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复活的军团

—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

 **eBOOK**
内容资料 非同寻常

梦想与光荣（代跋）

何尚

公元一九九六年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一个日光散淡的雪天，岳南与他的一位朋友踏进我位于十三陵的寓所，并力邀我去拜谒皇陵。在看完了那座辉煌灿烂的定陵地宫后，他坚持带着我们一路朝北，去拜谒另一座少为人知的墓园——庆陵。当我们尾随着岳南踏进那座荒草疯狂残垣四散的陵园时，正是昏鸦聒噪的黄昏。夕阳的余辉散落在残砖碎瓦之上，说不尽的凄凉落寞。看着这座曾经王气逼人恢宏壮美的伟大建筑竟然在岁月无情的剥蚀下，衣衫褴褛地俯伏在这个不为人知的角落，我们不禁心下黯然，而岳南却在陵园宝城上默立良久之后，突然双膝一弯跪倒在了一片昏黄的暮色之中。等到他终于站起身来的时候，我真切地看到他双眼中饱含着泪水。这一意外的插曲让同行的那位北大学子惊诧莫名，竟以为岳南是大明皇朝的皇亲国戚。

但我不能不为他这份苍茫的痛苦深深感动。

也许一桩隐秘的事件就能够展示一个作家对苍生万有的诚挚期待和寥远厚重的家国情怀！

新年伊始，从台湾传来消息，他与杨仕合著的《风雪定陵》一书获台湾《中国时报》十大好书奖，在那块倾心文化的岛屿上备受推崇，一时洛阳纸贵。

这种结果，我在五年前就曾有所预言，也算侥幸而言中。

那会儿中国文化界主义盛行，一派的浮华和浅薄，几乎没有几位作家去关注文化命运历史音容，似乎只有他还愿意坐下来谈论我们民族史上光披四表的秦汉气象、协和万邦的盛唐雄风，这多少让我欣慰而刮目。我告诉他上帝从来就不会辜负他优秀的子民。这个时代更需要我们去唤起同胞们对历史的温情和文化的关切！！

英国作家乔·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谈及中国唐初诸帝时期的文化腾达时，既满怀景仰又充满疑惑，似乎如此灿烂的文化景象多少有点似天方夜谭。为什么就没有一支如椽巨笔来解答乔·韦尔斯心灵中的疑团与神话呢？！

苍天可鉴，尚有岳南！

我不能不聊感慰藉！为这个悲苦而浪漫的民族、为这个喧闹而寂寞的文坛！

可也由于岳南常常对西方文化近乎偏执的不屑与拒绝，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位立志呵护古老文化的同仁怀有隐忧，担心他过于极端而陷进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泥潭，但当我郑重地翻开摆在案头的这部《复活的军团》的书稿时，我心里的疑虑涣然冰释。

这部显然是岳南创作生涯中最呕心沥血且又最为其本人满意的重在重现大秦帝国文化卓越风姿的文本，不仅以其超凡独到的眼光再一次烛照了一段辉煌壮阔的历史，而且更是从人类广袤的大背景下阐述了一种雄浑瑰丽的文明。其通篇一贯的深刻洞见和胸襟穹张的雍容气度，令人震动而叹服！风吹旧事，雪盖残年，又是一个心事苍茫的子夜，岳南坐在新年的屋檐下默默吸烟，在如慢的烟雾中，他凌空策马自在穿行，从敦煌到汉墓，从定陵到秦俑，从大国衰荣到沧桑历史……在人文精神普遍坍塌的时代的路口，他希图给这个摇晃的世界打进几颗古老而神圣的楔子，为人类苦难的心灵寻求依

托，忧愤激昂，激情洋溢……直到东方泛白他终于道出了他的梦想与雄心——在世纪末晚钟敲响的前夜，推出一套囊括中华文明阵脚的丛书，力争穷尽古国的文化渊源，从历史的隧道中捧出一盏灯火，传接千年脉动。我不禁肃然。想想看，在一个天下熙熙人欲横流的时代里，还有人在为人类文明的探寻求索倾尽一腔心血，下定如此决心，且甘苦不顾，岂非难得？我仿佛重又看到了那个千古壮士荆轲，正独立渭水河畔，慷慨悲歌，所不同的是荆轲仗剑上路，岳南执笔登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同样的从容与悲壮！

同样的梦想与光荣！

站在这个急速流变的城市河边与他挥手作别，我不知道除了道声珍重，夫复何言！

序章 复活的梦想

剧烈的颠簸，冰冷的海浪，使他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木船在风浪的推拥下，摇荡着向浩瀚的印度洋纵深方向飘去……

星月残淡，大海苍茫。

安提巴特斜倚船舱，抬起肿胀的手臂，想抹去额头腥润的血迹，一股钻心的疼痛使他忍不住哼了一声，没能完成这个在往日轻而易举的动作。

三个学生爬过来，呜咽着俯身抱住了他那孱弱的躯体。“扶我出去！”安提巴特有气无力地吐出一句。

木船漫无目的地在印度洋摇来荡去。安提巴特在三个学生的搀扶下，步履艰难地走出船舱。他仁立船头，望着凄冷的夜空和灰暗的洋面，恨恨地叹了一口气……

公元前 266 年。

风华正茂的迦太基探险家、诗人安提巴特，搭乘一只商船从故乡迦太基城出发，沿地中海扬帆东渡。他要去实现一个伟大的梦想，并做一个探险家应该做、也可能做到的事情。他雄心勃勃地向世人宣称：自己要踏遍世界各地，把亘古以来人类创造的所有伟大文明，全部载入史册。

从此，他踏上了亘古未有的风险之旅。

没有人给他提供这次旅行的经费，所需要的一切全靠他那个贵族家庭支持。他是幸运的。他的家族是迦太基这个著名的航海民族中的巨富，他们的祖先腓尼基人远在公元前 1200 年，就已经开始驾驶船只，并自由自在地出入地中海的最西端。这个民族发祥于地中海沿岸之东的狭长地带，随着国势日渐强盛，腓尼基人先后在塞浦路斯、北非地区、西西里、马耳他和西班牙等地建立了殖民地。十分发达的航海业，保证了腓尼基人海外贸易的顺利进行和在地中海建立商业霸权。到安提巴特的时代，这种航海贸易仍一直保持着昔日的繁荣与鼎盛。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特殊因素，安提巴特才敢大胆地构思自己的梦想并开始付诸于行动。

这年春，安提巴特乘坐的航船，从地中海北部进入爱奥尼亚海航线，并很快驶入了阿尔菲奥斯河。在阿尔菲奥斯河和科拉狄奥河相汇的地方，形成了一片宽阔的平原，平原的东、南、北三面群山环抱，它的中央点缀着一座不大的圆锥形山丘。安提巴特弃船上岸，奔向不远处的克洛诺斯的向阳山麓。他知道，闻名于世的奥林匹亚宙斯古庙就在眼前了。

安提巴特还知道，这里自古就是希腊的宗教崇拜的中心之一。希腊人来到之前，这里土著居民崇拜的对象是地神克洛诺斯与女神赫拉。他们为赫拉修建了神庙，举行祭典竞技。希腊人来到之后，这种祭典竞技被保留下来。与此同时，就在这同一地点，也开始了希腊人为自己的最高神——宙斯举行祭典竞技的活动，并且逐渐取代了前者。相传，这里当时恶疫流行，迷信的人们为了从宙斯那里得到拯救，便为他举行盛大的祭典竞技。这个祭典竞技开始于公元前十三世纪，但作为希腊纪年始点的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赛会，则被公认是在公元前 776 年。传说中，伊利斯王伊菲斯特和斯巴达王莱库古是这次赛会的倡导者。

在所有的神词和庙堂建筑中，最大的一座就是宙斯神庙。

安提巴特沿着“圣道”，来到一道粉白色石垣前面。这道高大宽厚的石

垣紧紧包围着阿尔契斯圣林。他按捺住心中的激动，穿过大门，登上一块高高的台地，雄伟庄严的宙斯古庙便完全展现在他的面前。这座大约建成千公元前五世纪六十年代的神庙，是一座典型的以雄浑朴素著称的多利亚式神庙建筑。这是古希腊人为自己的最高神灵宙斯举行祭典竞技的活动圣殿。主厅内，透过弥漫的烟雾，一尊巨大的雕像映入安提巴特的眼帘，这就是闻名于世的神庙的本尊宙斯雕像。

高约 14 米的宙斯神像，安详地坐在一个杉木制成的嵌着无数宝石并雕以花纹的宝座上。神像由乌木雕刻而成，肌肤的外露部分和衣饰分别覆以象牙和黄金。众神之主的宙斯，右手托着黄金象牙制成的胜利女神，左手握一根精雕细镂的王杖。王杖是金属的，上端傲立着一只啄爪犀利的雄鹰。足台的浮雕栩栩如生地刻画着希腊人同亚马孙人①相互残杀血战的壮烈图像。

在这个圣灵与艺术交相辉映的圣洁殿堂里，安提巴特完全被这气势雄伟、神态庄严的“天父”和古希腊辉煌的现实主义雕刻艺术所征服。他感到未曾有过的身心颤栗和灵魂的跃荡。“无法拒绝上帝赋予的使命，把这人类杰出的灿烂文明记入史册。”

初次旅行的成功，使安提巴特证实了自己的那个梦想完全可以实现，也更增强了他完成那个宏伟梦想的信心和勇气。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继续搭船沿地中海东巡，并观瞻了小亚西亚西端罗德岛太阳神巨像、毛索洛斯陵墓和以弗所阿尔特米斯神庙这三大照耀千古的人类文明奇观。

安提巴特并未就此止步。翌年春，他扬帆南下，直奔地中海南岸和尼罗河三角洲西北端的法洛斯岛。在这里，他看到了刚刚建成几十年的年轻的亚历山大①灯塔。

这座底座呈正方形，上部分别呈八角形和圆柱形，高为 135 米的巨大灯塔，傲然屹立在距岛岸七米处为巨浪所刷洗的礁岩上。这个庞然大物所占有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安提巴特大感兴趣，连连称奇。使他更为诧异的是，塔顶站立着海神波塞冬，他手中高举着一个巨大的火炬，这个火炬昼夜喷着烈焰，通过凹面镜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夜间航行的船只，即使在距此 56 公里的海面，也能够迅速准确地找到驶往亚历山大港的航向。

安提巴特详细考察了灯塔的形体、结构，并把希腊设计师在灯塔上留下的题词一并记了下来：“德克西弗涅之子，克尼多出身的索斯特拉图，为祝祷航海者的幸福把它献给救世主。”

年轻气盛、春风得意的安提巴特，以同样兴奋、激动的心情又踏上了尼罗河下游西岸和利比亚沙漠东部边缘的地平线。他花费了近半年的时光，考察了从阿布·罗阿希到法尤姆之间的 70 多座法老金字塔②。由于经费日渐紧张，再加上季节的变换，安提巴特未敢久留，因为另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在吸引着他。那就是公

元前 4 世纪米利都人、著名史传家赫卡泰俄斯①在《大地环游记》一书中，曾经提到过的那个美妙动人的“空中花园”。

在金字塔前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身旁，安提巴特顶礼膜拜了一番之后，便开始踏上了新的旅程。他从红海东岸穿越阿拉伯半岛，于公元前 264 年春到达乌尔城，不久，便开始沿幼发拉底河进入了仰慕已久的巴比伦古城。在这里，安提巴特终于看到了被赫卡泰俄斯描绘得出神入化的“空中花园”。然而，遗憾的是，这座精美绝伦、令无数史学大师和艺术巨匠崇拜得五体投地的神奇建筑，已经失去了它昔日的神俊风采，留在他面前的只是一副悬立

在空中的“骨架”了。

安提巴特并没有因此而懊悔，反而为自己在有生之年尚能看到这一伟大的遗迹而庆幸。如果说赫卡泰俄斯记载的是一座完整的“空中花园”，那么他今天将可以描绘的则是正在走向毁灭的一幅图景。从鼎行走向毁灭这一关键性的链条，同样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欠缺的一页。

安提巴特加紧整理手头的资料，并开始四处募集经费。他在积极地作着继续向东方探寻的准备。他要完成他的壮举，彻底实现那个辉煌的梦想。

正在这时，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迦太基人与罗马人的战争在地中海揭开了序幕。罗马大军攻占西西里岛之后，以猛不可挡之势向迦太基海军舰队扑来。

面对紧张的战争局势，安提巴特不得不暂时放弃东寻的梦想。

战争的序幕一旦拉开，其结果就只能凭武力来确定。迦太基人与罗马军队的战斗异常激烈，蔚蓝的地中海不时涌荡起腥红的血水，成千上万的人葬身鱼腹。对战争极为厌恶的安提巴特，没有因时局的动荡而改变初衷。他把此次旅行所见到的人类文明奇观，详尽地整理成册，并按建造时间的先后进行排列，命名为“世界七大奇迹”。七大奇迹分别是：

一、埃及的“金字塔”（Pyramid）——金字塔是古埃及法老（即国王）的陵墓。据知，埃及现存的金字塔尚有 70 余座，其中最大而享名的要数开罗附近尼罗河西岸吉萨的胡夫（Khufu）金字塔。它是埃及第四王朝（公元前 2613 年～前 2494 年）法老胡夫（Khufu）的陵墓，建于公元前 2700 年左右。塔呈四棱锥体，基部每边长度的观测量是 220 米（原 230.38 米），高度的观测量是 137.18 米（原 146.6 米），占地面积 56,900 平方米，体积达 252.1 万立方米。估计是由 230 万块石灰岩石块堆砌而成，每块石重平均为 3,000 公斤。用二十万人，历时三十年建成。

二、巴比伦城中的“空中花园”（Hanging Gardens, 又称“悬苑”）——古巴比伦王国位于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中部，幼发拉底河沿岸（今伊拉克境内），曾于公元前七世纪末建成方形的都城，城外围绕有巨大的护城河。据载，城每边长 13.2 公里。巴比伦都城的这种形制和布局，在古代的中东是极为罕见的。相传公元前六世纪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 B.C. 645～B.C. 561）为思念故乡的王后。在巴比伦宫殿附近构筑了一座经过绿化了的人工土山。山每边长 125 米、高 25 米，分三层，用巨大的石柱支撑着铅板，作成平台，再在台上堆积肥土，种有各种奇花异草，远望犹如悬在空中。可惜因都城和花园地处河岸、随着时间的推移陷入了地下。

三、土耳其以弗所（又译作“埃弗兹”）的月亮女神阿忒密斯神庙（即岱雅那寺 Temple of Diana）——罗马帝国于公元前 560 年建造，位于靠近伊德雷斯河的出海口。庙长 125.6 米，宽 64.79 米。台基立有高 23 米的爱奥尼亚式（Ionic order）圆柱 127 根，其中 30 根的基座上装饰有金属浮雕。柱顶上用大理石建造有长方形的屋顶。整个建筑宏伟华丽，颇为壮观。公元前 350 年毁于火灾，随后重建，但于公元前 262 年被哥特人焚毁。

四、希腊奥林匹亚宙斯（Zeus）巨像——（一说为雅典的朱庇忒 jupiter）建造于公元前五世纪，像高 14 米，如算上底座可达 17.2 米。此雕像出自当时雅典大雕塑家和建筑家菲狄亚斯（Phidias）之手。他先用乌木（Diospyros Cebelum）雕造支架，再用象牙片和黄金片分别贴附躯体和衣服。眼睛则是

用宝石镶嵌的。基座上作成一系列金质浮雕和立体雕像。可惜此宙斯神庙及其雕像毁于公元 523 年和 551 年的两次地震中。十九、二十世纪，德、法建筑考古学家均对遗址作过发掘，但收获甚微。

五、土耳其哈利卡纳苏的摩索拉斯陵墓（Mau-soleum）——摩索拉斯是公元前四世纪小亚细亚王国的国王，为炫耀他的统治权力，于公元前 333 年在加利卡尔那斯城的中心广场为自己建造了规模宏大的陵墓。陵墓正面约 33 米，侧面 38.7 米。四周的基台上配置爱奥尼亚式列柱 36 根组成柱廊，用以承托巨大的斜面屋顶。柱头上雕涡卷形，异常典雅华丽。墓顶上用大理石雕刻着四马战车，车上站的是摩索拉斯夫妇雕像。整个陵墓建筑高约 50 米。公元十五世纪，这座陵墓被十字军的圣约翰骑士团焚毁，大部分石材和雕刻品被烧成了石灰，其余的石块则被用作建造城堡的材料。残像现存大英博物馆。

六、地中海罗德岛上的阿波罗（Apollo）巨像——公元前四世纪末，马其顿将领狄米特里乌斯率领四万军队、370 艘军舰侵入地中海爱琴海附近的罗德岛（现属希腊），结果被打败。罗德岛居民为了庆祝这次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于公元前 303 年（一说公元前 280 年）用缴获的武器熔铸了太阳神阿波罗铜像，以作纪念。这尊像高 35 米，据说一个手指比真人还高。由于重心过高，竟在公元前 224 年（一说公元前 244 年）的地震中倒塌。

七、埃及亚历山大城之灯塔（pharos or light-house）——位于埃及法罗斯岛防波堤的南端，即亚历山大港岸。建于公元前 280 年，颇具巴比伦风格。据我国南宋人赵汝适《诸蕃志》载，此塔高二百丈，上下可容纳二万人。塔内有房 300 间，塔顶有一巨大的火盆，后置一面被磨光了的花岗石反光镜。有材料说此灯塔高 120 米，可分三层，第一层呈每边各长 30 米的方形，高 60~70 米；第二层呈八角形，高 30 多米；第三层是圆塔，顶设火炉，在 50 公里以外的海船都可看到它的火光。此塔毁于 1375 年的地震之中。

随着时间的流逝，安提巴特的东寻之梦日渐强烈，时时萦绕在心头。他确信，在遥远的东方世界，一定也会有足以和西方“七大奇迹”相匹敌的人类文明。

他默默地等待东寻的时机到来。

迦太基人与罗马人交战 23 年后，双方在艾加特斯海上进行了一场最为关键的空前大较量。结果，迦太基人海上舰队受到致命的重创，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迦太基人不得不饮恨含泪，以赔偿巨款和放弃西西里岛主权为代价，暂时向罗马人乞和。战争随之和缓下来。

安提巴特瞅准这难得的契机，毅然率领五名学生驾船东渡。由于战争尚未完全结束，他的木船时常遭到罗马军队的拦截。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几次改变航道。当他们历尽艰难驾船驶入阿拉伯海域时，厄运降临了。

一伙凶猛的海盗袭击了他们的木船，船上的一切均遭破坏，几乎被洗掠一空。两名学生与海盗的搏斗中殉难，安提巴特本人也身负了重伤……

小船仍在茫茫的海面上飘荡，绝望中的安提巴特眼望无垠的苍穹和惨淡的星光，辨别了小船可能所在的位置，命令学生转舵向西方的加斯加群岛行驶，以期休整补充后再驶向东方。

然而，未等小船靠岸，安提巴特便带着他未竟的梦想，在绝望与怨愤中气绝身亡……

就在安提巴特谢世二千年后的 1969 年 7 月 20 日，世界人类文明史上发

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美国“阿波罗”号宇宙飞船登月成功。从此，人类迈出了征服宇宙的第一步。

当美国国家宇航局询问在月球上的宇航员能看到地球上的哪些人类建筑时，登月队员阿姆斯特朗站在加里加特梯死海之上，充满活力与想象地回答：“中国的万里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

随着阿姆斯特朗话音的悠悠飘落，人类以惊奇的目光注视着黄河与尼罗河这两条大河孕育出的民族。同时，安提巴特的陈年旧梦也从海底再度浮出。接着，中国的万里长城能否与安提巴特的“七大奇迹”相匹敌的论争，在史学界兴盛起来。有人肯定，有人否定。当史学家们为此难以定论以至争执不休之际，谁也没有想到，在世界东方的黄土高原上，突然跃出一支秦代的大军。8000余名披铠贯甲的将士，乘着隆隆的战车，风尘仆仆浩浩荡荡地冲入现代人类的视野——

世界震惊了。

安提巴特那个辉煌的梦想复活了。

世界第八大奇迹——在中国。

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

岳南

第一章 穿越世纪的曙光

秦俑的问世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喜讯。埃及金字塔虽好，但不能与此相匹敌。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整个东方的自豪。

——日中友好联盟会会长浜野靖吾

走出混沌

1974年春天，严重的旱情威胁着中国西部的八百里秦川。返青的麦苗在干渴的折磨下趴伏在大地上，以祈求上天的恩赐。水，在这片黄土地上，一切生命都需要水的滋润。忠诚的祈祷并没有感动上帝。日复一日，依旧不曾有一滴水珠从天上洒下来。坐落在骊山脚下的西杨村自然也不例外。或许，贫困与落后，更加重了他们对水的关注与对麦苗的厚爱。这片土地的每一个主人都深深懂得，田园的麦苗枯萎之时，也是他们自身的生存受威胁之日。

一切故事都从这里开始——

夕阳的余晖笼罩着村南的柿树园，白光闪闪，折射出令人心焦的光。奔走了一下午的西杨村生产队长杨培彦和副队长杨文学，站在柿园一角的西崖畔上。二人眼望着这片只长树木，不长庄稼的荒滩，不由再三犹豫，踌躇不定。

太阳从西方落下，小鸟跳动着在树林中寻找栖身之处。杨培彦终于下定决心，挥起笨重的镢头在脚下石滩上划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圈：“就在这里吧！”

杨文学望望骊山脚下那个断裂的峪口，正和身前的圆圈在一条直线上。他点了点头：“但愿土地爷帮忙。”

此时的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不规则的圆卷将意味着什么。

翌日晨，以西杨村杨全义为首的6个青壮年，挥动大镢在杨培彦画的圆圈里挖掘起来。尽管地面布满了砂石，镢到之处火星四冒，但在干旱中急红了眼的农民，还是以猛不可挡之势穿越了砂石层。将近中午，工程进度明显加快。

当挖到1米多深时，出乎意料地出现了一层红土。这层红土异常坚硬，一镢下去只听到“咚”的碰撞声，火星溅出，却无法穿透土层。

“是不是咱们挖到砖瓦窑上了？”井底的杨新满放下镢头，不解地望着众人。

“可能。听老人们说，咱这一带过去有不少烧砖瓦的土窑。”杨全义说着，递过一把镐头，“来，用这玩艺挖挖看。”

井下又响起了咚咚的声音，坚硬的红土层在杨新满和杨志发两个壮汉的轮番攻击下，终于被凿穿了。这是一层大约30公分厚的粘合状红土，很像烧窑的盖顶（实则是兵马俑坑封土的夯土层）。有了这样一个概念，在以后的挖掘中出现的陶片，都被他们和砖瓦窑联系在一起，也就不再奇怪。

越过了红土层，工程进度再次加快。不到一个星期，这口直径为4米的大井就已深入地下近4米。这时，他们手中的镢头离那支后来令世界震惊的庞大军阵，只有一步之遥了。

历史应该记下这个日子——1974年3月29日。

当杨志发的镢头再抡下去又扬起来的瞬间，秦始皇陵兵马俑的第一块陶片出土了。奇迹的第一线曙光露出地面。

遗憾的是，这块陶片的面世并没有引起杨志发的重视，他所渴求的是水。此时，水比陶片更为令人渴盼。于是，杨志发和同伴的镢头便接二连三地

这支地下军队劈去。

一块块头颅，一截截残肢、一根根断腿相继露出，大家终于注意了。

“这个砖瓦窑还有这么多烂东西？”一个青年抹了把额头的汗水，沮丧地小声嘀咕了一句。

“砖瓦窑嘛，还能没有点破烂货？快挖吧，只要找到水就行。”杨全义在解释中作着动员。那青年人叹了一口气，又抡锄劈向军阵。

在井筒西壁的杨志发突然停住手中的锄头，大声喊道：“啊，我挖到了一个瓦罐。”

听到喊声，正在运土的杨彦信凑上前来，确是有一个圆口形的陶器埋在土中，便好心地劝说：“你慢慢地挖。如果没坏，就拿回家到秋后煨柿子，听老人们说，这种瓦罐煨出来的柿子甜着呢！”

一旦人的具体目的改变，行为也随之转换。在得到和利用的心理驱使下，杨志发不再盲目地大刀阔斧劈下去，而是锄手并用，连刨带扒，轻轻地在这个瓦罐四周动作。土一层层揭去，杨志发心中的疑窦也一点点增加。当这件陶器完全暴露在眼前时，他才发现自己上当了。

眼前的东西根本不是要找的瓦罐，而是一个人样的陶制身子（实则是一个无头空心陶俑），他晦气地摇摇头，用足了劲掀入身旁的吊筐，示意上面的人拉上去。

当这件陶俑身子刚刚抛入荒滩，井下忽然又发出一声惶恐的惊呼：“瓦爷！”

众人又一次随声围过来，又几乎同时瞪大了眼睛，脸上的表情有了明显的变化，肌肉在紧张中急骤收缩起来。

摆在面前的是一个陶制的人头，形象极为可怖。

只见这个人头上长角（实则是武士俑的发髻），二目圆睁，紧闭的嘴唇上方铺排着两撮翘卷的八字须，面目狰狞可怕。有一大胆青年用锄头在额头上轻敲，便听到咚咚的响声。

“是个瓦爷。”有人做了肯定的判断。

“我看咱们挖的不是砖瓦窑，是个神庙摊子，砖瓦窑咋会有瓦爷的神像？”有人推翻了以前的判断，同时又提出了新的见解。这个见解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

“甭管是砖瓦窑还是神庙摊子，找到水才是正事，快挖吧！”组长杨全义又把大家的注意拉回现实的生活中来。没有人再去发表见解和为此大惊小怪了。摆在面前的的确如杨全义所说，找到水才是正事。

随着锄头的劈凿，铁锹的挥舞，一个个武士俑头、一截截残腿断臂，一堆堆俑片，被装进吊筐拉上地面，再抛入荒滩野地。

出土的陶俑终于引起了一群儿童的兴趣，他们纷纷奔向荒滩捡拾俑头，先是好奇地玩弄，接下来便将俑头立于荒滩作为假设的坏蛋，在远处用石头猛烈轰击。有聪明的孩子则采取“古为今用”的方针，将俑身和俑头一起搬到自家的菜园中，在俑的手里塞上一根长杆，杆头上拴块红布，然后再找来破草帽，将陶俑打扮成一个活脱脱的看园老翁，立在院中，日夜守护菜园，使麻雀不敢放肆地前来啃啄返青的菜苗。

在所有拿走俑头的人们中，只有一个 70 多岁的老抠作了完好无损的处理。她把俑头的尘埃用水冲洗干净后，在自己那两间低矮灰黑的土屋里摆上案桌，将俑头小心地放在上面，点燃香火，以虔诚的姿态大加叩拜。自后，

家中整日香烟燎绕，老姬的精神日渐爽朗起来，和儿媳的吵骂也明显减少。

正当人们对陶俑大加戏弄，损毁或膜拜之时，村南的井下发现了更加奇特的情形。

在离地面约5米的深处，大家发现了青砖铺成的平面，同时，还有3个残缺的弩机和无数绿色的青铜箭头。这是地下军阵向两千年后的人类发出的最后一丝信号，兵器的出土意味着对砖瓦窑和神庙两种推想的彻底否定。随之而来的应是一种更切合历史真实的构想诞生。可惜，这里没有人再去理会这最后的讯息，更没有人再围绕这稍纵即逝的讯息去思考些什么了。让众人欣喜和激动的是，尽管没有找到地下水，但却找到了硕大的青砖和铜器。本世纪20年代，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周围，不断有秦砖在农民的耕作中出土。这些刻有精巧图案的秦砖，引起了官僚、军阀以及小姐、太太们的兴趣，从而兴起一阵抢购秦砖之风。伪陕西省省长宋哲元，曾用一块秦砖一斗麦的高价，搜购了一汽车秦砖拉往省城。农民们并不知道秦砖汉瓦的文物价值，见抢购之风兴盛，便好奇地四处打听和猜测，最后一致的结论是：用秦砖作枕头，可以避祸免灾，延年益寿。对于今天正在打井的农民来说，砖层的出现自然是个喜讯。尽管一时还不能辨别是不是秦砖，但毕竟是古代的东西，先拿回家做成枕头试验一阵子，再做好坏真假的结论，则是最明智的办法。于是，井下的秦砖很快被哄抢一空，走入千家万户的炕头。

当别人哄抢秦砖时，有一位青年却棋高一招。他默默地伏在井下，从泥土中捡拾看上去并不显眼的青铜箭头。附近的三里村收购站以14.4元的代价，将这几公斤青铜购去后，村人才蓦然醒悟：“还是这家伙有心计。”

打井工地围绕着“瓦爷”的出现这个话题，确是沸沸扬扬热闹了一阵子，终又归于静寂。大家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样，重新抡起手中的撅头，向大地母亲的肌体劈去。

那支庞大的地下军队，不惜以个体毁灭的代价向世界投递信息，却未能得到破译和救援的相应的回声。人类的目光，穿越军阵又匆匆移去，双方都未能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契机。纵然地下拥有千军万马，但他们已无法再向人们发出一丝哪怕是微弱的呼唤讯息了。

绝望中诞生

历史应该记住他的名字——临潼县晏寨公社水保员房树民。

他的工作职责是管理、调配晏寨公社的水利建设和水源利用。西杨村打井的消息自然会输入他的意识储存。事实上，这口井开工的第三天，他就察看地形和工程进展的情况，并对在此处取水充满了信心。于是，听说井已深入地下5米多，仍不见一点水星时，他便揣着诸多疑问来到西杨村。

“这口井为啥还不出水，是不是打到死线上去了？”房树民找到生产队长杨培彦询问。

“不像是死线。可不知为啥，打出了好多瓦爷。”杨培彦回答。

“什么样的瓦爷？”房树民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像真人差不多，还有好多青铜箭头、秦砖。”杨培彦含着烟袋，像叙述一段久远的故事，详细地介绍了打井过程中发生的一切。

房树民来到了井边。

他先在四周转了一圈，捡些陶片在手里端详敲打一阵后，下到井底。

井壁粗糙不平，一块块陶片、碎砖嵌在泥土里，只露出很小的部位。他用手抠出半块砖，来到组长杨全义的跟前：“这井不能再挖下去了。”

“为啥？”杨全义吃了一惊。

“你看，这砖不是和秦始皇陵园内出土的秦砖一样吗？”

“差不多。可要这些东西也没啥大用处。”杨全义仍然不解其意。

房树民爬出井口，找到生产队长杨培彦：“我看这像古代的一处遗址。先让社员们停工一天，我打电话让县上来人看看再说。”

当天下午，临潼县文化馆馆长王进成带领文物干部赵康民、丁耀祖，骑车来到西杨村。生产队长杨培彦介绍了一番情况后，领他们到菜地、滩头查看了几个较完整的陶俑。几个人震惊了，他们在临潼这块文物宝地，接触了许多形形色色的古文物，从未发现过如此高大的陶俑，惊诧之余，又一时难以断定属于哪个朝代的文物。假如是在秦始皇陵的封土边出土，则无疑是属于秦俑。可是这里离那个高大的土冢，尚有三里多地，秦俑跑到这里干什么？

他们没有为此多伤脑筋，目前最急需的是把这些文物收拢起来，以后再慢慢研究。

“这可能是极有价值的国宝，井不要再打了。赶紧把这些东西收拢起来，送往县文化馆收藏好……。”馆长王进成对杨培彦叮嘱了一番，即刻返回临潼。

第二天，县文化馆赵康民又骑车来到西杨村，和社员一起四处收拢捡拾陶俑、陶片，同时又赶去三里村废品收购站，将青铜箭头买回，装满六架子车派人送往县城后，他再来到打井工地。从农民家中找来铁筛，将可能带有陶片的泥土全部过筛，以寻找细小的陶俑碎件。许多俑耳、俑鼻、俑指被筛了出来。赵康民又指导社员在井下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发掘。

目的基本达到，赵康民以惊喜和激动的心情，伴随最后一筐陶片进入临潼城。

如果说水保员房树民的一个电话，使这支地下大军看到了一丝面世的亮光，那么，这点亮光也仍然只是暗夜里的萤火，一闪即逝了。

临潼县文化馆没有将这个重大的考古发现继续上报，只是让文管干部赵康民在馆内的一角悄悄地对陶俑进行修复。这种令人费解的心态和处置方法，使这支地下大军再一次陷入绝望。

当然，文化馆领导及赵康民也有自己的苦衷。那还是在1964年，正是全国上下大搞“四清”运动时候，年轻气盛的赵康民曾因为把渭河北岸出土的南北朝时代的几个石雕像用车拉到县文化馆收藏，结果被当作搞“封资修”的典型，在全县通报。

历史上常有许多东西应该属于未来。眼下，“批林批孔”正热火朝天，鉴于历史的教训，在报与不报的两难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

陶俑进入临潼县文化馆的两个月后，由于一个青年的偶然出现，使这支地下大军终于绝处逢生，大踏步走向当今人类的怀抱。

正在家乡临潼县度假的新华通讯社记者蔺安稳，无目的地来到爱人所在的县文化馆闲逛。当他走到陈列室一个暗淡的角落时，心蓦地一颤，禁不住出声问道：“这是什么东西？”

没有人回答。

蔺安稳急急奔上前去仔细察看。只见一个个形同真人的陶俑，身披铠甲，手持兵器，好不威武。他当即断言：“这是二千年前秦代的士兵形象，为国家稀世珍宝。”

自小喝渭河水长大的蔺安稳，太熟悉自己的故乡了。周幽王戏诸侯的烽

火台、杨玉环洗凝脂的贵妃池，项羽火烧阿房宫、刘备智斗鸿门宴……无数流传民间的故事伴他度过了天真活泼的少儿时代。当他还是一名中学生时，他便按照父辈讲述的故事，四处寻觅遗迹。秦始皇陵那高大的土冢也由此成为他嬉戏的乐园。他曾无数次从陵墓的封土上滚下，又无数次攀上去。这里留下了他童年的足迹和青春的梦。

1964年，23岁的蔺安稳结束了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的四年大学生活，迈进新华社国际部的门槛，开始了记者生涯。不幸的是，一帆风顺、踌躇满志的蔺安稳在“文革”中因为写了一篇《和陈伯达、戚本禹商榷》的文章，一夜之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到隔离审查。在这段岁月里，他通读了《史记》、《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凡书中提及有关家乡的章节句子，他都牢记心怀。有关秦始皇陵的记载更是烂熟于心。正因为如此，他才敢对面前的陶俑作出大胆的结论。

蔺安稳以记者职业的独特敏感和根据他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去西杨村作了深入调查了解后，写出一篇最终改变了这支地下军队命运的文章：

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

陕西省临潼县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出土了一批武士陶俑。陶俑体高1.68米左右，身穿军服，手持武器。是按照秦代士兵的真实形象塑造的。像这种同真人一样的立俑，还是第一次发现。

秦始皇陵周围以前曾出土过陶俑，但都是一些体积不大的跪俑。像这种真人一样的立俑，其珍贵的地方，在于这是一批武士。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而秦代士兵的形象，历史上未有记载。这批武士俑是今年三、四月间，当地公社社员打井时无意发现的。从出土情况推测，当时陶俑上面盖有房屋，后来被项羽焚毁，房屋倒塌，埋藏了两千多年。这批文物由临潼县文化馆负责清理发掘，至今只清理了一部分。因为夏收，发掘工作中途停止了。

秦始皇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是并没有得到妥善保护。生产队随意在陵园掘土挖坑，开荒种地。出土文物中的金属制品，有的竟被当作废铜烂铁销毁掉，一些石制、陶制物品则被抛来抛去，实在令人心痛和不安。

（新华社记者蔺安稳）1974年6月24日，蔺安稳回到北京，将文章修改后交于《人民日报》。出于某种考虑，人民日报没有公开登载这篇报道，而是把它刊登在内部编印的《情况汇编》上。这篇文章，是关于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情况的第一次文字报道。内参稿印发后，立即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6月30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同志对此文作了批示：

建议请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

随着内参与批示的面世，世界第八奇迹穿透两千年岁月的尘封，终于在东方闪烁出它最初的光辉了。

历史的信息

据考古学家论证：秦始皇陵周围共埋藏形状不同的陶俑万余件，陶马近千匹。这样一支浩大的地下俑群，千百年来是否向人类传递过信息？这历史的音讯是怎样传出，又是如何消失的？

历代王朝编纂的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一切故事都来自于民间——讯息之一：

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后，亲率大军东渡黄

河，直上北京。多尔衮带领数十万八旗子弟进驻山海关以东的茫茫雪原，虎视眈眈翘首西望。大明帝国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向历史的死海沉去。

由于战祸连绵，骊山脚下难民云集。西杨村自然添了不少逃难的百姓。

依然是春旱无雨，村中仅有的一口井已不能满足众人的需要。于是，难民们便组织起来，到村南的荒滩上掘井取水。

一切都极为顺利，仅三天时间，井下已冒出清冽的泉水。然而，一夜之间，井水又流失得不能倒桶提取（考古人员今天判断，井水是流入了陶俑坑）。众人见状，无不称奇。

有一青年找来绳子挂在腰上，下井查看。当井上的人们急着要得知缘由时，却意外地听到了井下一声恐怖的惨叫，随后再无声息传出。人们赶快把青年拉上来时，只见他已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忙乱中，人们将青年抬回村中，用姜汤灌醒，他却只能用手比划，说不清是何缘故。

一大胆的汉子提刀重新下井，探看究竟。由于眼睛一时不能适应井底的灰暗阴森，大汉便以手摸壁，四处察看，发现井壁已被水泡塌了厚厚的一层。

正在这时，只听身后哗啦一声响动，大汉打个寒战，急转身，只见一块井壁塌陷下来，随之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洞口。洞口处站着一个张牙舞爪的怪物，晃荡着似在向他走来。

大汉本能地举刀砍去，随即向井上发出呼救。当他被拉出井口时，已面如土色，昏倒在地。

消息传开，无人再敢下井探寻。西杨村一位老秀才遍查历史古典，终于找到了“不宜动土”的根据。这口谜一样的井随之填平。

老秀才为让后人牢记“不宜动土”的缘由，特地用“笔记”形式记载了事件的详情：

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初七，民于村外掘井，三日，乃水出。是夜，则水失而不得倒桶。众人见状，无不称奇。一后生缒井而下，随恐噤而昏厥。姜汤灌之，后生乃不知井下何者也。另有壮士提刀复入其井，壁塌，见一怪物如真人，咄咄作噬人状。士骇极，举刀砍之。怪物乃不倒。村人闻呼将士提出，士乃久昏不醒。吾闻之，告不宜动土也，复平之。呜呼，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滋生，是以记之，以醒后世者也。

老秀才这“不宜动土”的理论，尽管没有让后人醒悟，并停止在这里的发掘，但这份“笔记”，应该是最早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信息的记载。讯息之二：清宣统年间，骊山脚下的下和村一个叫和兴道的老人猝然病逝，家人悲痛之余忙给死者筑家送终。在一位风水先生的指点下，坟址选在了西杨村南的荒滩上，按风水先生所言：“此地背倚骊山，西靠秦陵，东傍少华秀峰，面临渭河滔水，实为难得的风水宝地。葬入此处，保证家业兴旺。”

和氏家族按风水先生指点的具体位置，悲喜交加地掘了下去。当墓坊快要完工时，令人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看上去面部狰狞的陶俑头露出地面，惶恐中，和氏请来族里长者察看，经过一阵深思琢磨，长者断言：“这是不祥的征兆，咱受风水先生的骗了，他想绝咱的后代啊！”

事情变得错综复杂起来，按当地风俗，人死后只能选一处墓址，墓位选定，一旦挖下第一锹土，无论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都要把死者埋入此处，若再改址，家中必然还要有人接着死亡。

既然已无路可退，而这里又明显发出了“不祥”的信号，怎么办？悲愤、沮丧已极的和氏家族一致决定：“拿风水先生试问！”

拿了赏钱正在家悠然自得地喝酒的风水先生，被突然闯来的四个大汉扇了几个耳光，酒桌也四脚朝天。没有等风水先生发话，四条大汉便把他挟持到墓地。这时整个陶俑已被在焦虑中变得疯狂的和氏家族挖了出来。

风水先生一见这仰躺在地上的真人模样的“怪物”，先是大

吃一惊，随着额头沁出的汗珠，渐渐从模糊中醒了过来。在他几十年看风视水的漫长生涯中，像这样的事情却没遇到过，真可谓世道沧桑，奇事百出，让他大开了眼界。

面对这狰狞的“怪物”与和氏家族悲愤的烈焰，老先生惊恐之中便充分显示了他久经沙场、浪荡江湖的才能和胆识。他先是把脸一沉，来到和氏家族长者的面前，大声质问：“你们如此恩将仇报，是何意思？”

“你看，这是什么？”长者抖动着花白的银须，指着陶俑：“你让先人同妖怪作伴，是不是想断我子孙？”

风水先生狡黠地笑了笑：“原来如此，你来看，这是什么？”他把长者的视线引向不远处的荒滩野地。

荒滩上十几座土丘隐约可辨，长者望着，大惑不解。“不知道吧。”风水先生变得温和起来：“我来告诉你，那土堆下埋的全是作古的先人，这些先人的后世子孙也都一个个发了起来。你们过来看。”风水先生领着和氏家族众人来到土丘旁，逐一指点：“这是三国时五官中郎将赵世济的父亲葬地；这是明嘉靖年间礼部尚书王战胜母亲葬地；这是清康熙四年状元郎杨茂完父亲葬地，还有这几座，全是历代名人士家的先人葬地……”

风水先生清了下嗓子，对那白发长者：“他们的后世凭什么得以显赫，成为人上之人？”

“凭什么？”此时，和氏家族已被风水先生这番云山雾罩、不着边际的演讲弄得晕头转向，不得不强按怒火反问。

风水先生见和氏家族已被唬住，便大着胆子继续行施他的骗术。他来到陶俑前，用手一指：“就凭他，是他的功劳。”

和氏家族更是如坠雾中，接下来就只有听凭风水先生那巧言如簧的解释了。

“先父临死的时候，把我叫到他的跟前，悄悄地对我说，‘孩子，我看了一辈子风水，对四周了如指掌，可就是西边那块荒滩捉摸不透。看上去那是平常的一块地，怎么在那里入葬者的后世一个个都发了。我平生没敢让人葬于此处，你也不要随便让人在此入葬，等有朝一日琢磨透了，再去行施吧。’说完，先父就闭上了眼睛。”风水先生讲到这里，像集市上说书卖艺的行家，故意留下悬念，以吊起众人胃口。

“后来呢？”终于有人入了圈套。

“我记住了先父的遗训，开始琢磨这个地方，但 30 年没能开窍。后来我来到皇姑庙，终于得到了仙人的指点，才醒悟。原来这些入葬的先人墓旁都有这个宝贝，这就是古书上说的仙神，是它的保佑才让入葬者的后人显赫起来。”

“真的？”和氏家人已完全被他征服。

“我见你和氏一家为人厚道忠诚，和我家父辈又有交情，才将墓穴选入此地。我有心告诉你们这个秘密，但天机不可泄露，只凭自然。想不到今天你们如此放肆，真是岂有此理！”风水先生说完，一屁股坐在地上，气喘吁吁，作冤屈状。

和氏家人终于豁然开朗，由悲转喜，白发长者红着脸过来陪理道歉，急命人将风水先生领回家酒肉伺候……

为洗刷刚才的耻辱，老先生借着酒劲，心生鬼招，以捉弄和氏家人。酒足饭饱之后，他把招数悄悄地告知白发长者，领了赏钱，扬长而去。

半夜时分，和氏家人将陶俑偷偷抬回家中，用绳子捆绑起来放入死者面前，死者的儿子咬破手指，将血溅于俑头之上后，挥动桃木条子向俑身猛力抽打，直到黎明鸡叫三遍才停下。如此连续三日，和氏家人再在夜深人静时将俑悄悄运往墓地埋起来。这是风水先生对和氏家人的报复。而和氏家人却真认为如此去做就能子孙兴旺、家业骤发……

这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是后来考古学家在附近农村调查中得知，讲述者就是那位风水先生的儿子，时已年过八旬。早年也曾以祖传的观风看水为生，当年他父亲向他讲述这个故事的目的在于启发他随机应变，转高山为坦途，化干戈为玉帛，以应付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

故事尽管有渲染编撰的痕迹，但基本事实似不能否定，因为在后来大规模的发掘中，证实确有十几座墓葬已穿入俑坑，其中一座为汉代，两座为明、清时期墓葬，周围的陶俑都有挪动的明显痕迹。可惜这些信息，没有传给更多的人类，就被愚昧埋葬讯息之三：

1932 年春，在秦始皇陵内城西墙基外约 20 米处，农民在掘地中，从 1 米多深的地下挖出一个跪坐式陶俑，此时关中正值军阀混战，狼烟四起。这个陶俑很快下落不明。据推测，此俑很可能被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带走。

1948 年秋，在秦始皇陵东的焦家村附近，农民又挖出两件跪坐俑，两俑均为坐像，身着交襟长衣，脑后有圆形发髻。一件被临潼县文化馆收藏，另一件藏于北京历史博物馆。

尽管这三件陶俑已经幸运地重新回到人间，但人们在拥抱它的同时，只是欣赏敬慕他们自身的价值而作出：“是属于秦国全盛时代的伟大艺术创作”的结论，却来去聆听更多的心音。所以当新的陶俑又一次扑向人类怀抱之时，遭到同样的结局是注定的讯息之四：

1964 年 9 月 15 日，《陕西日报》在一版并不显要的位置登载了一则消息：

临潼出土秦代陶俑最近在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又发现秦代陶俑一个。是在焦家村西南约 150 米处，今年 4 月，群众在整理棉花地时，距地面约一米深处发现的，为一跪式女俑。这一陶俑比解放前发现的两俑更为完整。头发、衣纹清晰可见，神态幽静大方，栩栩如生。现文物保存在临潼县文化馆内。

这是秦俑被埋葬二十多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官方文字报道，也是这地下军阵最有可能走向人类的重要讯息，可是随着人们好奇心的满足，这讯息便很快烟消云散，飘渺于无垠的宇宙了。它们走出黑暗，重见光明的日子，就注定要等到十年之后了。

第二章 本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

我们不能不对这二十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掘留下最钦佩之情。

——葡萄牙总理 席尔瓦

蒙在鼓里的国家文物局

1974年7月5日，简安稳的文章与李先念的批示，一同摆到了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办公桌上。王冶秋看到批示，心中一沉，是不是陕西又出现了打砸抢烧文物或文化遗址的事情？此时“批林批孔”正在全国兴行，许多文物和文化遗址已被砸烂烧毁。当然最倒霉的还是孔老夫子故址的那三大文化景观——孔府、孔庙、孔林。幸亏周恩来总理出面阻止，方算挽住狂澜。这类屡见不鲜的事情尽管让文物局焦虑不安，但又无可奈何。“批示”的到来除令这位主管全国文物的最高领导人的心头又蒙上一层阴影外，似乎并无太大的惊异。

当他看到文章的标题时，却大为惊骇地站了起来，一股难以名状的喜悦与兴奋划过脑际，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尚有珍贵文物出土，的确令人激动不已。可惜这种心情只是在脑海里一闪而过，随之而出的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我怎么不知道此事？

当他以最快的速度阅完文章的全部内容后，一种失职与蒙辱的感觉油然而生。国务院领导白纸黑字的批文已到眼前。可堂堂的文物局局长对此却全然不知，实在是不可思议。他抓起电话，让文管处长立即赶到自己办公室。也许是文管处没有汇报才造成自己的被动，他想。

当文管处长陈志德赶来时，对文章所报道的一切仍然一无所知。国家文物局被蒙在鼓里了。

王冶秋拿起电话要通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希望尽快了解事情的具体情况。可令他失望的是，陕西方面作了“我们也一点不了解”的回答。

陕西省文管会同样蒙在鼓里。

为争取主动，尽快了解详情，7月6日，国家文物局文管处处长陈志德，携带李先念副总理的批示，乘飞机抵达西安，第二天便和陕西省文管会领导人一起赶到临潼县文化馆。

“这么大的事，你们为什么不上报？”省文管会领导人显然不是以表扬的神态质问文化馆馆长王进成和文物干部赵康民，这一询问的目的在进一步证实自己的确对此不知，也给北京来的陈志德一个心理上的平衡。

“有说是神庙，有说是砖瓦窑，我想弄个明白后再汇报，”赵康民极为尴尬地作着解释，内心的苦衷自然没法说出。

大家来到展厅，看到已修复起的高大陶俑时，一切的沉闷与不快都烟消云散了。每一双眼睛都射出惊讶，激动的亮光。一个个身材强悍健壮、栩栩如生、顶盔戴甲的武士，岿然不动地站立在面前，透散出一股咄咄逼人的阳刚之气。

“太伟大了。”陈志德赞叹着，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转身对众人：“快，快去现场看看。”

他们来到了西杨村外的井边。

这时，临潼县文化馆已组织社员在井的四周掘开了一个南北长15米、东西宽8米的大坑，坑下更多的陶俑已显露出来。

大家以欣喜的心情查看了俑坑所在的位置和陶俑的形状，对俑坑的性质

作了大体的估计：既不是砖瓦窑，也不是神庙遗址，根据俑头可以自然拿下和空腹来看，它和前些年在秦始皇陵园内出土的跪坐俑基本相同。从这一点可以肯定陶俑的时代不是汉唐而是秦代，可能是项羽盗秦始皇陵时放火焚烧的一个秦代遗址。

既然已经接到了这支地下大军的信息，就再也不能放过这个历史性的契机。人们决定接纳他们加入自己的行列，在太阳与暖风的沐浴中，一起走向灿烂的未来。

经过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委立即组成了始皇陵秦俑坑发掘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成员：

陕西省文物局局长：于哲吉 陕西省博物馆馆长：廷文舟

陕西省文管会负责人：杭德洲

临潼县县委宣传部部长：方杰

临潼县晏寨公社党委书记：傅永仁

西杨村生产队队长：杨培彦

同时，陕西省委决定由省文管会、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化馆三家抽调专业人员，成立始皇陵秦俑考古发掘队，其主要成员为：

队长：袁仲一，41岁，华东师大古代史硕士研究生毕业。

队长（兼）：杭德洲，45岁，北京大学考古训练班结业。

队员：屈鸿钧，50岁，北京大学考古训练班结业。

队员：崔汉林，37岁，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

队员：王玉清，52岁，北京大学考古训练班结业。

队员：程学华，41岁，北京大学考古训练班结业。

队员：赵康民，40岁，高中。

队员：杜葆仁，37岁，高中。

随着这支考古发掘队伍的组成和开赴现场，本世纪人类史上最壮观的发掘，在中国西部的黄土地上揭开了帷幕。

深夜惊魂

7月15日，在袁仲一、杭德洲的率领下，考古队携带生活用品及发掘用具，匆匆离开西安，来到俑坑边的树林里安下营寨。

夜幕已经降临，四周看不到一点灯火。沉寂苍凉的始皇陵四周，蒙上了一层阴森可怖的面纱。高大的骊山在夜色中辨不分明，只有阵阵凄厉的狼嚎隐约传来，使这块土地显得更加荒蛮和更具野性。

烦闷的热气没有随着太阳的西坠而退去，依旧在这片树林中穿来荡去，似在寻找栖身的家园。考古人员躺在钢丝折叠床上久久未能入眠，先是为秦俑的发现激动地谈论，再是为口渴想着招数。

附近村庄的农民已经歇息，显然不好再去打扰，于是有人终于想起了附近的那片瓜田，“是不是到瓜地里弄几个瓜来解渴？”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赏。

正要付诸行动时，大家几乎同时听到树林里发出唰啦唰啦的响声。

“是不是狼来了？”有人最先作出判断，所有的人都在惊悸中跳下床，抓起了石头。

在此之前，生产队长杨培彦早有衷告，这荒山野林，晚上常有野狼出没。不久前，有一个孩子在上厕所时被狼活活咬死。

过了不久，树林里的声音消失了。

正当大家擦着汗水准备重新上床时，树林里突然响起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哀嚎，每个人又本能地抓起了石头。

哀嚎声越发凄惨和令人惊恐。

“有人遇上狼了，快去。”又不知是谁的提示，大家抓紧石头向林中跑去，准备作一次惊心动魄的人兽大搏斗。

当考古人员弯腰弓背，怀着极度的惊恐之情来到哀嚎者面前时，借着手电筒的光亮，看到了一幅出乎意料画面：三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赤身裸体被绑在树上，身边站着三条大汉，大汉手摇皮带，猛力抽打那裸露的躯体，哀嚎声不住地在旷野里响起。事情终于明白。三个裸体少年偷瓜不成反被看瓜人捉住，于是便被带到树林，进行惩罚……这个场面令考古人员大开眼界的同时又感到不可思议，这是他们和生活在这里的人第一次真正认识，也是生活在这里的人群留给他们的第一个印象。当然，对于从城里来的考古人员来说，不可思议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在后来的岁月中，将会有更加奇特的故事展现在他们面前。当一切都明白后，他们才会真正懂得这就是真实的中国乡村和真实的乡村生活。因为有了他们，生活本身才显得那么滑稽、那么热闹，有那么多好戏看，才显得丰富多彩又灿烂辉煌。

宝剑背后的血腥屠杀

第二天，考古人员对已发掘的俑坑和陶俑进行了拍照、测量和记录后，便开始了新的发掘。从这一天开始，这个发掘的俑坑被定为一号坑。

从带有花纹的青砖和陶俑的形状可以断定，这个俑坑属于秦代遗迹已成定局，但俑坑与秦始皇陵的关系尚难断定，因为这个俑坑距离秦始皇陵内城三里多地，在这样远的地方放置陶俑陪葬，当时的考古资料还没有发现先例。尤其令人不能迅速作出结论的是，在秦始皇陵周围分布了许多秦代的大墓葬，这就让考古人员不得不对陶俑与陵墓的从属关系倍加慎重。事实上，当这个兵马俑坑已全部掘开，考古界对俑坑与始皇陵的关系作出结论的十年之后，依旧有人提出此坑不是从属秦始皇陵，而是为始皇祖母宣太后或为那座不远处的秦大墓（又称将军墓）陪葬的全新理论，并引起学术界一片哗然。

要想弄清历史的真实，就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设想与推想固然有可取之处，但证据则更为重要。可是这个俑坑发掘了一个星期，出土陶俑已达百件，始终未见与它的主人相关的点滴记载和可靠证据。考古人员由惊喜渐渐陷于迷惘，如果连陶俑与陵墓这基本的从属关系都难弄清，还叫什么考古？

正在这时，一柄足以揭开谜底的钥匙出现了。

在一个被打碎的陶俑身前，静静地躺着一把未见锈痕、光亮如新的铜戟，戟头由一矛一戈联装而成，顶端戴有类似皮革的护套。戟柄通长 2.88 米，朽木上残留着淡淡的漆皮与彩绘，末端安有铜墩。从外型可以断定，这是一把典型的秦代铜戟。尤为令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在戴头的内部鲜亮地刻着：“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口”等珍贵铭文。铜戟与铭文的出现，提供了确定兵马俑坑为秦始皇陪葬坑的重要证据。同时，也再现了 2000 年前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史实和两个闪光的名字：秦始皇——吕不韦。

约公元前 260 年，战国时期的韩国翟阳城里有一名富商吕不韦，往来于中原各国做买卖。此人善于取巧，机智灵活，颇有胆识。

吕不韦在靠他的聪明与胆略赢得了万贯家财的同时，苦恼也随之而来。他不时地看到那些家资巨万的翟阳大商人，一旦得罪了官府贵人、顷刻间便

家破人亡，那钱财也随之烟云一样散去。面对随时都可发生但又无法改变的事实，聪明的吕不韦悟出了一个道理，钱是需要依靠权势来保护的。或者说，有了权也就拥有了钱，而靠权势得钱要比辛辛苦苦，提心吊胆地做买卖更为便利和稳当。

于是，吕不韦把他在商界的才智运用于进出官府、结交权贵，暗暗物色足以能改变自己身份与地位的后台老板。经过两年的奔波与努力，契机终于到来了。

一天，吕不韦在赵国邯郸结识了作为人质押在赵国的秦公子子楚，这位公子本是秦国秦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因为他的母亲在安国君心中失宠，不再被重视的子楚便被羁留在赵国邯郸以作人质。此时子楚的落魄惨不忍睹，吕不韦在惊讶之余，以他的机智与政治敏感，立即意识到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绝好良机，他决定在这个落魄公子身上下大赌注，他当场告诉子楚：“我可以改变你这种落魄的状况。”

在这之前，吕不韦对各国权势集团作了详细研究，他知道秦国太子安国君最宠爱的是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又偏偏无子。正是瞅准了这个缝隙，他开始了狡黠的政治投机。

吕不韦先是赠给子楚大笔金钱，让他在赵国广交上层宾客，以便提高身价，沽名钓誉。然后携带金银财宝，亲赴秦国作政治赌博，以说服华阳夫人与安国君立子楚为嫡子。

华阳夫人收到以子楚名义贡奉的珍宝，深为感动。她觉得子楚是个聪明孝敬的孩子，却在赵国吃尽了苦头，仍然念念不忘她这位非亲生的母亲。不久，她又听到了宫廷大臣们开始称赞子楚，甚至有些老臣说他是立嗣的最佳人选。华阳夫人动心了。这时，她的姐姐和弟弟已被吕不韦买通，纷纷前来向华阳夫人陈述见地，使她越发明白自己虽受安国君宠爱，但毕竟没有儿子，一旦容颜衰退，必遭冷落，甚至遭到不测。假如立子楚为嫡子，他将来必定会知恩图报，自己将永远不会失势，即使一旦失宠，仍有子楚作为依靠。

华阳夫人是聪明又机灵的女人，她趁安国君正对她迷恋之机，劝说立子楚为嫡子，而安国君的长子奚正由相国杜仓教导培养，按照惯例王嗣之位已稳如泰山。可万没想到由于吕不韦的出现，形势急转直下，命运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安国君没有吕不韦和华阳夫人那样精明的头脑，他认为一切都顺理成章，答应下来倒也皆大欢喜。

于是，往日的落魄公子正式成为秦国的王太孙，吕不韦也顺理成章成了这位王太孙的师傅。

一日，吕不韦在家中宴请子楚。两人喝得兴致正浓时，只见一个美丽绝伦的舞女从帘后闪出来，为他们跳舞助兴。子楚被那女人的姿色弄得目瞪口呆。吕不韦见子楚已完全被自己的爱妾所迷，便不动声色地笑笑，装出一副慷慨大度的样子：“如果王太孙喜欢这名侍姬，就让她跟你去吧。”子楚喜不自禁，匆匆了结宴请，将女人带回府中。这一夜，子楚是怀着感激涕零和欣喜若狂的心情同那女人度过的。然而，他决不会想到那女人在离开吕家时已有身孕，不到十个月就生下了一个男婴。这就是后来叱咤风云、席卷天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嬴政。若干年后，安国君死去，子楚接替安国君的位子成为庄襄王。为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吕不韦为丞相，赐给他食邑洛阳十万户，封为文信侯。同时封华阳夫人为太后，至于自己的亲生母亲

就不再顾及了。从落魄公子到一国之王，这极大的反差，使子楚忘乎所以，几乎是狠着心纵情享乐，其结果自然是乐极生悲，终于一病不起，为王不足三年就一命呜呼了。年仅 13 岁的太子嬴政继位，但一切政权却要靠吕不韦来支撑。羽翼未丰的秦王政，尊吕不韦为相国，并称仲父。一切政事全由吕不韦操纵。吕不韦当仁不让地利用手中的权势，力主秦国对外战争，连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他在秦国的威望进一步提高。

吕不韦不惜心血和钱财所做的政治赌博终于取得了成功，他的梦彻底实现了。况且那位贵为太后的女人仍然与他旧情不忘，暗中往来，以致“淫乱不止”。这一切对一个商人来说，无疑是登峰造极的杰作。

随着秦王政年龄的增长，老谋深算的吕不韦遭到他这个私生子的报复，惊恐之中想出一条妙计，找来一个叫嫪毐的“天阴人”作为替身，推荐给太后。这位花蕊正盛的女人与被当作宦官送进宫中的嫪毐私通后，很是满意，对嫪毐“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后来，太后与嫪毐竟秘密生下两个儿子，为避人耳目，太后诈称卜卦不宜留居咸阳，迁往雍都宫殿。

公元前 238 年，已 23 岁的秦王嬴政按照秦国礼制，在雍都蕲年宫举行加冕礼，这一礼仪的行施意味着他亲自执政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位始皇帝对母亲与嫪毐的丑事早有耳闻，他一旦执政，其结果可想而知。

嫪毐已察觉秦王政有除他之意，在性命难保的危急关头，决定孤注一掷，先发制人。他矫借秦王御玺及太后玺发兵进攻蕲年宫，企图制刚刚加冕的秦王政于死地。年轻气盛的秦始皇当机立断，派兵镇压，结果嫪毐兵败被夷三族，与太后生的两个儿子也被秦王政装进袋子活活摔死，风流太后本人被迁到雍都阳宫软禁起来。

早就对吕不韦独揽大权心怀妒恨的秦始皇，借铲除嫪毐之机，毫不留情地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并削去侯爵及一切封地，逐归洛阳。几年后，又把吕不韦贬至巴蜀。不久，又追去一道诏书，赐其自杀。

吕不韦跪对亲生儿子发来的赐死令，知道已经山穷水尽，再无机可投，不禁老泪纵横。商人毕竟是商人，他尽管可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一时的显赫，但毕竟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真正的政治角逐本领。或许，他的悲剧性结局，从那个辉煌梦想的实施之初就已注定了。因此，他悔恨交加而心肝俱裂，一杯毒酒才喝下两口，就砰然倒地。

这次“宫闱秽事”的曝光，使后来的秦始皇曾怀疑到吕不韦是自己的生父。残酷的政治斗争以及这种复杂的身世，对他性格的变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号坑翰与铭文的出现，证实了秦始皇为王初期吕不韦曾达到了炙手可热的权力高峰，也证实了秦代青铜兵器技术在这时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更为重要的是，证实了眼前的兵马俑坑与秦始皇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突然消失的神秘人物

秦俑出土十几年后，考古队长袁仲一谈及当初的发掘情况时，仍极为激动与兴奋地说：“我们当时以为这个俑坑十天半月就可全部发掘完成，既然是个陪葬的俑坑，能有多大？没想到半个月下来，连俑坑的边都没有摸着。太令人惊奇了，怎么还有没边的俑坑？”

是大令人惊奇了，俑坑本来有边有角，只是这边和角已大得跑到了考古人员的想象之外。俑坑拓开了 400 多平方米，仍旧不见边际，考古人员大为

惊讶，“这是不是陪葬坑？”有人提出疑问，“如此规模的陪葬俑坑，在世界考古史上也未曾发现过。”

“不能再继续发掘了，还是先派人探查一下再说吧。”死人唬住了活人。考古人员面对这支地下大军神秘莫测的阵容，不得不重新派出侦察部队以探查虚实。

发掘暂时停止，考古队抽调4人，持探铲打孔钻探，以防中了“埋伏”。

考古探铲又名洛阳铲，这种铲为古代盗墓贼所发明创造，中原洛阳一带的盗墓贼大多以此铲作为盗墓的主要工具，它的作用是无须将墓掘开，用铲在地下打个小孔，通过带出的土层和其它物质来分析判断地下所埋葬的一切。有经验的盗墓老手，只要将铲打下去，凭发出的声音和手中的感觉，对地下的一切便可了如指掌。随着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从二十年代末期洛阳铲便被加以改进，成为考古工作者的专用工具。

考古人员以间隔3米的距离，沿发掘方位由东向西钻探。洛阳铲以它特有的作用和威力不时向考古人员发出信息：地下有俑，当探铲移至打井位置100米处时，仍然发出地下有俑的讯息。考古人员不敢再探下去了，他们先是对铲的作用发生怀疑。接着是重新分析和辨别探铲所带出的讯息是否真实，最后，他们对自己本身的考古知识都发生了疑问。

正在考古人员四顾茫然，踌躇不前时，一个神秘的老头出现了。他的出现，使大家更为惊讶和迷惑起来。

在开始钻探的第一天，一个年逾七旬的白发者汉，便斜坐在不远处的大树底下，眯着花眼向发掘工地观看，他的出现最初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

太阳西沉，当考古人员拔出探铲要休工时，白发老汉从树下慢慢地走过来，问持铲的程学华：“你的那地方有没有？”

只顾收铲的程学华没有回答，只是低着头反同一句：“你看有没有？”老汉不再作声，快快而去。

第二天依旧如此。

当移至100米处时，老汉又无精打采地走到程学华的跟前：“你的地方有没有？”一样的问话。

“你看有没有？”一样的回答。

这次老汉不再离去，表情有些愤然，说话变得生硬起来：“我不是问你吗？是你在踱，又不是我在踱

程学华抬头仔细打量了老汉一眼，见老人生得鹤发童颜，仙风道骨颇有几分仙气与神韵，他似乎感到了一些什么，坦诚地回答，“我看地下好像有，可是……”他把“不太敢相信”几个字又咽了下去。

老汉眯着眼睛微微一笑：“你跟我来。”

程学华奇怪地望望老头的神态，放下探铲跟老汉向西走去。

大约离井口200多米的地方，老汉停下来，依然面带笑容地对程学华说：“你不用踱了，我告诉你，俑坑的边就在这里。”

“什么？”程学华睁大了眼睛，怔怔地望着老汉那胸有成竹的样子：“你这老头不是骗人吧。”

“信不信由你。”老汉依旧微笑着，像神话一样，在夕阳的照耀中，消失在坑边的柿树林，从此再不见他的踪影。

翌日，程学华按照老汉指点的位置，半信半疑地开始钻探，果然有陶片被提了上来。再继续西探，未发现陶俑的踪迹。老头的话被证实了。

一年之后，整个俑坑被揭开，事实证明老汉所指的位置完全准确。考古人员曾对这个神秘人物进行了种种猜测：有说是他多次参加挖墓取土，像风水先生所遇到的经历一样，见过地下的陶俑。或者是他在此打过井，遇到陶俑时以为是不测的妖怪，于是再度寻找位置，找来找去，对这里的情况就有所了解。当然也有人估计是老汉的祖宗曾给他留下了关于秦俑及陵墓情况的文字资料，他的祖宗甚至他本人都曾有以盗墓为生的可能，从他神秘的行迹可以推断，他曾在附近盗过墓的可能性似乎更为可信，无论作怎样的猜测推断，随着这个神秘人物的出现和消失，关于他的真情也就无法作出一个更为完整和准确的结论了。

一个东西长 200 余米，宽度超过 60 米的陶俑坑，在钻探中得以证实。如此规模庞大的军阵，令考古人员目瞪口呆。他们在为自己当初的设想未免有些“小家子气”而感到可笑和悔恨的同时，依然不肯相信眼前的事实。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肯定中间夹着其它的玩艺儿，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俑坑。”

“也许中间没有俑。”有人提出了相似的理论。

考古人员围绕俑坑中间到底有俑还是无俑的主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时难分胜负。也难怪，这俑坑的气势也的确是太大了，即使是最伟大的考古学家见此景观，也不得不再三揣摩一番。

既然范围已经探清，中间有无陶俑只有待发掘验证。考古队把情况向上级业务部门汇报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发掘。这时，工地上的发掘人员除从当地招收的几十名民工外，又从当地驻军借来百余名解放军战士参加发掘，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几十名学生，在刘士莪教授的率领下也前来工地助阵，发掘程度明显加快，仅一星期，探方已探出一千多平方米，陶俑出土 500 余件。

随着俑坑的扩展和陶俑的陆续出土，考古人员的思路也随之开阔跳跃起来，按照古代兵马一体的军事形制，既然有如此众多的武士俑出土，应该还有陶马埋在坑中。可是这迟迟不肯面世的陶马又藏在哪里呢？难道没有听到人们真诚地盼望它们加入新世纪行列的呼声吗？

地下的陶马似乎感到了人们寻找自己的心音，三天后，它们的第一个群体面世了。

这是四匹驾车的战马，通高 1.5 米，体长 2 米，四马齐头并立，驾一辆木制战车。尽管战车已经朽掉，但马的神态和雄姿，仍能给人一种奔驰疆场、勇往无前的真实感觉。

随着陶马与木车的出土，发掘人员再度陷于亢奋与激动之中，而使他们的亢奋与激动达到顶点的则是青铜剑的出土面世。

这是一把镀金的银白色铜剑，它静静地躺在泥土中。尽管经历了 2000 多年泥水侵蚀的漫长岁月，当考古人员发现时，它依旧闪烁着昔日的风采。光亮如新，寒气逼人。此剑长达 91.3 厘米、宽 3.2 厘米，其形制与长度为典型的秦代精良宝剑。它的出土，无疑为研究秦代兵器的制造和防腐技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原始实物证据，它使人们重新忆起了“荆轲刺秦王”那段惊心动魄的故事的同时，也解开了这个故事留下的千古之谜。

公元前 222 年，强大的秦军灭掉赵国后，兵临易水，剑指燕国。燕国军臣人心惶惶，国亡在即。燕太子丹为挽救危局，便导演了一幕荆轲刺秦王的历史悲剧。

荆轲为报答太子丹的厚待之恩，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慷慨悲壮之心，离燕赴秦，去实施行刺计划。

荆轲与壮士秦武阳来到咸阳，向秦始皇贡献秦国叛将樊於期的人头和燕国地图。当他们来到宫殿前，副手秦武阳就被眼前威武森严的秦宫气势吓得面如土色，热汗淋漓。卫士将他挡在门外，无奈之中，荆轲一人手捧地图从容自若地走向大殿。当他在秦始皇面前将地图缓缓展开时，一把锋利的匕首露了出来，这是太子丹花重金从赵国徐夫人手里购来并让工匠用毒药煨淬过的特殊凶器。经过试验，这把匕首只要划破人的皮肤流出血丝，无不当场毙命。

荆轲见匕首已现，扔掉地图，冲上前去抓住秦始皇的衣袖行刺。也就在这一刹那，秦始皇本能地从坐椅上跳起来，荆轲抓住的衣袖被挣断。秦始皇借机绕宫殿的大柱子奔逃，荆轲紧追不放，情况万分危急，奔逃中的秦始皇伸手去抽身佩的青铜剑，可剑身太长，连抽三下都没有出鞘。在这紧要关头，一个宦官大呼：“王负剑！”秦始皇听到喊声，猛然醒悟，将佩剑推到身旁斜抽出来。随着寒光闪过，荆轲的左腿被斩断，血流如注。荆轲躺在地上，忍住伤痛，用力将匕首向秦始皇掷去，但未能刺中，秦始皇挥剑连砍荆轲数剑，荆轲绝命身亡。作为副手的秦武阳也被宫廷卫士随之剁成肉泥……

如果秦武阳不是因胆怯而改面色，和荆轲一起去刺杀秦始皇，那么中国历史的进程将重新改写。可惜他没有做到，只以其自身的悲剧给后人留下不尽的感叹和惋惜。有诗云：

廿岁徒闻有壮名，
及令为副误荆轲。
是时环柱能相副。
谁谓燕囚事不成！

随着这场悲剧的结束和岁月的流逝，人们对秦始皇所佩宝剑提出了种种疑问，为什么在绕柱奔逃时抽不出剑？负剑抽出又是怎样的一种动作？他的剑何以锋利到足以将荆轲左腿斩断的程度？

一号坑秦代宝剑的出土，使千百年来的秦王负剑斩荆轲之谜迎刃而解了。

从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剑作为一种兵器，起源于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大约在殷代之前就开始使用，西周时传入中原一带。从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出土的剑来看，全长仅为 27 厘米，并带有极大的原始性。即使是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铜剑也为数不多，且剑身短小、形同匕首。这时南方的吴越之地，铜剑铸造业却发达起来。从已出土的吴王光剑、吴王夫差剑都不失为天下名剑，而在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其精良程度达到了当时铸剑的奇峰。这柄宝剑出土时不仅未见任何铜锈，而且表面光彩照人，刀锋锐不可当，在布满菱形暗纹的剑身上，铸有“越王鸠浅自作剑”八个鸟书铭文。吴越之剑的剑身长都在 60 厘米以下，越王勾践剑身长也只有 55.7 厘米。

战国时期乃至秦代青铜剑的铸造工艺，在吴越剑的基础上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将古代青铜剑的铸造工艺推上顶峰地位。秦代剑的锡含量明显比吴越铜剑增多，由于含锡量的增加，可以更好地使金属组织细化，因而硬度也就相对地增强，锋利程度得到明显提高。最为不同的是，秦剑的身长已不像吴越之剑那样短小而是大大增长，由先前不足 60 厘米发展到 90—120 厘米，随着剑身的增长和锋利度的提高，青铜剑作为一种武器渐渐被士兵所普遍利

用，成为一种常规武器装备用以防身和作战。当然，在统治阶级内部，佩挂宝剑，除防身外还有显示身份和地位的功能。

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剑尽管不能判断是秦始皇当年斩荆轲之剑，但可以由此推断他所佩宝剑的长度不下 91.3 厘米，以秦始皇好大喜功的性格看，他的剑可能比出土青铜剑更长，甚至达到 120 厘米，这样宽长厚重的兵器悬于腰的旁侧，当身体急剧运动时，势必造成大幅度摆动。随着秦始皇身体不断的前倾，佩剑就势前移，直至胸前。尽管秦始皇身高臂长，但也不能将 1 米多长的宝剑迅即脱出鞘口。

有史学家认为秦始皇将剑推到身后才得以抽出，这显然是出于对“负”这个字的考虑。但事实并非如此，这里的“负”应是今天的“扶”字之意，只要秦始皇抓住剑鞘，使其恢复到身旁原有的位置。凭他手臂的长度，完全可以将剑抽出鞘口。所谓推于背上或背后，实在是一种有悖情理的假设和猜想。

一号坑青铜剑出土后，考古人员张占民先生作了一个有趣的试验，他先在桌面上放一叠纸，然后轻轻将剑从纸上划过，其结果是一次居然可以划透 19 张纸，其刃之锋利可想而知。后经科学测定，此剑由铜、铅、锡三种金属构成，由于三种金属比例得当，才使秦剑坚硬锋利而又富有韧性，达到了“削铁如泥、断石如粉”的登峰造极的神奇境地。

而使秦剑历 2000 余年泥水侵蚀依然光亮如新，则完全归功于剑身表面那层 10 至 15 微米的含铬化合物氧化层，这表明秦剑已采用了铬盐氧化处理。令人惊叹和遗憾的是这种化学镀铬技术，随着青铜兵器退出战争舞台，也随之失传了。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才由德国人重新发明并取得专利权。尽管 2000 多年前的中国人就已熟悉运用这居世界领先地位的镀铬技术，却远没有德国人幸运了。至于中国人是怎样将铬盐氧化物镀在秦剑上的，直到今天这个谜也未能解开。

历史的纪念碑群

经过一年的发掘，这座东西长 230 米、南北宽 62 米，总面积为 14260 平方米的大型兵马俑坑终于被揭开，饱受了二十多个世纪黑暗与挤压之苦的 6000 余件兵马俑和数 10 辆战车面世了。人们在亲眼目睹了秦兵马俑神姿风采的同时，也有机会对它们的设计和创造者作进一步的考察与探索。

据史学家司马迁撰著的《史记·秦始皇本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万人，穿三泉……”可以看出，这位后来的始皇帝嬴政，在公元前 247 年他 13 岁登上秦国王位的同时，就开始为自己营建陵墓了。建造人数最多时达到 70 余万人，前后修建达 39 年，直到他死亡并葬入地宫后，陵园的工程尚未全部完成，其规模之庞大，建筑之复杂可想而知。

修筑帝王陵墓作为一项巨大的土木工程，在尚无先进机具的古代，需要很长的时间和为数众多的人工已属必然。由于治陵工程旷日持久，就很自然地赋予了它祝寿和永恒的表象功能。也就是说，帝王生前所属陵墓的修筑时间越长，预示着其主人越高寿。故，历代帝王生前为自己修造陵墓便有了“起寿陵”的说法。秦始皇的祖辈秦孝文王就曾把自己的陵墓直接称作“寿陵”，没有取其它的名字。汉武帝 17 岁即位，活到 71 岁才撒手归天。由于在即位的第二年就开始修筑寿陵，在他入葬时，不但墓内的金银财宝堆放不下，而且陵园内修陵时栽的树木也粗大得可以合抱了。

秦始皇陵墓的修筑初期，曾采取过一项重大的行政措施，这便是秦始皇于十六年（公元前 231 年）设置的“丽邑”。

“邑”作为城市讲，则有“大者曰都，小者曰邑”的区别。作为行政性地域论，则是都、鄙之外的地方。据考古学家分析判定，当时秦丽邑统辖的范围主要是占有今临潼县境内的渭河以南地区。隔河，北与高陵、栎阳相接，南以骊山为界，与蓝田为邻。东西因有零河、临河，分别同郑县、芷阳接壤。由此可以肯定的是，因陵而设的丽邑，其城址当于始皇陵不是太远。

陵邑的设立是秦始皇的一个创造，也为以后的汉代所继承。因服从修陵，便于管理是其产生的根本，所以它不完全是行政区划性质的县邑，而是独立性较强的陵邑。据史料载，设置“丽邑”时，秦王政正处于 29 岁的中年时期，他已经历了“亲政”后的 7 年政治锻炼，铲除嫪毐、吕不韦两大势力集团后，任用李斯为客卿，封尉繚为国尉，并积极采用韩非的理论，使一大批法家人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十三年（公元前 234 年）起，秦始皇攻赵，定平阳、武城。十六年（公元前 231 年），韩、魏献地求和。这时的秦始皇雄心勃勃，为了使“统一海内”和“穿治骊山”两大事业同时顺利进行，他想出了设置“丽邑”的办法。由于“丽邑”的设计，使陵墓的修筑工程可以更具程序化和组织管理专业化。

历史上的秦始皇十六年（公元前 231 年），秦国正处在向东方诸国发动最后攻势的前夜。就在这一年，秦国开始了两件大事并行的宏伟计划。一是“初令男子书年”，二是设置“丽邑”。前者是通过登记年龄，旨在扩大兵源和徭役。后者则是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两件事虽不能同义而喻，但用意却是一致的。由于这两件大事的具体实施，秦国才得以把注意力完全投注于战争，并以疾风扫落叶之势，于十七年（公元前 230 年）灭韩；十八、十九年（公元前 229 年—前 228 年）攻赵，并俘虏了赵王迁；二十、二十一年（公元前 227 年—前 226 年）伐燕；二十二年（公元前 225 年）王贲率军灭魏；二十二年（公元前 224 年）大将王翦出兵灭楚；二十五年（公元前 222 年）灭燕；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灭齐，从此统一了全国。秦国发动的吞灭六国的战争虽长达十年之久。但“骊山”的陵墓工程却秩序正常，并未因战争而受到影响。这说明“设丽邑”的重要作用和秦始皇的深谋远虑。

由于秦国在战争中的节节胜利，这就为骊山工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和人力、技术资源。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历代国君包括秦始皇在内，对占领区都实行了“徙民”的传统政策。在被徙者中，一部分是被赦免的罪犯，一部分是当地的旧势力人物。而徙民的办法通常采取两种：一种是迁居，迁居到占领区的人，既有赦免了的罪人，也有招募来并赐予爵位的人。另一种是“出其人”，即把一些旧贵族和商人迁出本土。或是从原来的甲地迁到乙地，或者干脆把他们迁徙到秦的本土给监管起来。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了全国，他把全国范围内的财力、物力和人力都动员起来，除北筑长城、南戍五岭的国防工程以外，还在首都周围展开了规模庞大的两项土木建筑工程——继续和扩大修建骊山陵墓和建造阿房宫。于是有了“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的历史记载。由此可以看出，秦始皇陵墓的修筑工程，在高峰期的人数达到了七十余万。这些人中，既有自由民，又有罪犯和替债者，同时还有一少部分的奴隶。而在自由民中，又以农民为最多，同时还有市民、手工业者、商人和掌握各种技艺的工人。

由于秦法相当苛刻，人民动辄获罪，致使整个社会变成了一座大监狱，大多数的国民就自然成了程度不同的罪犯。而秦时大量的刑徒，正好成为大兴建筑工程的无偿劳动力，并成为劳动大军的主体。秦律中没有罪犯刑期的条文，也未见刑满释放的规定，实际上，秦代的罪犯就是终身官奴，要为国家服劳役至死方休。所以，修筑秦始皇陵园的刑徒，包括以身顶债者和服徭役的农民，即使不被繁重的体力劳动致死，也绝少有生还的希望。劳动繁重、鞭捶加身、精神折磨、死亡威胁等，构成了他们自身凄苦悲惨的生活内容。他们以生命为代价而留给后人的正是包括兵马俑在内以始皇帝陵墓为主体的伟大的陵园建筑工程。

秦征发的“天下徒”一旦送诸骊山，即按军事组织的形式编制入籍，严加控制，并统称“骊山徒”。从流传的“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唱，万人讴”等民谣来看，这是怎样的一支规模宏大的劳动大军。而负责监工的章邯，他本人就是一位秦国将军，并曾在攻赵灭韩的统一战争中屡建奇功。骊山工程的劳动组织严密、功效之高，可以说是同军事化的编制有着直接的关系。

被禁锢的骊山徒，其劳役带有终身的性质，从秦代的历史文献上来看，没有提供这些骊山徒役满放归的任何记载，相反地，倒是限期延长和死亡恐慌一类记述却不断地充溢在字里行间。后来成为汉高祖的刘邦，当年曾以一个亭长的身份押送丰沛的徒人到骊山修筑陵墓，由于谁都明白一旦到了骊山便绝没有生还的希望，便纷纷在道上设法逃跑，刘邦见此情景，知道自己无法向其上司交待，索性带领剩余的人造起反来了。

尽管“骊山徒”的身份是复杂的，其来源不一，而对待又各异。但到了骊山，并成为徒人，就成了事实上的官奴。即使是社会地位稍高一点的技术工匠，尽管受到一点优待，也只是相对而言。他们一旦到了陵区的作坊，就难于脱身自救。不但他们要终生修筑陵墓，而且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要编入劳动大军，以至出现了“行者不还，往者不返”的劳役制度和人的悲惨命运。

骊山陵墓处于京师地区，修陵徒人的衣食都是凭券从咸阳国库里领取，但标准却很低，只供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且罪犯穿的衣服均为粗麻编织的“褐衣”。对远离家乡，又是重体力劳动的徒人来说，这样的衣服穿不了几天就会破烂得难以遮体的。

至于“骊山徒”的饮食，不但食粮定量标准很低，而且粮食本身也极其粗劣。据出土的《云梦秦简·仓律》载：“城旦之垣及它事而劳与垣等者，旦半夕参，……免隶臣妾、隶臣妾垣及为它事与垣等者，食男子旦半夕参，女子参。”也就是说，从事挖壕筑城这样强体力劳动的男刑徒早餐半斗，晚餐三分之一斗，日食定量是六分之五斗，月定量是2.5石。由于秦律极为严格，根据男女性别及其从事劳动强度分级的口粮供给标准也自然是统一的。所以，供给筑城劳动的刑徒、隶臣“旦半夕参”，则指的是实发的原粮。根据“粟一石六斗大半斗，舂之为粢米一石”的比率，可折算出日定量的现代重量应是1.755市斤。这个数字对于修筑陵墓的重体力男劳动力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够吃的。除此之外，《仓律》还有两条减少衣食的惩罚性规定，即受饥饿刑的囚犯，日定量只有三分之一斗（七两）。隶臣妾如果丢失了公物或牲畜的，要按月扣除衣食的三分之一。按照秦律的统一性，这两条规定对“骊山徒”也是同样施行的。规定中还说，如果扣除的衣食不足以抵偿损失的公物，必须延长劳役以低偿，其最终结果是这些徒人落到了长期服役而永

无归期的悲惨境地。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生活境地，伴随着“骊山徒”命运的莫过于死，而这一威胁实际上来自三个方面，即累病而死，折磨致死和饥饿致死。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使“骊山徒”多劳累致残染病，但又得不到治疗，以至于轻病加重，重病待毙。倘稍有懈怠和不慎，既受到监工的鞭捶之苦和严刑峻法的惩治。自由民已经不再自由。劳作中无论是在土方工程的现场或是手工业作坊，或是运输途中，都有监工督造。占大多数的刑徒则身穿红色的囚衣，戴赤巾，服刑具，从事最为笨重和最大强度的劳动。就整个过程而言，“骊山徒”们在肉体上的劳顿，到了难于忍受的程度。精神上的折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轻绝人命”的做法，从治罪处死到故意屠杀，随着工程的阶段性进展而变得更为酷烈，“骊山徒”们随时都有惨死的可能。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七月，那位号称千古一帝的始皇帝病死在出巡的归途中。据《史记》载：“九月，葬始皇骊山。二世（胡亥）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秦始皇死后，继位的儿子胡亥曾下令，原属始皇帝的妃嫔，凡没有生育儿女的全部被殉陪葬。为了怕参与修筑陵墓地宫的工匠泄露了内中秘密，当始皇帝的棺椁进入地宫后，工匠们也被活活封闭于地宫中，作了这位始皇帝的殉葬品。而作为陵墓附属建筑的兵马俑坑工程，在秦始皇入葬地宫后仍继续挖筑，直到周章率领百万农民军攻入关中并对秦朝廷构成巨大威胁时，兵马俑坑的修筑才被迫中辍，草草收场。

两千多年后，当年兵马俑坑的设计者和修筑者已不复存在，一切的悲壮和苦难也早已随风而去，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则是他们在酷烈的政治背景和生活遭际中，用心血凝成的伟大的不朽之作——庞大的地下军阵。正是这个庞大的地下军阵，才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大秦帝国的风采和“骊山徒”们的灿烂思想光辉。

秦兵马俑是悼念为秦始皇扫平六合血染华夏的秦军忠烈国殇秦兵马俑是哀婉地再现为秦始皇修陵的 70 万刑徒的纪念碑群——

秦兵马俑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惊人的写实雕塑艺术奇峰——

秦兵马俑是中国历史处于奴隶制崩溃，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划时代的标志——

从出土的实物和俑坑的形制完全可以断定，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土木结构建筑。俑坑四周分别布有五个斜坡门道，门道土质坚硬，上有清晰的车轮痕迹。由此推断这是当初放置兵马俑时所出入的通道。兵马俑放置完毕后，门道则用立木封堵，然后再以夯土填平，俑坑便成为一个规则的长方形，在东西走向的十一个过洞和壕铺的青砖坑底上，有极为清晰、整齐的方形或圆形棚木凹槽和木炭遗迹。这表明整个俑坑为土木结合而成，俑坑顶部的上层重量主要靠下面的立柱支撑。各个隔梁及四方边墙主要起着隔断墙的作用外，亦有承重墙压力的用途。据一位志愿军老战士回忆，朝鲜战争中，中国志愿军在阵地上所修的土木工事，和秦俑一号坑的结构形制有同工异曲之妙合。

尽管兵马俑历 2000 多年苍桑岁月和黄土的掩埋，变得残缺不全。但庞大

的整体阵容，仍不失浩浩荡荡的威势和秦川壮士叱咤风云、驰骋疆场的雄姿豪情。

坑中的武士俑，身穿交领右袂短褐，勒带、束发，凸起的发髻偏于头的右上方。腿扎行滕，足登方口齐头履。有的手持弩机、弓箭，背负箭■，■内装满铜矢。有的手持长矛、威严而立，有的腰佩弯刀，目视前方，时刻准备接敌陷阵。

在武士俑中，鲜亮地密布着一队队铠甲锐士。明显高大的身躯外披铠甲，足登短靴。一行行步兵，腿扎行滕，头戴圆形软帽。战车上的甲士腿绑胫档，头戴小冠。不同的锐士均手持弩机，腰悬青铜宝剑，虎视阵前，大有慷慨悲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在阵容中威严屹立的陶马，或驾御战车，或站在骑士身旁恭候战令。战马肌丰骨劲，面部棱角分明，两颊宛如刀削，洗练精致。那用丰富的线条精雕细刻的眼睑、鼻翼和嘴唇，层次丰富，形象逼真，无不透出战马的神奇韵律。

这个有锋有后，有主体有侧翼，步马和车马交错的军事阵容，既严整统一又富有变化，既肃穆静立又寓有动意。那一列列武士，按兵种的不同而身穿绿色或红色的战袍，外披黑色或褐色的铠甲，使军阵的氛围显得威武庄严。但武士面孔和神情的不同，连同发髻的多变，又避免了凝滞呆板的不足。那披坚执锐、挟弓挎箭的武士，伴有齐头并立、昂首仰尾、双耳上耸，引颈嘶鸣的战马，给人以蓄势欲动、挥戈上阵、驰骋疆场的强烈意象。这于统一中求变化、静穆中得跃动的军阵构图，充分展现了秦军的气势磅礴、所向无敌，也折射出意境的壮美和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

秦俑的人物形象，有着科学的写实性和深刻的典型性，其逼真的写实艺术在中国雕塑史上卓越非凡。透过欣赏的表层更能让人们看到潜伏在艺术形式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的变革——

人类在原始社会漫长的岁月中，对于自身肖像的雕塑并不注重，从出土的实物中可以看到，只有个别的器皿上画有人头形装饰像，即使在商周青铜器上，也只有少数作为器物附属性的卑屈的奴隶形象。当历史的车轮辗轧到战国时期，人的雕塑或画像在不同的场所以活跃发展。恐怖的饕餮和公式化的螭渐渐被简括而凝练的人的身影所代替。秦兵马俑的造型则是战国以来思想活跃，图腾退位，人的地位受到尊重的象征。可惜这种艺术传统在秦末大规模的兵燹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再也没有继承流传下来，以致这辉煌的文明受到人们长达 2000 余年的误解。

1975 年 7 月 21 日，新华社播放了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发掘的消息。这支阵容肃整、披甲执锐的地下大军，将从中国走向世界，接受整个现代人类的检阅。

第三章 横空出世

这次访问是对人类希望和梦想的永久性的最令人激动的经历。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遗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伯利■总理 曼努埃尔·埃斯考米尔

聂荣臻元帅的提议

1975年8月，北戴河海水浴场。年逾古稀的聂荣臻元帅，躺在温热的沙滩上，眯着被太阳的强光刺得难以睁开的双眼，眺望远处的海面。碧绿的海水咕咕地欢唱着向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元帅涌来，浪花亲吻着他的躯体和手臂，他感到分外惬意爽快。戎马一生，历尽苦难，终于有了今天。可惜，那些在战火中倒下去的战友不能享受这人间的欢乐与幸福了。海水默默地从元帅的身边退下去。他望着，似乎想起了什么，站起身朝浩瀚无垠的大海长嘘了一口气。

“聂帅，您好。”刚从海水中出来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走近他身旁。

聂帅答应着，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望着水滴未干的王冶秋：“你们挖的秦俑坑怎么样了？”

“范围、形制基本已经搞清，大批陶俑、陶马已经出土……”王冶秋详细向聂帅汇报了秦俑坑发掘的情况。

“不得了呵，这么大的一个地下军阵，要是能建个博物馆就好了。”聂帅惊叹之余提出了秦俑保护问题的关键性建议。

聂帅的话使王冶秋激动起来，“我早有这个意思，但考虑到国家经济比较困难，未敢提出。”

其实，国家经济困难只是王冶秋犹豫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是批林批孔运动还没有结束，在这种背景下提出要建博物馆，谁知道随之而来的是怎样的政治厄运。聂帅沉思片刻：“你打个报告给国务院，让大家讨论一下嘛。”

“好，我这就去准备。”王冶秋大喜，和聂帅道别后立即赶回北京。第二天，他向谷牧和余秋里两位副总理作了在秦俑坑建馆的报告。两位副总理表示同意，又把报告的详细内容提交国务院办公厅讨论。这次办公会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在听取了各位与会者的意见后，李先念挥起手臂，啪地向桌上一拍：“就这么定了！”

一锤定音。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的名字由此诞生了。

8月26日，王冶秋带着兴奋与激动之情飞抵西安，把国务院的决定先行告知陕西省委和文管会。同王冶秋一样，陕西方面对秦俑的保护前景更是没有把握。大批的陶俑、陶马出土后，他们只是在俑坑上搭了个简易棚，以防雨雪侵蚀。在他们的预想中，等兵马俑全部出土，能盖个仓库一类的房屋，保护起来就算万幸了。至于盖博物馆，让世人参观展览却未敢奢求。王冶秋带来的消息，使陕西方面喜出望外，从而也对兵马俑发掘后的前景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和感知。

8月27日，王冶秋在秦俑坑察看了现场，同陕西省委一起在西安人民大厦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建馆问题。要求设计人员在一周内把初步的设计方案拿出来由自己带回北京向国务院汇报，同时让考古队进一步落实一号俑坑的口周边界和内部陶俑的分布情况，为博物馆的基建工程提供确切的资料。

1976年元月，修建秦俑馆遗址展览大厅的人员陆续进入工地开始施工。这时一号坑出土的陶俑、陶马，全部用土重新掩埋起来，以确保基建过程中

文物的安全。

瑰宝得来又被盗

1976年春节过后的第二天下午，留在工地值班的考古队长袁仲一，独自一人向秦始皇陵园走去。他和他的同伴经过一年多的辛劳，终于使这支地下大军走向了人间。在以考古为职业的袁仲一看来，这无疑是最辉煌的业绩。尽管他曾不止一次地失去了春节同家人团聚的机会，但心中依然感到惬意和快活。

在陵园无目的地走着，考古职业的习惯使他对周围的一切分外专注。太阳就要落山了，空旷的陵区被夕阳的余辉染成一片桔黄。在距秦陵封土约100多米的断崖上，他停住脚步向远处的骊山望去。骊山在晚霞的映照中，越发显出它的壮丽与秀美，当他转身返回时，眼前闪过一个灿烂的亮点。他一惊，“这是什么？！”随着脑际闪过的问号，俯下身来仔细地观察着断崖土层中那个指甲盖大小的放光的东西，职业的敏感，使他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件文物。

事实很快证实了他的预见，当这个闪光的东西被完全清出土层时，他惊呆了，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秦代乐府钟。该钟为青铜所铸，凸出地表的那个闪光的亮点便是钟的鼻钮。它通高13.3厘米，两铣间7.2厘米，鼓间5.8厘米，舞广为6×4.8厘米。钟的钲部和鼓部为错金蟠螭纹，篆间及钟带为错金流云纹，花纹细密而清晰，豪华典雅，虽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出土后金银花纹依然清晰完整，充分体现了当时冶金工艺发展的高度。更为重要的是，在钟钮的一侧发现刻有小篆字体“乐府”二字。这两个字的发现，意义远远大于实物的本身，它使后人透过欣赏其冶金工艺的表层，解开了千百年来史学家和音乐家争论不休的历史之谜——

乐府是皇家庆典和祭祀时管音乐的官署，无论是庆典还是祭祀，饮酒与奏乐往往一起进行。公元前279年，秦赵渑池相会，意在讲好修和。酒宴开始后，秦昭王向身旁的侍卫魏冉使了个眼色，魏冉心领神会，立即捧上一张瑟来。秦昭王对赵王说：“听说赵王通晓音律，这里有宝瑟一张，请您弹奏一曲，敬希勿辞。”赵王明知这是秦王故意羞辱自己，但又找不到理由推辞。正在为难之际，随赵王来的蔺相如在一旁劝道：“秦王既不嫌弃，大王您就弹奏一曲，这有何妨？”

赵王白了蔺相如一眼，只得怏怏不乐地接过瑟来，勉强地弹奏一曲。

秦王见赵王受辱而羞红了脸，越发得意地说：“赵国始祖烈侯就很会弹琴，今日听了赵王演奏，果然是得祖辈家传。”随后转身对魏冉道：“可告御史，将今日之事，记入史册。”

秦国御史前来，执笔取简，边写边高声朗诵：“秦昭王28年秋月吉日，秦王与赵王会于渑池，秦王命赵王鼓瑟……”秦国群臣开怀大笑。可这时谁也没有料到，赵国的蔺相如极其自然地顺手拿起一只瓦盆，从容地走到秦王面前：“我国大王听说秦王善于演奏秦国的乐器，就请大王击缶以同乐。”

秦昭王一惊，傲慢地说：“我乃堂堂秦国君主，怎可击缶？尔出此言，分明是取笑本王。”蔺相如手持瓦盆，厉声道：“大王依仗秦国强大，想要威风以强欺弱不成？今日乃两国相会，若是大王不肯击缶，相如舍弃头颅也要溅你一脸血污。”

在蔺相如的威逼下，秦王无可奈何地笑笑：“先生何必如此动怒，大家欢乐，就击一下有何不可？”于是接过瓦盆，用筷子轻轻地击了一下。

蔺相如大声宣布：“今日盛会秦王击缶，也应记入史册！”他把手一招，赵国御史走来，拿出竹简和书写工具，写道：“赵惠文王 20 年秋月吉日，赵王与秦王会于渑池，赵王命秦王击缶。”记完，御史高声朗诵了一遍。面对蔺相如的智勇，秦昭王无可奈何，便起身给赵王敬了一杯酒，赵王也回敬一杯作为答礼。从此，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友好相助的条约。

秦赵渑池相会的故事，给研究者的启示是：处于西北地区的秦国，早期的乐器并不发达，且极为简陋，不过是击筑、扣而已。又由于后来秦始皇爱听高渐离击筑，几乎被高渐离刺杀的故事，后人便以《汉书·礼乐志》记载的汉武帝时“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为依据，认为乐府最早产生于汉代。秦陵乐府钟的出土，从实物上首次证明了乐府的最早建立是在秦代。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发现，而更为重要的是，考古人员又在乐府钟出土的地方发现了专门设置的乐府遗址。这里曾仿秦咸阳都城的设置，建有乐府官署，有各种祭祀用的礼乐，同时有一批乐人在此常驻，每逢祭祀之日，乐人便奏起礼乐，钟磬齐鸣，百官同祭。可惜这个乐府仅存两年余，就被项羽大军一把火烧为尘土瓦砾，珍贵的乐府钟也在劫难中掩埋入滚滚黄尘，直到 2000 年后才重现人世。

经过音乐家测试，这口乐府钟的内壁有调音带四条，其音为 C 调，造型工艺和音质都是秦代乐器所罕见的精品。这口乐府钟的出土，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它为研究秦代宫廷礼乐的制式以及音乐器械的演变发展，提供了珍贵而形象的实物资料。这口乐府钟后来被陕西省博物馆作为一级文物收藏。

遗憾的是，在这件珍贵文物出土 10 年后的 1986 年 10 月，一只罪恶的黑手将它盗走，至今下落不明。音乐家扣响了它沉默 2000 年后的第一声，再也难以听到它以后声响了。这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令人兴奋与恐慌的二号坑

一号俑坑展览大厅的基建工程开工不久，一个令人兴奋与恐慌的事情发生了。经过考古人员的钻探，在一号坑东端北侧约 20 米处，发现了又一座兵马俑坑。这个后来定名为“二号俑坑”的出现，自然使大家想到已经着手兴建的大厅工程。这个二号坑和一号坑是什么关系？它们有没有可能是连在一起的整体？万一连在一起怎么办？

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委听到消息，立即派人前来察看。考古队惊喜之余紧张起来，在遗址完全发掘前盖房，这是世界考古史上没有先例的，考古队自然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万一这两个坑连在一起，整个为筹建博物馆工程所付出的努力将毁于一旦。

为搞清两个俑坑的范围和形制，考古队在加紧钻探的同时，又在两坑之间挖了七段探沟，最后终于作出结论：二号坑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和一号坑不相连接。这个结论使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委的领导人都长嘘了一口气，再度转惊为喜。

为弄清二号坑的形制和范围，在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后，1976 年 4 月，考古队对二号兵马俑坑进行了试掘。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一号俑坑的近似曲尺形的地下建筑，通长 96 米、宽 84 米、深约 5 米，总面积为 6000 平方米，约相当于一号俑坑的二分之一。结构明显地分为左右两大部分。右侧近似一个正方形，属于坑道式建筑。面开 8 间，前后有回廊，东西两端各留两条斜坡门道。左侧近似一个长方形，

亦为坑道式建筑。同样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略呈正方形，面开6间，前后回廊贯通。在东西两壁和北壁各留两条斜坡门道。坑内埋藏木质战车89乘，陶俑陶马2000余件，青铜兵器数万件。从整体推断，这是一个由弯兵、轻车兵、车兵、骑兵四个不同兵种组成的特种兵集团军阵。

这个军阵与一号坑的军阵不同，在最前方的一角排列着一个弓弩组成的小型方阵。秦代弓箭手有轻装与重装之分，轻装弓箭手称作“引强”，重装弓箭手称“■张”。这是以引弓的不同方式命名的。引强是指用手臂张弓，赴张则是用足踏张弓的强劲弩手。秦俑二号坑就是以334件弓弩手编成了一个独立的小方阵。

一百年前恩格斯在论述古代战争时会特别指出：“军队的力量在于它的步兵，特别在于它的弓箭手。”二号坑出土的弓弩方阵部位以及精良的装备，充分显示了弓弩在古代战争中的特殊作用。因此，我们有理由作出推断，当历史行进到秦代，弓弩手已成为一支完整而相对独立的兵种，在战术上形成与车兵、骑兵的密切配合，而且对射手的选拔也格外慎重与严格。作为秦代的弓弩手，他们必须是年轻健壮的“材力武猛者”，经过至少两年的培训才可作为射手初入军阵，二号坑弓弩手的形象正是这些“材力武猛者”的生动写照。立姿射手体形匀称，身材高大，均在1.80米以上。面部表情透视出青壮年特有的坚毅与刚强。阵容严谨，姿态整齐的跪姿射手，身著战袍，外披铠甲，身体和手臂向左方倾斜，二目向左前方平视，两手在身的右侧持弓搭箭，背部置有上下两个对你的负矢陶环，每个陶环装置铜镞多达100支，其负矢之多，比起当初魏国武卒“负矢五十”的数量多达一倍。由于射手面容和衣褶纹的不同，使这个特殊的军阵在整齐严谨中又充满了鲜活的个性，尤其射手头部那向左或向右挽起的高高发髻，髻根均用朱红色丝带来扎，有的飘于肩下，有的似被风吹动向上翻卷，显得英武神俊，潇洒自如。

特别值得军事学家注意的是，这个特殊的方阵四周均是持强弩的立姿射手，方阵的中心则为持弓的跪姿射手。这种并非偶然的列阵方法，明显地告诉人们战争中的程序和步骤。当敌人接近时，立姿射手先发强弩，继之跪姿射手再发弓箭。一起一伏，迭次交换，从而保证矢注不绝，集中力量，增强战斗力，使敌不得前来而毙于矢下。二号坑出土的立射俑和跪射俑，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秦代军队军事素质与射击技术的规范化。立射俑面右背左，侧身横立，左腿微拱，右腿后绷，左足纵，右足横，两足之间呈“丁字不成，八字不就”状。左臂略举，右臂曲至胸前，手掌伸开，掌心朝下，是为典型的正射之道。而跪射俑左腿支起，右腿下跪，左膝朝上，右膝着地，是古代军事中善射之法的充分写照。这种善射方法在保持身体平稳、正确击中目标的作用中，具有极为科学的依据。

关于强弩最初大规模应用于战场的记载，恐怕要数下面这个战例：

公元前341年，魏国的大将庞涓率领军队围攻韩国的都城郑，战斗正在激烈之时，忽然接到本国的报警急报，齐国大军已攻进魏境，并直取都城大梁。

庞涓看过警报，大吃一惊，于是立即下令：撤围班师。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迅速返回魏境，堵截齐师。同时又选拔了精锐部队、亲自带领，手抢点滴时间拦击齐兵。

孙臏率领的齐兵，这时已突破了魏国的边境防线，正乘虚向西挺进。孙臏西进的目的在于攻取魏都大梁，而在于解韩国之围，击溃魏军。大军正

行之间，探马跑来报告：“庞涓已率军离韩返魏。”

孙臏得知庞涓回师的消息，率军埋伏在马陵道的两侧，等待魏军的到来。

马陵道是一条狭谷山道，两边是陡峭的高山，山道周围树木丛生，怪石林立，地形险峻奇特，正可以埋伏千军万马。孙臏察看了地形，命军队砍些树木和搬来巨石，将山谷的出口道路堵塞后，又特意选择了一棵大树，将靠路一侧的树皮刮去一片，用黑炭在上面写了六个大字“庞涓死于此地”。同时选出五千名弓箭手埋伏在大树的两侧，只等树下火光起时，一齐放箭。

庞涓率军一路风尘仆仆地赶来，等到马陵道的进口处时恰是日落西山，夜色来临。救国心切的庞涓面对这条险峻的山道未加思索，打马驱车进入谷道。当大军已完全进入谷道后，前方传来报告：“路已被砍倒的树木堵塞无法通行。”面对这不测的征兆，作为主帅的庞涓仍未警觉，反以为齐军胆怯，惧怕他的追赶才堵塞山道。他亲自走下战车指挥士兵搬树开路。这时有一士卒发现了道旁一棵大树上的字迹，急忙报告庞涓。天越发黑暗，并有乌云挡住了月亮。庞涓看不真切，忙呼士兵点起松明火把来到树下。当那六个刺眼的炭迹大字跃入庞涓的眼帘时，他蓦然醒悟，一句“我又中了孙臏的计了”的话还未喊完，四处已是强弩齐发，箭如飞蝗般地向他射去，这位赫赫有名的将军顷刻毙命。所率大军除杀死外全部被俘。这便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著名的马陵之战。同时，作为劲弩这种新型的兵器，也是首次在战争中发挥了它的巨大威力。

随着历史的进展，这种曾在古代战争中发挥了强大威力的劲弩，已渐渐从兵器家族中消失。后人只能从文字记载中感知它的形貌，而对于弩的真实状况和应用方法却全然不知。二号坑近百架弩的出土，无疑为后人对这种古代兵器的认识和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弩是一种源于弓而不同于弓的远射武器，“言其声势威响如怒，故以名其弩也”。汉代人认为弩是黄帝发明的，《吴越春秋》的作者则把弩的创始人说成楚人琴氏，到底哪种说法更合乎事实本身已无法考证。但是从历史资料来看，青铜弩机在战国时期才大规模地登上战争舞台，《战国策》就有“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矜子、少府、时力，距来者皆射六百步之外。”的记载。马陵之役在首次显示了弩这一新式武器的威力的同时，也反映出当时齐国军队已广泛使用弩的事实。远在西部的秦军，对这种新式武器所发挥的强大作用，自然深知。于是在他们后来的军事战术中，有了“强弩在前，铍戈在后”的最新式的排列方法，这种战术排列，在二号俑坑得到了具体的再现。

当然，作为一种在战争中足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弩，它自身的改进与发展也随着战争的不断延续，越发精良和实用。秦俑坑出土的弩就有许多与史书记载不同，并且形制多样。有一种形制极为特殊的劲弩，在身長 64 厘米的弩臂上重叠了一根木条，还夹有青铜饰件。显然这些装置都是为了增强弩臂的承受强度，从而可以推断它是一种张力更强、射程更远的弩。这种推断，除弩的本身不同的形制外，从所配制的特大型号的铜铍也可得到验证。这些历经千年而不朽的铜铍，每支重量达 100 克，较其它铜铍长一倍有余。迄今为止，这是古代兵器史上发现型号最大的铜铍。特殊的强弩，配以硕长沉重的铜铍，必然会产生一种其它劲弩所不能匹敌的巨大杀伤威力。当然，这种弩机与铜铍的出土，尚不能代表秦代弩兵器的最高水平，从史料中可以得知，秦代的劲弩似乎比这更为先进和具有杀伤力。请看——

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开始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当他来到琅琊时，那个到东海蓬莱、方丈、瀛州三神山觅求长生不老药 9 年未回的徐福，突然来见秦始皇。狡诈的徐福怕多年耗费数万巨资未得仙药，会受到秦始皇的处罚，便称蓬莱仙药可得，只是海上有蛟鱼作怪，船行不到蓬莱就被蛟鱼掀翻，愿皇上派遣善射的弓箭手一同去寻，若见蛟鱼就连弩射之，此药可得。秦始皇求药心切，对徐福的话深信不疑，下令随行官员入海捕捉巨鱼。同时自己亲备连弩，乘船下海。船行芝罘半岛的海域，果有一条大鲸鱼搏浪而来。秦始皇和身边卫士拉动连弩，将巨鱼射死海中。

在这场人鱼搏斗中，秦始皇和卫队到底使用了怎样的一种具有如此强大杀伤力的连弩，《史记》中记载的始皇陵墓门道上曾装置的自动发射的“暗弩”，又是怎样的一种新型武器装备，至今仍是不解之谜。但纵观世界兵器发展史，最早将弩装备正规军并使之在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无疑是中国。当历史进展到中世纪时，西欧的诸国尚未制造出连弩这种更有杀伤力的兵器。

二号坑的弓箭方阵尽管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并形成独立的军阵，但这种独立只是相对的，它是整个二号俑坑军阵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和其它的兵种血肉相连，成唇齿之势。俑坑的发掘已为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证。在弓箭方阵的右侧，便是一个庞大的战车军阵。它纵为八列，横为八排，战车共计 64 乘。每乘战车上甲俑三件，御手居中，车左、车右居两侧。御手身高 1.9 米以上，双足立于踏板，两臂向前平举，双手半握，掌心相向，作握辔状，食指与中指留有空隙，以便辔索通过，在拇指的内侧有一半圆形陶环，似为勒辔时拇指的护套。三俑均身穿战袍，外披铠甲，披膊长及腕部，手上罩有护手甲，颈围方型盆领，胫著护腿外套，足登方口齐头履，头顶右侧梳髻，外罩白色圆形软帽，帽上又戴有卷尾长冠，嘴上的八字微须，潇洒飘逸，双目炯炯前视，显示了秦兵在阵战中凶悍威猛的旷世雄威。

关于步兵、车战的立体透视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便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搏斗，而战争无非是扩大了搏斗。正如近代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所言：“如果我们想要把构成战争的无数个搏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考虑，那么最好想象一下两个人搏斗的情况。每一方都力图用体力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他的直接目的是打垮对方，使对方不能再作任何抵抗。因此，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实际上，人类社会战争胚胎的产生，应该说是从孕育步兵的对抗开始的。

中国步兵是古代诸兵种中最早诞生的兵种，但随战斗手段的进步，它却反过来屈尊在车战时代的战车兵卒之下。由于铁兵器的出现、弩的发明、军队远战能力的增强，战车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车兵反过来又成为步兵的辅助兵种。从此，步兵作为一个重要的独立兵种，才再次活跃在战争的舞台之上。关于中国建制步兵的最早记载，应属公元前 719 年，宋、卫等国联军“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一段。“徒兵”，就是徒步之兵。商周时期，站在战车上作战的“甲士”是奴隶主贵族，而车下由“众人”、“多臣”、“庶民”等奴隶组成的步兵只能附属战车。春秋时期，郑、晋等中原国家在对戎狄的战争中，为战胜这些居于山林谷地、善用步兵进攻的少数民族，就不得不在保持原来隶属步兵的同时，率先建立起能够独立作战的建制步兵。公元前 633 年，晋文公在作“三军”的同时，又“作三行以御狄”。“行”是原

来隶属步兵“徒卒”的队形名称，据考古学家王学理研究，此处当指步兵无疑，而“三行”就是晋国最早出现的建制步兵。

尽管建制步兵已经产生，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并没有形成军队的主力，而只是用在西方和北方边防上对付戎狄之中，可中原地区依然是战车统治的战场。公元前541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战将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厄，请以什共车（以多卒配合甲士共同作战），必克。因诸厄，又请。请皆卒（请甲士们都下车来作战），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二伍。”这次晋国“毁车以为行”。以步兵配合甲兵作战的战役表明，在中原大地上已经产生了第一支用建制步兵作战的部队。尽管这支步兵部队还是由战车部队临时改编的，免不了幼稚，甚至遭到了“翟人笑之，未阵而薄之”，但它毕竟在春秋末期开创了一个国内战场上广泛使用步兵的“步兵时代”，为后世战争的多层面、多兵种、大规模的快速作战方式奠定了基础。

到公元前505年，吴楚大战爆发，就在这次大战中，“吴阖庐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与荆战，遂有郢。东征至于郢庐，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吴王夫差的军队编制是以百人为一“彻行”，百“彻行”为一方阵用于作战。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步兵人数已达到数十万甚至百万。从此步兵作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活跃在战争的舞台上，并逐渐走上成熟。

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排列的兵阵来看，秦步兵的数量大，远战能力强，而当时的军事指挥家又善于处理步兵同战车、骑兵的配合关系，诸兵种协同作战，因而形成了军事编制的最大标志。秦俑一号坑的矩阵是以步兵为主、同战车穿插排列的兵力部署。其协调车、步关系的作法，是“鱼丽之阵”变化了的形式。尽管战车有左右和前后的双车编组之别，但总体上是车的前后及两侧都有步兵涌队列。这种编组，既有古代兵书上所说的“鱼丽之阵”的车、步协同的宽大界面，又突破了在二线或三线的兵力配置，从而就出现了强大的纵深，形成了“本甲不断”的雄壮气势，正是由于步兵和骑兵跻身于战场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的优越性，才使那动辄千百乘、大排面密集的车阵战，在中华大地上叱咤风云地度过了十多个世纪之后，不得不相形见绌地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古代战争车战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殷代，经过殷周时期千余年的发展演变，战国时期战车的种类、编制、装备、战术等方面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然而，由于先前实物资料的缺乏，人们对于这一时期车战问题的研究只好徘徊在故纸堆中，并有史学家推断：“战车自秦代已退出历史舞台，被骑兵所替代。”秦俑二号坑大型车阵的发现，首次向我们展示了古代战车编制、装备、战术方面丰富的实物资料。它使古代车战史的研究者和史学家，不得不重新校正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依据。战车庞大的阵容同样告诉了人们，秦代的战车特别是像坑中这一类型的轻车，并没有因战争的发展和战术的变化而衰退，相反这种轻型战车呈现出稳定发展的趋势，并渐已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它和骑兵、弩兵等精锐兵种处在同样的重要位置，在战场上发挥着其它兵种无法替代的作用，并在战争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壮烈的干戈撞击、人仰马翻的活剧。

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和战争规模的扩大与空前的惨烈，战车本身也一次次受到时局的冲击，以至最后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

地位。这种因冲击而引起的大变革，主要归于两次大的战争：第一次是公元前 707 年，在周、郑濡葛之战中，郑国子元为“鱼丽之阵”。其法是“先编后伍，伍承弥缝”。即把步卒配置在战车的两侧和后方，使车、步协同，发挥各自作用，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战车同步卒一线配置的传统队形。这可以说是中国车战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大的变革。随后的战争实践经验，使战争指挥者越来越体会到“卒乘辑睦”关系的重要作用。几百年后的公元前 541 年，晋国魏舒在对狄人的作战中“毁车以为行”，干脆把车兵的行军队形改成步兵的战斗队形，这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一次步兵对车兵的革命。

正当庞大勇猛的步兵部队成为战场主力，而古老笨拙的战车甲士被轰下战争舞台的时候，一支曾与步兵配合过作战的车兵却又从中诞生了，这就是在脱离步兵之后也能够单独作战的战车部队，也就是在战国后期出现的轻车兵。它一改过去那种车对车的冲刺战法，在多兵种的协同作战中，巧妙而艺术地表现出了自己的制敌特点。这个特点首先表现在驰敌致师的战术之中。当战争的双方在战场上列阵之后，先以勇力之士到阵前挑战，接下来才是双方军队的大决战。春秋战国期间，当双方列阵之后，便捷轻锐的轻车则担任了冲击敌阵的这一角色。《吴子·应变》谈到的“谷战之法”就是在两边高山、中为狭地，突然遇到敌人的情况下，隐蔽的车辆在山中迅猛冲出攻入敌阵，使敌军造成混乱和溃败。

当军事力量双方在战场上列阵时，先要派出轻车在军队的两翼担任警戒，随之按阵法排列队伍，这也就是孙子所讲的“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据后来考古学家兼军事研究家王学理推断，孙子所说的“轻车先出居其侧”，实际是后来被称为“角”的队形正处在形成过程中。一旦队伍布置妥当，轻车便向敌阵两侧很快斜张，因而也就形成了夹击的态势。也正因为如此，军事指挥者为应战对敌，才把“轻车先出居其侧”作为判断敌方是否列阵的一个重要征兆。

由于战车的冲击力大，速度快，成为攻击敌人阵地的重要力量。但因受到山地、谷地等险峻地形的限制，而不能发挥其战斗作用。若在平原广阔的地带和选择最佳的出击时机，战车的威力才能得到有效的显示。当单纯的车战被淘汰之后，在多兵种的运用上，作为一种战斗手段，战车仍然保留着它重要的一席之地。正因为如此，著名军事家孙臆才指出：“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易之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就当时的战况而言，在平坦地形上作战，一辆车可以抵挡住 80 名步兵或者 10 个骑兵。但在险阻地带，它的威力只能发挥一半，甚至连一半也难以发挥。

从历史上著名的“避实捣虚”、“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中可以看到，田忌、孙臆派轻车奔驰大梁，创造了战车突袭的有名战例。这个战例在告诉人们田、孙二人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外，还宣告了一个轻车驰援，可以千里而赴的事实。这个事实告诉军事家的是，轻车可以突然袭击敌人之不备或出没不定地骚扰敌人，并起到转移对方目标、动摇军心的作用。当两军激战时，面对敌人的进攻，弩射又遏制无效，处于劣势的一方就需赶快把战车联结起来成为“车宫”，组成一个“当垒”的屏障。一旦屏障形成，指挥者就立即命令隐蔽在车后的弓弩手从缝隙中射击来犯之敌。这样既减少了伤亡，又增加了武器的有效杀伤力。当然，这种能够形成屏障的车多属笨重的“守车”，但在战场双方局势变化多端的情况下，为了应急，轻车更能发挥灵活机动的防御作用。

从秦俑坑出土的战车可以看出，战车的种数，无论是用作指挥、轻锐致师、补阙、随同战骑等等，都只是形制上的区别，仅因用途和装备的不同定名而已，并没有改变作为战斗用车的这一根本性质。可以说，此时的战车已非昔日殷周时代的模式，它是轻车兵正处于成熟阶段的显示，它标志着在旧的车战方式衰落之际，随着步兵与骑兵的兴起，一个轻车兵、步兵和锐骑等多兵种配合的作战方式已经形成。而经过战国、西汉 700 年的时间，轻车兵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走到了自己的尽头，他们几乎在战场上完全消失，而骑兵却驰骋疆场，意气风发，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骑兵的崛起

当战车退出战争舞台后，代之而来的则是骑兵在战场上大规模的出现，骑兵军阵的应用直到近代的二次世界大战才逐渐告退。中国古代骑兵何时登上战争舞台？自然以公元前三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为标志。但通过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在殷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记载骑兵作战的事例，可惜那时的骑兵并不普遍，局限于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况且战争的规模比之战国时期要小得多，不足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因为在战国之前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毕竟是战车统治疆场的时代，况且随后它又陪伴车兵同步地度过了一百多个春秋。应该说，骑士同战马的最早结合并进入战斗行列，就标志着骑兵的诞生。而骑战在我国古代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又以攻击力最强、机动性最大而闻名于世。无论是战国时期的秦国，还是统一后的秦帝国，都程度不同地处在古老的车兵与年轻的骑兵结伴的那段时间里。就作战手段而言，纯粹的车阵已由车、步、骑的多兵种协同作战所代替，并且经历着作战主力由车到步骑的消长过程。从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和稍晚些时候出土的咸阳杨家洼汉墓的骑兵队列来看，秦汉时期无疑是中国早期骑兵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骑兵由在战争舞台的配角地位，渐渐取代主角，到西汉的武帝时代，战争舞台正式完成了由车、步到骑步的革命性的转变。

关于中国以及当时的秦国的骑兵最早出现于何时，史书中好象没有明确的记载，也许正如恩格斯在《骑兵》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匹用于乘骑和军队编有骑马的部队，自然首先发生在那些自古以来就产马，而且气候和青草适于马匹生长的国家。”

在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是众所周知的广阔草原地带，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因而也就有了乘骑的方便条件，并理所当然地最早建立起自己的骑兵进行军事活动。像鬼方一支的狄族，南侵晋国的边境，竟于公元前 730 年打到了晋都的郊外。山戎和北狄也曾和齐、燕多次发生战争。公元前 663 年，山戎侵燕，燕向齐告急，于是，齐桓公派军队伐山戎，并“擒狄王，败胡貉，破屠河，而骑寇始服”。从这些历史的战例中，可见中国骑兵的出现，似乎早在春秋初期就发生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了。至于秦国的骑兵出现于何时，在留传下来的《韩非子·十过》一书中，虽有秦穆公发“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的记述。书中的畴骑二字，应该是指骑兵。而秦穆公派兵送重耳入晋是公元前 636 年发生的事，其所派的畴骑已是同战车、步兵并列的一个完整的兵种。那么，可不可以说秦骑兵产生的时间应早于秦穆公的那个时代？

这样说的理由是：秦人在入主关中之前，长期生活偏处在西北的秦地，那里的沟谷有丰沛的清水茂草，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为秦人先期的养马业提供了优良的条件，并使秦人和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从《史记·秦本记》中

可以看到相关的记载：秦人的老祖先造父，曾“以善御幸于周穆王”，西巡时得过良“驷”，并“一日千里”地驱车归周。试想，这样训练有素的宝马良驹，不经过长期调养是难以选出的。

历史上最早的秦人同戎人长期杂处，都过着逐水草而群居的游牧生活。随着内部关系的变化和矛盾的不断加剧，秦人同戎族的相互争斗也越演越烈，以至终于导致了兵连祸结的仇杀。当勇猛凶悍的西戎人一举灭掉了居于犬丘的秦大骆之族，并杀掉了受周宣王支持而讨伐西戎的大夫秦仲时，为了对付擅长骑术的戎人，秦人不但加快了养马训马的步伐，而且也开始上马作战。到秦穆公时代，骑马作战的传统已经确立，而正式组建一支骑军队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雄才大略的秦穆公，也许正是仰仗着这支年轻的骑兵部队，才取得了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赫赫战绩。

从以上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早在西周中期，当中原国家的车士在殷殷战车上称雄时，而僻处西方的秦人已能上马搏杀了。由此可以说，秦骑兵作为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独立兵种，出现的时间不但早于中原诸国，而且也远在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寇”之前。

尽管秦骑兵的出现时间开中国骑兵之先河，但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其原因大概是它过早地同车、步兵配合，而被淹没在车、步兵混合兵种的大趋势中。与此相反的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有些不同，它是在车兵同步兵的撞击中产生的独立兵种，即是和车、步兵配合作战，也始终保持着它独特的体系和发挥着独特的功能。所以，历史学家把中国骑兵正式登上战争舞台的功劳让给了赵武灵王，也许自有它的道理。

尽管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作为中国产生骑兵的标志，但它显然地处于中国骑兵史上的“童年时期”，之所以说是童年时期，是因为除在战争中的作用不甚明显外，一个显著的标志是没有马鞍和马蹬，武士们只是骑着一匹匹的裸马在作战。到春秋时代中期，作为秦国的骑兵才作为一支能够独立作战的兵种崭露头角。当然，因时代条件的局限，同样发挥不了太明显的作用。直至秦始皇并灭六国的统一战争中，骑兵数量急骤增多，其战斗力也明显地加强。但在车战仍充当着主力，步兵已承担起重要角色的情况下，无论从战略上还是具体指挥艺术上，骑兵还只能暂时作为一种配合性兵种来发挥它的作用，其性质依然属于一支机动力量。因此，在兵力的布置和指挥上，还是按照以车为正，以骑为奇的战术来适应战场的需要。当需要骑兵搏杀时，也还是遵循“用骑以出奇，取其神速”的战术原则，以便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当秦王朝建立后，军事重心转移到国防，接敌对象由原来的山东六国变为北攻胡貉、南攻杨越。对于强悍的匈奴骑兵，没有一支训练有素、强健精锐的骑兵是难于角逐的。所以，这时的秦军也加强了骑兵部队的建设，并大规模用于军事行动。并出现了大将军蒙恬率军击败匈奴骑兵，使之远退漠北，十余年不敢南下的战争胜况。特别是秦 50 万大军进军岭南，长途驰驱，当然更少不了骑兵。此时的秦骑兵已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纵横驰骋在各地战场上。遗憾的是，古代骑兵的装饰、布局及军阵的风采，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失落入茫茫烟尘，纵使后人绞尽脑汁，也无法从根本上领会它的真正内蕴和叱咤风云的壮观雄姿。秦俑二号坑骑兵俑的出土，为后人无声地打开了一扇神秘的窗口，两千多年前骑兵军阵的一切再度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二号坑的骑兵俑群位处于模拟营垒的左部，占有 3 个过洞，并呈有很大纵深的长方形小营。小营中的每一骑士牵一匹马入编定位，行列整齐，纵向

12列，横向9列，共计108骑。另外，在车步混宿小营的3个过洞里，尚有8骑殿后，整个俑坑的骑兵总数为116骑。

骑兵俑的装束与步兵、车兵俑有着明显的不同。它头戴圆形小帽，帽子两侧带扣紧系在颌下。身着紧袖，交领右衽双襟掩于胸前的上衣，下穿紧口连裆长裤，足登短靴，身披短小的铠甲，肩无披膊装束，手无护甲遮掩。衣服短小轻巧，铠甲简单明快。这一切无不表明完全是从骑兵的战术特点而考虑和设计的。由于骑兵战术所显示的是一种迅猛、突然、出其不意、抵之不及的特殊杀伤功能，这就要求骑士行动敏捷、机智果断。假如骑士身穿重铠或古代那种宽大的长袍，则显然违背了骑兵战术的特点。事实上，也只有穿着这种贴身紧袖、交领右衽的胡服才更能自由地抬足跨马、挎弓射箭，驰骋疆场。

秦俑坑骑兵军阵，完全是模拟现实的艺术再现，每个骑兵的身高都在1.80米以上。从体型的修长匀称、神态的机敏灵活，以及身材和面部显示的年龄特点，完全符合兵书所言：“选骑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七尺五寸以上，壮健捷疾，趋绝伦”的要求。那些站立战马身旁，抬头挺胸，目视前方，一手牵缰、一手提弓的骑士，真实传神的造型姿态，成功地揭示了秦代骑兵待命出击，壮健捷疾的强大风貌。

有研究者认为，古代骑兵使用马鞍当是在西汉时期，在此之前尚无先例。秦俑坑陶马的出土，为这种理论作了彻底的否定。现实使我们看到，每个陶马的背上都雕有鞍鞅，鞍的两端微微翘起，鞍面上雕有鞍钉，使皮革质套固定在鞍面。同时鞅的周围缀有流苏和短带，鞍后有■，下有肚带，遗憾的是未配马蹬。这些实物的出现，完全可以证明早在秦代甚至战国后期骑兵就已使用了马鞍。马鞍的使用可以使骑兵的双手进一步获得解放，有效地发挥和增强战斗能力。二号坑发现的骑兵军阵，置于整个大型军阵的左侧，这种排列特点，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它在战争中所发挥的正是其它兵种所不具备的“迅猛”迎敌的战术特长。

当然，骑兵在战场上取胜绝不是靠单骑的速度，而是凭着一个有组织的队形，否则，有如个人在体育场上的竞技一样，只能赢得一时的喝采，而对一场战斗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著名的兵书《六韬》说到骑兵作战时，往往把车骑并提，这显然是早期骑兵尚未独立的一大特点。而在《均兵》中，关于骑兵的作战能力，太公望认为，如果对车骑运用不当，就会“一骑不能当步卒一人”。但是，列阵配备合适，又是在险阻地形上，也能“一骑当步卒四人”。由此可以看出，兵法家在这里明确地揭示了队形和地形是骑战威力所在的两大因素。车骑作为军中的“武兵”，如果安排得当，就能收到“十骑服百人，百骑走千人”的战争艺术效果。

秦俑二号坑的骑兵俑群，向后人提供的是一个宿营待发、配合车兵和步兵的实例，若从整体观察，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兵力配置上，骑兵俑群偏处一隅，其数量也远远地少于车、步俑之数。结合文献记载可以说明：此时的秦骑兵虽已是一支雄壮强盛的独立兵种，但毕竟还没有取代车、步兵而成为作战的主力。协同作战、量机而用，则成为当时军事家们已经运用自如的指挥艺术。

尽管此时的骑兵还没有成为秦始皇时代的作战主力，但在统一战争的交响乐中、却是一支最强音。因为骑兵行动轻捷灵活，能散能集，能离能合，远距离作战，快速奔驰，百里为期，千里而赴。短时间内长途奇袭，使敌防

不胜防，出入无间，又能迅速转换作战方式，成为兵书中共誉的“离合之兵”。具有悠久的养马史、传统的驾驭术、早兴的骑兵部队的秦国，在骑兵的运用上自然优胜于山东六国。而在车、步、骑并存的诸兵种中，骑兵之所以后来得到了重视，就在于执远战兵器弓弩的战士在战斗号令下达后，能迅速集合，翻身上马，立即投入战斗，并随时可调换攻击方向。同时战斗队形对复杂地形的适应性强，其高度的机动力和强大的冲击力，都是其它兵种所不能取代的。这种独特的骑兵战术，正如孙臆所认识并概括的那样：用骑有十利。即：“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敌虚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道，绝其军道；六曰败其津关，发其桥梁，虚其高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命。”随后的兵法家又把骑兵战术的原理总结为“十胜”、“十利”等，但无论是十胜还是十利，其不外乎是由“驰骤便捷，利于邀击奔趋”的高速度构成骑战的核心，即所谓凌厉的冲锋，诡秘的奇袭，迅速的迂回，闪电式的侧击和夹攻，独立的侦察，掩护本部步兵和骚扰敌人。公元前 260 年，在秦、赵长平大战中，秦国以五千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绕过赵军翼侧，迂回至后方营垒，将其截为两段，断其粮道，使之不能救援，最后迫使赵军全军覆没，从而使秦国在古代战争史上创造了多兵种协同而又用骑以奇的光辉战例。

当然，骑兵的短处正如兵书上所总结的亦有不利的因素，即所谓的骑战有“九败”或“八害”。其中心内容是，骑兵往往受到地形的限制而招致失败，如陷于“天井”（四周高峻）。“地穴”（低陷）及沼泽难行之地，大涧幽谷、木林茂密之地，深沟坑阜之地等，均构成骑兵的“死地”或“败地”。这些不利的地形地物，深为兵家所忌。其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会对骑兵形成威胁，这就是骑兵的冲锋速度高，极容易脱离战场主力，如果长驱不止，陷于敌阵又不能破阵，再加之后继部队接应不上，就势必受到敌人的截击或埋伏而陷于进退两难的险境。面对这些不利的因素，作为军事指挥者，势必明了和果敢处置面临的一切，才能化险为夷。事实上，作为骑兵部队，只有选择平旷的地势，给骑兵创造出高速度冲杀的场所，才能以“一骑当步卒八人”的威势攻击对方。秦俑二号坑在试掘时，露出土层的完整的有骑士 33、马 36。这些骑士都无一例外地作垂臂、左手提弓的姿势。出土的武器惟见铜剑、镞和弓弩，没有长柄兵器。而此时的剑，看来也只是骑兵作为卫体的武器而已。这说明秦骑士的作战手段同赵武灵王时教国人穿“胡服”，习“骑射”的情况是前后相承的。民国时期，洛阳金村曾出土过一面战国铜镜，背面有骑士乘马握剑刺虎的图像，即证明了这一特征。由于剑仅限于击刺的单纯动作，在驰驱如飞的骑兵手里是发挥不了太大作用的。也正是由于这诸多的局限，才使骑兵无法充当作战的主力而只能处于辅助的地位。战国时期，秦国有兵员 100 多万，其中“带甲”（指步卒或作“奋击”）百万，战车兵数千乘，而骑兵仅有 1 万。包括后来发掘的秦俑三号坑，从出土的情况看，三坑中约有步兵俑 6 千多，战车 140 余乘，骑兵俑 116 骑。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提供的双重数字表明：秦惠文王时，秦国的骑兵占军队总数的 1% 左右。到了秦始皇时，骑兵的比例已升至 2%，这时步兵仍是作战主力，车兵的地位仍然高于骑兵。即是骑兵使用率最大、也最多的赵国，骑兵在军队中的比例也还是有限。战国晚期，赵国名将李牧在重新整编部队时，依然是以车兵 1300 乘为主，骑兵 13000 匹为辅。而在军队的总数中，骑兵所占的比例也不过是 8% 左右。况且这是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七、八十年的情况。

在其他诸侯国家中，骑兵的比例更少，不过 1% 左右。

骑兵在战国时期已初露锋芒，但迟迟没有形成战场主力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便是在骑兵史的改革进程中很小又极为重要的一个部件——马蹬的产生和利用。从秦俑二号坑的骑兵俑来看，骑兵们不但既无马蹬，连踏蹬也没有，由此可以断定骑兵们在上马时，是双手按住马背跳跃上去的。上马后的骑兵抓紧缰索，贴附马背以防颠落。由于没有马蹬，在奔驰特别是作战时，就不能靠小腿夹紧马腹来控制座骑，更谈不上腾出双手来全力挥斥武器与敌搏杀，在攻击力与灵活性上都大受限制的情形中，也注定了不能使用长柄兵器更有效地杀伤敌人这一时代局限和遗憾。

那么，作为极具重要性的小小马蹬是何时产生的？尽管众说不一，但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公元 302 年）墓出土陶骑俑的马鞍左侧吊有一蹬，这是被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最早的马蹬。但因为只有一只，有的学者便认为不是马蹬，而很可能是上马时的踏蹬，两只脚分踩的马蹬，是十六国时期才出现的，这个推论来自北燕冯素弗墓（冯死于公元 415 年）出土的用铜片包着木芯的马蹬实物。如果事实真的如此，作为一个小小的马蹬，在产生骑兵之后的近千年才发明创造出来，也真令后人有些不可思议了。

在西汉茂陵大将军霍去病墓前有一石牛，牛背上有一蹬的雏形，这个蹬的雏形又给了研究者一个新的启示？难道是西汉有骑牛的习惯？如果有这个习惯并有蹬产生，对将古代骑兵发展到鼎盛时期的西汉军队来说，对出现马蹬不也是一个极大的启示吗？那牛蹬不正是马蹬的另一种安排吗？如果看一下汉代骑兵的强大阵容和赫赫业绩，就不难推断出，在那个时代产生马蹬或产生了马蹬的雏形并用于战场上的骑兵部队是极有可能的。

众所周知的秦末汉初中原战争纷乱，给了远在北方的匈奴一个扩充自己骑兵部队的机会，几年的时间，其骑兵总数便达到了 30 余万。渐已强大的匈奴趁汉朝未稳之时，便大举进兵南侵，并很快占居河套及北方的现在的伊克昭盟地区。匈奴铁骑势如破竹，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 200 年），匈奴单于冒顿率部攻下马邑，并把刘邦亲率的 32 万汉兵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的白登山七天七夜，致使汉高祖刘邦险些丧命。平城之战，使西汉统治者认识到：要战胜匈奴骑兵，只靠步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强大的骑兵。基于这样一种明智的选择，自汉文帝起就开始正式设立马政，加强全国的养马事业，并很快见到成效。汉文帝三年（公元前 177 年），匈奴大举进入中原北部上郡一带掠夺财物，汉朝廷命丞相婴率八万五千骑兵进击匈奴，取得初步胜利。到了孝文十四年（公元前 166 年），匈奴单于率十四万骑兵进入中原西北部的朝那，肖关一带，孝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周武为将军，发车千乘、十万骑兵，驻守长安一带，“以备胡寇”。与此同时，还封卢卿为上郡将军，魏仁为北地将军，周灶为陇西将军，张敖为大将军，董赤为将军，以车兵和骑兵大举反击匈奴，迫使匈奴再度退出中原属地和西北边地。

当汉朝到了武帝时期（公元前 140 年—前 87 年）、骑兵部队发展到鼎盛，并承担了抗击匈奴的主要使命。

汉武帝一登上皇帝宝座，就极为重视马政建设，下令繁殖军马，扩建骑兵。经过六、七年的努力，已拥有甲马 45 万匹，从而形成了一支精良的骑兵队伍。自元朔元年（公元前 128 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汉、匈双方在阴山和祁连山进行了长达十年的争夺战，汉朝每次出兵都在数万骑以上，最多的一次可达到 18 万骑。公元前 128 年，匈奴骑兵入侵雁门，杀死汉

军千余入。汉朝大将军卫青率骑兵3万驰救，匈奴败退北还。次年，匈奴发兵攻上谷、渔阳郡（今北京以北地区），汉武帝命大将军卫青、李息率精骑数万，采取大迂回战略，暂置上谷、渔阳于不顾，而是西出云中（今内蒙托克托东北），迅速沿黄河向西，绕至朔方侧后，对河南地区的匈奴楼烦王和白羊王进行袭击，一举歼敌5000人，缴获牛羊百万余头，迫使二王北遁。卫青率部一直追至高阙（今内蒙杭锦后旗西北），尽得秦时河南地，从此，汉朝在此设立了朔方郡。河南之战，揭开了中国骑兵时代的序幕，从此，骑兵作为一种成熟和庞大的军事阵容，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力量。

匈奴失却河南之地后，痛心疾首，闻之者未尝不哭。右贤王曾多次进攻朔方郡，想夺回河南失地，又无不被汉军骑兵所击败。公元前121年，汉军又发起了规模浩大的“河西之战”。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率数万骑兵，西进河西走廊，奔袭两千余里，共歼匈奴4万余人，打通了西域通道。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派大将军卫青与霍去病分率两个骑兵纵队约十万人，分别出定襄、代郡，又发动了“漠北大决战”（今蒙古库伦东南地区），共歼匈奴主力九万余人，使漠南的匈奴王庭从此绝迹。这次战役，在反映了汉骑兵已出现第一个高峰的同时，也完成了独立的战术理论体系。正是由于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才使中国的骑兵达到了鼎盛时期，不但在秦汉而且在中国千年长河的骑兵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秦俑坑焚毁的对话录

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出土十几年后的今天，有观光者来到秦俑博物馆，仍可见到这支地下大军的无数将士倒卧在泥土中，有的四肢分离，有的粉身碎骨，有的脑壳迸裂，似一场血战刚刚在这里发生，其凄惨之状目不忍睹。那用夯土筑成的土隔梁上，到处遍布着一块块，一堆堆木炭遗迹，表明了俑坑曾遭到过大火的焚烧。面对这文明的劫难，人们在扼腕叹息的同时，也自然地要发出种种疑问：劫难发生于何时？谁是劫难的主要制造者？焚毁俑坑的目的又是什么？带着和观光者相同的心情，在秦俑博物馆采访的日子，我分别和袁仲一，程学华，李鼎铭等几位对秦俑颇有研究的考古人员进行了多次长谈，意在解开心中的疑窦。袁仲一先生（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秦俑学会会长）：

我认为兵马俑坑是项羽军队焚毁的。在对一号俑坑的试掘和发掘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一是文物的移位。如有的地方本来没有战车遗迹，却出土了车上的铜构件。有的陶马耳朵、尾巴、饰物也散落在本来没有陶马的长廊内。二是文物不全，如俑坑内出土了许多铜剑鞘首，而不见剑的露面。在第七过洞的淤泥中出土了一铜剑鞘首，里面残存着长约8厘米的剑尖一段，但却怎么也找不到剑身。在出土的长兵器中，有柄无首，有■无首的情况也很多，这说明坑内有些文物是被人拿走了。

从发掘情况看，一号坑的全部和二号坑的一部分，都是因为被火焚烧后塌陷的。火焚的原因是什么？前几年有人发表文章说是由于俑坑内的沼气而引起自焚。这种观点我认为是不对的，因为在发掘中没有发现俑坑内堆积大量腐植质的迹象，里面放的尽是陶器和青铜器，坑内虽有淤泥，但泥质比较纯净。里面含有大量的细沙，这些物质不具备产生沼气的条件，也就谈不到沼气自燃。

我认为项羽焚烧俑坑的理由，早在《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中就作过论述，现在需要再补充的几点是，后来在发掘中还有些值得注意的迹

象。在一号坑的第二次发掘中，曾发现了一座西汉合葬墓，墓中出土有“五株”钱币，钱币形制属于汉武帝时期，这是整个俑坑发现时代最早的一座后期墓葬。它的发现说明俑坑在汉武帝时期还不为所知，同时告诉我们俑坑焚毁的绝对时间至少在汉武帝以前。

一号坑的底部普遍盖有厚达 10—44 厘米的淤泥，一般厚约 20 厘米。而二号坑的淤泥仅仅 2—5 厘米厚。同时在一号坑东端的长廊部分曾发现用极薄的竹皮织成筛眼形的编织物炭迹一处。这些现象可进一步证明俑坑是在建后不久被焚的。假如时间相隔很久，两个俑坑的淤泥应堆积得更厚更多。竹的编织物、麻绳、箭杆等这些细小的东西也早已腐朽，就不会再被有烧成炭迹和灰迹的可能。请结合历史文献来看，《汉书·楚元王列传》就曾有“项羽入吴发之，以 30 万人 30 日运物不穷”的记载。秦始皇陵是否被项羽掘过，目前还难以拿出事实来验证，但项羽大军来过始皇陵并火烧陵园地面建筑却不容怀疑，至今仍可看到陵园建筑遗址内堆积着很厚的砖瓦残片、红烧土块以及炭迹灰迹等。

秦兵马俑是秦始皇陵园的一部分，既然项羽烧毁了陵园建筑，那么洗劫兵马俑坑也在情理中了。当然，陵园建筑明显，而秦俑坑深埋于地下，不易发现，但是我们知道始皇陵工程修建了几十年，参加修建的人几十万，他们中的多数人应该是了解秦陵布局的基本内容。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项羽军中肯定会有参加过始皇陵园修建且知道兵马俑情况的人。

既然项羽能够知道秦陵附近有兵马俑坑，又能知道俑坑所在地，那么在焚烧陵园建筑的同时对兵马俑坑的洗劫也就不难理解。尽管秦俑坑内没有珍宝奇货，但有形同真人真马的秦国军队和数以万计的实战兵器。项羽这位楚国贵族出身的将军，对秦始皇以武力踏平楚地，杀死其祖父和叔父，毁灭他贵族美梦的秦国军队自然怀有刻骨仇恨。单从报仇雪耻这一点而言，兵马俑军阵正是最好的对象之一。在复仇心理的驱使下，他命令军队士卒掘开秦俑坑，砸碎兵马俑、夺走兵器、烧毁建筑也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事实还清楚地表明，在秦亡之前没有人敢去焚毁兵马俑坑，秦亡以后、经过四年的楚汉战争，项羽兵败自刎乌江畔，汉高祖刘邦掌握政权后会指派始皇陵“守冢十二家”，主管看护陵园。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大规模的焚毁现象也不可能。所以我认为兵马俑坑的焚毁时间是在秦汉之际的重大政治变动时期。在这个时期最有条件和可能的破坏者应是项羽。程兴华先生（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秦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我也不同意“沼气自燃”说。所谓沼气自燃，坑中并不存在产生沼气的条件，既没有沼气，哪来的“沼气自燃”说？按发现被烧后的遗迹遗物，结合有关历史文献记载，袁仲一先生所说的项羽焚毁似乎还是言之有证，持之有据的。但通过钻探队对陵园深入的调查钻探和局部清理所获资料来看，我认为俑坑焚毁的真正原因是秦人的一种自焚仪式。

我的依据是 1977 年，在秦陵园西侧的内外城垣间发现一座曲尺形的马厩坑。局部清理时，我发现在坑的门道端底层有用细绳绞砖坯砌成的长 140 厘米、宽 90 厘米、高 60 厘米的引火底炉，坑道口施棚木处又留有入风空隙，坑底西部和炉的前边有一段不长的空间，堆放着大量被烧的灰烬，这明显是坑建成后为葬仪需要所焚毁的铁证。其次陵国内还发现有被烧毁的陪葬坑。更为有趣的是，与铜车马为一组的陪葬坑，其中一个单元焚毁得很彻底，但铜车马所在的其它几个单元并未焚毁。

兵马俑坑的一组情况也是如此，一号坑焚毁较为彻底。二号坑东北隅蹲跪式俑一区焚毁程度与一号坑略同。其它车、骑及步骑混编三区和三号坑相同，未经焚毁。

从目前陵城垣以内和以外发现地下陪葬坑焚毁与未焚毁的情况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特点。

焚毁的陪葬坑一般为大中型，建筑结构为多斜坡道，坡道对边的坑壁也见竖穴小道口。坑内有用夯土筑起的隔梁，将坑分成若干过洞或长廊，过洞与长廊或径直或萦环曲绕，但都能互相串通。坑的底部，周壁和顶部封口均有木结构，顶部封口施棚木，苇席，周壁重叠侧立壁板或壁柱。坑底先铺垫木，垫木上再铺设较厚的板材。若是青砖墁地，便在墁地砖的两侧有用坊木袱垫的通长底部。坑口架设棚木时，在坑底引火处的上部留有入风空隙。这些形式结构的特点，颇似烧窑一样易于燃烧。

未被焚毁的陪葬坑，多属竖穴小孔。有的坑口封口封顶也施棚木，但坑的周壁和底层无壁板、壁柱、垫木和铺地板材，盛装陪葬品的葬具，有方形盒状的木椁、棺，也有瓦棺的。坑内均无引火易燃的任何迹象。

从上述陪葬坑焚毁与未焚毁的形式结构特点看，所谓项羽焚毁兵马俑坑的论点显然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一号坑大厅修建时，为保护已清理出土的俑坑文物遗迹，又仿秦代当时的建筑设计，重新架设木料覆盖回填。一年后我们再发掘时，这些木料已腐朽不堪。项羽入关时，坑已填近3年，这时的木结构早应腐朽，留下的也绝不可能再有较为完整的木构榫卯或架设接茬的关系。这种炭化情况，只有在木炭焚毁前，木质尚好的情况下才能出现。另外，项羽焚毁陵国的目的，在于报仇和盗取财物。从已经探明清理的有关陪葬坑，乃至陵寝地宫扰乱迹象、盗洞的大小分析，可以断定不是大的兵燹盗窃。

根据对秦始皇陵地面建筑和地下陪葬坑探测清理所获资料，我认为“项羽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的记载，应是指楚兵在陵园地面建筑内，先掠夺财物，后纵火焚毁，在烧塌的瓦砾废墟中挖取财物。从“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的记载来看，项羽在关中是住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不可能挖开秦陵地宫和地下陪葬坑来盗取财物，再纵火烧毁。何况兵马俑等地下陪葬坑根本无记载。同时从兵马俑发掘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兵器没有被盗，而且还较集中有序地保护在原地。所以我说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焚毁的真正原因，是秦始皇下葬时一种自焚的葬仪形式。

我要补充说明的是，葬仪自焚未见史载。商周以来有“祭天燔柴”。这种祭天燔柴的自焚形式、从河南安阳小屯丙组发现的考古资料可予佐证。秦民族自西向东的发展，接受中原文化，已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纳群臣建议：“关于自称曰朕，朕为始皇帝”他将自己比作上天的儿子，因此在死后下葬时，被认为是天子归天，回到他的母体中去，经过孕育再度降生人世。由于这种思想的指导与驱使，采用历史上祭天燔柴的方式，也就成了将埋葬时的祭品，都采取火烧的一种葬仪，使这些物质都随着主人升入天国。李鼎铭先生（美术家、中国秦俑学研究会理事）：

你向我讲述的袁先生和程先生的两种不同理论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些原因都有导致俑坑毁坏的可能，包括前几年有人提出的“沼气自燃”说也是一样。但细研究起来却都有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之处。我的观点是焚毁

兵马俑坑的祸首则是一个放羊的小孩。

从发掘现场可以看到，俑坑底部都普遍存有 10—14 层淤泥。这说明俑坑的焚毁是秦亡后相当一段时间的事。我们知道棚木一旦烧毁，几米厚的土层就会立即塌陷，不会再出现淤泥的现象。14 层淤泥只能是在较长时间内地表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否则，在两三年内是不会产生 14 层淤泥的。所以秦俑坑不像袁先生所作出的推断，是公元前 207 年项羽入关的军队所焚毁。

程先生作出的秦人自焚这一理论推断，也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我们先不谈战国晚期的秦国有没有这种仪式的存在。就目前探测的资料知道，秦陵周围的陪葬物不只兵马俑坑一处，如前几年发现并出土的跽坐俑，还有近几年发现的马厩坑、珍兽坑等，已公布的报告说大量的马匹是被活埋的，珍禽异兽也看不出有杀死后入棺的迹象，而出土为数不少的跽坐俑大都完整无损，史料记载秦始皇的宫女也都是被活埋的（关于马厩坑等具体情况，后文将详细介绍），为什么会单独发生 3 个俑坑自我焚毁的仪式呢？

兵马俑的质地是陶质，胎厚而用土细腻，且焙烧的温度都在 1000 度左右，十分坚硬，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能长久地保存下来，以至万世不休。如果秦国有自焚陪葬物的仪式，这些用心岂不是多余的吗？这种在质地上力求的永存性和仪式的暂存性是有根本矛盾的。从咸阳出土的西汉兵马俑，徐州出土的西汉兵马俑来看，除了比秦兵马俑小，其它方面均是相似的。这些汉代兵马俑在出土时大多数都完好无损，可见没有在入葬时就被自焚。秦汉不过相距几十年的时间，按汉承秦制的说法，葬仪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这就说明秦俑坑的焚毁不是自焚，而是他焚。再则，秦兵马俑的兵器绝大部分被人捡走了，如按自焚说，土层立即塌陷，这些兵器怎么会不胫而走？

沼气焚毁的说法从理论上当然可以解释得通，但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就难以成立。要证明沼气失火的现实性，就必须了解秦时骊山地区的水文、土质、气候等资料，经过科学的实验才能加以肯定。在封闭的坑中单有木材的腐朽能否产生沼气以致燃烧也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

秦俑坑的焚毁到底应该怎样解释？我认为随着秦王朝的灭亡和秦陵的被毁、秦始皇陵园已失去了它昔日的风采，变成野草、榛莽丛生的荒野，偶尔出没其间者只有樵夫和牧童了。秦俑坑的被焚一定与樵夫、牧童有关。从今天已发现的西汉晚期墓葬断定，秦俑坑焚毁的时间应在秦亡至西汉晚期之前，《汉书》曾有这样一段记载：“秦始皇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三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项羽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棺椁。”《汉书》成于东汉初年，作者所述牧儿亡羊失火之事，在它之前的《史记》中不曾有半字记载，由此推断作者大多根据民间流传所记。近年考古人员在秦陵作了精密的钻探和考察后，认为秦陵封土没有发现盗洞，地宫并未被盗。既然没有盗洞，怎么会有“羊入其凿”之享？这个“凿”我推断就是距地表不深，处于荒芜中的秦俑坑洞口。秦俑坑是陵园的组成部分，当年的项羽军队虽然破坏了秦俑坑，但并未放火烧毁，这从后来发掘出的三号坑无焚烧痕迹可以得到证实。原因是这支复仇的军队，面对比豪华壮丽的陵园要简陋得多的秦俑坑，没有引起焚烧的念头，如果这时焚烧，就不会有俑坑底部的 14 层淤泥。

可以这样推断，当牧童赶着羊群来到秦俑坑区域时，当年项羽军队所挖掘的进入俑坑的洞窟，多已被荒草和尘土掩盖，羊群只顾啃吃青草，并未注

意脚下的地形和地貌，故而纷纷坠入一号和二号俑坑中。一经“牧童持火照求羊”而失火后，使有可能被误传为秦陵失火，再讹传为地宫失火，烧其棺槨等情节。这就是我认为秦俑坑被焚毁的真正原因。张仲立先生（考古学家、中国秦俑研究会常务理事）：我首先不同意“沼气自燃”说。秦俑坑是一组地下坑道式的土木结构建筑。俑坑四周的边壁和坑中的土隔墙均为夯筑，坑底用青砖墁铺，坑顶棚木上铺席，席上又复一层胶泥土，胶泥土上又压盖一层2米左右的封土，就连修建俑坑时所用的斜坡门道也被用立木封堵，并用土填实。所以，完工后的俑坑实际是一组完全封闭的地下建筑。要在如此封闭的建筑中烧起一把火来，并烧得非常彻底，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燃烧所需要的足够的空气。假如有沼气产生也难自燃，况且产生沼气也不可能。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种焚毁惨状，只能是在俑坑建筑被破坏成千孔百洞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也就是说，在俑坑内部与外界有众多的地方可以空气对流的情况下被点燃焚毁的。

能够造成俑坑严重破坏，使其千孔百洞，内外空气畅通不外乎有两种力量。一是人为破坏，二是雨水破坏。而秦俑坑曾遭大规模洗劫这个客观事实，使得这一问题无再复述的必要了。洗劫者要进入俑坑，就必须先挖开俑坑的顶盖，破坏俑坑建筑。反过来说，只有首先揭开俑坑顶盖，才能进入俑坑破坏和掠夺。参加洗劫的人越多，俑坑建筑就破坏得越严重，而俑坑破坏得越严重，坑内外空气对流就越畅通，大火就烧得越彻底，大规模的破坏和掠夺为秦俑坑的焚毁制造了条件和良机。正是置于这样一种事实，所以我在否定“沼气自燃”说的同时。也有理由否定了程学华先生的“自焚”理论。

从俑坑出土的情况分析，它的焚毁在秦末汉初这个社会大动乱年代已是无疑，同时也可肯定他说焚毁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数众多的集团。这个集团对俑坑的掠夺并不是一般性质的窃取财宝，而是带有目的性地有选择地拿取。秦俑坑丢失的主要是戈、矛，戟、剑等兵器和关键的车马器具及车轮。而为数众多的金铜质器物仍然留在坑内。所以我认为这个洗劫盗窃集团当与军事组织有关，很可能就是一支军队。反之，假如洗劫者是一般性质的盗掘团体，那么秦俑坑中的所有金铜器物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具有掠夺价值的东西，为什么不拿走箭镞、铜甬、弩机、甬钟和其它众多的器物？再说一般性质的盗掘集团是不会把气力浪费在对俑坑的打砸上的。更不会在盗掘后再点一把大火，有意将自己的盗窃行动暴露于众，至今我还没有闻听有这样愚蠢的盗贼。

既然我已对俑坑的洗劫者作出了是一支军队的结论，并把时间的范围放在秦末汉初，就有必要说明在这段时期内到过或接近过秦陵的军事集团。第一首当是秦国章邯所率领的由骊山刑徒组成的秦国政府军。章邯官拜秦国少府，是秦始皇陵园工程后期的主持者，当秦二世二年农民起义大爆发，并威胁到秦国政权时，在章邯的请求下，秦二世赦免了骊山刑徒，授给兵器，并由章邯率领去抵抗农民军。在章邯率刑徒攻打农民军这个问题上，有人又节外生枝地提出，可能这支匆忙组成的军队缺乏兵器，便将俑坑的马弩刀剑取走。这种解释如果和砸毁兵马俑联系起来，便知这是一种不攻自破的推断。假设章邯取走了兵器，何必再砸毁陶俑？况且俑坑兵器和几十万刑徒的比例又是那样悬殊。章邯取走兵器一说不能成立。

有人认为周章之师曾到过秦始皇陵一带，是周章率人洗劫并烧毁了秦俑坑。这一说更难成立。周章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只能算作接近过秦始皇陵

园的一支军队。在《史记·秦始皇本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这个“戏”的确切地点在新丰东南30里处，而新丰在秦始皇陵北6里处，这说明周章之师未到始皇陵就被章邯组织起来的骊山刑徒打退了。

刘邦所率领的军队先于项羽到达关中，尽管史书没有明确说明，但这支军队到过始皇陵是可能的。然而，从刘邦入关后的所做所为来看，足以证明秦俑坑的洗劫和焚毁非其所为。《史记·高祖本记》中记载刘邦数说项羽十条罪状时曾有“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罪四。”的记载，要是刘邦将兵马俑洗劫焚毁，这段骂辞是说不出口的。所以，我认为秦俑坑的焚毁是晚于刘邦入关的项羽所为，其原因如袁仲一先生所说的理由相同。

至于李鼎铭先生所言，尽管项羽砸毁、洗劫了俑坑，而没有焚烧的“牧童焚毁”说，我也不敢苟同。假设项羽没有焚烧俑坑，一个小小牧童能将俑坑烧得如此彻底？疑问自然是众多的，这个牧童共有几只羊掉入俑坑？如果是一只，他只能烧毁一个俑坑，如果是多只分别掉入两个俑坑，说明俑坑已千疮百孔，棚木等自然不能相连，如果有火燃起，也难以全部烧尽，总有一些断裂处而免遭焚烧留于后世。况且这时坑内已多次进水，潮湿的棚末能否点燃也是一个令人难以作答的问题。

无论是“沼气自燃”说、“葬仪自燃”说，还是“牧童焚毁”说，其实都是犯了同样的一种错误，这就是撇开了秦俑坑曾遭大规模破坏和掠夺这个事实，单就

焚毁而论焚毁，从而使历史的真实陷入了误区。假如按“自然”和“葬仪”说解释俑坑的焚毁，那么秦俑坑就不应存在人为的破坏和掠夺。假如按“牧童”说，就不应两个俑坑均遭焚烧，或者说焚烧就不该如此彻底。

结束了对四位秦俑研究者的采访，面对眼前的一堆记录，它使我对秦俑坑的焚烧原因有所了解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疑窦。我觉得我同样地走进一个怪圈中，难以分辨东西南北，诸种不同的推论，除了有他们各自的可信性，不能完全令人折服的缺憾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沼气自燃”、“葬仪自燃”、“牧童焚毁”诸说的证据之不足已为张仲立先生所总结。目前秦俑博物馆的讲解员在对游客解释秦俑坑的焚毁之因时，采用的是“项羽焚毁”说。足见这一理论较其它诸说更能接近历史史实而可能也更被人接受。但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撇开了“俑坑内堆积淤泥普遍为14层”这一事实。按此说法，项羽入关将俑坑大面积揭开。那么在砸毁焚烧后，俑坑上部的土层必然落入坑底而将慢砖甚至陶俑覆盖。何以出现显然是被水冲积的多达14层淤泥沉积坑底的奇特现象？“项羽焚毁”说也正是忽视了这一实证而不能完全令人折服并使讨论陷入误区。如果哪一天研究者能够真正还历史的真实面貌，那无疑将是考古界和史学界的一大快事。

第四章 西部军魂

秦陵兵马俑是世界最大的古代军事博物馆。今后我们军队的高级将领都要到这里看一看。

——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 叶剑英

三号坑之谜

秦始皇兵陵马俑坑的工地上，已经分成了三支不同的队伍——建馆、发掘、钻探。一切都在紧张地进行。

1976年5月11日，钻探人员在一号兵马俑坑西北侧25米处，又探出三号兵马俑坑。这无疑又是一个极大的喜讯。1977年3月，考古人员对三号兵马俑坑作了小型的试掘，发现这是一个形制和内容完全不同于一、二号坑的奇特的地下营帐。考古人员不得不费尽心思，小心翼翼地按照它原有的遗迹脉络进行发掘。它的形状完全呈现出来，人们才发现这是一个奇异的俑坑。建筑面积仅为300平方米，尚不到一号坑的1/20。然而它的建筑形制特殊，坑内结构高深莫测，难以作出确切的结论。一号俑坑平面呈长方形，二号俑坑平面呈曲尺形，唯有三号俑坑平面属于一个不规则的凹字形。它的东边为一条长11.2米、宽3.7米的斜坡门道，与门道相对应的为一车马房，两侧各有一东西向厢房，即南厢房与北厢房。遗憾的是这个俑坑陶俑的保存情况远不及一、二号坑。一号坑陶俑虽然有破坏的迹象，并有许多陶俑被打碎、陶片被移位、兵器被盗等现象，但这些陶俑的头却大部分留在坑内，经过修复后，陶俑缺头者并不多。而三号俑坑的陶俑大部分没有头，陶马的马头也同样残缺不全，坑内也不见残破陶片的踪影。由此，可以推断三号俑坑曾遭受过比一、二号俑坑更加严重的洗劫。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三号俑坑的建筑未遭火烧，而属于木质建筑腐朽后的自然塌陷。这种奇特的现象在令人们想起了程学华先生“自焚理论”说的同时，仍然未能解开心中的谜团，假如三号坑是自焚，那么土层塌陷后这些俑头、马头又是如何跑掉的？这又是一个不解之谜。

随着发掘的不断进展，三号俑坑的南半部通道、车马房和北半部已得到了大面积的清理，昔日的风采再度向人类展现出来。与此同时一个古代军阵指挥部的形貌也一览无余地出现在后人的面前。三号俑坑作为古代军阵指挥部完整的实物形象资料，是迄今为止世界考古史上唯一的发现。它的建筑布局、车马特点、陶俑排列、兵器配备，都是人们重新认识和研究古代战争及出战仪式等方面难得的珍贵资料。

就在三号俑坑发掘的同时，考古人员又在三号坑西侧150米处钻探出一座南北向甲字形大墓。墓室面积约为30平方米，深达12米，四周有二层台，北边的斜坡墓道长约40米，墓室内曾钻探出木板朽灰。由于它的位置与三号俑坑相隔不远，因而，考古人员在《三号兵马俑坑发掘简报》中曾推断：“此墓是否和三个兵马俑坑同为一组？墓主人是否即三号坑内的指挥者？这些还有待于以后的发掘予以验证。”

墓主人是否是军阵的指挥者暂且不论，三号兵马俑坑的出土却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古代完整的军事布阵图：

纵观中国古代战争史，在春秋五霸以前的战场厮杀，军队的指挥将领要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他们所处的位置自然要在军阵之前或在军队的前半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和战争次数的增大增多，军事将领的位置也随之向后移动，至战国晚期，军事将领所处的位置已从军队中独立出来，并组

成了军阵的首脑机关。从三号坑可以看出，秦代军队在战争中指挥机关已独立出来并置于整个战阵布局西北方向。这个指挥机关的产生和位置的选择，既有利于将领研究制定严密的作战方案，又便于观敌瞭阵，知己知彼。更为重要的是指挥将领的人身安全有了保障，避免出师未捷指挥将领首先阵亡的情形。秦始皇陵兵马俑三号坑的发现，使人类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作出古代军事战术至此已完全成熟的结论。

既然三号坑是整个军阵的指挥机关，它的形状结构以及坑内的布局自然变得特殊。我们看到的车马房为一东西向的长方形、东与门道相对，北与北厢房相连，南与南厢房相通。车马房中有彩绘木质战车一乘，这乘车的形制与一号坑发现的战车明显不同，车舆不仅彩绘着华丽而鲜艳的文饰，同时在车左侧还发现了一个直径为 42 厘米的彩绘花盖。战车上没有发现兵器，战车的背后，俑的数量也不同于一号坑。在一号坑出土的战车上往往只有 3 件陶俑，而且车后尚有数量不等的随车徒步兵。而三号坑出土的战车上为 4 件陶俑，中间的御手俑和军吏俑呈一前一后排列，其余两件车士俑位于左右两侧，军吏俑身穿短褐，上披彩绘花边的前胸甲，头戴单卷尾长冠，右臂微举，手作按剑状，从它的冠式、铠甲、手势分析，身份高于御手，但似乎又低于一号俑坑车后站立的将军俑。其余两件陶俑从衣着打扮可以看出地位更加低下，应为普通的车左或车右。

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一种乘坐 4 人的指挥车。三号俑坑的战车无疑属于这一类。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战车又似乎不同于春秋时期的驷乘指挥车。那么这辆指挥车的用途和作用又是什么？著名考古学家袁仲一先生对此作了这样的结论：“二号俑坑的车位于队列的最前端，似为前驱车，又可名为先驱军，行军的导行在先，作战时挑战先驱。即在战前向敌军致战，表示必战的决心，然后两军开始交锋。”这种解释也许合乎历史。但从现代战争的眼光看，是否也可完全否定这种“导行在先”的理由作为指挥者的“专车”，以视察战场局势的巡视车呢？

三号俑坑南北两个较大的空间，所以称为厢房，是考古人员在两个空间的前廊和车马房相接处发现有朽木门楣遗迹。门楣经过髹漆处理，并装有等距离环首铜钉 4 件。根据遗迹推断，门楣上的环首铜钉当是用以悬挂帷幕之用，继之推断当时车马房进入南厢房入口处是悬挂着帷幕的，借以将两个空间相隔，各自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而北部的空间与南部相同，门楣、铜钉遗迹俱在，只是建筑形制稍微简单一些。

考古人员把这两个空间命名为南北厢房，这个命名很容易令人想起《西厢记》中情意绵绵，荡人心脾的爱情故事，通过发现的帐钩等饰件的分析，断定南厢房是军事将领研究制定作战方案和休息的寝室，并没有男女之事的异常情况出现，只有 40 件披甲的武士俑成队地站立着。而北厢房同样没有这类的遗迹，相向排列着 22 件武士俑均为男人模样。看来这两个厢房是一个阵前指挥部，不是起居室。

纵观三个兵马俑坑，不仅在建筑形制上完全不同，而在陶俑的排列组合、兵器分布和使用方法上也各有特色。一、二号俑坑的陶俑都按作战队形作相应的排列，而三号俑坑出土的武士俑则呈相向而立的形式出现，采取了夹道式的排列。无论是南北厢房还是正厅，武士的排列方式均为两两相对，目不斜视，呈警卫状。

一号俑坑的武士俑有穿战袍者，也有的身披铠甲，有的头梳编髻，也有

的将发髻高高挽起，而三号俑坑的武士均身披重铠，头梳编髻。其陶俑造型魁梧强悍，面部神态机智灵活，充分显示了古代卫士特有的性格特征和威武机智的精神风貌。当然，三号俑坑最显著的特点当是兵器的不同。一、二号坑有大量的戈、矛、戟、剑、弯刀之类的兵器，而三号俑坑只发现一种在古代战争中很少见的无刃兵器——殳。这种显然不是应用于大规模厮杀的兵器，首部为多角尖锥状，呈管状的殳身套接在木柄上，其性能只能近距离杀伤敌人或作为仪仗。从大批殳的出土和武士俑的手形分析，三号俑坑的卫士无疑都是手执这类的兵器两两相站

立。周武王九年，武王与姜子牙计议，决定东征伐商。周军出发前，作为统帅的姜子牙左手持金斧、右手执白旄，号令三军将士。周军纪律严明，旗鼓整齐，当大军开到黄河渡口孟津后，赶来参加伐商的诸侯竟有八百之多。就在这时，姜子牙下令班师回朝。因为他这次出征的目的就是检阅部队的战斗力量和试探诸侯的人心向背。姜子牙清楚尽管他的东征得到众多诸侯的响应，但商朝的实力还比较强大，伐商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所以下令班师返回。两年后，殷纣王更加荒淫无道，不仅杀掉了自己的叔父比干，并且囚禁了贵族首领太师箕子，商朝的一些贵族大臣纷纷叛商奔周，殷纣王不但失去了民心，也失去了贵族的信任和支持。洞若观火的姜子牙感到，灭商的时机来临了，在武王的授意下，他决定出兵伐商。然而，在出征前举行的占卜仪式中，兆辞却指出了“征伐将对周不利”的凶兆。恰在这时，暴风雨突然袭击了丰镐，几乎所有的大臣都为此感到恐惧和犹豫，纷纷劝说武王不要发兵征商。唯有姜子牙一人不信天命，坚持劝说周武王不可坐失良机。周武王终于被姜子牙说服，命大军即刻东征伐商。姜子牙率军从孟津渡过黄河，各路诸侯也纷纷率军前来助战。四千乘兵车浩浩荡荡地开往距朝歌七十里的牧野，列阵讨战，殷纣王仓促武装了七十万奴隶和东南夷战俘进行抵抗，双方在牧野展开大战。姜子牙率领周军将士冲入敌阵，商军虽众，皆无战心，看到强大的兵车将率潮水般涌来，自知难以抵挡。于是七十万人一起掉转矛头，引导周军杀向商朝京都朝歌。殷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鹿台放火自焚，统治中原近六百年之久的商王朝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在姜子牙大战牧野，以周代商之后的几百年来，许多史学家对战争前的占卜仪式进行了研究。从史料可以看到这种卜战仪式最早源于史前时期的石器时代，殷代最为盛行，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卜战仍然是战前的一项重要仪式。其占卜的方法是在龟壳或牛肩胛骨的一面钻孔，灼热后骨背面便出现裂纹，占卜者可按裂纹的不同判断吉凶。历史发展到秦代，由于资料的缺乏，后人无法得知这种卜战仪式是否在秦军中应用，甚至有人提出了这种古代卜战仪式在秦代已绝迹。三号兵马俑坑的发现和发掘，使困惑中的史学家又终于看到实证。在俑坑中除陶俑陶马和兵器外，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二号俑坑中没有的一堆动物骨骼朽迹和一段残缺不全的鹿角。这些实物的发现，无疑证实了秦代卜战仪式仍然存在。至于这种卜战仪式在秦代大规模的战争活动中如何应用和发生作用，也许随着秦始皇陵园遗迹的不断发掘会逐渐得到解答的。

完整的古代陈兵图

由于军阵是伴随战争而产生的组织艺术，又随战争实践而发展变化的多种形式。今天的人们要了解古代的军阵，自然显得力不从心。而随着古代兵书真本的失传和具有明显演义性史书及描写古代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的问世，古代军阵被无形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使它越来越处于一种近乎神

化的境地。后人难以见到它的真实面目了。

在唐代所留下的史料中，有一篇叫《李靖问对》的军事文章。唐太宗李世民问军事家李靖何为“五行阵”时，李靖当即回答了“方、圆、曲、直、锐”五种阵法，并向李世民进一步解释，尽管古代兵书战策所言阵种繁多，各家之说不尽相同，但总离不开“因地形使然”的道理，若将诸种阵形加以概括提炼，用此五种阵法完全可以囊括。在这场君臣问对中，李靖郑重其事地指出，“凡军不习此五者，安可以临敌手？”李靖对古代军事诸家阵法的概括，无疑又为后来的军阵研究者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这个谜经过了1300多年后才终于得以解开。

1972年4月，考古人员在发掘山东临沂银雀山两座西汉武帝时期的墓葬时，意外地发现了记载《孙子兵法》、《孙臆兵法》的4900余枚竹简。兵法的问世，引起了世界考古界与军事界强烈轰动，为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理论佐证，悬而不解，争论不休的问题由此得到了确切而一致的答案。

银雀山竹简《孙子兵法·十阵》曰：“凡阵有十，是为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行之阵、雁行之阵、钩行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

《孙子兵法》虽列有十阵，在今天看来其中一些不能算作阵，如火阵只是用火攻击的方法，水阵则是在水上战斗或利用水攻击敌人的方法，这些不能成为独立的阵形。因此，《孙臆兵法》在继承《孙子兵法》思想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摒斥了孙子的“火阵”和“水阵”而成为“八阵法”。

“八阵法”被孙臆首先提出后，历代军事家又接此加以推演，形成了庞杂而令人眼花缭乱的多种“阵法”。可惜这些阵法仍未能超越孙臆“八法”的范围。但就孙臆的“八法”而言，仍可提炼和简缩。如“玄襄之阵”只是多置旌旗而诱敌的疑策，并非战斗队形的排列组合，严格他说是不可称阵的。“疏阵”和“数阵”两种阵法大同小异，只是前者疏数，在战场上展开队伍，扩大阵地，后者在战争中收拢队伍，不为敌人所分割。两种阵法实则均属直阵的范畴。“雁行之阵”和“钩形之阵”，前者意在将队形呈大雁飞行状展开，以便更大地发挥矢弩之威，而后者的阵法是左右弯曲如钩，以便见机行事，采取迂回包抄。这两种阵法亦可用曲形阵加以概括。“锥形之阵”的阵法相当明确，旨在以精锐之师突破敌阵的防线插入敌人的纵深。由此，孙子的“十阵”和孙臆的“八阵”之法，实际的基本阵形仍是“方、圆、曲、直、锐”五种。可见唐代的军事家李靖对古代兵书战策的提炼和概括是颇有道理的。

理论的总结自然要经过验证，然而中国古代军队刀光剑影、血流漂杵的战场，俱被岁月的烟尘所埋没。许多著名战役的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阵容，也不能“定格”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后来的人们就只有根据在烟尘中残留的蛛丝蚂迹来推断远古战争的辉煌场景，并按照各自心中意想的图形，对古代军阵的真实面目进行不休的争执。

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出土，使人们透过欣赏这一奇迹的表层，同时也窥到了它隐匿于表层之内的深刻的军事战略和军事思想的脉络。这无疑是古代一幅完整的陈兵图的真实再现。

三个兵马俑坑作为不同形式排列绝非是随心所欲的安排，它完全真实而形象地向后人展示了秦代精华的军事布局。一号坑作为异常规整的长方形出现也绝非偶然，这是一个方阵格局的典型代表。

阵中的车马和武士俑背西面东，给人们显示了整个俑群已具备了锋、翼、

卫、本几个在方阵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坑中的最前端横排三列共计 204 件武士俑，他们中除三个头戴长冠的“将军俑”外，其余均是身着战袍，腿扎行滕，足登浅履，免胄束发，手执弓箭。军卒的装备显然是古代兵书所云的“善发强弩、远而必中”的摧锋之士。这同二号坑前端左翼安置的弩兵俑群一样，反映了这是一支攻击型的部队，其战法必定是在战斗开始的瞬间万箭齐发，迫使敌军突然乱阵。后续的 38 路大军乘机源源冲击，形成白刃格斗，斩将擒敌的阵局。在大军中间的特定位置上，战车上站有手握青铜宝剑的将军予以指挥，从而形成一个方阵的主体布局。

在俑群南北两旁的武士俑，身披重铠，手执劲弩，面向军阵两侧呈出射状，这无疑是整个方阵中的“两翼”。在俑群的后部。有三排锐士作横队排列，背队大军，这便是方阵的“卫”。两翼和卫的作用在于防止敌人拦路截击或包抄后路，以保障自己军队的战斗行动不受敌人的夹击，从而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略目的。站在军事战略的高度上认识，一号坑兵马俑所组成的庞大方阵，提供给后人的便绝不是一张固定而呆板的图画，从这个战阵的组成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军事战略沿革的脉络。一号坑方阵的组成之本，在于以众多的步兵簇拥战车从而组成强大的决斗力。步兵手执矛、戟、铍等具有强大杀伤力的长柄兵器用以决斗刺杀敌军主力。车兵和弩兵则是用以射杀突出与明显部位的敌军，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这个方阵与春秋时期大排面的车阵不同的是，它充分发挥了步兵的战斗作用。战车所布之阵，可显示军容，威慑对方，发挥集体作战的威力。公元前 656 年，齐楚会盟于召陵，齐桓公排布诸侯之师组成方形车阵，清楚国使者乘车巡视并洋洋自得地称道：“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可惜他以战车为主体的方阵最终没能抵住秦国以步兵和战车为主体的军阵攻击。它的道理在于战车为主体的军阵虽能显示庞大的气势，但在复杂的地形条件下便不能发挥庞大的威力。同时又由于战车的存在，束缚了士兵在不同情况下个体战斗力的发挥，更谈不上随机应变，充分利用灵活作战的战术。故此，战车为主体的方阵随着战争的发展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也是自然的事情。

著名作家、军事家阿里安在《亚历山大远征记》中，对古代希腊的方阵作了这样的解说：“方阵并不是像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僵化的队形，它可以是方形也可是拉长的长方形。也就是形成摆好的阵势。这种阵势也可以随战机收缩，以便突破敌阵。”阿里安的这种解释，也同样适于中国古代军事家孙臆所言“方阵之法，必薄中厚方，居阵有后”的特点。“薄中厚方”，有的史学家解释为“加强两旁的兵力，中间较弱”，这显然与孙臆的“本必鸿、战惟密”的列阵思想相矛盾。按照考古学家张占民先生的解释，“薄中厚方”的“中”应指方阵的正面，“方”似指方阵的纵深。“薄中厚方”的列阵理论应为正面要小，纵深要长，以此编成军阵，必然成长方形。唯有这样宏大而纵深的军阵，才能充分显示出攻击或防守在战争中的优越性。

很明显，一号坑军阵无论从哪个角度透视，都难将其整体予以分割开来，和一号坑不同的是，二号坑兵马俑军阵明显地分离成四个不同形状的军阵布局。第一个空间是由 334 件弩兵组成的方形集团，第二个空间为 64 乘轻车组成的方形队型，第三个空间由 19 乘重型战车和百余件随车步兵组成的长方形劲垒，第四个空间则是由 6 乘战车和 124 件骑兵组成的力量。

弯兵和骑兵尽管在战国末期特别是秦代已发展成相对独立的兵种，但在

战场上却不能构成独立的军阵。尽管这时的弩兵已形成集中的兵团并排成相应的队形，做到了前后相次，射时前无立兵，队无横阵，张而复出，射而复入，更发更上，番次轮回的战斗效能，却无法做到军阵所要求的千变万化，因战局的不同而进退自如的功能，因其行动缓慢。兵器杀伤效能单调，决定了在战场上必须同其它兵种配合的特点。与此相反，骑兵尽管行动迅速、机动灵活，可惜他们手中的兵器不是枪、刀，剑、戟而是劲弩。兵器的局限而不得不同样必需同其它兵种配合。因为劲弩使用不便，况且鞍马没有脚蹬，这样的兵种假如独立成阵，其在战场上的使用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如果历史倒转几百年，位于第二和第三空间的庞大车队，完全可以形成“先编后伍”的“鱼丽之阵”。从战车与步兵的布局来看，也附合阵法所要求的先把战车编成纵横队列，再在车后安排步兵，成为车前步后，并在车与车之间以步兵填之，形成鱼儿钻进曲簿的制敌要领。这种阵法春秋时达到鼎盛，郑国曾用这种“鱼丽之阵”以少量的兵车和士卒战胜了强大的周军，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例。但这种以车为主。步兵为辅的全正面进攻队形，随着战争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弱点而无法再适应战场的形势变化了，到战国末期，这种以车为主的队形已无法单独作为军阵出现，便只能是和其它兵种配合，成为阵中的一个部分。

尽管二号坑中的四个军事集团不能单独成阵，但是他们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具有强大杀伤力和攻击效能的曲形阵，这种军阵一旦应用于战场，必将是所向披靡，威力无穷。这种多种配合形成的强大阵容的战术思想，随着战争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军事家的重视。当冷兵器退出历史舞台，这种列阵思想同样渗透到现代化战争中，从而形成了规模更加庞大。兵种更加复杂的“立体”军阵。

雁行之阵

既然一号俑坑和二号俑坑模拟的是两个实战的军阵，三号俑坑又作为指挥部出现，那么这三个俑坑无疑就是一个密不可分军事集团。这种不同兵种的排列组合方法，是遵循什么样的军阵原则？

很明显，这个大型军阵的排列，完全不同于春秋以前的阵法了。周灭殷的牧野之战，只是一种单调的车步配置一线横排方阵，双方交战时均作全正面冲突，在战术思想上没有采取策略性地变化的活力。敌我双方只能靠兵器的优劣、士气的不同而决出胜负。

秦俑坑军阵布局 and 兵种的排列，隐现着一种随战场情况变化而军阵和兵种配置也随之变化的迹象。执弩的前锋射击后，可随即分开居于两侧给后面的主力让路，骑兵则根据不同的敌情，以迅疾的速度冲出军阵，和步兵主力形成犄角夹击敌人。这种战术上的变化，在春秋中期的车战中就已开始出现，到战国时期随着步兵与骑兵的兴起，这种以夹击为队形的阵法渐已趋于成熟。春秋时期大排面的车阵战已被这种追击、包围、正面进攻的战术形成所替代，“雁行之阵”由此形成。

秦俑军阵无疑是“雁行之阵”的再现。当战争一经开始，阵前的弓弩手先开弓放矢，以发挥其穿坚摧锐的威力。一号坑的步兵主力乘机向前推进。与此同时，二号坑的骑兵与车兵避开敌军正面，以迅猛的特长袭击敌军侧翼，一号坑步兵主力在接敌的同时将队形散开，和车骑兵种共同将敌包围，致使敌军呈困兽之状，从而达到歼灭的目的。这正如孙子所言：“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于江河。”一号俑坑是以传统

的车兵与密集的步兵组成的庞大军阵，兵力部署相当于二号俑坑兵力的三倍。而二号俑坑则是由弩兵、骑兵、车兵组成的军阵，当二号俑坑的兵车、战马以“取锐”的快速进攻方法冲入敌阵时，一号坑的大军则“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接触与敌军正面交锋，这种布阵方法，可谓大阵套小阵，大营包小营，阵中有阵，营中有营，互相勾结，又有各自摧锐致师的性能和目标。曲阵的神奇变化，迅疾勇猛，方阵高深莫测，雄壮威武，使得这个雁行之势，用之对敌，则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无敌。

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正是利用这样一支所向披靡的大军和划时代的军事战术思想，血荡中原，席卷天下，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伟大使命。

划时代的艺术形象

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的出土，除了让后世人类亲眼目睹了那威严壮阔的营阵场景及栩栩如生的群像之外，那个体俑像如真的形体，自然的情态，精湛的艺术技巧和独创的表现力，又以光彩夺目的“秦俑艺术”直逼人们的视野和心灵，这一古老艺术的出现，固然体现着千古一帝秦始皇这个一世雄主的雄浑气魄和人生意向，但从另一个侧面则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伟大时代的人文精神和审美追求。

秦俑三坑众多的与人等高的陶俑和硕大齐人的陶马，以及座骑、战车，按照军事序列和阵兵的形式，再现出来的秦军列阵、驻营、拟战、军幕的生活场景，从宏观上反映了秦国的兵强马壮、气吞山河的风貌和秦始皇本人博大雄武的气概。正是由于秦军在战国争雄中取得的辉煌胜利和秦始皇本人的气魄，构成了秦俑艺术产生的社会基础。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没有秦军的胜利，没有秦始皇帝，就不会有今天看到的秦俑艺术的存在。就不会出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伟大的写实艺术奇峰。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秦代之前，以军队为题材塑造战争场面的艺术作品，如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装饰画，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上面雕刻的 290 余名士兵在水面和陆地上拼杀攻坚的场景，以及洛阳金村出土的骑士持剑刺虎纹铜镜中表现的武士着铠、乘马勇斗的风姿等等，虽然在艺术上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军旅生活和疆场搏击的情景，但由于提供给后人的图像都是些仅具轮廓的侧面剪影，而无法看出他们的真实形象。在此之前，咸阳杨家湾汉墓从葬坑出上了西汉前期的彩绘步、骑陶俑群，这些俑像造型优美，人体的各个部位结构合理，形态生动逼真并极富灵性，但可惜通高只有 50 厘米左右，正因其形体过小，对于甲衣、芒鞋靴履、鞍鞅等细部还只能用颜色绘出，并不具备秦俑在塑型上涂彩的质感，故而只能让后人看其大体效果而无法弄清更为具体的细节。也正是由于这诸多的缺憾，就自然地使这些俑像在艺术上不同于秦俑并削弱了它的历史研究价值和艺术魅力。

我们说秦俑的出现是一个伟大时代精神的产物，这是因为，在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整个社会在思想文化领域诸子群起，百家争鸣，形成了一个意识大碰撞、大解放的思潮。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造型艺术开始从单纯的装饰工艺的小圈子里突围而出，水陆攻战、歌舞宴饮、狩猎追捕、采桑种植、楼台建筑等现实生活的题材纷纷以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并将艺术形式从原始的神的图腾回归到人的思想和生活的本体。这种对生命本体的表现形式，在装饰雕塑、绘画、建筑等领域都有了极大的艺术突破，同时在艺术实践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是有了战国时期的思想滋润和艺术技巧的训

练，才有了秦代写实艺术的奇峰。

从秦俑三坑中武士的造型来看，不但再现了各个兵种的实际阵容，而且成功地塑造了秦军将卒的年龄、性格和人物形象，这些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又表明了雕塑艺术在那个时代由表现神和杰出人物转变为描绘芸芸众生的变革和进步。从秦俑的千差万别和各自的神态、性格，年龄等不同的个性来看，显然不是雕塑家随便拼凑、凭空捏造的一堆有形无神的拼凑，而是现实生活中具体人的生命的艺术再现。确切他说是秦军将卒不同生命体的复活。从出土的十数件将军俑来看，其面目表情、年龄爵秩各有不同。年老者面庞清癯，长须可掬，形态平静，显现出不苟言笑、稳健多谋的老将风采。壮年者，则面阔耳大，天庭饱满，眉宇飞扬，间有髭须，表现了血气方刚、威猛善断的“智将”气质。他们头戴初云冠，身穿战袍，摆小扎长甲，拄剑伫立，昂首挺胸、体魄魁伟，显然是些指挥若定。身经百战的宿将。而戴长冠，穿胸式甲衣的佐俑面目清秀，态度恬静，是一位勤于思考，善作谋略的参谋军官。这些指挥俑塑型精细，敷色明朗，代表了秦俑艺术的最高水平。这些将军俑群像，究竟是曾叱咤风云的秦将王翦、王贲、蒙骜、蒙武、蒙恬、杨端和、李信、庶公、王齮、羌瘣、内史腾、屠睢、章邯等人的肖像，还是雕塑家们心中的“模特儿”，这些已很难为后人考究清楚，但艺术家们塑造形象过程中有现实人物或想象人物的模本，则是毋庸置疑的。一件成功的刻划人物的雕塑作品，它首先要求的就是造型的准确，这一艺术技法在中外雕塑史上都有论述。中国古代的《韩非子·说林》一书就有“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的话。韩非子的这段论述，只能算作雕刻技法的总结，还没有形成像古希腊、罗马雕刻家们那样的理论体系。因而，先秦时期的那些作为器物附件和装饰品的小型立体雕塑，一般地说，概念化多于写实性，表现鬼神多于人的自身。而秦俑则不同，不但俑像大同真人，完全脱离了表现鬼怪神灵的题材和方式，在追求真、善、美的意识中，一步就回归到人的生命本体，不但使数千件武士俑中的将卒们各具“形似”，并且达到了各自的“神似”，这是雕塑艺术在历史的长河中运用写实手法获得的第一次成功，也是秦代雕塑艺术具有写实主义风格的形成和审美价值产生的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开端。那些肃穆静止的武士俑，虽然其姿势、装束和面容，都受到年龄和纪律的约束而整齐划一地列队站立，但不论是身经百战的老兵，还是刚刚入伍的年轻战士，不论是善断多谋高级将领，还是遵命唯谨的小卒，都分别显现出机智勇敢、求战立功的神情。那衣纹随体曲折、发带翻飞的真实描绘，无不又为性格的刻画起到了辅助作用。正是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巧妙地处理了静与动的关系，就使得从大场面的铺排到个体形象的塑造更趋和谐，从而取得了完整统一的艺术效果。

这种艺术效果整体地反映出来，就形成了独特甚至有些奇特的风格。从秦俑三坑所反映的内容看，既不同于送葬的“刍灵”，也不类于一般的随葬俑。因为它不是缩小了比例的小件，也不是放大了倍数的个体雕像，而是追求真实的塑型。就仿照现实生活中人与马的原形而塑造出的秦俑来看，这确实属于一个时代的奇迹，其创作技巧也是极为罕见的。就其创作手法而言，如果说采用的是“圆雕”法，似乎不太贴切，采用“泥塑”法，又不全在乎情理。因为秦俑重在于塑，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塑法。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俑身并非以木杆草绳为骨，用黄泥一点一点地添加，或者一点一点地削减，

而是采用泥条盘筑，用多型多式的范模，通过贴、捏、刻、划成型，再经窑烧成陶，最后绘彩才成为一尊塑像。从表现形式上来看，秦俑所透视出的主要是塑和绘而不是雕，由此也可称为“塑绘”。鉴于这种“塑绘”同“彩塑”又有区别，所以恰当的称呼似应作“陶塑”。在中国雕塑史上这种由秦俑开始的艺术手段，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它标志着雕塑艺术完全从装饰工艺中独立了出来，并开创了以人为体的艺术表现的先河。就其以写实的手法塑造出秦军气壮山河的英雄群像而言，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用雕塑形式纪念战绩的最早的也是最成功的尝试，其艺术上的地位和意义，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艺术发展史上都占有光辉的一页。

当然，作为大型群体塑绘艺术的秦俑，也无可讳言地存在着不少缺憾。除了整体风格基调的沉郁、压抑和悲凉外，在造型上也是优劣参差的。有的陶俑结构松懈，不合人体比例关系。如臂短及腰长，有短颈压肩者，有窄胸猿臂者，也有手大特甚者。而有的则动作异常，不明其用意。如有左手环握而拳眼外翻或者向上者，有半握拳而四指如矩者，也有曲肘环握如按者。这些均不是握其兵器的正常姿势。尤为突出的是，有些俑的形象欠佳并不乏概念化。如相貌雷同有如父子或孪生兄弟，有许多不同的个体都可找到不止两件重复的形象。有些武士俑的形象相当丑陋，几乎到了猥琐的地步。如一个车御俑的身躯如柴，四肢僵直，嘴歪眼斜，同其重要的身份极不相称。还有数量不少陶俑的双眼与耳轮的连线并不在一个平面上，这个缺憾当然不是窑烧或修复所造成的变形所致。还有的表情游移，同肃穆的军阵主题极不协调。有些陶俑毫无表情，呆板木然，有些又表现出神不守舍、犹疑不定的情形，这种复杂多样的面部表情，反映在这样一个肃穆整齐的军阵中是极不应该的，也是与秦军勇猛威武的整体精神相悖的。也有研究者认为，正是这些表情不同，如“轻愁”、“隐忧”、“讥消”、“憨笑”的具体体现，才反映了秦军的现实状况，从而更具现实主义的艺术特点，反映出的军阵更真实，也才更像现实中的军阵和军人。

不管怎样解释，从一个大型的群雕艺术作品考虑，出现了这些与主题思想不协调的形态和表情，就势必损害以致破坏了整体的呼应关系。

造成这种缺憾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却不容忽视，那就是秦王朝的历史背景和艺术家们当时所处的环境。只有在这个历史的大背景下去审视秦俑艺术，对缺憾的原因才能更见分明。

的确，艺术产生于劳动实践。原始人类的艺术兴起，主要集中到对物质产品进行美的加工上面，如陶器的形态和上面的图案等。在对美的加工过程中，又渗透着对图腾的崇拜和鬼神的敬仰。进入阶级社会后，从事艺术劳动的下层人民，除美化生活之外，更多的是适应统治者“制器”的需要而作装饰。秦俑艺术从工艺美术的范畴中脱颖而出，自然是由无数不知名的艺术劳动者适应了时代需要而作的一种新探索。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的文人艺术并未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民间艺术的基础之上。这种独立的艺术形式，经过秦汉几百年的发展之后，至三国以后才出现了以文人为主体的专业艺术家。由此可以看出，整个秦代尚处在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队伍的形成阶段，同时也是专业艺术家产生的前夜。也正因如此，殷周以来鄙视艺术劳动的史、古史及士大夫们不可能去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也不会上升到理论高度来指导艺术。固然先秦的美学思想或多或少地影响艺术创作，但美学并不等于美术，秦代的雕塑工匠们还只能根据祖传的经验，自己的观察和体验来

从事劳动。因此，参差不齐的艺术作品便在这个时代中同时出现了。

秦俑三坑的陶俑清楚而明晰地告诉后人的是，这是一个范模分作、组合安装的组合体，这个组合体的制作过程，跟用零部件组装一台机器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艺术创作本来是一种高级而复杂的思维活动，如果不是其中有艺坛高手作巧妙精到的处理，陶俑势必会成为各部规格不一，整体不能配套的拙劣作品。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甚至是极为重要的因素是，在秦代严刑厉法的恶劣劳动条件和生存环境下，工匠们的艺术劳动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其对作品的热情和创作激情也必然受到极大的压抑。从留传至今的史料和秦俑坑考古资料表明，建自秦王朝统一前后的兵马俑坑，在这里从事艺术劳动的人群，除秦国原有的艺术人才外，绝大部分都是以徭役的形式征发自六国的工匠。由于陵园的工程量极为庞大，除了工师（师傅）领导的工匠外，同时还把有技艺的“工隶臣”也编入其中。于是，在这些成分复杂的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心怀国破家亡之恨，遭遇家世零落之难，身受鞭笞奴役之苦，常存惩罚治罪之忧，因而把陶塑的烧制不是当作一门艺术创作，而只能是当作一种苦役来完成。由于工师和官吏们严格的监视和要求，这些在心灵上受到压抑的民间艺术劳动者，不敢过多地随心所欲，让陶俑缺陷百出，更多的是把自己的情绪融入所创造的艺术之中。于是，整个秦俑军阵透视出一股哀愁、隐忧、愤怒、形似而神不足的韵味，也似乎是一种历史环境中的必然。

当然，秦俑三坑的几千件陶俑中，真正属于劣质的或者说不成功的作品，毕竟是为数不多的一小部分，而劣质和雷同的艺术形象也只限于一般的士兵俑，整体的俑群特别是各级将军俑，其逼真生动的形象、鲜明光亮的个性，完全可以作为一代艺术奇葩而留传千古。

玉虽有瑕，但毕竟瑕不掩玉，浩大的秦俑军阵以其构图、气势、造型之美将无以替代的地位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自1974年3月西杨村农民发现第一块陶片到1977年10月，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8000名地下大军，以磅礴的气势和威武的阵容，接受了当今人类的检阅，它的出现，如同一轮初升的太阳，使沉浸在漫漫长夜的东方古老帝国的神秘历史，再度灿烂辉煌。

当新华社频频发射电波，向全世界报道这一东方文明的盛况时，西方新闻界也不甘寂寞地发出了足以令人同样震撼的讯息：

希腊通讯社报道：“1977年11月，希腊弗吉纳村发现一座巨型墓葬。据考古学家鉴定认为这座墓葬可能是2300年前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墓葬……”

意大利广播公司报道：“截至1977年12月底，意大利历史名城庞贝的考古发掘工作已走过了战后30年的历程。这座罗马时代由于火山爆发而湮没的城市，经过考古学家的科学钻探，已完全掌握了整座城市的形制和布局，许多殿宇的残骸在发掘中得以保护……”

相互交映、此起彼伏的电讯，又唤起了人类对久远历史的记忆，3个最伟大的古代帝国再次步入人们的瞳眸。马其顿——罗马——中国，3颗耀目的星斗又在20世纪人类的心中升起。

第五章 三颗太阳同时升起

秦陵兵马俑是世界上伟大的奇迹之一。它表现了人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和相似的。

——国际特奥会主席史维法

光照三洲的帝国

公元前 356 年，在希腊北部马其顿的一座王宫里，诞生了一个婴儿。这就是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就在亚历山大出生之日，远在世界东方的一个诸侯国秦，已从栎阳迁都咸阳，并通过“商鞅变法”悄然崛起，开始了蚕食山东六国逐渐统一天下的行动。马其顿原是希腊北部一个野蛮、落后的部落小国。经过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二世的默默治理，这个民族逐渐强盛起来。

就在腓力二世雄心勃勃地要征服波斯帝国时，却被他的部下刺杀身亡。20 岁的亚历山大以他超人的果敢和才智肃清了杀父的党徒，并于公元前 336 年继承了马其顿王国的最高统治地位。

亚历山大继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率军出征波斯，完成父亲未酬的遗愿。

但未等亚历山大的大军起程，希腊中部便出现了叛乱。为稳定自己已经得到的控制希腊联盟的地位，亚历山大不得不改程先率军平息叛乱。远征波斯的大军在平息叛乱后的公元前 334 年才走出希腊本土。

亚历山大从小就有爱马的习性，他远征波斯率领的 3.5 万人的军队均为骑兵，战马几乎成为他缔造帝国大业的主要作战工具。公元前 334 年，亚历山大的铁骑踏上小亚西亚，同波斯军队交锋。在长达一年多的厮杀中，波斯军队最终抵不住亚历山大铁骑的进攻而败退。波斯主力团也在伊索斯战场被击溃，皇后、皇太子均被俘。

亚历山大抓住战机乘胜前进，直扑特罗斯城。具有战略眼光的亚历山大知道，要想击败波斯帝国就必须消灭波斯舰队，要消灭波斯舰队，就势必先攻克特罗斯城，一旦拿下特罗斯城，舰队后路已绝，便成瓮中之鳖，无力交战，消灭波斯指日可待。

波斯帝国同样深知特罗斯城在整个战争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所以当亚历山大的大军展开攻势时，遇到了波斯驻特罗斯城军队理所当然的顽强抵抗。亚历山大见陆上攻击不能奏效，便把军队调集到海上实行猛攻。但特罗斯城仍岿然不动，亚历山大再次把军队分成两路，分别从陆地和海上一齐猛攻，这种双管齐下的战法使用了 7 个月之久，城堡依然未克。

亚历山大不愧是世界古代军事史上杰出的英雄。他绞尽脑汁冥思苦想，终于悟出了破敌的要领。他命令将士在海上修筑起长长的突堤，直通特罗斯城下，然后在突堤上安装木梯等攻城器具。这显然是把古代土木工程学的技术应用到攻克城堡中的天才的军事杰作，以后成为罗马时代攻城克坚的军事教课书，罗马帝国也正是如此得益于亚历山大的军事战略思想和灵活多变的战术，才在世界格局的争斗中迅速崛起的。

一切准备就绪，亚历山大登上突堤，望着面前几百架宽长的木梯和一捆捆绳索，对夜色笼罩下的特罗斯城发出一声淡淡的冷笑。

亚历山大的军事天才得到了验证，特罗斯终于在强大的攻势中失陷了。波斯国王大流士派使节向亚历山大求和，提出的条件是：释放波斯族王族妇人，并由波斯给予赎金；自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地域全部割给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拒绝了这种求和，他率领大军沿巴勒斯坦海峡挺进，南侵叙利亚，占领腓尼基，随后登上埃及的领土。此时的埃及已沦陷为波斯的殖民地。对亚历山大的到来，埃及百姓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亚历山大利用在埃及过冬的时间，建造了举世闻名的亚历山大城和亚历山大灯塔。这座城市直到今天仍繁荣不衰，成为地中海第一大商港。而被安提巴特命名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亚历山大灯塔，在安然无恙地屹立了 1000 年之后，于公元 796 年的大地震中沉入海底，再也没有复出。

第二年春天，亚历山大再次踏上征程，亲率 47000 名士兵由埃及东向，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便抵达两河流域。同年的 10 月 1 日，在商加米拉平原同卷土重来的波斯军队主力进行了决定性的会战。两军各自摆开阵势缓缓向前移动，亚历山大军队的右翼首先向波斯军展开正面攻势。亚历山大故意延长右翼佯装主攻波斯左翼，波斯军急忙抽调大量中央军队增援左翼，结果中央空虚，而且与右翼形成了间隔。亚历山大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以精锐的骑兵突然楔入敌军中央，这种和《孙子兵法》所言的“锐阵”相同的阵法，一经亚历山大应用，波斯大军在乱作一团失去控制和指挥后，很快全线崩溃。大流士国王再一次率少数部下杀出重围落荒而逃。

这次战役使波斯残余势力遭到了致命的重创，再也没有反扑的力量了。亚历山大长驱直入，率大军来到大流士国王正在兴建的新都，并将宫殿付之一炬，报了 150 年前希腊阿特勒被波斯大军焚毁之仇。然后率大军进入哈曼丹，将波斯残余势力全部消灭。

随着波斯帝国的灭亡，他在哈曼丹就地对部下进行奖赏，遣散盟军，仅留部分愿追随他的忠诚之士，并在当地招募新兵，编成精壮的私人兵团。同时自封为“亚西亚之王”。从此亚历山大走上了一条更艰难也更辉煌的道路。

为确保已经到手的波斯帝国领土，亚历山大再次向更为广袤的世界进行征服，把他新编的兵团推向了新的征程。庞大的铁骑经过亚利安拉、多兰齐加拉，越过峻秀高耸的库什山脉，进入伊朗北部，直达锡尔河。大军在锡尔河休整过程中，与当地入一起修建了“最尽头的亚历山大港”。

至此，亚历山大出征已达 6 年，全部行程为 18000 公里。

之后，亚历山大率军企图继续东征印度，直达太平洋，但在全军将士的坚决抵制下，不得不下令返回故都苏萨城。

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定新都于巴比伦城。踌躇满志的亚历山大仍继续把整个身心用在向大帝国迈进的征途中。他下令修筑的运河网，同时乘船绕阿拉伯半岛航行进行考察。正在他向自己的目标迈进时，却突然患病身亡。英雄一世，死时，年仅 32 岁。

金色的罗马

随着亚历山大的谢世，他所建立的庞大帝国也随之崩溃，若干年后，西方的霸主地位将由一个曾经弱小的罗马取而代之。

如果以公元前 270 年为界，那么这之前在地中海一带角逐霸权的只有迦太基人和希腊人。此时的罗马还是个弱小的婴儿。

然而迦太基人和希腊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弱小的罗马似乎在一夜之间崛起了。婴儿终于长成了青年。

既然已经崛起，就要充当霸主。没有这种意志与信念的支配，小小婴儿是不会在一夜之间长成强壮青年的。当然，罗马人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筋骨还不十分强壮，气力上没有迦太基人这位老大哥强大。所以，罗马人在不

断向迦太基人表示心悦诚服、订立友好条约的同时暗中对希腊人这位力气稍差的二哥刺进了刀子。希腊人没有想到这位三弟如此凶残狠毒，欲想制自己于死地，但受伤的躯体最终还是使它力不从心而溃败。

满身气力的迦太基人面对罗马人的行动和野心，依然蒙在鼓里，他们怎么也不会料到一旦希腊人溃败，罗马人的刀子就向自己刺来。

更换位置的时刻终于来了，这是公元前 270 年，罗马人把最后一批盘踞在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全部驱逐出境后，很快控制了整个意大利半岛。希腊人被铲除了，随之而来的自然是罗马人同迦太基人争夺第一把交椅的决斗。

既然罗马人的刀子已在眼前亮出，并呈威胁和格杀之势，作为大哥的迦太基人自然不能坐以待毙，战争不可避免了。

公元前 246 年，罗马人挥舞战刀向迦太基扑来，很快占领了军事要地西西里岛。

要拿下迦太基，彻底打败这位大哥，对于罗马来说就意味着必须横穿地中海，进行大规模的海战和陆战，以对付希腊人十倍的力量来进行这场战争。因为迦太基人毕竟不是希腊人，这个具有航海传统的民族，此时强大的舰队完全控制着地中海海域。

当罗马人驾着笨重缓慢的木船离开西西里岛开赴迦太基城时，遭到了迦太基舰队的猛烈反击，罗马军队几乎全军覆没，不得不在西西里岛坚守不出。

面对宽阔浩瀚的地中海和迦太基庞大的舰队，罗马人只好仰天长叹。

希望源于失望，罗马人苦闷了数月后，终于想起了亚历山大大帝在波斯海上筑起突堤，而一举攻克特罗斯城那本著名的军事战例教科书。亚历山大的军事杰作，使罗马重新燃起了希望之光。

夜幕遮掩下的地中海，波涌浪翻，空旷苍凉。罗马大军驾驶笨拙的木船悄悄向迦太基舰队靠近。海浪的涌动，云雾的翻腾，遮饰了罗马舰队的行动。当迦太基人发现面前的一切时，已来不及了。木船疾速驶近敌舰，并很快排成突堤状，一架架木梯倾刻搭向舰身，罗马军队蜂拥而上，在迦太基的舰上展开肉搏和厮杀。舰身急剧地颤动，浪涛依旧翻腾不息，无数人从舰上栽入海中葬身鱼腹，冲天的火光，映照着剑影刀光，惨淡的星月冷冷地目视着人类的争斗杀戮，地中海荡起腥红的血水，船舰上升起撕心裂肺的喊杀和哀嚎声……罗马大军凭借亚历山大创造的战术和自己的强悍勇猛，对迦太基舰队展开大规模的猛攻。在著名的米勒海大海战、艾克诺莫斯大海战和艾加特斯大海战这三大战役中，给迦太基舰队以致命的重创，使其部队战斗力丧失殆尽。在这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迦太基为保存自己的残余势力，不得不以赔偿巨款和放弃西西里岛主权的代价，含泪饮恨与罗马人暂时讲和。

这次被史书称为“腓尼基战争”的结果，使得罗马人终于由婴儿成为西地中海区域的霸主。但是，罗马人深知自己的第一把交椅坐得并不稳当，因为迦太基实力尚在，说不定哪一天会卷土重来，撼动它的地位。

罗马人没有看错，就在他们庆贺战争的胜利而论功授赏之时，迦太基有一个 6 岁的孩子正在成长。这个孩子就是日后差点致罗马人于死命的汉尼拔。

当汉尼拔 9 岁时，他的父亲，迦太基著名的军事将领哈米尔卡就带他出征西班牙，在连续不断的征战厮杀中，汉尼拔逐渐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人。公元前 229 年，哈米尔卡患病去世，临终前他没有忘记让他的儿子汉尼拔到柏尔摩洛克的神庙对神起誓：不忘迦太基战败之耻，永远与罗马为敌。

公元前 221 年，统帅西班牙南部“新迦太基城”的汉尼拔的姐夫遇刺归天，由 25 岁的汉尼拔取而代之。

汉尼拔一经取得军事权力，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实现自己的誓言，和罗马决一雌雄。

他故意挑起事端，以激怒罗马人，从而赢得战争的机会。兵强马壮的罗马自然不能容忍他的无理，公元前 218 年，迦太基与罗马的第二次大战拉开了帷幕。

罗马兵分两路，一路挺进被迦太基人控制的西班牙，征讨汉尼拔，另一路进攻“新迦太基城”，以切断迦太基的中心指挥系统。

汉尼拔没有列阵迎战，而是率领六万大军北上，朝意大利领土扑去。他要把战火引向罗马本土，使罗马军队首尾难顾，不战而退。这无疑是一个大胆而具有风险的军事战略。

汉尼拔率领的六万大军中，有步兵五万，骑兵一万，外有三十七头作战大象。在汉尼拔的东讨西战中，战象是他对付敌人的一柄得意利剑。

汉尼拔率领大军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迅速向内陆迂回。此时的罗马人已明白了汉尼拔的意图，急忙派重兵阻截，以打破汉尼拔战略计划。

当罗马大军匆匆赶来时，汉尼拔却销声匿迹。罗马军队派出情报人员四处打探，仍不见汉尼拔大军的影子。

罗马人懵了。他们捶胸顿足地面对苍天叫喊：“汉尼拔，你在哪里？”

汉尼拔在阿尔卑斯山的山峰之尖。

此时的罗马人断然没有想到，汉尼拔居然开始了亘古未有的壮举，翻越整个阿尔卑斯山。

绵延千里的阿尔卑斯山，早已是冰封雪飘、鸟兽难容的季节。在险峻狭窄的山道上，汉尼拔率大队人马顶风冒雪艰难前行。苍茫的雪野，雄峻的山峰，深不可测的大峡谷，使这支大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他们完成了这一伟大壮举，越过阿尔卑斯山后，六万大军只剩四万，三十七头巨象也只有二十头。但惨重的代价没有使这支大军沉沦颓丧，他们毕竟站在了意大利领土上，而且处在罗马军队的背后，胜利的前景已向他们展现开来。

汉尼拔率领大军尖刀一样直插罗马的心脏。罗马见这支恍若从天而降的神军从背后猛扑过来，立即组织国内的军队进行抵抗。自小受到严格训练的汉尼拔，以杰出的军事才能指挥部下将罗马军一次次击溃。汉尼拔抓住战机率大军在罗马国土上纵横驰骋，所向披靡，罗马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俱丧。直到公元前 216 年 8 月 3 日，罗马人才在暂短的喘息之后，得以在意大利南部阿费多斯河口的康尼平原上摆下阵势，与汉尼拔作决定性的一战。

罗马军联合各同盟诸侯的步兵八万人，另有骑兵六千余众。而汉尼拔此时只有不足四万步兵和一万骑兵。从兵力上看，汉尼拔显然处于劣势，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兵源的补给。

两支大军摆开阵势，间距数公里，坦荡无垠的康尼大平原上，暖风徐动、野花飘香，灿烂的阳光照耀着碧绿的草蔓，火獾在草蔓中流星般四散，整个康尼平原越发壮美秀丽。

罗马大军的右翼由帕尔鲁斯指挥，中央正面军由前执政官凯朱奴斯指挥，左翼则是法鲁将军指挥。其军阵布局为：

左右两翼均为双层长横式阵形，每一层六排步兵。后列是中央军，由十二排步兵组成。他们的阵法很明显，是以其两倍的优势兵力主攻汉尼拔的中

央正面，为锐形阵法。

汉尼拔纵身马上，巡视罗马军的阵形，踌躇了很久。随后他猛地调转马头，大声向部将下令：把中央正面部队迅速调整为梯形，突出于两翼，并成为一列横队展开。

汉尼拔所采取的阵形为“斜阵法”。在当时，这是兵法史上划时代的布阵方法。在此之前希腊将军艾帕伦达斯曾用此阵法在乌克特拉大败常胜军斯巴达。自小接受军事训练的汉尼拔自然通晓希腊时代的兵法。因此，他在这广阔的康尼平原上，作出了惊人的杰出表演：

他高喊着：“我指挥梯形正面！”同时把两翼的重装骑兵分别交给其弟和波米卡尔指挥。

当他挥舞战刀，策动中央军急速突出，而罗马军的中央正面也在向前运动时，汉尼拔的左翼重装骑兵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罗马军的右翼撞来，并迅速向罗马中央军背后包剿，瞬间已达罗马军左翼的背后。形成了巨大的包围圈。由于汉尼拔的梯形正面呈铁椎状插入罗马军正面，敌军两翼在他的骑兵包围中又来不及合击，结果罗马军的中央被穿透，两翼被骑兵席卷扫荡，主脑失去指挥能力而陷入全面的混乱之中。罗马大军当场阵亡七万人，剩下的一万全部被俘。

这便是留传万世的典型的以少胜多的“康尼之役”。汉尼拔为此在世界军事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声名。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总参谋长休利芬元帅所拟定的著名的“作战一号”计划，便是继承汉尼拔的包围歼灭战术思想，在他的计划中，对法、俄两军的正面作战，特别加强左翼的战斗力和中央正面军呈夹击之势，致以全面包围，将敌人粉碎。这个完全师法于“康尼之役”的战法，曾使法、俄两军大规模溃败。

“康尼之役”，完全是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军阵阵法和战术的西方版本。东西方形成的这种共同的战略战术，让后人无法不为之感叹。

然而，汉尼拔的好运随着“康尼之役”的结束而一去不复返了。罗马人决定采取持久的拖延、牵制、消耗战术，把汉尼拔这头雄狮困死。同时让另一条战线上的军队直接进攻西班牙，以迫使汉尼拔后撤。

面对军队疲惫、劳累、补给不足的困难，汉尼拔心急如焚，这时，西班牙被罗马另一条战线上的罗马军队攻陷，迦太基政府遭到巨大威胁，汉尼拔思前顾后，不得不率军返回故国。尽管他的军队已迫近距罗马城只有八公里的地方。

公元前 202 年，也就是汉尼拔回到故国的第二年。年轻的罗马将领西庇阿率军进入迦太基。汉尼拔立即组织军队在查玛地区同西庇阿军队进行了他有生以来规模最大的决战，也是最后的一次决战。深秋的查玛战场，狂风怒吼，尘土飞扬，使这片无水、无山、无人烟的不毛之地越发显得悲壮凄凉。这是苍天向汉尼拔最先发出的不测的警告，可惜他没有察觉。

威名赫赫的汉尼拔依然摆开了同康尼平原上相似的阵法。有所不同的是大军的前方安置了 80 头凶猛的战象。

两军势力相当，步骑均为三万人。汉尼拔信心十足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军队，发出了攻击的号令。交战开始了。

此时的汉尼拔没有想到年轻的罗马军将领西庇阿，在彻底地研究了阵法之后，又以惊人的才华拟订了使他惨败的神奇对策。80 头战象挟起了死

神，以万钧雷霆之势向罗马军队扑来。随之左翼的铁骑也驰入敌阵。

罗马军队面对滚滚风雷，既不退却，也不避让，呆了似地在原地不动。

战象铁骑狂奔着，离罗马军队越来越近，死神已在眼前直扑罗马军队。

随着西庇阿发出的号令，罗马军队鼓声大震，号角齐鸣，声调怪异，震耳欲聋。在奇声怪响中，罗马军阵闪现出一条条通路。

凶猛的战象和铁骑受到这突起声响的惊吓，顿时乱了阵脚。有的停滞不前，有的穿阵而过，有的则掉头冲向自己的军队。汉尼拔军阵一片大乱，无数步兵在战象与铁骑的冲击、践踏下成为肉泥。

西庇阿抓住战机，指挥中央正面部队迅速楔入汉尼拔的阵中，将中央军击溃后，转身增援牵制汉尼拔两翼的部队。久经沙场，百战百胜的汉尼拔，再也无力指挥军队反扑了，他遭到了平生最悲惨的大失败。三万军队除阵亡外，几乎全部被俘。

初出茅庐的西庇阿第一次把声学应用于战争，一举击溃名将汉尼拔而留传青史。

这次交战的结果是，迦太基无条件向罗马投降。并接受罗马人提出的一切条件：没收军舰战象；剥夺交战权；放弃全部的海外领土，赔偿 10000 斤黄金；派 100 名贵族子弟赴罗马当人质等等。于是，为期 19 年的第二次腓尼基战争宣告结束。

罗马彻底坐稳了在西地中海的霸主地位，然而，胜利者的欲望总是会不断地膨胀，这正是人类共同的天性。

罗马人没有就此止步，随着罗马的悲剧英雄凯撒大帝登上政治舞台，他的大军又征服了高卢、发拉克斯、埃及和小亚西亚。稍后的屋大维大帝，继续率领罗马大军开疆拓土。大军所到之处，势如秋风横扫残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罗马的版图直至成为东起幼发拉底河，西抵直布罗陀海峡，北至英吉利，南到北非北岸，整个地中海成为一个内湖才不再向外延伸拓展。

婴儿最终成为巨人，“金色的罗马”达到了它最为辉煌的鼎盛时期。

千古一帝震华夏

当马其顿的铁骑踏上万里征程，罗马大军在地中海舞台上作出出色表演之时，在喜马拉雅山东部和天山、阴山、大青山区域的千里大漠上，同样是刀光剑影，烽烟不断，厮杀连年。凄凄大漠深处，匈奴、东胡、月氏族，展开了争夺区域霸主的拼杀。战马的鸣嘶伴着劲风吹起的狂沙烟尘，在箭雨刀光的浪涛中起伏跌宕，滚滚前涌。

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广袤土地上，强悍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家雄主，同样为争夺霸权而拼杀搏击，逐鹿中原。黄色的土地上，到处大军云集、鼓号震天，戈矛并举、刀剑进击，车骑交错、战马嘶鸣。战争之频繁、规模之巨大、兵车之众多，远非西方战场所能比。交战双方投入军队的数量随着战争的发展而急剧增多，几乎每一场交锋的人数，都有数十万之众；战争的方式也由车战、阵战的直接对抗逐渐演变为以步、骑、弩兵为主的野战和赋予多种变化艺术的包围战。著名的秦赵“长平之役”，两军从公元前 262 年一直拼杀到公元前 260 年，结果是赵国 40 万大军降卒被坑杀，秦国军队也伤亡过半。无数将士惨死沙场，流淌的热血荡涤着中原。

历史的动荡急需一位铁血人物站出来，用超人的智慧和强大的武力完成统一。秦始皇正是顺应这历史潮流的发展挺身而出，“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御宇内”以叱咤风云的盖世雄威，席卷天下荡平六国，完成了历史赋予他

的伟大使命。

公元前 237 年，秦始皇亲政并以他的机智与果敢粉碎了吕不韦和■集团，稍试锋芒后，便开始实现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

这一年，呈现在秦始皇面前的是两种针锋相对的战略主张：一是吕不韦之后继任丞相的李斯“先取韩”的战略，另一种是大思想家韩非“举赵、亡韩、臣楚魏、亲齐燕”的战略。李斯的主张体现了先弱后强的作战方针，而韩非的主张则体现了先强后弱、远交近攻的战略布署。

李斯与韩非虽系同学，一旦发生关系到自己前途命运的利害冲突时，相亲变为相互残杀，便无法避免，这是人类天性中的弱点所决定的。既然冲突已经出现，残杀也已成必然，李斯联合重臣姚贾先发制人，在秦始皇面前分析了韩非的战略方针无非是“存韩”和“谋弱秦”。因为韩非是韩国的宗室贵族，人虽在秦，其心向韩，故不让讨伐韩国而攻赵。不如极早杀掉以绝后患。秦始皇为李斯所言而动心，下令将韩非关进监狱听候发落。

既然冲突已经开始，就要制敌于死地，否则后患无穷。深知权术之道的李斯不会放过这个契机，他以毒药将韩非致死而取得了这场冲突的胜利。

韩非既死，李斯又倍受秦始皇宠幸。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战争的形势和六国的格局没有深刻的了解，对敌我双方的力量没有正确的估计，缺乏战略头脑和眼光，此时的秦始皇可能就要按照李斯的作战方针行动了。

然而，秦始皇没有行动。他开始以自己的宏才大略正确估计和判别敌我双方的力量，以及韩非与李斯两种不同方针的得失。

秦始皇清醒地认识到，秦国的军事力量比任何一个诸侯国的力量都要强大，若单个较量，秦军无疑占绝对优势。但是，秦国面临的是关东六国的敌人，若以秦国兵力对六国总兵力，优势则归对方。灭六国不能四面出击，而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无疑是正确和明智的。要想各个击破，就必须防止诸侯合纵。六国中，韩国最弱、赵国最强，如按李斯的战略方针，“先取韩以恐他国”，就很可能再“恐”出一个以赵国为首的合纵抗秦的强大势力。公元前 241 年，赵将庞■统帅赵、楚、魏、燕、韩五国之师合纵伐秦，就是以赵国为首联合起来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不能再蹈复辙。韩非的主张无疑是为先打破诸侯合纵考虑的，是一种新的形势下战略目标的发展与转移。“举赵”以击其头，使六国群龙无首，同时“亲齐燕”以断其身，合纵难以形成。

秦始皇以一个战略家的杰出才智，不顾李斯等人的强烈反对，毅然决定采用韩非的战略方针：远交近攻，举赵亡韩。作出了集中主力，打击赵国的具有重大军事战略意义的抉择。

公元前 236 年，秦始皇派名将王翦、杨端、桓■率 30 万大军进攻赵国。当时赵国大将庞■正率兵与燕国交战，秦军乘虚而入，占领了上党郡及河间地区。第二年，秦军又攻下平阳、武城。赵国军队阵亡十余万，大将扈辄死于乱军中。公元前 233 年，秦军又一举攻下了赵国的赤丽、宜安，兵临邯郸城下。赵国危在旦夕，急从北方调回正在防御匈奴的名将李牧。李牧所率军队为赵国的精锐之师，从北方返回后，士气高昂，锐气逼人。李牧以出色的军事才能指挥将士和秦军在邯郸城外进行了一场血战。结果是秦军遭到了攻赵以来的第一次惨败，指挥战斗的主将桓■由于战败而畏罪潜逃燕国。第二年，秦国大军再次进攻赵国，又被李牧指挥军队击退。

尽管秦军兵败，但赵国的势力已大大削弱，祸不单行，公元前 230 年赵国又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战争的消耗，灾情的折磨，政治的昏暗，此

时的赵国已成强弩之末，灭亡之日为期不远了。

赵国自身难保，联纵已不可能。趁此良机，秦始皇派兵一举将小小的韩国拿下，昏庸无能的韩王被俘。

李牧尽管两次大败秦军，但未能挽救赵国灭亡的危局。公元前 229 年，秦军大将王翦、杨端兵分两路扑向赵国。久经沙场的宿将李牧、司马尚率赵军拼死抵抗。两军进行了数百次厮杀，均遭巨大伤亡。将士血染战袍，尸骨遍地，苦苦搏击一年之久未分胜负。秦始皇亲临现场观战，以鼓舞壮士不惜全力拿下邯郸。与此同时，他采用尉繚“离间其君臣”之计，派人用重金贿赂赵国权臣郭开。郭开贪利而向赵王诬告李牧、司马尚欲谋叛乱，只守不攻，作战不利。不辨真伪的赵王立即派赵葱、颜聚去取代李牧、司马尚的兵权，李牧深知赵葱、颜聚皆非将才，绝不是秦国名将王翦的对手，在大敌当前的危急关头，李牧以国家存亡为重，抵抗王命，拒不交出兵权。赵王与郭开密谋派人将李牧抓获并处以死刑，司马尚被免职关入大牢。可惜李牧忠诚一世，壮志未酬，没有战死沙场，却被奸臣所害。

李牧一死，赵军军心大乱，结果秦军不到 3 个月，便攻克邯郸。赵国从此不再存在。

强大的赵国一旦灭亡，弱小的魏国和燕国的悲剧命运已无法改变。尽管不乏有荆轲那样的壮士，慷慨悲歌，以死相搏，但仍未能摆脱国破家亡的结局。两国随着赵国的灭亡，也很快走到了尽头。

时势造英雄，但英雄必须正确驾驭和把握时势，否则便不再是英雄。

四国吞灭，秦国面临的敌人便是齐、楚。很明显，这两国的实力，楚远比齐强大，而秦与齐和亲修好 40 余载，和楚数次结怨。面对齐、楚两国的不同局势，如何确定征讨战略方针？

当秦始皇征求文臣武将的意见之时，听到的多是先攻齐，再伐楚的战略理论。

这实则是李斯“先弱后强”作战方针的延续。

秦始皇依然没有这样做。他再次清醒地认识到，齐国虽弱，但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如若先攻齐，免不了还要和强楚进行一次恶战。同时还要遭到齐、楚合纵的威胁。若先灭楚，可使齐秦之交不破，齐楚合纵不成。一旦楚国灭亡，齐国不战而降。

于是，秦始皇再次使用了集中主力打击主要敌人的战略方针。公元前 225 年，秦始皇派大将李信率 20 万秦兵伐楚，因年轻气盛的李信过分轻敌，秦军遭到惨败，退回秦国。

公元前 224 年，秦始皇改派王翦率领 60 万大军出征伐楚。当秦军压入楚境时，楚国名将项燕立即调动国内全部兵力迎战。王翦吸取了李信兵败的教训，坚守营盘而不出战，待秦军养精蓄锐、斗志旺盛之际，才下令出击。60 万大军洪水般冲入敌阵，此时的楚军已失去戒备之心，猝不及防，而被秦军一举击溃。楚国名将项燕也战死于乱军中。不久，秦军攻下楚都寿春，楚国被吞灭。

未出秦始皇所料，楚国一灭，齐国已成瓮中之鳖，被王翦的大军一触即溃，齐亡。

齐楚征战，在显示了秦始皇杰出的军事战略才能的同时，也暴露了他使用将领的失误和弱点。但他的失误和本身具有的弱点，没有妨碍他伟业的建立。至公元前 221 年，关东六国在秦军 15 年的征讨中全部灭亡。中原大地上

为期几百年的割据混乱局面结束，历史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然而，六国灭亡、中原统一，并未标志着秦军的征战已经结束。因为此时中原北部的情形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匈奴人由弱到强，趁秦灭六国的机会，单于头曼率匈奴大军南下，攻占了河套黄河以南的地区。秦都咸阳面临严重威胁。“亡秦者必胡”的议论已在民间流传开来。

同时，地处五岭之南的“百越”陆梁人，对秦的统一和政治的稳定，也造成威胁和困扰。要建立一个强大而牢固的封建帝国，就势必要对这两股军事力量给予打击。

问题出现了。摆在秦始皇面前的是匈奴人，强悍强壮，以战征之，难攻难守。而“百越”虽远隔千山万水，路途遥远。但部族分散，军事力量相对较弱，攻取较易，守戍也可能成功。

面对新的局势，秦始皇毅然实行战略大转移，采取了先弱后强，先远后近的征战方针。这实则是 15 年前李斯等人战略思想的复活，秦始皇终于在历史发展进程的今天付诸实施了。

50 万秦军兵分五路，以战略进攻的姿态出现在“百越”战场上，很快占领了这块土地。南海也因“百越”的征服打通了。

随着对“百越”战争的胜利，秦始皇立即派大将蒙恬率 30 万大军攻击匈奴，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结果匈奴退却 700 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

在历史的跑道上

19 世纪后半叶，著名的《进化论》作者达尔文，提出了现存灵长类中最接近人类的大猩猩和黑猩猩的生息地点为非洲，因此认为人类发祥地可能在非洲。于是他提出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

然而，随着 1892 年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上发现的直立人化石和 1929 年在中国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受到了挑战。这种被认为最早的直立人阶段的骨化石陆续在亚洲发现，并且在亚洲也生息过诸如猩猩、长臂猿之类的灵长类动物，加之从地理位置上看，亚洲又正是处于人类生息的世界各大陆的中心位置，因而，许多人类学家以实物和推理两重理论，提出了和达尔文不同的人类起源于亚洲的学说。

正在这种学说逐步得到一致认定的时候，20 世纪 30 年代，考古学家又在南非、东非一些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比爪哇和北京人（距今一百万至五十万年）更早的南猿人阶段的骨化石和石器（距今三百万至一百万年）。于是，有人又想起了达尔文，再次力主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但这种学说维持了不久，考古学家又在印度北部的西瓦立克山、亚洲巴基斯坦、中国云南发现了比南猿人更早的拉玛古猿化石（距今一千二百万至八百万年）。人类起源的学说再度倒向了亚洲一方。

1975 年，在中国云南省禄丰县的煤层里，陆续发现了丰富的拉玛猿人化石。特别是随着 1980 年 10 月在禄丰县的煤层里，世界上第一具拉玛猿人骨的问世，许多科学家便认为这是与人类最亲近的一种古猿，人类就是由它演变而来的。有的科学家甚至干脆把拉玛猿看成是人类的起点。这个起点在亚洲的东部。

达尔文最早提出的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再一次受到挑战。

撇开人类起源的学说争论，从现在已发现的直立人化石来看，在欧、亚、非三洲的“旧大陆”上均有分布。唯有北美、南美和大洋洲被人称为“新大

陆”的地方没有见到。

尽管这些直立人当时已经会使用 and 制造天然工具，并充分掌握和利用火来生存，但依然没有创造人类的文明。世界人类文明的曙光又经过了近百万年的漫长岁月，在距今 7 千年前才显现出来。

毋庸置疑，人类的文明应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的解体而进入有国家社会组织的阶级阶段为标志。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并且掌握冶炼金属的技术。当然，这一切的标志中，创造和使用文字则是最主要的。

1968 年，英国剑桥大学丹尼尔教授在他的《文明之起源与考古学》一书中，提出了全世界最古老的独立发展的文明为六大文明之说。这六大文明分别为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

其实，丹尼尔的学说实则是荷兰著名考古学家法兰克福学说的继续和发展。早在 50 年代初，法兰克福就指出全世界范围内独立发展的文明只有三种：埃及与两河流域组成的近东文明；中国文明；秘鲁、墨西哥组成的中、南美文明。埃及与两河流域，印度与两河流域相互的密切联系而形成的文明，已被考古资料所证实。尽管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没有发现直立人化石，但他们特别是墨西哥与秘鲁最早在世界形成独立的文明，同样被考古资料所证实。显然，它们所形成的文明是独立的，与旧大陆无关。只有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问题，成为传播论派和演化论派争锋的焦点。而丹尼尔和法兰克福正是站在演化论这一边的主将。

18 世纪后半叶，法国人约瑟夫·德·歧尼提出了中国人乃是从埃及殖民过来的理论。与此不同但相似的是法国的汉学家波提埃和卢内尔曼将汉字和楔形文字作了一番比较后，提出了中国文明和巴比伦文明有亲缘关系的学说。当时英国的东方学者拉克帕里将中国文明与美索布达米亚乌尔地方的迦诃文明比较后，作出了两者之间有某种关系的结论。在英国的理格提出了诺亚的子孙曾东行到中国一说后，德国的李希霍芬则干脆把中国文明解释成是由西方移入的结果。

1924 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中国的甘肃、青海等地发现大批彩陶，并和苏联中亚的安诺以及南俄的特里波列等处的彩陶作了比较，以考古的资料为中国文明起源于西方的学说提供了证据。

中国的考古学巨匠夏鼐将商代的冶铸青铜技术与铜器上的纹饰，以及甲骨文字的特点等作了研究并和西方文明的考古资料比较后，提出了中国文明是独立发展的，并非外来的学说，重新肯定了丹尼尔、法兰克福的结论。

……至今，关于人类的起源与文明的诞生问题，在世界科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并可能还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争论下去。不管这场争论谁胜谁负，人类的起源和文明的诞生到底最先来自西方还是东方，是中国还是外国，我们看到的却是人类终于以自己的智慧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穿透了千万年苍茫迷蒙的漫长岁月，在滴血的号子与沉重的足音中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当进击的脚步迈到公元前 3 世纪和前 2 世纪时，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所诞生的三个最强大的帝国，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几乎是达到了相等的高峰。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它们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让后人倍感兴趣的是，它们搏击奔跑的姿态和方法又是出奇地相似。

亚历山大不愧是一个有知识、有见地、有抱负的伟人。他不同于一般的

昏庸帝君，只贪图淫乐安逸，陶醉于奸佞小人的谄媚之中。从某种角度看，他的军事行动，万里远征，颇有科学探索的性质。当年他自远征波斯的初期，便带有很多学者行军，使这些在科学、文化、政治领域里颇有建树的学者和希腊人，到了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从而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最典型的例子是他们知道了里海并不是海湾，而只是一个大湖泊。在此之前，无论是声名显赫的学者还是一般的希腊人，对此一无所知，这不能不说是具有重大历史和科学意义的幸事。

罗马振兴时代的杰出人物凯撒大帝，虽出身贵族之家，而自己却是一个平民党人，并同和平势力的领导者金拉氏的女儿柯尔娜结婚。

凯撒 27 岁时被选为罗马神官及军团司令官， 31 岁时担任国家财政大臣， 34 岁时担任祭典、竞技等公共事业按察官， 37 岁时成为法官。这时他离执政官的目标只有一步之遥了。

在此期间，为了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他大量营建公共设施，其中包括组织罗马人为之狂热的竞技活动。他曾一次同时举办了 320 组斗剑比赛，使成千上万的罗马城乡居民全部卷入，并为之振奋不已。而凯撒个人的生活却极为节俭，乃至不惜负债累累地对平民慷慨施舍。

当他 39 岁时，率领军队出征西班牙。在佳德斯，策马冲到亚历山大的塑像前，来来回回地徘徊了好久。亚历山大的光辉业绩和杰出才能，激励着他完成了自己的伟业。

和亚历山大、凯撒有所不同的是，秦始皇本人并未亲自率军厮杀疆场，但他却站在了更高角度上驾御群才，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历史使命。修建郑国渠本来是韩国的疲秦计，然而他能听从谏议未杀水利专家郑国，反而下令将渠修成为秦所用。为夺得一个思想家韩非，他不惜发动一场战争，青年将领李信率军伐楚、损兵折将惨败归来，仍受重用。在大规模的东征中，秦始皇手上有一大批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思想家。如李斯、姚贾、王翦、蒙恬、尉繚等人，均在秦始皇的麾下，出色地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完成了吞灭六国的大业。

在融合人种这一问题上，亚历山大作出了前人未有的惊世之举：令东西民族相互通婚。虽然他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巩固大帝国的统一，重点在于政治，但其间也有一种进步的、科学的思想在指导着他，客观上促进了文明的传播和发展。

罗马的凯撒为加强属州的统治，移出 8 万罗马城市民，分别送到各殖民地地区定居，令他们与当地入通婚，以进行人种的融合，这也是亚历山大思想的继承和延续。

秦始皇发兵 50 万一举攻下“百越”。面对戍守的困难，毅然改变吞灭六国的戍守战略，命部分将卒与越人杂居、通婚。这显然出于政治与军事战略的考虑，却使“百越”的文明得到了发展，致使“中县人以故不耗减，越人相攻击之俗亦止”。

亚历山大远在异邦建立了很多城市、军港，无非是出于巩固帝国的军事上的考虑。而秦始皇面对当时无力彻底吞灭匈奴的现实，不顾时人乃至后人的诅咒，狠心地筑起了一道万里长城。也同样是出于巩固帝国大业的军事上的深谋远虑之举。

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决定国家兴亡的重要军事力量，在人类历史长河这短暂的瞬间，东西方尽管没有站在同一条

跑道上，但却是齐驱并进的，两颗璀璨的明珠一样地辉煌壮丽、光彩照人。然而，人类的足迹并未在此停留，文明也在不断的创造中越发辉煌夺目。当历史的潮头就要奔腾到 21 世纪时，人类蓦然回首，那三个古老的帝国早已流星般地在夜空中陨落，所留下的只有一条不易察觉的轨迹。

但是，今天的人类并没有因为这三个古老帝国的陨落与消失而遗忘历史。与此相反的是，仍在不惜一切努力去探寻它们的踪迹，聆听这远古文明的足音。由于岁月的久远以及历史烟尘的遮掩，今天的人类无法再辨清它们的真实面目。于是，主观的臆想和推测就不可避免地相继出现了。

亚历山大东征远至中亚的锡尔河，已被他所建立的城堡和考古资料所证实。但近来却有史学家提出了亚历山大曾进军到中国境内，并且在西北地区修筑了土长城和城堡的推论。随后，又有人以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普在公元前一世纪所记载的：“公元前三世纪至二世纪罗马东向扩土，直达塞累斯国”为依据，结合近年来在陕西，甘肃等地出土的拜占庭和罗马金币的考古资料，提出了罗马帝国同样东征至中国的学说。

假如此说真的能够成立，对中国人来说不能不算作一大幸事。试想，亚历山大既然已到中国的甘肃，就不可能放掉中原这块肥肉，从确切的史料看，当时的亚历山大曾有过征服东方直至太平洋的计划，那时他认为一旦到了太平洋，就踏上了世界的边缘。

那么，在东方兴起的“春秋五霸”必然要和亚历山大的铁骑决一雌雄。尽管西方的铁骑骁勇善战，东方的战车也绝不是拉土块的用具。亚历山大虽通晓古希腊的兵书战策，东方的孙武、孙臆、伍子胥也对军阵的妙用深得神髓。厮杀的结果应该是很清楚的。

假若，后起的罗马大军杀向中国，战况也绝不是横扫地中海那样乐观和得意。“春秋五霸”已不复存，但“战国七雄”尚在。尽管罗马有费比乌斯、玛尔凯斯以及后起之秀西庇尔那样出色的军事指挥家，但中国的王翦、尉繚、李牧、廉颇、项燕也绝非等闲之辈。两千年后的秦俑坑出土的军阵以及将士的风范，虽经千年泥水浸泡，仍散发着灿烂金光的青铜宝剑。足以今后人判别西方这支劲旅和中国军队交手后的胜负。

对此，中国人并不悲观。于是，1983 年 3 月，中国考古学巨匠夏鼐在应日本广播协会之邀的演讲中，对亚历山大和罗马大军进入中国的学说进行了公开的批判。亚历山大进入中国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和实物证据，因而“只能算是传奇小说，并不是历史事实”。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普记载的塞累斯，并非指中国，而是指中亚一带，即当时欧洲人知道的丝绸来源的最远地点。而在中国陕西、甘肃出土的罗马、拜占庭金币，似是在汉唐时期丝绸之路开辟所传过来的，绝非当时的罗马大军来中国所留下的遗迹。

此说已经否定，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再也没有显露出东西方军事力量大规模交手的例证，但这并未否定东西方力量就永远没有碰撞和交手的机会。当大秦帝国陨落两千年后的 1840 年，契机终于到来了，遗憾的是它到来得太晚了，此时的东方帝国，早已失去了昔日的雄姿。面对西方人坚船利炮的进攻，中国人败下阵来了。结果，这块被秦始皇圈定的版图，再也无法粘合在一起，而最终被割裂开来。

由此，曾经强大的东方民族在世界舞台上出演了一场漫长的悲剧。

第六章 世界第八奇迹

世界上已有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完全可以说是第八奇迹。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

——法国总统希拉克

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

世事兴废，自有它的规律。冥冥之中，自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残蚀着人类文明。当年安提巴特向世人指出的七大奇迹，随着岁月的流逝，或毁于地震，或毁于大火，或毁于兵燹……迄今为止，只有埃及的金字塔还在风雨日月的剥蚀中傲立于尼罗河畔，目睹世间的沧海桑田。

今天的人们再也看不到那早已消失的伟大奇迹的风采了。正因为如此，秦俑的出土才越发引起人们的瞩目。

1976年4月底，正在访华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听到陕西省临潼发现了真人大小的秦代兵马俑的消息，极为震惊并感到难以置信。他向李先念副总理询问并得知了确切情况，立即提出要参观秦俑发掘现场，他的请求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准许和安排。

此时，秦俑工地的建馆工程远比发掘复杂得多。早在3月9日，负责博物馆筹建的人员就已请来了省、地、县、公社及生产队的负责人和当地群众代表，在临潼县华清池召开了协商会议，作出了“先进入场地做施工准备，修建道路、接通电路、解决施工用水问题，同时补办征地手续”的共同决议。但一接触实际，麻烦就接二连三地出现。有的社员见工地上的柿树已萌芽，想收一季柿子到秋后再砍树。有的地块麦苗一天天地见青，靠地活命的庄稼人更心疼，迟迟不忍铲除。时间一天天过去，清明节就要到了。对祖宗比自己生命还看重的当地农民，触景生情，更是不愿迁移工地周围的祖坟。

博物馆工作人员面对种种的困难和阻力，不得不请来一位当地领导向社员作思想动员工作，企图以政治感化来消除阻力。谁知这位领导不但未去施展他的政治演讲才华，反而别出心裁地另出高招，建议把建馆的投资办一个工厂，或者在当地办，或者把陶俑分到各省去办，如此方法既经济又实惠……这个建议使博物馆的筹建人员目瞪口呆。

正在纷纷扬扬争执不下之时，秦俑馆筹建组接到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于五月中旬来秦俑工地参观”的通知。时间如此紧迫，使筹建人员越发焦虑不安。再也没有耗下去的时间了，筹建人员只好硬着头皮抢修道路和停车场。面对几百株碗口粗的柿树，人力砍伐已来不及，只好租用两台履带式拖拉机，用钢丝绳一株株拉倒，再以人力清除。为防止场地下沉，拖拉机冒着浓烟，用笨重的躯体来回滚动、碾压。同时，在修出的道路两边撒灰布线，以免轿车开出线外钻入泥潭发生意外事故。

5月14日下午3时，40多辆车队在洒水车的前导下进入场地，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走出红旗牌轿车，向秦俑坑走来。

祖辈未出过远门的当地社员，突然见到如此庞大的华丽轿车队，立即放下手中的农具，潮水般从四面涌来，在工地两旁筑起人墙，纷纷争抢着目睹重要人物的出场。

李光耀总理站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一个高处，眼望这支气势磅礴的地下大军，很久没有说话，只是脸上不断地泛起惊诧、兴奋、迷惑和难以辨析的复杂表情。四十分钟后，当他就要离开此地时，才发出了他的肺腑之音：

“秦兵马俑坑的发现，是世界的奇迹，民族的骄傲！”

当天，新华社向世界播发了李光耀总理参观秦兵马俑坑的消息。这个消息一经报道，立即在国际上引起强烈震动。没有想到秦俑坑发现已两年之久，从未让一个外国人看到秦俑真面目，中国政府竟破例让李光耀总理享受了殊荣，亲眼目睹了兵马俑的风采。极为敏感的外国人，隐约地感到了中国将逐渐摆脱封闭与保守，透出了开放的曙光。既然曙光已从东方露出，他们就不会放过这个契机。

于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从世界各地奔向骊山脚下这支地下大军，以肃然起敬的姿态进行瞻阅。

当然，行动最迅速，人数最多的是美国人。他们一旦出现在秦俑坑工地，就显出了与众不同的聪明。几个人悄悄来到负责接待和宣教工作的女讲解员马青云跟前，用不太熟练的中国话问道：“我们可不可以到坑中去帮助发掘人员拉几车土？”

年青的马青云一听，惊喜地问道：“你们想去？”几个美国人不约而同地说：“当然想去。”马青云打量了一下面前几个磨拳擦掌，跃跃欲试的美国人，心中暗想：这样既不付工钱又干了活的好事为何不干？看来不只是中国人在学雷锋，美国人也在学雷锋助人为乐了。她慷慨答道：“可以下去。”

几个美国人顿时高兴得跳了起来，纷纷扑向俑坑，夺过了发掘民工的车子就拉起来，有的挥动铁锹，奋力向外扬土撒沙。

这时的马青云没有想到，自己已进入了别人设下的圈套，更没想到他们拉土是假，沽名钓誉是真。当考古队长袁仲一发现工地多了几个洋人，并在拍摄拉车、翻土的照片时，才意识到会有不测的事情发生。他立即下坑勒令几个美国人停止拉车和拍摄，离开发掘现场。

几个月后，一份外国杂志登载了几个美国人在秦俑坑发掘的照片和文章。随后，围绕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有没有外国人参加发掘，是否中国独立发掘完成这一题目，在世界上引起一场波澜并为此争论不休。

这时的马青云才知道自己上当了。面对领导对她的批评和警告，自然是不折不扣地接受并诚恳地作出检讨。

当然，美国人发表的文章和对秦俑的探讨，并没有随着马青云的检讨而结束。1978年4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以庞大的篇幅，图文并茂地登载了奥黛丽·托品的文章——

中国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

一尊高六英尺，身佩盔甲的赤陶武士俑像，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的情景，而这尽是数以千计的2200年前常备军武士之一。当罗马帝国在西方扩展的时候，东亚一个秦国的国王吞灭了其余各战国国家，并建立了中国国家的核心。历史上的这位胜利者就是秦始皇帝，他是第一位皇帝，也是万里长城的建造者。公元前210年，他被葬于一座称为骊山的，相当于15层楼高的大丘下。人们很早就知道陵墓的位置，然而如同中国的其它许多古墓一样，它一直没有被发掘出来。最近，在距此山丘不到一里处，挖井的人们偶尔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地下墓穴，这是整个陵墓工程的一部分。现在考古学家正在探索其非凡的珍宝——6000余个真人大小的，充作皇帝护卫军的陶人、陶马。

我们面临的是本世纪以来最为壮观的发掘。看到这些雄壮有力，全部真人大小的人、马塑像从粗糙、润湿的土地中出现，令人永生难忘。在那儿，

在中国渭河河岸的黄色土壤下，掩埋着千百尊残缺不全，但依旧美丽的赤陶塑像。其中有全副武装的战士，还有拉着载有士兵的战车战马。这些都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的扈从。我们站在雨中，激动得几乎流下热泪，如同每一个面对伟大艺术品的人。这些塑像一个个栩栩如生，其中一些还完好无损，直直地站着，摆好了姿势，似乎正在等待攻击的命令。另外一些则已残缺不全，可怜巴巴地撒落着，这是由于在皇帝死去四年以后，下一个朝代统治者的士兵们抢劫并烧毁了皇帝坟墓的一部分，这些塑像才破碎不堪，大批的武器也被偷走了。

然而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令人瞠目的考古发现的开端。专家们估计这些塑像是 2200 年前制作的一支 6 千人军队的前锋。他们被埋在一个巨大的有门的地道中，以保卫秦始皇帝的坟墓。就是这坟墓的主人统一了中国、修建了万里长城、烧毁了孔夫子所珍视的书籍并宣布自己为中国的第一个皇帝。

如此大的考古发现展示了历经战斗与荣耀的中国历史。我们在此处所看到的大军只是一个历史的开端，在

不到三里远的地方才是坟墓的本身和历史的源头。也许就在那个巨大的坟墓下面埋藏着帝国最大的秘密以及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最为瑰丽辉煌的宝藏。

此文在详细地介绍了秦陵兵马俑的情况和秦代历史背景的同时，以大幅的模拟图画对秦始皇陵地下宫殿进行了种种推想，神秘的地宫在推想中更加神秘和诱人，大有惊心动魄之感。

无论是从篇幅还是内容本身，《中国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的发表，盖过了以前所有介绍秦兵马俑及秦陵地宫情况的文章。在此之前，中国报刊所发表的有关秦俑及秦陵情况的文章也无法和它相提并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凭着它在世界报刊中的崇高声誉和特殊地位，很快将此文推向美国乃至世界，并引起广泛的瞩目。秦陵兵马俑由此彻底走向了世界，——尽管它难以令人置信。

1978 年 9 月，后来担任法国总统的前总理希拉克经不住秦陵兵马俑这支地下大军的诱惑，毅然来到骊山脚下的秦俑发掘工地，他向世界宣布：“世界上已有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第八大奇迹。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

世界第八大奇迹，由此成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的代名词。

美国人的怪招

本来，美国人依靠《国家地理》杂志，将秦俑军阵及始皇陵地宫的情况全面推向世界，那么，关于秦俑的出现应当列为世界第几大奇迹的问题，似乎也应由处在霸主地位的美国人来定。可没有想到法国前总理希拉克捷足先登，对秦俑毫不推让地作了第八大奇迹的命名，这显然是有点对霸主不尊重的味道。美国人自然要争回这个面子。

1979 年 4 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飞抵中国北京，在短暂的小住后，即赶到秦俑工地现场。面对这支气势恢宏的秦代大军，他作出了“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迹”的结论。

法国前总理希拉克受到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挑战。关于秦兵马俑是世界第几奇迹的命名问题，由此展开了喋喋不休的论争。

在基辛格回国不到 4 个月的 1979 年 7 月，美国参议员杰克逊又来到了秦俑发掘现场。他泼墨挥毫，潇洒地在留言簿上留言：“太好了！一周前我看

了埃及金字塔，今天又看到了中国的秦俑，两者都有悠久的历史。”这段留言实际上是法国前总理希拉克的思想和论断的延续。可惜他没有沿这种思想脉络延伸下去。随着杰克逊手中那支笔的不断颤动，一行文字又展现出来：“狮身人面像只有一件，秦兵马俑却千姿百态，成千上万，威武壮观，耐人寻味。”

语出惊人，出乎意料。就在杰克逊微笑着放下毛笔的刹那间，他内心的真实用意已明白无误地表述出来了。

杰克逊尚未离开中国，1979年8月29日，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又来到秦俑发掘工地。他仍不放心地对基辛格和杰克逊提出的论点作了总结性的补充：“这才是真正的奇迹，全世界人民都应到这里看一看。”

既然秦俑才是真正的奇迹，那么其它七大奇迹无疑是虚假和蒙人的。以此推演，希拉克所排列的“第八大奇迹”无法成立，自然是不攻自破。蒙代尔把美国人的用意推上了极至，秦兵马俑的身价也随之升入顶峰。

蒙代尔之所以把秦俑看作是“真正的奇迹”，除了他在政治上的考虑外，显然已经透过兵马俑军阵庞大、恢宏的表层，洞察到了潜藏在军阵中的深邃内含和无穷奥妙，领悟到研究这部活着的《孙子兵法》，对未来战争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对美国军队的益处。实际上，蒙代尔是站在一个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的双重角度上来看待秦俑和评价秦俑的。或者说，他更偏重于军事上的观察和感悟才作出如此结论。

既然秦俑军阵的内在奥秘，在所有前来参观的外国人中最先被美国人所感知，那么，他们就不会放过研读这部活着的《孙子兵法》的任何机会。所以，继副总统蒙代尔之后，美国的卡特、里根、尼克松三位在任或卸任总统都前后来秦俑博物馆参观。与此同时，美国陆、海、空三军的数十名高级将领，分别前来，对秦俑军阵作出详细地考察和研究。几乎每一位国防部长和国防大学校长，都要到秦俑馆对这支军阵的布局 and 战略战术思想作深入的研究和适当的借鉴，把秦俑军阵的思想精髓应用到美国国防力量布署和高级将领的教学之中。为彻底吃透秦俑军阵战术精神，美国人不惜破费大量金钱，于1986年3月，干脆让空军少将克里斯·迪维率领空军本部、海军陆战队组成的一个庞大的训练观察团，前来秦俑博物馆参观、考察。如此之气度，是当今世界任何其它国家所难以做到的。

当然，极度聪明的美国人是不会做赔本买卖的，所有在中国秦俑博物馆考察所造成的经济消耗，都将在未来的战争中加倍地捞回。这个宝他们是押准了。

当我首次穿过披着皑皑白雪的黄土高坡，来到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采访时，海湾战争的炮火正在引起世界的极大关注。透过朦胧的硝烟，人们都在对这场几十年后仍将意义非常的世纪末之战，作出各自的判断和推测：伊拉克与美国，萨达姆与布什，到底谁胜谁负？即使参观的人们面对这支秦代的地下大军，在观赏之余也不时地议论着海湾战争的局势。也许，置身于这弯弓执剑、驾车骑马的兵马俑前，人们更能感受到战争的气氛，更能想到海湾战争的现代化武器装备，战略战术与古代战争的相同与差异之处。在秦俑馆采访的日日夜夜，我在密切关注着海湾战况的同时，也在思考着萦绕在心中的一个问题：美国人不惜钱财对秦俑军阵以及这部活着的《孙子兵法》苦心孤诣地研究，所领悟的阵法与战术精髓，能否在海湾战争中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回答竟是肯定的。

自海湾危机爆发以后，中东地区出现了世界战争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以凌厉的军事手段，首先采取了“以压促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力图迫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这个被称为“沙漠盾牌”的军事行动持续了5个月多而未达到预期目的。终于在1月17日凌晨格林威治时间零时6分，也就是联合国限令伊拉克撤军的期限仅超过19个小时后，举行记者招待会的美国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说出了一句话：“女士们，先生们，解放科威特的行动开始了。这个军事行动的名称叫‘沙漠风暴’……”伊拉克懵了。面对多国部队空军对伊拉克大规模的空袭，我把目光从电视屏幕转移到秦俑军阵，窥探二者的内在联系。秦俑军阵前大量的弩兵，已向人类提供了它的战法：随着开始的号令，这支大军最先必是万箭齐发，弩兵张而复出，射而复入，更发更止，番次轮回，以达到“弩不绝声，敌无薄我”，最后使敌军“绝行乱阵”的目的。

海湾战争参战部队所用的兵器，自然不会是两千年前的强弩劲弓。但多国部队空军的轮番轰炸以及得到的战争效果，分明又让人看到了强弩劲弓的影子。这种在海陆大规模进攻前所采取的空袭轰炸的战法，无疑是秦俑军阵战术思想的发展和延续。

由此，我想起了萨达姆·侯赛因这位注定要引人瞩目的人物，我在秦俑馆的留言簿上寻找他的姓名，我想知道他来没来秦俑馆和他对这支地下军阵奥秘的理解和感悟，以作出对这场战争胜负的进一步推断。

然而，我没有找到他。就像多国部队费尽心机，仍然见不到他的踪影一样。

我不得不把视线转到另一个闪光的名字——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

这位联合国秘书长是1987年5月11日来到秦俑馆参观的，据当时接待他的工作人员马青云讲：“德奎利亚尔来秦俑馆时显得很匆忙，只呆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走了。也难怪，世界上有那么多大事在等待着他去做。他的气质和言谈不同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很有些胸怀世界，放眼全球的样式。”

我相信马青云的眼力和判断，德奎利亚尔的气质和言谈当然与他的职业有关，这一点在他的留言中可以看到：“作为联合国的秘书长，我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军队都像西安的兵马俑军阵一样。”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军队”自然包括美国和伊拉克。但美国和伊拉克的军队不可能都像西安的兵马俑军阵一样，否则，怎么去分胜负？

也许德奎利亚尔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才于1991年1月12日深夜抵达巴格达，为避免这场海湾战争作最后一次努力。

当他在伊拉克阿齐兹外长的陪同下，坐车去下榻的宾馆时，巴格达这座拥有400多万人口的千年古城弥漫着战争的气氛。城市虽然一片漆黑，但街头士兵、军车却不住地晃动、奔跑，总统府前的高射炮管直指天空，武装直升机的轰鸣不时传来。

早在他来巴格达之前，他就會对美国、伊拉克和科威特驻联合国大使说过：“我不敢说此行是争取和平的最后机会。这只是我个人对和平解决海湾危机所作的最后贡献，我有道义上的责任去竭尽全力避免战争的爆发。”

第二天，德奎利亚尔便直接与萨达姆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会谈的结果同他的担心一样终于在萨达姆强硬的姿态中宣告失败。这位秘书长此时的心情，通过他在巴格达机场接受记者采访的电视转播，让全世界都清楚无误地

感受到了，强抑住眼中的眼泪登上飞机离开了巴格达。

在多国部队空军猛烈轰炸伊拉克时，远在东海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开始了近海登陆演习。伊拉克根据种种迹象，作出了盟军将在东海岸登陆的判断。并迅速将主力部队和精良武器投入到东海岸进行防御，而在西线的伊沙边境只留下一个师防守。

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充当“打头阵”的角色而著称于世。这支军队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待机战备状态。因此，美国政府在处理历次危机中，也总是派海军陆战队去“打头阵”。自 1945 年以来，海军陆战队共执行作战任务 101 次，而陆军和空军分别为 34 次和 54 次。看来，海湾战争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再次在地面进攻中“打头阵”已是无疑。正因为如此，伊拉克才调集主力来阻止这支军队登陆。

然而，1991 年 2 月 24 日盟军发起的大规模地面进攻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却突然在波斯湾西北部的科威特海岸登陆，大批盟军也出乎伊拉克意料地在海湾西部出现。海军陆战队抢滩登陆后，迅速向科威特挺进，和盟军主力形成对伊拉克军队的“夹击”攻势。在收复科威特的战斗中，美国海军陆战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并插入伊军左翼的第二天，英国广播公司即向世界播发了消息，并道破了这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陆战队所采用的战略和战术方针：

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后，迅速插入伊军左翼，配合多国部队主力以包抄战术大规模推进到伊拉克南部地区，他们将同伊拉克的共和国卫队作战。

海湾战争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作战方法，和二战时期的战法有了明显的变化。四十年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日本海岸抢滩登陆时，是在日军的猛烈炮火打击下，以劣势兵力对付优势兵力的情况下强行登陆的。这种先敌攻击、见敌必战的战术思想，使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曾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次海湾登陆，他们采取了和以前完全不同的，以自己的全力之实，乘敌之虚，以奇配正，以奇制胜的奇袭战法。这个战法来源于中国的《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越来越受到美国军队的重视，被誉为 21 世纪兵法。几年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出现了《孙子兵法》热。此书以发放驱逐舰以上的全部海上部队、学校及所有陆上机关和部队，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马汉的《海军战略》及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要》，只发放培养陆战队军官的学校。

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在以后的战争中更加成熟，因为他们已有并认识了《孙子兵法》。

经过四天的激战，伊拉克军队 40 多个作战师被歼或丧失了战斗力。精锐的共和国卫队也在多国部队的打击下溃不成军。

萨达姆终于从地下指挥的迷宫里钻了出来。这时，人们再也听不到 3 天前他那慷慨悲壮的声音了。

直到这时，萨达姆才发现自己在战略和战术上的一切错误：他号召阿拉伯世界与他共同抗击外来的异教徒，没有达到目的；他希望扣留西方人质以对西方形成威慑，仍没达到目的；他对以色列发射“飞毛腿”以把这个犹太国家引入战争而分裂美国与阿拉伯联盟，未能成功；他自认为用砂筑起长城，挖战沟放入油水的战略防御足可阻止敌军，而事实证明他又错了。这种种错误所造成的恶果而使他最终不得不接受安理会提出的一切要求。萨达姆的声

音嘶哑了。

历时 42 天的海湾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的胜利而告终。

伊拉克的惨败和分享了战争之累的海湾国家所付出的一切，无疑都是为美国在中东地区获得更大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所作出的共同牺牲。赔本的生意美国人是不会干的。

海湾战争不仅反映了“美国凭借它的军事实力和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先进技术装备迅速插手干预第三世界事务的能力”，同时也反映了美国善于吸收和借鉴一切先进思想、技术和经验的能力。否则，一个才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民族，何以迅速登上世界霸主的顶峰地位？

叶剑英说：没有军衔是不行的

正当法国人与美国人围绕秦俑应列世界第几大奇迹而争风吃醋之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也于 1979 年 4 月 9 日，出现在秦俑发掘现场。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来到被誉为世界奇迹的地方视察。

尽管叶帅已是八十高龄，但从他行走的姿态和面露笑容的脸上看得出，仍有宝刀不老的风采。

此时一号坑大厅正在兴建，陶俑被土回盖，无法参观，叶剑英直奔正在发掘和清理的二号坑。当他看到坑中有近百名解放军在翻土、拉车时，不解地问博物馆筹建组负责人杨正卿，“怎么这里还有军队？”

“是驻军的一个连在帮助我们搞考古发掘，他们在这里已有几个月了。”杨正卿解释。叶帅转过身对陪同前来的驻军首长笑了笑，“想不到你们还参加了考古工作，干得好。”

站在坑边的一个土坡上，叶帅望着这支以步、车、弩、骑四个独立兵种组成的地下大军阵，脸上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光晕，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共和国元帅，他是深知诸兵种如此组合排列后，投之于战争将意味着怎样的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和变化无穷的奥秘。他在为出神入化、栩栩如生的陶俑雕塑艺术所折服的同时，更为古代杰出的阵法 and 战术思想而赞叹不已，相见恨晚。假如在自己的戎马生涯中能目睹这样一个集古代兵法之大成的军阵，也许会使自己的战绩再添上一层荣光。可惜，战争结束了 30 年他才看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但是，战争虽在自己这一代人的努力下消失，而还有可能在下一代中再死灰复燃，只要战争恶魔没有从人世间完全消失，亲眼目睹一下这支古代大军领略一下其中的奥秘，对每个军人都是有益的。

将要走下高土坡，叶帅两眼放着激动的光芒。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身边陪同的军队人员：“秦俑坑是我国最大的古代军事博物馆，这里面有学不完的东西，希望今后我军的高级将领都要到这里看一看。”

博物馆尚未建成，筹建人员只好把一间破砖房当作临时陈列室，来接待贵宾。由于屋子小空间窄，陈列的文物也较简单，除了几件陶俑。就是十几件兵器。叶帅来前，才又加了几件陶马、骑兵俑等几件文物。

叶帅走进陈列室，望着刚出土不久的刀、矛、剑、戟、戈、殳、弩机、铜簇等完好无损的实战兵器，禁不住叹道：“两千年的埋藏还这样光亮，真是奇迹。”他顺手拿起最引人注目的秦剑，反复看了几眼，又好奇地用手指摸摸刃锋。轻摇了下头：“想不到古代的剑会是这般锋利，冶金工艺如此发达，简直像神话里说的那魔剑一样。”

来到陶马前，叶帅眯起眼睛瞅瞅马头，随之打量了一下陶马那颇长的身

子，有些不解地问：“我和战马打过不少交道，这样长脖子、长身子的马却没有见过，这是什么马种？”

“从马的形体来看，与当代甘肃河曲马种有共同之处，由此可以推断秦代马多采自于中国西北地区，俑坑的陶马尽管不完全相同，但仍可肯定为甘肃河曲马种。”陪同的考古人员回答。叶帅用手扶着鞍马的陶制辔子，接着问道：“什么时候才有马蹬呢？”

身旁的杨正卿回答：“从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来看，两晋时才有马蹬。”

叶帅点点头：“这么多良马都来自西北，我们的西路军却很少得到它。要是西路军配上这些良马，肯定会是另一个样子的。”他边走边说，声音很小，只有近旁的几个人听清并隐约地感到这声音的颤栗和叶帅面部表情的变化。

西路军兵败西北沙漠和河西走廊地带，几乎被马步芳战刀杀戮殆尽，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假如那时他们配有这精良的战马，谁能断定不能成功？

可惜这个假设没有成为事实，无数将士的热血洒在无垠的沙漠戈壁至今没有洗掉。作为共和国元帅，触景生情，对那段历史悲剧不能不扼腕叹息。

叶帅在高大的陶俑前停下，指着铠甲上明显突出的花穗问道：“为什么这件陶俑的铠甲和装饰和那边两件不同？”

“这是个将军俑，铠甲上的花穗是代表等级的。秦代军队不仅兵器精良，战斗力强，而且各种军事制度也比其它六国完善。这代表等级的花穗就是一个例证。”杨正卿回答叶帅提问的同时，又作了简单的补充解释。

“秦代军队有多少等级？”叶帅抬起头询问。

“据史书记载，有 20 个等级，这些等级在秦俑军阵中已作了明确而真实的反映。”杨正卿对答如流。

叶帅将右手放在额下沉思片刻，转身走出临时陈列室，面对高大秀丽的骊山山顶，自言自语道：“看来军队没有军衔是不行的。”

这声音极小，似是即兴说出的话语，在场的接待人员和考古人员没有放在心上，更没有领会其背后的真正含义。但叶帅身边的几位军队将领却感到了这句话的份量，并以军人职业的敏锐，预感到中国军队一次大的变革就要来临了。

尽管这场变革，在叶帅来秦俑馆参观的 8 年之后才付诸实施。但几位军队将领此时的预感没有错。

于是，中国军队已取消 14 年的军衔制度，再度在最高军事决策者的心中酝酿、萌发。叶剑英来秦俑馆参观，无疑加快了这项制度的确立。1988 年 8 月 1 日，中国党、政、军领导人正式决定在人民解放军行列里恢复军衔制，中国军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叶帅参观完毕，上车时又似乎想起了什么，他招招手示意杨正卿走到自己的跟前。“秦始皇为什么要用兵马俑从葬呢？”叶帅问。“他凭借武力统一了六国，死也不忘兵马，这就叫视死如事生。”杨正卿答。叶帅点点头又问道：“你们什么时候开馆？”“今年国庆节。”“要快！要快！要快噢！”叶帅一口气说出了三个快字。杨正卿深知叶帅对兵马俑的感情，随即提出：“叶帅，我们想请您为博物馆题写馆名？”叶帅沉思片刻，道：“我的字可是写得最丑。”“这是兵马俑博物馆，您是元帅，题字最合适。”杨正卿说着叫人拿来事先准备好的馆名字迹递了上去。叶帅带上老花镜仔细看了一下，让秘书将纸叠起放入公文包内说：“我回去后写好寄来吧。”叶帅握着在场工作人员的手同他们告别。1979 年 10 月 1 日，

由叶剑英元帅提写馆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支秦代的地下大军将全方位地面向世界，接受人们的赞赏与检阅。

第七章 陵园探宝

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掘，使今天和今后的生活的人们清楚地了解两千年前的历史和伟大成就。希望这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永远保留下来，而不被任何的战争所摧毁。

——民主德国议院代表团团长辛德曼

在始皇陵的封土上

新华社陕西分社 1984 年 4 月 8 日讯秦始皇陵自从 1974 年发现了震惊中外的兵马俑以来，近几年经过秦俑考古队的钻探和试掘，又有新的收获：发现了一批被杀的秦始皇的公子、公主的陪葬墓，以及从事建陵劳役的刑徒墓和马厰坑，还有大量的文物出土，它给研究秦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本社记者王兆麟）

这个消息发出的时间，相对钻探人员的行动和最初发现的陪葬墓、马厰坑而言，未免过于迟了些。故此，它所引起的关注除科学界外，并未在大多数人中引起轰动。前来参观秦陵、秦俑坑的人也很少知道发掘的详情。

早在 1976 年秋，秦俑三号坑被发现之后，考古队便派程学华率领部分从当地招收的亦工亦农的考古训练班学员，组成一支钻探小分队走进秦始皇陵园，作大规模的钻探，以期揭开始皇陵地宫周围埋葬于地下的所有秘密。

程学华放弃秦俑坑的发掘，扛起考古探铲，率小分队走进秦始皇陵园。随之，这里的一切秘密也将被揭开。

最初在陵墓上筑丘和植树的陵园形式，来自春秋时代的孔子。这已被大多数研究者所承认。在孔子之前的葬仪极为简单，死去的人抬到野外，挖坑埋掉，坑的上方不加封土，周围不种树木。有研究者认为这种葬仪是由于当时人们的物质条件简陋和思想方式简单所决定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简陋的物质条件赋予人类一种深刻的思想内蕴，使他们相信人类来自于自然的孕育，最后必然再回归到自然的怀抱。一切人为的修饰都是无益的。这种思想正是为无数哲学家和思想家所称道的“深刻得到了浅薄的程度”的最高思想境界。

正可谓，由浅薄到深刻难，由深刻到浅薄则难上加难。今天的人类有多少至死也没悟透这个道理。

尽管殷商时代葬仪已实行棺椁和墓穴制，但仍未起陵丘。而春秋末期的孔子之所以在父母的墓穴上筑起四尺高的土丘并种植几棵小树，实则是因为四处奔走，怕回来时找不到父母的墓地。而无法行施他一生为之苦苦宣教的两个字：礼制。这时的孔子绝对想不到他推行的礼仪收效甚微，而在陵上筑丘和植树却在各国风行起来，并且越演越烈，直至涂上了一层依厚的政治色彩。

秦始皇一生讨厌儒学，但唯独在陵墓的建造上没有拒绝孔子最先创立的在陵上封土植树的礼制，并把它加以发展而系统化，建造了规模庞大格局完整的陵墓陵园机构，从而开创了历代帝王在陵墓建制上的先河。

据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记载，秦始皇在 13 岁刚刚登上国王宝座时，他的陵园建造工程便随之开始。建造人数最多时达 70 万人之多，直到他死亡并葬入地宫后，陵园的工程尚未全部完成，前后修建达 39 年，其规模之庞大、建筑之豪华可想而知。遗憾的是，伴随着秦始皇的尸骨走入地下迷宫，我们的大秦帝国也已是日薄西山，只有靠惨淡的光辉来照耀这块黄色土地了。

公元前 207 年 9 月，起义军将领刘邦率领军队攻克了函谷关，直扑秦国都城咸阳。这时秦始皇已命丧 3 年，其子胡亥也被丞相赵高所杀，帝国古船只有靠秦始皇的孙子秦王子婴独自支撑，作最后的航行。

刘邦率大军兵临城下，子婴大惊失色。秦帝国的现状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已经彻底走向沉沦。既不能出战，也无力守护，唯一的选择就是开城投降。

年轻的子婴乘着白马素车，以绳套颈，手捧传国玉玺，满面泪痕来到刘邦跟前屈膝下跪，俯首请降。刘邦面对这位只做了 46 天皇帝的秦王，冷笑几声，命部下收起王玺、兵符和节杖，并把子婴看押起来，挥军攻城而入。

至此，秦始皇东征西讨所创造的伟业，仅在世上存活了 15 年就烟消云散了。大秦帝国陨落了。

刘邦进入咸阳，遍召当地豪杰长春，公开宣布自己的政见：现与诸位父老约法三章：凡杀人者死，伤人乃盗抵罪，其它秦时等法全部废除。

刘邦引军离开咸阳还驻霸上，不久项羽率大军赶来。进入咸阳后，竟在一天之内就将秦国皇亲 800 余人连同 4000 名文武官员全部杀死。秦王子婴也被项羽亲自用方天画戟扎入胸腹扔到街心而绝气毙命。随后，8000 江东子弟兵潮水般涌入秦宫，将财宝、美女抢劫一空后，一把大火又将包括阿房宫内的宫殿、楼阁烧为一片废墟。这支以复仇为目的的军队，在东返路过秦始皇陵园时，项羽又下令捣毁一切可能捣毁的建筑。大火在陵园升起，数日不灭。70 万人费尽 39 年心血建造的陵园，在大火中变为一片焦土瓦砾。这是秦始皇陵园遭到的第一次也是最为致命的一次劫难。

之后，刘邦与项羽在中原大地上展开了争夺最高权力的交锋，直至项羽兵败自刎乌江，为期 4 年的楚汉战争才告结束。

刘邦称帝后，随着国家的日趋稳定，他下令对秦始皇陵墓妥为保护，并安排 20 户人家具体负责陵园的看管事宜。劫难后的始皇陵园得到暂时的安息。

千百年来，对于“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这一悲剧性命运，无数文人墨客为之扼腕叹息，并发出了“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哀惋之情。历史没有倒转的机会，即使项羽当年真的渡回江东，历史也未必重新改写它的结局。项羽的失败绝非偶然，早在他火烧咸阳，焚毁始皇陵，砸碎兵马俑之时就注定了。

因为，一支连人类文化部不认识和不珍惜的军队，还能认识和珍惜什么？项羽谢世两千年后，中国大地上一位伟人就曾清楚地指出：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尽管汉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对始皇陵园也都作了适当的看管，但依然没有断绝陵墓地宫被盗掘的厄运，一只只黑手不时地伸向地宫深处。史料载，后赵时，以盗墓为业的关中人石勒和石季龙两人来到河南用探铲探到了战国时期赵简子墓的确切位置后，便趁夜深人静偷偷挖掘起来，很快进入墓穴隧道。此时赵简子墓已灌入数尺积水无法行进，他们便以盗墓人特有的方法用牛皮囊向外吸水。时值秋天，不等他们将墓道中的积水吸完，外面的雨水又沿着挖开的通道灌进来，反而积水更多。眼看着一个月过去了，积水始终没有排除，两人不得不先堵死通道，弃赵简子墓而来到始皇陵。经过一番周密的钻探后，他们开始在封土以外不远处挖起来。这次他们的苦心没有白费，终于打通了地宫隧道，取走了隧道门旁安装的铜柱数根。正在他们进一步向地宫深处凿挖时，被守陵人发现，才不得不含恨忍痛弃陵而逃。

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克长安后，这位起义首领便下令派兵公开盗掘过始皇陵，以补充军费和兵器的不足。这次盗掘是继项羽之后对秦始皇陵的第二次大规模洗劫。也就是这次洗劫之后不久，黄巢军兵败长安，帝国皇帝之梦也从此破碎了。

民间的许多人把项羽与黄巢的失败之因，说成是秦始皇阴魂的报复，这显然带有迷信色彩的道理并不能使人信服，倒是二十世纪初那个中国伟人的话再次找到了立足的根据。

传说清道光年间，秦始皇陵封土遭到了暴雨流水的冲击，陵墓北面的半腰间，也在暴雨冲击中塌陷出一个很深的洞窟。这个洞窟被附近的岳家村一个老头发现后，立即传播开来。消息被一个外号叫“白狼”的当地土匪头子知道后，他立即率人以探测陵园为由进入洞窟。令所有入洞者大吃一惊的是，这个洞窟竟通入陵墓地宫。“白狼”命人取了大批的珍宝带出洞外溜之乎也。守陵人得知后立即报告了官府，洞窟由此被堵死，随之加紧了陵园的看管，洞窟再来被掘。据清朝官员推测，这个洞窟很可能是当年黄巢大军掘陵时所打开的通道之一，掘陵的将军在离开时，草草地将洞掩饰起来，以备后来再盗时能顺利打开。但随着黄巢的兵败，这些当年封洞的将军再也没有回来。随着岁月的流逝，洞窟也就成了不被人知的秘密。只是偶然的一场大雨又使它重见天日，从而使陵墓地宫再一次遭到洗劫。

清朝灭亡后，随之而起的是军阀混战，陕西军阀又一次派兵挖掘了秦陵，取走了地宫大批珠宝。这是项羽、黄巢之后又一次对秦陵的大规模兵燹。当然，关于这些记载和传说是否真实，后人尚有争论，而有一点却是肯定的，这便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驻西北军队为抵抗解放军的攻击，以秦陵为制高点，在封土四周挖掘出数条战壕应用于战争，致使面目全非的秦始皇陵园雪上蒙霜，千疮百孔。

千载风雨剥蚀，无数场战争的摧残，使今天的人类无法得知陵顶当年封土的形状。有人认为封土最初的形状为圆锥形，有人认为是四方锥形或方锥形，有的则推断为覆斗形，无数研究者为此争论不休，但至今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导致这种原因和状况的自然史是史料记载的忽视，但史料记载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关于封土的高度，西汉时记载为“坟高五十余丈”。按当时每尺23厘米折算，封土高度应为115米甚至还要多些。风雨的冲刷无疑地逐渐降低了它的高度。汉之后的官方资料没有对封土冲刷后的高度作出详尽的记载，倒是中国的国门被外国人用大炮轰开之后，封土的高度才有了较确切的记述。

1906年，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来中国对秦陵作了考察后，在他的著述里就有了“陵高76公尺，中间稍平，且有阶段，顶上广阔平坦，陵墓近于长方形，东西宽约488公尺，南北宽约515公尺……”

20世纪初，曾有三个法国探险者来到骊山考察，其中之一的维克多·萨加仑在1917年这样描述秦始皇陵：“是中国现存陵墓中最为不朽和高大的一座。它每一边都长于1000英尺，有150英尺高，外形经过精心设计，共有三层起伏的封土，就如一座小山一层层叠在一起……”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将秦始皇陵作为全国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予以公布。同年陕西省文管会王玉清等人对陵园进行了勘察和测量，这时的陵顶封土已被雨水冲刷到不足当初高度的二分之一，权为43米。

当然，这次的勘查对陵区文物的分布及地下深埋的秘密仍一无所知。要

真正弄清陵园的一切，还要等到兵马俑被无意发现后，程学华率考古钻探小分队到来之时。

程学华走来了。

马厰坑与珍兽坑

程学华站在始皇陵封土之尖，举目四望，陵园周围的庄稼已收割，大片的田畴只有银白色的荒草在秋风中动荡。他察看了地形，率队走下陵顶，来到陵园东侧的上焦村外，开始了漫长的钻探岁月。

一把把洛阳铲钻入当年的皇家圣土，一块块黄土碎石在力的打击下被切割开来，随着探铲走出属于自己的位置，接受现代人类的检验。

三个昼夜已经过去，钻探小分队一无所获。程学华凭着多年的考古钻探经验和对始皇陵的研究，隐约地预感到这一带肯定会埋有为秦始皇陪葬的器物，这里将是整个陵园随葬品地下布局的探查开端。由此，他才把小分队最先带到这里钻探的。但是，三天来毫无收获的事实，又不能不让他重新考虑钻探方法的得失。他在经过了一夜的深思后，毅然决定由原来间隔二米的疏探改成间隔半米的密探。这个钻探方法一经实施，结果很快证实了他在布署上转变的正确。

这是一个秋日的黄昏，如血的残阳泼映在秦始皇陵园，荡动的野草翻起来点点赤红色的光，如同飘荡的流火。天地辉煌，大自然再度张开生命的活力，接受苍茫寰宇的热切亲吻。历尽沧桑劫难的秦始皇陵园，也在这天地的馈赠中孕育着一个灿烂的未来。当程学华的探铲再度穿入地下时，随着铲杆的微微颤动，传来一声异样的音调。富有经验的盗墓贼所达到的顶峰，就是能从铲杆和声调的变化中，确切地感知和判断出地下的器物。而考古学家的钻探中达到顶峰的标志也是如此。否则，便不再称其为考古学家而只是掘地的农民。

程学华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稍纵即逝的讯息，他知道，那苦苦探寻的东西就要从这里面世了。

程学华没有声张，拔出探铲移动了位置继续钻探。他期望这里会再度出现像一号兵马俑坑那样庞大的地下军阵，再现人类文明的盖世奇迹。但事实却使他失望并陷于迷惑，随着探铲带出的不是块块陶片，而是朽骨的残迹。

他把所有的钻探人员叫到面前，对两种不同的迹象作了细致的分析。凭第一次听到的音调和铲杆赋予的感觉，他第一次所碰到的是个陶俑已成定局，而在这陶俑的旁侧出土一堆朽骨残迹该作何解释？况且从朽骨的形状、粗细来分析，又不像人骨。这就否定了会像一号兵马俑坑那样出土的朽骨多为后来者葬尸的可能。为解开这埋藏地下的玄机奥秘，程学华决定将钻探情况上报后进行试掘。

周围5米见方的土层很快被掘开。当深入地下2米时，一个陶俑的头盖露了出来，这就是程学华在钻探时感知的陶俑。当发掘人员将坑全部试掘完后，呈现在钻探人员面前的是一幅和一号兵马俑坑完全不同的画面。

一个高约70厘米的陶俑呈跏趺式背西面东安详地立着，脸部和手背分别涂有粉红色颜料，头后部挽有细长的发辫，衣袍呈淡绿色，两眼平视前方，面带慈容，双手平放在大腿上，似在观看和等待着什么。

在跏趺俑的面前，放置着陶罐、陶盆、陶灯等不同形状的陶器，陶盆内有朽烂得发黑的陈迹，隐约可辨出是谷子和谷草。在陶器的前方，则是一副硕大的骨架，虽经两千年掩埋，但考古人员一眼便看出这是一匹马的筋骨。

事情已经清楚，这是一幅完整的圉人喂马图。考古人员发现，在马骨的身下有4个不粗的小孔，马腿置于孔中。前端有一小土坎，坎上挖有缺口，其大小刚好把马的脖子卡在缺口内，虽然没有发现专门的葬马辅助设施，但从马的骨骼作挣扎状和残存于骨架上绳索的痕迹推断，马是被捆绑后抬到坑中活埋的。

随后，程学华根据坑的位置和出土的器物推断，类似的马厰坑绝非仅此一处，它一定像兵马桶军阵一样成一个庞大的整体，从而构成秦始皇陵园整体陪葬布局的一个完整单位。

他开始率人在坑旁分南北两路进行钻探。一个月后，马厰坑的位置和排列形式全部探明，整个单位布局为南北向三行排列，每行千余米，以坑的密度推算，至少有200座陪葬坑。为确切证实钻探后的结论，程学华又率队试掘了36座陪葬坑，出土器物除跟第一座坑类似，还发现了陶盘、铜环、铁斧、铁铲、铁灯等不同的陪葬品，并在陶盆、陶罐类意外地发现了一批陶文：

大厰 4 斗 3 开

左厰容 8 斗

大厰中厰小厰

这些陶文的发现，为确定陪葬坑性质提供了确切文字依据。“大厰”、“中厰”、“小厰”等文字，无疑秦代宫廷的厰名，从而进一步证实这批陪葬坑象征的是秦始皇宫廷的马厰，或者说象征着秦始皇生前宫廷养马的场所。铁叉、铁铲、铁斧为养马的常用工具；陶盆、陶罐为养马的器具；谷粒和谷草是马吃的食物；陶灯和铁灯，则是夜间喂马人的照明灯具。

马厰坑的发现，为研究史料缺少记载的秦代养马习俗和马厰的编制机构，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马厰坑发现和试掘后，钻探小分队分成两组，一组在陵园东侧继续扩大钻探范围，一组赴陵西开辟“第二战场”。

1977年春，陵西钻探组在内外城之间发现了和马厰坑类似的陪葬坑31座。排列形式亦是南北走向的3行排列法，只是间隔比马厰大些。为揭示陪葬坑的内容和奥秘，钻探队对中间一行17个坑进行了试掘。出乎意料的是，这17个坑中只是各自存有一个长方形的瓦棺，没有其他器物出土。考古人员将瓦棺的顶盖揭开，只见里面存有一具动物骨骸和一个小陶盆，陶盆的形状与马厰坑出土的相同，只是动物骨骸要小得多，显然不再是马。经过科学鉴定，这些动物的骨骸分别为鹿及禽类。

既然已有动物骨骸，说明它的性质和马厰坑是相同的，只是这里的饲养者没有在坑内。那么，这组陪葬坑是否不再设饲养的圉人？

考古人员带着疑问，对东西两侧陪葬坑又进行了局部发掘，则发现每个坑中都有一件跽坐俑，其造型和神态与马厰坑出土的跽坐俑极为相似，只是有几尊陶俑和一号兵马俑坑的陶俑一样高大，姿态不是跽坐而是站立，双手不同于跽坐俑平放于腿上，而是揣在袖中。从姿态和服饰推断，这几尊俑的身份要高于跽坐俑，可能是主管饲养事务的小官。

从试掘情况分析，中间的17座应为珍禽异兽坑，而两边则为跽坐俑或立俑。如果马厰坑象征的是秦始皇的私人养马场所，珍禽异兽坑也该是宫廷的“苑囿”。两组不同的陪葬坑在充分揭示了秦代宫廷制度和皇家生活习俗的同时，也让后人透过历史尘封，更加清晰地窥测到秦始皇的思想脉络和政治心态。

尽管千百年来人们对秦始皇的所作所为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但马厰坑和珍禽异兽坑的发现，无疑揭示出秦始皇时代已有一定的对于人的价值认识和尊重这一思想主题。两组不同的陪葬坑，分别埋有活生生的马和珍禽异兽，但饲养者却都是陶俑。面对事实，使人们透过艺术和葬制的表层，看到的自然是秦始皇时代对于解放生产力的一定认识和为此作出的事实例证。如果沿着这样的思想去观察整个秦始皇陵园布局，也不难发现三个兵马俑军阵同那个秦大墓联系的内涵。

作为军事指挥部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第三号俑坑的几十件俑中，没有发现具有特殊地位的将帅俑。均为普通的幕僚，其身份和地位远比一、二号坑发现的将军俑要低。作为一个军阵的指挥部而没有将军和元帅，就不能不让今天的观光者产生种种疑问。博物馆讲解员的回答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是秦始皇本人，按照秦代制度，军队在出征时才由秦始皇临时任命将帅，交矛盾象征兵权的虎符，而平时则不任命，军权集于自己手中……

这种说法自然有它的道理，但并不能令人满意。笔者认为，任何一个军事集团不管在平时还是战时，总要有一位将领具体负责管理或带领作战。假设秦兵马俑模拟的是一个陈兵图而非战时的出征或作战图，那么这支军队同样应有一位将领来负责管理和承担具体责任。如果不是这样，这支大军岂不成为无首群龙、各自独立的乌合之众？一切训练、防卫、后勤供给将如何实施？

正是置于这样的事实，我们才不能撇开位于三个兵马俑坑一侧而尚未发掘的那座秦大墓，去草率地把这个军阵的最高指挥者让秦始皇来担当。马厰和禽兽坑在赋予后人诸多启示的同时，也同样折射出秦大墓的主人就是兵马俑军阵最高指挥者的可能。而墓的主人也许正是生前为秦国统一天下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著名将帅。这个将帅就是自蒙骃之后的秦国著名将帅之一，而蒙骃本人的可能性最大。他与兵马俑军阵的联系同马厰坑和禽兽坑中的所有动物与饲养者一样不可分割而成为一个整体。有研究者曾经提出：“假如秦大墓的主人是军阵的最高统帅，那么秦俑军阵的性质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就是说俑坑军阵不再是为秦始皇陪葬而变成为墓主陪葬。”

但马厰坑赋与我们的认识是，马与俑双方不存在谁为谁陪葬的问题，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共为秦始皇陪葬。同样地，墓主人和兵马俑也是作为一个整体为秦始皇陪葬的。二者在陶俑与真人真马的关系中，尽管作了完全相反的安排，但正是这样的安排，才更能令人看出秦始皇对人的自身价值尊重的良苦用心。

当然，钻探小分队不久发现的杀殉坑，则是另一种背景下的政治产物，这和已死去的秦始皇本人已不再有任何关联。悲剧的发生同秦帝国的陨落一样，实在是这位叱咤风云的千古一帝未能预料的。

凄壮的祭坛

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带着左丞相李斯和小儿子胡亥，在近侍中车府令赵高等臣僚、太监的簇拥下，开始了第五次，也是他一生最后的一次出巡。

大队人马伴着初升的旭日从都城咸阳起程。在金风丽日下出武关、过丹汉两水域，沿长江东下分别到达虎丘山和会稽岭。秦始皇在会稽岭祭奠大禹，刻石颂功，并针对东南地区存在的氏族社会婚姻习俗和男女淫乱的现状，提出了“要大治濯俗，天下承教化之风，使民俗清廉”的新型封建思想。并刻石宣示，以醒时势臣民。

离开会稽岭，秦始皇率队沿水路到达琅琊。在方士徐福的诱说下，秦始皇亲率弯手进入东海寻找鲛鱼作战，将一条巨鳞可辨、若沉若浮的大鱼用连弯射死。

当秦始皇满怀胜利的喜悦，在琅琊台饮酒作歌入东海时，忽感身体不适，只好下诏西还。当车队到达平原津时，秦始皇竟一病不起。左丞相李斯见状，急令车驾速返咸阳。

时值盛夏，如火的烈日的烤着这支车队，大路上弥漫升腾着黑黄色烟尘。李斯、胡亥心急如焚，秦始皇痛苦不堪，不时发出阵阵呻吟，死神在一步步向他逼近。

当车队到达河北境内的沙丘时，病人膏肓的秦始皇自知已不久人世。弥留之际，他强撑身体，把李斯和中车府令赵高叫到跟前，让他俩草拟诏命，诏令在北疆防御匈奴的长子扶苏速回咸阳守丧。

李斯、赵高匆匆把诏书拟好，秦始皇过目后，用颤抖的手把玉玺递给李斯，有气无力他说道：“速派使者送达扶苏……”余下的话尚未说出，便撒手归天了。

这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翻云覆雨，改天换地的一代伟人，终于走完了他那辉煌的人生途程。死时年仅 50 岁，从他自称始皇帝算起仅为 12 年。

秦始皇撒手归天，丞相李斯深知新主尚未确定和登位时贸然宣布先帝死讯将意味着什么，于是断然决定秘不发丧。知情者仅限于胡亥、赵高和几位近侍。李斯与赵高秘密筹划后，秦始皇的遗体被放入一辆可调节温度的辒辂车中。

放下车帷，令其它臣僚无法知道车内虚实，每日照常送饭递水，臣僚奏事及决断皆由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和李斯代传批示。在这新旧政权交替的危机之时，李斯急推赵高速发诏，召扶苏立即赶回咸阳守丧和继承皇位，以免发生不测。

然而这时的赵高却另有打算，在他的威逼和诱劝下，李斯终于被迫同意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派使者赐剑给屯守北疆的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命他们自杀，改立胡亥为皇帝。

为等待扶苏，蒙恬的死讯，车队故意从井陉绕道九原再折回咸阳。漫长的旅途和酷日的暴晒，使秦始皇的尸体已腐烂变质，恶臭难闻。李斯、赵高速命人买来几车鲍鱼随辒辂车同行。以鲍鱼之臭掩饰尸臭，终使随行臣僚一直蒙在鼓里。当车队就要驶进咸阳时，扶苏自杀的消息传来。于是，李斯、赵高才公开秦始皇的死讯。九月，将秦始皇早已腐烂的遗体草草葬于骊山陵中。胡亥由此登基称帝，赵高随之升为郎中令，李斯仍为丞相。

在赵高的唆使下，胡亥登基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命人用毒酒将北疆屯边的将军蒙恬赐死。然后将 6 位公子和 10 位公主捕捉，押往长安东南处一一杀死。紧接着又逮捕 12 位公子押往咸阳闹市斩首示众。其余皇室宗亲，有的被迫自杀，有的则在出逃中被“御林军”截杀……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胡亥的帝位不受侵害。为彻底斩草除根，胡亥下令对朝廷中那些持有异议的臣僚也一一杀死。最后，曾为赵高所惑，帮助胡亥登上帝位的丞相李斯，也被腰斩于咸阳……

随着秦帝国大厦的倾塌和历史的延续进展，这段震惊天下的血案，也渐渐埋没于岁月的尘埃。后人再也无法见到朝廷内外涌动的血水，更听不到那凄厉悲怆、撕心裂肺的呼嚎了，一切都成为梦境般遥远的过去。

然而 1976 年 10 月，秦陵考古钻探小分队在陵东发现了 17 座殉葬墓，在无意中为后人打开了一扇透视两千年前那段血案的窗户。

为弄清墓的形制和内容，考古人员对其中的 8 座进行了试掘，发现墓葬形制均为带有斜坡墓道的甲字形状。其中斜坡道方圹墓 2 座，斜坡道方矿洞室墓 6 座。墓的独特形制表示了墓的主人无疑是皇亲宗室或贵族大臣，因为秦代的平民不享有这种带墓道的安身之所。从墓中发现的异常讲究的巨大棺槨来看，也非一般平民所能享用。

之所以把这些殉葬墓看作是窥视那段历史血案的窗口，是由于棺内尸骨的零乱和一些异常器物的发现。有的尸骨下肢部分被发现是埋入棺旁的黄土，头骨却放在停室的头箱盖上。有的尸骨头盖骨在槨室外，其它骨骼却置于槨内。更有特色的是，一具尸骨的躯体与四肢相互分离，零乱地葬于棺内。唯独头颅却在洞室外的填土中。经考古人员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个头颅的右额骨上有一块折断的箭头，显然是在葬埋前被射入头部的。发掘的 8 座墓中，其中有一座竟找不到一块残骨，却发现有一柄短剑。一切迹象表明，墓中主人是受到外力打击而死亡的。从尸骨零乱和出土的器物推断，这些墓主大多是被砍杀、射杀后又进行了肢解才葬于墓中。

证明墓主人是皇亲宗室、官僚贵族的理由，除独特的斜坡墓道外，考古人员还在墓中发现了极为丰富的金、银、铜、玉、漆器及丝绸残片。其中一件张口鼓目、神似鲜活的银蟾蛛，口中内侧刻有醒目的“少府”二字。这无疑说明此件葬器来自秦代少府或由中央铸铜官署——少府制造后为墓主人所有。如此珍贵的器物，亦是平民所难拥有或见到的。

这就不能不令人想起胡亥制造的那场宫廷血案。这一具具零乱的尸骨，无疑都是被杀的公子、公主或宗室大臣，绝非正常死亡。因为科学鉴定的结果表明，这七具尸骨除一人约 20 岁左右的青年女子外，其余均为 30 岁左右的男性。如此年龄相当又一致的正常死亡是不可能的。更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考古人员在墓中发现了挖墓人员当时取暖留下的灰烬，这就进一步说明挖墓时间是在冬季，而胡亥诛杀公子、公主、朝廷官僚的时间也是在冬末春初的寒冷季节，这个巧合绝非偶然。这就更能令人有理由推断出这 17 座墓的主人，便是那场宫廷血案的悲剧人物。他们的惨死以及惨死后给秦帝国带来的毁灭性结局，恐怕是秦始皇（和胡亥）未曾预料到的。

千百年来，人们往往把秦帝国短命的原因，一味地归结为秦之暴政以及刑罚的残酷，劳役和兵役的繁重，使“苦秦之矣”的天下百姓揭竿而起，将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第一个封建帝国夭折于幼年。

兵役劳役的繁重、刑罚的残酷，这不能不说是导致秦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非根本的原因。秦亡的根本原因是胡亥篡位后的倒行逆施，人为地造成了秦统治集团的矛盾分裂，削弱了统治力量，终于使秦王朝短期灭亡。

假如，胡亥继位后励精图治，稍微缓和一下社会矛盾，秦帝国也就不会如此之快地大厦倾塌；假如，胡亥能维护朝廷内部官僚集团的团结和利益，即是山东起乱，秦王朝尚有足够的力量对敌。试想，当年的章邯匆匆武装起来的几十万骊山刑徒，就能将农民起义军周章打得大败。那么，在北疆屯守的秦王朝 30 万精兵和大将蒙恬如果和章邯合兵一处，共同对敌，刘项大军就未必能越过函谷关，至少不至于如此迅速地就杀进咸阳，致秦于死地。

历史没有重演的机会，事实让我们看到的是秦帝国迅疾消失的结局。一切假设都是徒劳之举。但“历史确有属于未来的东西”，因而，秦始皇陵园

的 17 座杀殉墓，也就更能令后人透过这场血案的表层，去追寻一种潜藏在生活深处的深邃哲理。去思索过去、现在和将来应该扬弃和吸收的东西，这样，既有益于民族，也有益于自己。

第八章 跨过岁月的河

我们为此历史性的发现而深深感动。它是两千多年前伟大文明创造者的智慧的结晶。世界冶金史应重新编写，一切从这里开始。

——罗马尼亚团结阵线代表团团长塔玛拉·多布林

神奇的金泡

正当陶制的兵马俑在海内外人类的心中引起强烈震撼的同时，在秦始皇陵封土西侧 20 米的 7.8 米深处，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又悄悄出土了。它的发现和出土，再次给世界人类尚未平息的心灵以巨大的冲击。

经过四年的苦苦探寻，程学华率领他的钻探小分队，陆续发现了上焦村陪葬坑；马廐坑与珍禽异兽坑；一、二、三、四号建筑遗址；秦陵修建者墓地遗址；陈家沟秦陵陶窑遗址……整个陵园外侧的地下秘密已全部揭开。

1980 年夏，程学华率领小分队由陵园外侧转入陵园内进行钻探。10 月 3 日，又一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悄悄揭开帷幕。

洛阳铲在秦始皇陵封土西侧的不远，单调而疲惫地发着闷响。4 年的辛勤钻探，尽管发现不断，但再也没有像兵马俑军阵的出土那样令人激动和振奋，刚来陵园钻探时的新鲜感已渐渐在队员们心中消失，周而复始地钻探形成了一种单调的近似机械操作的模式，这就更令那些需要不断地变化和刺激的男女青年队员感到人生方式的不满足。既然单调的钻探生活不能改变，他们企望着一次重大发现的到来，以填补生活中的诸多不足。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当钻探队员杨诸德将已深入地下 7 米的探铲吃力地拔出来，仔细地观察带出的泥土时，一个指头肚大小的金泡映入眼帘，“这是什么东西？”他心中自问着，顺手擦去了蒙在金泡上的湿润泥土。刹时，金泡在丽日的照耀中发出了刺人眼目的光芒。他好奇地把金泡攥在手里，跑到正在不远处指挥其他队员钻探的程学华跟前，轻轻他说：

“程老师，我钻出一个圆珠。你看，像是金子做的。”

程学华接过金泡，心蓦地抖了一下。这一刹那，他隐约地感到了什么，忙催促杨诸德：“快带我去看看。”

程学华按捺住心中的激动，详细察看了金泡出土的位置，约离皇陵封土 20 米左右。在这样近的距离内陪葬的器物一定非同寻常。他把金泡交给杨诸德，拿起探铲伸入地下。

又是一堆湿润的黄土被带了上来。程学华小心地扒着土层，一个银泡和一片金块显露出来。他的心开始急剧地跳荡，手在微微发颤，凭着他多年考古掌握的史学知识和经验，他已预感到地下埋藏的器物会是怎样的一件稀世之宝。当最后一块金丝灯笼穗

出现在眼前时，他“啊”了一声，蹲着的身子像被击了一棒，倒坐在地上。

他的预感已完全被这块光彩照人的金丝灯笼穗证实了，在这 7 米深的地下暗藏着的正是他苦苦寻找了 4 年的稀世珍宝——铜车马。

多少次，他曾一人坐在高大的秦始皇陵封土上，面对庞大而神秘的陵园陷入深深的沉思。4 年来的辛劳和探寻结果，使他在兴奋中也像年轻的钻探队员一样渐渐滋生了一种不满足的情感。当然，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所产生的这种情感，和年轻的队员仍是不尽相同的。每一次细小的发现，都是解开秦

始皇陵园及秦代历史的不同阶段和区域难得的钥匙，事实已经证实了他和同伴们4年来的钻探成果，对于解开秦帝国政治风云、经济状况和文化心态的重要贡献。他也时常忆起自己的导师、考古巨匠夏鼐先生的衷告：“看一个考古工作者的水平和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他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要看他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而定。”但作为考古工作者，谁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重大考古发现的最先工作的主持者或参与者。况且秦始皇当年那辉煌的政治生活，总在吸引着他去作种种推想，面对气势磅礴的兵马俑军阵的同时，也无法使他忘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5次出巡所率领的精美华丽、气势非凡的庞大车队那浩浩荡荡的威武阵容。按照秦始皇“视死如生”的思想脉络，他不会忘记把伴他度过了一生许多重大事件的车马为自己殉葬。那么，这支华丽的车队到底躲藏在哪儿？

今天终于发现了它的蛛丝马迹。

凭着眼前这细小的迹痕，程学华内心就几乎已经当场断定，地下就是他要找的铜车马。

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关村出土了重875公斤的商代司母戊鼎，曾使东半球的考古界为之震惊。1972年在意大利里亚切市海湾发现了两尊希腊青铜武士像，使整个欧洲为之狂欢。此时程学华清楚地意识到，这不同以往任何一次的考古发现，将使世人又一次为之震撼。

面对将要成为现实的壮观前景，程学华心中的热血由此而奔涌澎湃，似乎要把那颗急剧跳荡的心脏推拥而出。他感到内心翻起一阵阵未曾有过的灼热和火辣辣的痛疼，再也无法忍受这身心的折磨。他当即命令杨诸德停止操作，对探孔严加看守。然后将出土器物用手帕小心翼翼地包好，推起工地上停放的自行车向陵园外走去。

蒙在鼓里的杨诸德没有意识到他所发现的那个金泡意味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和壮观前景。他只是清楚地看到了程学华在回眸向他微笑的瞬间那双湿润的眼睛。

争夺铜车马

程学华来到秦俑博物馆馆长杨正卿的办公室，将手帕在桌上铺开，脸上挂着绯红的神色：“杨馆长，你看这是什么？”

“发现什么了？”杨正卿从对方的眼神中已感到陵园将有重大的考古发现。

“不得了了，陵园里发现了铜车马。”程学华用依然颤抖的手，指着桌上的金泡、银泡和金丝灯笼穗说：“这些东西就是马头上的装饰，如果发掘出来，一定能震惊世界……”

杨正卿望着面前金光灿烂的器物 and 程学华激动的面庞，眼睛也随之明亮起来。惊喜中他仍不放心地问道：“你能肯定是铜车马？”

“完全可以肯定。除了铜车马，别的陪葬品不会有这些器物。”程学华严肃而认真地回答。

为确切地证实铜车马的存在，杨正卿又找来几位考古队员进行辨别，结论完全同程学华所推断的一样。杨正卿立即将情况上报，同时又让程学华回陵园进一步钻探。

1980年10月15日，国家文物局局长任质斌在陕西省委领导人和省文物局局长杨达的陪同下，来秦俑博物馆视察工作。杨正卿让程学华将发现铜车马的情况向任质斌局长作了汇报。

“根据是什么？”任质斌兴奋中提出疑问。

程学华指着出土器物一一分析。这时除金泡、银泡和金丝灯笼穗，经过钻探又发现了有铜车存在的饰有花纹的铜片。

“如果真的是铜车马，我们将会再一次震惊世界。”任质斌说，作出了“先挖探沟，弄清虚实”的决定。

10月18日，考古队长袁仲一和程学华根据钻探的情况，作了周密的计算。在铜车马的覆盖上层上划出一个长方形图路，钻探小分队队员依图路挖了下去。

11月3日，2乘铜车、8匹铜马及2个铜御手在7.8米深的地下显露出来。尽管经过了2000多年漫长岁月的埋藏，已使铜车马被土压塌变形，但整套车马披挂俱全，银质饰品色泽光溜，金质器物闪闪发光。程学华的推断被证实了，铜车马将由此以它那精美绝伦的稀世身价和神奇风采，跨过漫长的岁月之河走进今世。

11月4日，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领导小组成员张宁鑫和工作人员吴永琪携带铜车马出土的照片，乘飞机抵达北京，火速赶往国家文物局汇报。

正在办公室召开党组会议的国家文物局局长任质斌被悄悄地叫了出来，走进接待室。

“根据您的指示，我们已在铜车马四周挖了探沟。2乘铜车、8匹铜马和2个铜人已完全暴露出来，请局长过目……”张宁鑫将照片递给任质斌。

任质斌一看，挥手猛地拍了一下茶几，脱口而出：“太好了，这么伟大和珍贵的文物，怎么能不让世界震惊！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说着，他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拿着照片走进会议室。

惊叹、赞誉、议论……会议在这一重大考古发现的新消息冲击中，已无法进行下去。任质斌让张宁鑫、吴永琪速到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找夏鼐所长汇报，同时指派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孙轶清乘飞机赶往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具体处理一切情况。

当张宁鑫、吴永琪在北京向有关部门汇报完情况返回秦俑馆时，秦始皇陵园的景观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就在铜车马刚露出土层的当天，消息已在当地群众中风传开来。先是“秦陵挖出了和真马真车一样大小的铜车马”，再是“秦陵挖出了金马金车”，最后变成“秦陵挖出了活马真车”。

消息越传越神，越传越远，很快在临潼和西安市流传起来。当地的农民，西安、临潼的干部、职工、市民，还有不少正在当地旅游的外国人，纷纷赶到秦始皇陵园欲一睹这“活马真车”的风采。陵园内外到处荡动着参观者的身影。

面对这意想不到的局势，为保证文物的安全，袁仲一和程学华在铜车马坑边用干草搭起一座棚子，日夜守护，以防不测。

铜车马出土的位置，正在附近农村社员的麦地中，这些社员眼看着人流源源不断涌来成大军压境之势，青色的麦苗被踩成泥土，便急中生智，立即找来绳子、木桩将铜车马坑包围起来，并在参观铜车马的必经之路设卡堵截，找些废纸胡乱剪成长条，于设卡处兜售，进铜车马坑参观者，需先买票才能进入。票价不贵也不贱，按秦俑馆票价一半销售。远道而来的人参观心切，不顾这卖票者是公是私，是合理还是非法，纷纷掏钱买票，冲进卡内直达铜车马坑边。

整个铜车马坑四周已被当地社员控制，所有秦俑馆工作人员要进入铜车马坑工作，也必须和外地群众一样过卡买票。陕西省文物局几位领导因未遵守规矩，闯进卡内，被当地社员连推带拉轰出卡外，只能远远地望坑兴叹。

面对这混乱紧张的局势，秦俑博物馆派人和当地驻军联系，要求部队派兵守护。

为确保文物安全，当地驻军调拨一个排的兵力进驻秦始皇陵园。当地社员一看自己的发财之地被解放军占领，毫不退让，大有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气概，全力抵抗。

军民纠纷在所难免。

最后的结果是解放军数人受伤，其中一名战士被急送医院抢救才保住性命。

部队无法继续守护，只得退出，重新把控制权让给当地社员。

面对这剑拔弩张的局势，秦俑馆无计可施，不得不派人向临潼求援，希望能够得到支持……

然而，临潼县没有站到秦俑博物馆一边，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对这场纷争作出裁决：“秦始皇陵园是临潼县管辖的范围，并没有划给秦俑博物馆，临潼县无法对当地农民的要求作出站在秦俑馆一边的仲裁。”

事情已很明了，局势急转直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的焦点已不再是谁守护的事情，而是这铜车马应该归哪家所有的矛盾纷争。

秦俑馆只得向陕西省主管部门求援，而陕西省文物局也毫无办法，再打电话向国家文物局求援。此时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已从秦陵发掘工地返回北京。和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王廷芳一起，将秦陵发现铜车马和面临的归属权问题，匆匆拟报告，请中共中央宣传部定夺。

批示没有下达之前，矛盾自然无法解决。秦始皇陵园每天仍有四、五千人来回荡动，社员设卡售票依旧，只是秦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越来越难以接近铜车马。只有袁仲一和程学华仍坚守阵地不放，守在车马坑边的小草棚里日夜监护。

临潼县在等待中央的批示。

秦俑博物馆在等待中央的批示。

终于，中央宣传部在反复研究斟酌后向陕西省发出了急电：

秦陵出土铜车马，运至秦俑博物馆进行清理、修复和展出。

电报很快转至秦俑博物馆。秦俑馆立即派人持电报赶往临潼县委和县政府协商，临潼县决定协助将铜车马运至秦俑馆。

铜车马深在地面7米以下，况且已被土层压碎，仅一乘铜车就破碎成1500余块。如何安全、完整、尽快地运往博物馆，成为一个重大而首要的难题。

复杂的现状，使秦俑馆每个人都知道，不能再有丝毫的耽误。博物馆工作人员吴永琪力举，终于在附近一家工厂制成了一个大型钢板簸箕，作为收集迁移的主要工具。

当汽车拉着钢板簸箕驶入工地时，同样受到了设卡农民的阻拦。具体负责迁移工作的张宁鑫拿出中央发来的电报，示意农民放行。

“我们不认中央的电报，只认麦子，把麦子压坏，我们吃什么？”农民的口气依然强硬，汽车无法越过关卡进入工地。

急红了眼的张宁鑫当即决定：“所有压坏的麦子都由秦俑馆赔偿。”

“赔偿多少？”农民开始放缓口气，讨起价钱。

“产量的二倍。”张宁鑫回答。

“不行，进一次 300 元，少一个子儿也甭想过去。”农民毫不退让，提出了惊人的价格。

“就这样定了，进一次 300 元。”张宁鑫果断而坚决地当场拍板。

“拿现款来。”农民望着张宁鑫涨红的脸庞，伸出了粘满泥土的手。

张宁鑫摸摸衣兜，掏出一个笔记本：“现款我没有带，但可以写条子，你们凭条子到秦俑馆领钱怎么样？”

“写吧。”农民放下手，大瞪着眼睛看着面前这位黑大个儿的动作。

按群众要求、汽车进一次工地由秦俑馆付 300 元现金。

张宁鑫

1980.12

纸条从笔记本上撕下，递到农民手中。

汽车冒着蓝烟，穿越防线，驶向铜车马坑。

随着张宁鑫手中条子的不断书写“付 300 元现金”，汽车、吊车一次次驶入工地而畅通无阻。

一切准备就绪。铜车马的四周挖出了几条深达十米的宽沟。以 4 立方米木板的代价，将铜车马连同一米厚的土层包裹起来，成为四个大型木箱。钢板簸箕用吊车放入坑中，簸箕口对着铜车马，板台架设千斤顶，逼使簸箕向铜车马的底层慢慢推进。整个木箱进入簸箕，吊车开始起吊，四个木箱裹夹着铜车、铜马完整地进入汽车拷斗，在一片欢呼声中驶往秦俑馆。

4 天后，张宁鑫来到当地农村，找农民商量赔偿事宜。

“条子我已经写了，你们看怎么赔偿，是不是按条子写的办？”张宁鑫问。

“秦俑馆哪来的那么多钱，赔偿的事就不要提了。”憨厚朴实的农民回答着，递过一碗热茶。

张宁鑫望着农民们那黑瘦的脸颊和一双双粗糙的手，想起这些天发生的一串故事，心中滚过一阵热浪，似乎这时他才真正认识了这些普通农民的内心世界。

临走的时候，张宁鑫真诚地对那黑瘦脸颊的农民说：“不能让你们吃亏。我回去和馆领导研究一下，就按五倍的粮食价格赔偿这次造成的损失。”

一个月后，秦俑馆按张宁鑫提出的要求，向农民兑现了经济赔偿费。

轰动、轰动

铜车马运到秦俑馆后于 1981 年 5 月开始了修复工作。为保证修复顺利地进行，馆内采取了对外保密的措施，使外界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不知道铜车马运入秦俑馆后的具体情况。

1981 年 8 月 7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发专稿，详细介绍了铜车马的发现和修复情况。这封闭了近一年的消息一经播出，立即在世界引起强烈震动，中外游客纷纷奔向秦俑馆，争相目睹铜车马的风采神韵。然而，他们没有如愿，秦俑馆仍恪守保密的决策，使无数游客望馆兴叹，扫兴而归。

1981 年 9 月 18 日，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来到秦俑博物馆，当他走出兵马俑坑时，委婉地向中方陪同团领导习仲勋提出了参观铜车马的请求：“这里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壮观的兵马俑军阵已使我深深地感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如果再能参观一下贵国刚刚出土的铜车马，那将是一生

的幸事。”

习仲勋理解古斯塔夫的心情，但在此之前铜车马从未对外展出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难题。

古斯塔夫国王被安排在接待室暂时休息，习仲勋走出来悄悄和秦俑馆领导人商量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秦俑馆不能擅自作主，立即电话请示国家文物局，终于得到了一个今古斯塔夫国王满意的答复：“接待瑞典国王。从今日起，铜车马作为特殊之物，作为外国元首参观的特殊待遇。”

古斯塔夫国王终于如愿以偿，面对正在修复的铜车马，他以敬佩和感激的心情说：“这次有幸亲眼目睹了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西安一行，将令我终生难忘。”

1983年8月，经秦俑博物馆修复人员吴永琪、柴忠言等人的努力，被编为“二号铜车马”的1乘铜车、4匹铜马及1个铜御手全部复原归位。9月，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在骊山宾馆召开了“二号铜车马清理，修复鉴定会”，并很快通过了鉴定。10月1日，二号铜车马走出修复室，进入展厅，正式接受世人的检阅。

那挽车的四匹铜马膘肥体壮，仰起的额头上戴着光彩耀目的金银络头，圆睁的二目虎视前方，翘起的鼻孔似在喘息中微微颤动，整齐的牙齿紧咬嚼衔，耸起的鬃毛在尘风中飘荡。状如削竹的马耳斜立在额头的两侧，似在静心聆听主人的号令，只待一声脆鞭的炸响就毫不犹豫地仰头躬身，撒蹄奔腾。赶车的御手面庞丰腴，潇洒自如。两片浮雕式的八字胡须更增添了他的神韵。头顶的初云冠、腰悬的青铜短剑，又使他严肃而威武。稍弯的秀眉掩护着一双半眯起的双眼，手中抓住六条御马辔缰，长鞭高悬，严阵以待，时刻准备驱车前行。穹式的车盖和车厢四壁，绝妙地绘制着色彩艳丽的变形龙凤卷云纹和丝缕交错的云气纹图案，镂花画凤的银器环抱着车衡两端和驾马的轭钩。轴悬飞铃、马带繁缨。整个铜车马华贵中透出庄重，瑰丽中带有古朴，动中有静，静中寓动，工艺绝伦的造型使2000年前的青铜再度泛起了勃勃生机。而铜车马的冶金铸造技术更令后人叹为观止。制造者根据车马的不同结构，不同用途的构件，把战国以来的冶金铸造技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使铜车马刚柔相济、历两千年依然金光灿烂，映照人影。据测定，铜车马修复后的光洁度达到■8—10级，如此高超的工艺技术和冶金能力，不能不令人为中国古代文明而拍案叫绝。这组铜车马为20世纪世界考古发现的最大青铜器，总重量达1243公斤，其形制相当于真马真车的1/2。而如此装饰豪华、完整齐全的古铜车马，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它那无与伦比的工艺技术和高超的冶金铸造水平，为同代任何青铜器物所无法匹敌。故此，它在世界引起轰动已是理所当然。1983年10月20日，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团结阵线代表团团长塔玛拉·多布林作为第一位正式参观的外国知名人士。看了刚刚公开展出的铜车马，在留言簿上兴奋地写道：“我们为此历史性的考古发现而深深感动，它是2000多年前伟大文明创造者智慧的结晶。世界冶金史应重新编写，一切从这里开始。”1983年11月6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东京办事处主任埃克雷斯，在参观后惊呼：“参观精美绝伦的古代铜车马，是一次令人终生难忘的、最愉快的经历。这组铜车马是中国艺术文明的楷模。”

1984年8月22日，日本访华团团长江上裕雄，在秦俑博物馆几乎是满含激动的热泪，挥毫泼墨写下了发自内心的话语：“我感谢中国古代之文化。兵马俑和铜车马是一棵古树上盛开的两朵鲜花。它们是相互辉映相互

媲美的人类瑰宝。兵马俑以它那宏伟的军阵和千军万马的庞大气派赢得赞叹。铜车马则是以它那精湛、神妙的冶金工艺震撼人类的心灵，我为此历史性的考古发现深深感动，我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敬意！”

1986年6月16日，秘鲁部长会议主席路易斯·阿尔瓦在秦俑馆铜车马展厅，情不自禁地喊出：“这一文明的再现，使世界感到惊讶！”

1986年9月28日，意大利陆军参谋长波利中将，走出铜车马展厅，面对蓝天白云拥抱的万里苍穹，以军人特有的气质果断地作出了结论：“这是世界无敌的奇迹！”

轰动，轰动……一切都是预料中的反响。1987年5月，一号铜车马复原后正式展出，它所引起的再度震撼，也依然是预料之中的。

车马走向的昭示车作为一种运载工具，在中国最早发明于何时已无从考证。30年代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小屯出土了数十辆木式战车，是发现车最早的使用年代，距今已有3700多年的历史。此后的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各代，都有车出土，遗憾的是多为木式战车，出土时均已腐朽变质，后人很难辨清古代车驾的真实面目，秦陵铜车马的出土，无疑为今天的人类目睹古代车驾的真实面目，提供了鲜活的见证。

从形制上看，2乘铜车均为单辕。前面有挽驾的衡木，4匹马并驾齐驱，两边的两匹驂马拉车。

根据车的形制结合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认知，一号车应为古代的立车，御手和乘人都站在车上；二号车为安车，御手坐在前御室，乘人坐在左右两侧开窗，后部留门的乘室内。从安车车顶那穹窿式的绣有花纹的篷盖和室内铺有质地柔软、状若毯垫的车底衬推断，当为高级臣僚所乘之车。而这两乘铜车只不过是秦始皇陵整个铜车马陪葬坑的一部分，尚有大量的车马没有出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只是秦始皇当年出巡车队的一组，但并不是秦始皇本人所乘之车。从史料中可以得知，秦始皇所乘坐的车为“金银车”，由6匹马并驾齐驱，从属的车队中按阴阳五行分别配制五色立车和五色安车，外加通过窗户的启闭而调节温度的轂车。秦始皇每次出巡，总是先以蒙饰虎皮的警蹕车保驾开道，文武百官、近侍宠臣、皇后嫔妃、王子公主随行，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大秦帝国的风貌在这庞大华贵的车队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

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使人们在窥视到秦代卓绝的工艺技术和冶金水平的时候，也不难想象秦始皇一生五次出巡的辉煌宏伟的气势，从而进一步看清这位一代雄主的性格和政治思想领域中更为深刻的内蕴。

秦始皇一生叱咤风云，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吞灭六国、南取百越、北筑长城、五次出巡等几个清晰宏大的脚印。千百年来，人们赞誉他吞灭六国、统一天下的辉煌业绩的同时，也对他北筑长城、巡示天下、求仙取药提出了种种非议。秦始皇由此成为毁誉下一、争论不休的历史人物之一。

长城被视为中国古代人类文明的象征，已毋庸置疑。面对这绵延万里、穿山越岭的伟大建筑，在让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勤劳和智慧惊叹的同时，也清楚地看到长城的构想者心胸宽广、勇于探索的开创精神。秦始皇是在世界东方这块黄色的土地上建立起那千古伟业的，他对这块土地的爱恋至死不移。但透过他复杂多彩的一生，让人们看到的却是他不断的摒弃本土意识而苦苦探寻更具魅力的海洋意识。这种开放的心胸和思想走向，从长城的修建便可足以证明。

万里长城的修建，当然有军事上的考虑，但这并不是主要的。其主要的指导思想则是秦始皇是利用这堵大墙逼迫他的人民去拥抱蓝色的大海。这种思想的脉络早在秦国大军席卷百越时就已显露。面对东南沿海的这块神秘土地，他命令他的士卒和当地人通婚，在此长期生活、繁衍。这种方式的意义同样地不只局限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而更在于使他的人民接触和创造海洋文明。面对秦始皇亲手圈定的帝国版图，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巨形的“簸箕”，牢固地嵌在世界的东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类背对的是一堵坚硬的大墙，面临的则是广阔无边的海洋。后路已被封死，只有义无反顾地前行，奇特的环境和面前的现状无一不在昭示着人类走向蔚蓝色。这也正是秦始皇不顾时人的反对和后人的诅咒，狠心地在中国北部而不在东部和南部修筑万里长城思想的根本所在。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才有秦始皇五次出巡远行，四次走向东海岸的具体行动。从东海岸的会稽岭、琅琊台、芝罘山，碣石岛那高高筑起的楼台上，透过秦始皇看海观景、饮酒作歌的表层，不难发现他对那蓝色文明的幻想与向往。而楼台与长城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的修建，也绝非是他的随心所欲，两种不同的建筑格局昭示给后人的是同一主题：让思想与智慧的光芒射向更加广阔的蓝色远方。

东晋史学家王嘉的著作《拾遗记》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

“有宛渠之民，自东海乘螺舟而至琅琊。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故名沧波舟。其国人长十丈，编鸟兽之毛以蔽形。始皇帝与之语及天地初开之时，了如亲睹。谓此为神人也。”

在这一卷中，作者对宛渠民有极为生动、详尽的描写。宛渠民的沧波舟可“日游万里”，照明设备极端先进，在夜间只需“状如粟”大小的物体便可“辉映一堂”，且这粟一般大小的发光物“若投之于小溪，则溪水沸腾，沸沫流于数十里”。如此之先进的运载工具在当时的地球上是没有的，那么这宛渠之民不是来自外星又来自哪里？

当然，作者王嘉的这段记载，是距他约五百年前的故事。很难令后人相信是历史事实，但秦始皇思想脉络的产生与发展与这些超凡的现象不无关系。

纵观秦始皇短暂的一生，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征服”二字上，并把人类征服的天性发挥到极峰。当他用铁腕在腥风血雨中扭转乾坤，荡平天下之后，征服的欲望并未枯竭衰落，他把目标对准死亡，他要以自己盖世威力，向死神挑战。

这个挑战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悲壮色彩，正如当年荆柯刺秦工一样凶多吉少，但他依然慷慨悲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秦始皇先是派徐福等人到他一直向往的隐藏在蔚蓝色中的神秘天国寻求药物，随之亲自登船到海洋中搏击一切阻碍他取得胜利的力量。他的连弩射向庞大的蚊鱼，同时也射向了一条万物生死死，生死往复循环的真理。他把人类的天性发挥到极至，以人本身固有的最大张力向自然界的法则发出了挑战。

面对浩瀚的海洋和扑朔迷离的生死之城，他最终没有成功并遭到了平生最为惨重的失败。死神以极大的报复之心，把他和他亲手创建的帝国毫不留情地扼杀了。

这一悲剧性的结局，深谋远虑的秦始皇应该也早就想到了，为此，他的陵墓修建工程才历30年而不断。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行动才越发显得悲壮和

令人惊心动魄。尽管他的海洋求仙梦最终走向了破灭，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征服之举，要比哥伦布在海洋中单纯地发现新大陆要伟大得多，意义也更深远。

之所以说他伟大，是因为秦始皇以自身的毁灭做出了人类不满于大自然法则的束缚，而敢于同我们的头脑中既成的认为不可能逾越的所谓真理抗争的范例。他的壮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越来越被事实所验证。

在 17 世纪之前，存在于世间的真理是宇宙中只有一个太阳，当布鲁诺站出来宣称宇宙中有无数太阳的时候，不但遭到了时人的讥笑，而且布鲁诺本人也被教庭活活烧死。在火车发明之初，有人大肆攻击，认为会惊吓家禽，使坐车的人因缺少足够的氧气而窒息，或者被风折断脖子。著名军事将领拿破仑进攻英国前，美国工程师福尔普敦向他提出了制造蒸汽船的意见，就连伟大的拿破仑也对这似乎违背真理的意见不但置之不理，而且大加讽刺：“老兄，要造船逆风而行，并在甲板下烧火，原谅我，没有时间听这无稽玩意。”天文学家托勒密在公元前 2 世纪曾作出了“没有人能通过赤道，因直射的阳光会使海水沸腾、木船着火”的断言。另一位天文学家西蒙尼康在 1903 年宣布：“空中飞行是无法克服的问题。”数月后，莱特兄弟的飞机便在蓝天翱翔起来。液态火箭专家戈达德曾预言：“终有一天，火箭可到达月球。”却被《纽约时报》攻击为“他似乎没受过中学教育。”1899 年，美国专利局局长曾向麦金莱总统要求废除专利局，理由是：“可发明的事物已全部发明完毕”。

人类心中的真理和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一条条法规，无不在人类的不断征服中逐渐被穿破。人的生死是一个未被解开的千古之谜，人类生命的极限也依然未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但在人类生息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人类生命极限不断延伸的事实。

旧石器时代，中国猿人的平均寿命为 13 岁；新石器时代中国北京猿人的平均寿命为 14.6 岁；夏商时代不超过 18 岁；西周至秦汉时期仅为 20 岁；东汉时代为 22 岁；唐代增至 27 岁；宋代为 30 岁；元代为 32 岁；清代为 33 岁；民国为 35 岁。

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普查表明平均寿命为 57 岁。1981 年中国人均寿命增长到 67.88 岁；1985 年全球人口平均寿命已达 59.2 岁，而发达国家则达到 72.4 岁。中国男子平均寿命达 67 岁，女子则达到 71 岁。

长寿并非神话，人能活 100 岁甚至更多也同样不是神话。今天的人类理应期望长生，并通过不断地征服自然和自身，到达心中的终点。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文明的进展，人类也将更加客观和实际地评述秦始皇的一生。他所创造的辉煌伟业和对中国的深远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晰。长城不应再是保守、封闭思想的产物，秦始皇的出巡和到海洋中求仙寻药的故事，也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乌托邦式的追求。从历史资料可以看出，秦始皇绝非像大多数皇帝那样沉湎于酒色的丧家辱国之辈。他要励精图治，他要使这个中华帝国永远强大不衰。正是出于这样的愿望，他才去胆大妄为地追求神奇虚幻的灵丹仙药。可惜他手下的臣僚、方士、侍卫都是些鸡鸣狗盗之徒，贪图私利之辈，处处为自己的利益而考虑行事。从而失去了秦代的中国探索和占领海洋的机会。“秦始皇晚年所做的一切，其实是生命和自然掰手腕的较量。也许他的乐趣正在于战胜——战胜自己，战胜敌人，战胜死亡。这实

则是一种伟大精神和意志的象征。人的阳刚之气正在于战胜；而我们今天所缺乏的也正是这一点。如果什么时候我们能真正体会和领悟了这种精神的内蕴，那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人类文明的太阳将会在西方落下，再度从东方升起。”这是一位在秦兵马俑博物馆长大的年轻女服务员的想法。

面对这位 22 岁姑娘的论断和对前景雄心勃勃的展望，我除了钦佩她的见解之独到之激越之外，不能也不想和她讨论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重生了这种具有阳刚之气的征服精神，中华民族至少会改换一个新的模样。

第九章 难以消退的历史底片

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所展出的文物，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它不仅反映了历史的重要阶段，也反映了中国古代高度的文明。这些文物不仅属于中国人民，也是全世界的财富。

——前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

无疑，秦始皇陵园所出土的文物，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它是整个世界人类的珍贵财富。为此，1987年，中国的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军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清单，受到全人类的保护。秦俑馆自1979年10月1日对外展出，已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研究、观光者2000万人，而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2000余万人，同样不惜远涉重洋之劳，光顾秦俑博物馆，其中有国家元首68位。秦俑馆每天人流如潮，形成了一条流动的长河。而这条长河在不停地奔腾中，时常翻起多彩的浪花。尽管这浪花的翻起和消融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它将在秦俑博物馆的历史中，完整地保留下来，并成为和秦俑军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意义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会更为人们所瞩目。

十几载花开花落，星转斗移，难以抹掉的底片，清晰地记录着难以忘却的故事——

里根“拍中国马屁”

美国白宫。

遇刺痊愈不久的里根总统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将要结束时，

曾风趣地说过：“我很想进行一次访华，并亲眼目睹一下贵国那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军阵，只是会不会出现……”里根抬起右手、将食指伸出，放在自己的面庞一侧，做了个手枪射击的动作。

中国领导人心领神会，爽朗地一笑：“总统阁下尽管放心，

只要你一踏入中国的领空、领土，您的安全将万无一失。”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1984年4月25日，正在长沙一个培训班学习的秦俑博物馆宣教部女讲解员马青云，突然接到陕西省文物局拍来的急电：

立即乘机返回西安，有重要接待任务。

马青云连夜起程，返回西安，赶往省文物局。第二天清晨、陕西省省长、文物局局长向她交待：“4月29日，美国总统里根携夫人南希要来秦俑馆参观，上级指示，除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外，还要做好一切接待事项。你是秦俑馆最有经验、最出色的讲解员，经我们反复研究，讲解的任务就由你来完成。这次的接待不同于往常，你一定要发挥最大的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在现代化方面咱不如美国，但在历史的悠久和古代灿烂文化方面，她不如咱……”

马青云受领任务后立即赶回秦俑馆做接待准备。这时秦俑馆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停止日常的工作，投入了清扫院落、修整房舍。检查设备的突击性准备。卫生检疫人员对为里根一行准备的食物、饮料进行了详细地检验和消毒。省公安厅派来的保卫人员和秦俑馆公安科的公安人员，控制了展室、接待室、厕所。所有里根总统可能进入的房间钥匙，统由公安人员管理控制。为防不测和发生意外，当地驻军投入一个营的兵力携带扫雷探测器，扫描了秦俑馆所有的地下和房间角角落落。并对俑坑中的陶俑、陶马逐一探测。与此同时，临潼县消防队四辆消防车架起水龙停在秦俑馆广场一侧，以作失火后的扑救。一支经过特殊训练的武警部队包围了秦俑馆，战士持枪荷弹，

进入一级战斗准备……整个秦俑馆处于紧张的状态。

4月28日，美国驻华使馆的一秘来到秦俑馆对安全设施和布局详细察看后，未发现破绽，又问秦俑馆馆长：“是哪位作讲解？”

馆长把他领到接待室指着马青云说：“这位是我们馆最优秀的讲解员马青云同志。”

一秘善意地打量了马青云一眼，伸出手用流利的普通话说道：“噢，您就是从长沙赶来专门接待我们总统的马青云女士？您明天打算如何讲解？”

“预计里根总统在这里共停留40分钟，一半时间让客人自己观看和休息，余下的20分钟一半留给翻译，一半由我讲解。我的讲解时间分别为：休息室2分半钟，一号坑大厅2分半钟，俑坑中5分钟。”马青云微笑着回答。

“您讲什么内容？”一秘继续问。

“如果您有兴趣，我可以把在休息室讲的内容先讲一遍，请您指教。”马青云依然微笑着回答。

“那太好了，我先坐在总统的位置上，其他人暂时坐在夫人和随行人员的位子上，请您讲吧。”一秘说完，瞥了一眼左手腕上的手表，坐在沙发上注视马青云，认真地听着。

时间一秒秒地过去，马青云停住手势戛然而止。一秘迅速看了看表，兴奋地站起身握住马青云的手：“太棒了，只差3秒钟，您把那么悠久的历史，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讲得非常清晰，一听就很明白。您的讲解如此出色，我的总统一定会喜欢。”一秘走出接待室，又回过头对马青云说：“祝您成功！”

4月29日下午，里根总统的两个特工先行驱车来到秦俑馆，每人手提一个棕色小型皮箱走进备用房间，两人将皮箱并列放在眼前，态度极为严肃，目不斜视，亦不相互讲话，如同两个跽坐俑稳重而呆板。秦俑馆工作人员端来茶水，他们除了微微点头表示谢意，并未试饮，仍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棕色皮箱。

下午2时，里根总统的飞机在西安闫良机场降落，里根携夫人南希缓缓走下飞机舷梯，进入早已在机场等候的防弹车、向秦俑馆驶来。与此同时，一架军用直升飞机从闫良机场立即起飞，在里根到达之前降落在秦俑馆前的广场。

下午3时，随行里根夫妇的60余辆车中乘载着600多名特工与记者，浩浩荡荡拥入秦俑博物馆。内穿防弹背心的里根外套黑色西装，雪白的衬衣领口打着深红色条纹领带，颇有艺术家欲登台演出的潇洒气度。南希身着大红衣裙，挽住丈夫的手臂举步轻盈，面露微笑。但眸子里隐约透出不安和紧张的神情。

在他们来华的同时，美国情报部门掌握的情报发现一个强大的恐怖组织对里根夫妇此行的一切细节甚至包括南希的服饰都了如指掌。这个恐怖组织所派遣的杀手随着里根飞机在北京机场的降落也潜入中国境内，伺机给美国“最严厉的惩罚”。

随着里根夫妇走进接待室，外面的保安人员、武警部队做好了一切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枪栓拉动，子弹入膛，食指紧扣扳机。消防车引擎轰鸣，干瘪的水龙迅速鼓起，水枪对准了长空。馆外的直升飞机螺旋桨不住地转动，掀起片片残叶和漫天尘土……整个秦俑博物馆的紧张气氛达到高峰。

休息室里，里根与南希端坐在沙发上，两边站立着数名特工，两个等候已久的厨师走进来，打开棕色皮箱，取出了饮料放到里根夫妇的身旁。为能

正确辨别，秦俑馆准备的饮料全部移在另一侧。

5 分钟一闪而过。里根夫妇满意地微笑着，随马青云走进兵马俑一号大厅。

大厅的栏杆后面，云集着中外近千名记者、保安。随着里根夫妇的到来，照相机镁光灯、摄象机碘钨灯一齐开动，整个大厅被耀眼夺目的各色灯光覆盖，坑中的兵马俑已看不分明，里根总统眨眨眼，转到马青云的身后，似乎才辨别出兵马俑的军阵已在面前。

“请总统先生看坑中竖立的白色木牌。”马青云手指着打井位置的标志：“1974 年春天，当地农民在这里打井，无意中发现了埋藏了 2000 多年的为秦始皇陪葬的兵马俑，不过他们发现时兵马俑大多都已倒地破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排排立俑，是经过修复人员修复后才恢复了原来的面目……”

马青云熟练地讲解，翻译快速地传递，里根和夫人南希不住地点头。

“噢，这些兵马俑是从这里挖出的，现在又在原地排成当年的队形，你刚才不是说他们在发现时都倒了嘛，你们怎么知道兵马俑应当是这样排列的呢？”里根第一次向马青云发问。

马青云指着兵俑的脚底：“俑虽然都倒了，腿也断了，可是脚踏板的位置没有动，我们是根据脚踏板的方位复原了当年的排列队形。”

里根沉思了片刻，点点头：“我明白了。”

在大厅遗址的中部，马青云指着脚下的黄土层：“这是为建大厅，防止损坏文物，工作人员又用土回填的地方，我们脚下都有像前边一样的兵马俑。”

“是吗？！”南希惊奇地望着马青云的脸，又低头看看脚下的黄土，便悄悄脚地轻轻地走动，似乎怕惊醒了土下的陶俑。

按照规定，外国的观众只有国家元首或相当于元首的人物才能下坑参观，里根夫妇当然得到这最高规格的接待。

沿特别修筑的台阶，里根夫妇携翻译在陕西省省长李庆伟夫妇及马青云的陪同下，向俑坑深处走去。面对威严肃穆的兵马俑军阵，南希夫人如同初出远门的小姑娘，好奇而胆怯。她紧紧抓住马青云的手，回头看看里根总统，又将另一只手伸出来握住了丈夫的手腕。

高大威武、神色各异的陶俑静静地站立着，以骇人的气势和雄壮的姿态，接受这位美利坚台众国总统的检阅。

南希夫人已失去了刚才姑娘般的胆怯。她如同一位少年男子一样在俑群中绕来穿去，神态异常活泼，不时地在里根总统面前对秦俑指指点点，讲些只有他们两个才能心领神会的风趣语言。突然，南希猛地抬起头，惊恐地望了一眼俑坑上面的人群，似在寻找着什么。马青云及时捕捉到了南希稍纵即逝的神情，她知道，这位夫人一定是想起了丈夫的安危。

在陶马前，里根总统瞪大了眼睛静静地望着。他情不自禁地抬起右手又踌躇地停下，回头礼貌地问马青云：“我可以摸一下马吗？”马青云迅速望了一眼身边的省长李庆伟心照不宣地请他抉择，李庆伟略作沉思后回答：“我们请您来，当然可以摸一摸。”

里根轻轻地把手放在马背上，慢慢地从前向后移动，一直到马屁股。突然，他猛地把手从马臀抽回，神态严肃地说：“它不会踢我吗？”

“不会的，对于远道而来的贵客，它绝对友好。”马青云说，众人为里根的幽默哄堂大笑。

马青云知道这位美国总统有爱马的嗜好，便不失时机地进行讲解：“这匹马塑得双耳如削，鬃如风云，鼻翼微张，目视前方，似在引颈长鸣、又像扬蹄欲奔。静中有动，动中寓静，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卓越的雕塑艺术水平……”

里根和南希静静地听着，不时打量陶马的全身，显出兴奋之情。南希伸手指着马肚子上的一个圆孔，示意里根注意。

“为什么这马的肚子上还有小孔？”里根躬身看着不解地问。

“当年陶马是分别用模子和雕刻手法配合制成的，马的头部和腿部是实心的，而马的肚子却是空心的。据我们的考古学家和雕塑艺术家分析，这个圆孔是工匠们当年特意留出来的，被称为排气孔。这样，陶马在烧制时就不会出现裂痕，同时也减轻了马腿的承受力……”对马青云的解释，里根不住地点头。

离开时，里根又伸手拍拍马后背：“这陶马的制造工艺真令人叹服。”

里根总统猛转身，差点和一个无头俑相撞。”这个俑为什么没有头？”他问。

“俑头和俑身是分别制作而成，待烧制后才组装到一起。这俑头拿下来，也可以装上去。这个俑头没有装上是为了让观众了解俑身内部的情况。”马青云说。

里根眨眨眼，又风趣地说：“那就把我的头给它安上吧。”

众人再度大笑，他本人则笑得最为响亮。

随后，里根凑向陶俑问道：“这俑有多高？”

“1米85以上。”马青云答。

里根抬起右手从无头俑的脖子水平移向自己的脸庞，耸耸双肩，微笑着道：“看来我没有它高。”

参观时间就要结束，李庆伟省长请里根总统及夫人南希在坑中合影留念，并向坑边等待的记者作了个手势。几百架照相机，摄象机一齐对准坑底，里根夫妇站在一起，接受记者的拍摄，大厅再度亮起耀眼的光芒。里根和南希越靠越近，两只手握在一起，里根轻轻捏捏南希的手背，南希反过来按摩里根的手心，作着一种别人不易察觉也无法明白的感情交流。

亮光不断闪烁，坑上的记者们开始为争抢合适的拍摄角度而相互挤抗起来，有一名女记者从栏杆上被挤下，多亏她迅速抓住栏杆的一侧才没有栽入坑底。有机灵者见在此无法取胜，便跑到另一侧架起相机对准里根夫妇，高声喊道：“总统先生转过身来，转过身来。”里根听到喊声，同南希一起转过了身子。记者们又随之哗地涌到旁侧，争抢起拍摄位置。大厅的气氛空前高涨。

预定时间已到，里根携夫人面带微笑，向记者们频频招手致意，在刺目的灯光中走出俑坑。里根走到大厅入口，猛地转过身，对着兵马俑军阵喊了声：“dismiss（解散）。 ”

“噢——”几乎所有的外国记者都哄笑欢腾起来，不懂英语的记者则以为又发生了什么惊人的事情，拼命挤到前方糊里糊涂地跟在里根夫妇的身后，向铜车马展室涌去。

不大的铜车马展室，几乎被记者全部占领，只有一个狭小的空间勉强让里根一行立身。这种对总统人身安全极为不利的环境和氛围，促使马青云必须作简单的解说，以便让里根夫妇迅速离开。

“这车是青铜的吗？”南希听完马青云的讲解，怀疑地询问。在她的眼里，这车马似乎不是古代的青铜制造物。马青云不得不再作补充解说：“不仅车、马、人是青铜铸成，就连马车上的挽具，例如缰绳、笼头以及马头上的装饰也是金质的。车马总重量为 2200 多公斤，由 3462 个部件组成。其中金质部件 700 多件，约 3 公斤余，银质部件 900 多件，约 4 公斤余。这是迄今中国乃至世界发现的最早的挽具最齐全、装饰最华丽的古代铜质单辕车。”

里根夫妇的额头贴向展柜，瞪着眼睛仔细地观察，似在验证马青云的解说。当马青云讲到“车棚盖呈椭圆形，车箱为正方形的构造方式，应证了历史上记载的天圆地方的说法，坐在车中犹如在天地之间的习俗”，里根和南希惊喜地相对一笑，转向马青云。里根总统轻轻地摇了摇头：“真有意思，想不到这铜车马还有这么大的学问。”

里根夫妇尽管此时游兴未尽，在展厅恋恋不舍，但已超过规定时间，不得不迅速离开。在接待室道别时，里根和南希分别签名留念，最后加盖特制的英文和中文并排的印章。

总统的中文名字是：罗纳德·里根。

夫人南希的中文名字是：彩虹。

里根夫妇参观秦始皇陵兵马俑之行，各国新闻界几乎都迅速作了报道，并引起国际性的瞩目。在所有的报道中唯独香港的一家报纸更别出心裁而耐人寻味，大块的文章配有里根在俑坑摸马的巨幅照片，醒目的文章标题是：“里根总统拍中国马屁”。

尼克松被困秦俑馆

1972 年 2 月 21 日，中南海丰泽园一间普通的书房，毛泽东与尼克松两位巨人的手握在一起，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到来，冰冻了 20 多年的中美关系之门由此被打开，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85 年 9 月 5 日，秦俑博物馆接到陕西省外办的电话通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要来秦俑馆参观，他已经身患重病，这可能是他一生最后一次访华，尼克松曾为中美建交作出过努力和贡献，现在他虽然不再是总统，但我们还要按国家元首的最高规格接待。务必做到热情、周到、细致……”

9 月 7 日上午，尼克松一行 20 多辆车驶进秦俑馆。显然，尼克松的来访远没有里根总统气派和威风，倒让人感到有些孤独和冷清。

尽管秦俑馆已作了周密的布署，但想不到的事还是发生了。

尼克松的轿车一进入馆前的广场，就被中国游客围住，使他无法走出车门。保卫的公安人员和武警部队迅速挤进人群，将车门拉开，尼克松才得以走了出来。

“总统好！”有人在人群中高呼起来，尼克松愣怔了一下，没有听懂对方的语言，但他从人们透出的敬慕、激动的眼神，立刻意识到这是中国人对自己的亲切问候。他严肃的面庞立即布满了笑容，潇洒地举起右手挥动着，喊出了同样令游客听不懂的问候：“Ladies and gentlemen（女士们、先生们好）。”

人群越来越靠近尼克松，机警的公安人员和武警战士迅速排成人墙，堵住人群给尼克松闪出一条狭窄的通道。尼克松挥动着手臂，在工作人员的领护下来到接待室。

“非常抱歉，刚才的秩序有些混乱，请总统先生谅解。因为您曾经为中美建交作出过巨大贡献，中国人民一直对您十分尊敬和感激，在中国，就是

普通的百姓也熟悉总统先生的大名并怀有深深的敬爱之情。”中方陪同人员向尼克松作出解释，以免引起误会。

尼克松显然被刚才的场面和陪同人员的解释所感动，他稍微抬起右手，微笑中透出真诚：“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我表示深深地感谢，请代我向广场的人民问候。”

尼克松预定在接待室的时间一闪即过，由保卫人员护送，他走进一号兵马俑展厅。

面对整齐威武、博大壮观的兵马俑军阵，尼克松脸上的笑容消失殆尽，闪亮的眸子静静地注视着坑中的一切。突然，他转向身边的女讲解员问道：“美国有哪些总统来看过兵马俑？”

“第一位是副总统蒙代尔，时间是1979年8月，第二位是总统卡特，时间是1981年8月，第三位是里根总统，时间是1984年4月，您是第四位光临秦俑馆的总统。”马青云流利地回答。

尼克松轻轻点头：“这的确是个神秘而又吸引人的地方啊！”他的声音很小，似乎是在说给自己听。

他的脚步很轻很慢，似乎怕惊动这支地下伏兵而杀将上来，使自己遭到不测，他的面庞没有笑容，神态严肃而沉重。他的内心分明被这威严的军阵气势所震撼。

“1972年，当我第一次登上八达岭长城的时候，我就曾说过那是一座伟大的建筑，人类文明的奇迹，地球的标志。今天见到了秦代兵马俑军阵，它给我的感受和长城是一样的。”尼克松仍在自言自语，声音小得难以令人听清。

其实，他对登长城的感受只是说出了表面的一部分，而潜藏在心灵深处的强音则由于环境的制约而不能表述：“美利坚合众国面对的是一个世界历史上最有潜力的国家，因此必须作出一切努力同中国搞好关系。”

透过尼克松那双深沉、凝重和略带惊觉的眼神可以窥测到，面前的兵马俑军阵给他的震撼要比长城给予他的感受更为沉重和丰富。

尼克松的参观，一切按接待里根总统的规格和方式进行。只是由于游客不断地向这位美国总统高声问候而几次停止讲解和观看。40分钟的预定时间在匆忙中悄悄流逝。

尼克松来到接待室作最后的道别。工作人员递过特制的留言簿，请他签名留言。尼克松满怀激动之情，写出了或许在心中酝酿了几十年的内在感受：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参观中国的过去，也有机会看到中国的现在，而且意识到未来中国的潜在力量。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来一百次也不能对它全面了解。对维护辉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尼克松走出接待室，但广场上的游客仍没有散去，他们已在这里等候了40多分钟。

尼克松又陷于人群的包围圈。广场上的游客越聚越多，形成了人的海洋。尼克松像一只孤独的小船在无际的海洋中颠簸、漂荡。

“总统好！”人群又开始高呼起来。

尼克松挥动着右手，紧跟保卫人员前行，寻找自己的轿车。

“尼克松总统万岁！”不同的呼喊越来越响。恰在这时，一个美国旅游团来到秦俑馆广场。几十名男女游客见到尼克松，也向人群挤去，尼克松面前又出现了令他熟悉而亲切的乡音：“presi-dent Mr. Nixon（尼克松先

生好)。”

尼克松被保卫人员簇拥进轿车，但车已无法开动。人群潮水样拥在车周围。黑头发、黄皮肤，白皮肤，黄头发，不同的种族发出了相同的声音：

“尼克松总统万岁！”

“President Mr. Nixon。”

保卫人员不停地驱推人群，轿车缓缓启动，尼克松此时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推开车门，再度站起身来向人群招手致意。最后他终于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眼窝渐渐发热、发红。他猛地钻进车中，想尽力掩饰那双湿润的眼睛，但泪水还是悄悄地涌了出来。

1972年，当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历史性地握手后，在返回美国的专机里，尼克松曾为飞机着陆华盛顿之后，美国两党和公众对自己的访华行动所采取的态度而烦躁得脸色发青，差点昏倒在坐舱内……

“水门事件”的爆发，尼克松总统被迫辞职……

但是，具有长远政治眼光和超人智慧的美国国务卿、尼克松总统的得力助手基辛格，曾对尼克松的功绩作出了如下预言：“未来将比现在更公正地对您此行作出评价。”

历史证实了基辛格当年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流逝，尼克松为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已被广大的人民所认识和牢记，他本人也更加受到人们的敬爱。

尼克松在中国秦俑馆的经历，便是对这位历史伟人的功绩生动而形象的评述。

盲人摸俑

1987年夏，国外一批20多人的盲人参观团来到秦俑馆参观。接待盲人参观团，秦俑博物馆尚无先例。

盲人参观团的人员年龄均在60岁以上，其中有两位已年过八旬。当然，负责护理的十几名姑娘却正值青春妙龄。

秦俑馆工作人员以最大的努力给予这帮特殊观众以热情周到的接待。当他们来到一号俑坑展室时，随着讲解员的解说，他们不断地点头，脸上泛出兴奋的光彩。所有的参观者中一个额头上凸着紫红色青包的老太太最为活跃，而额头上的青包也正是由于她的活跃，在北京街头和一棵树相碰留下的纪念。

讲解结束，参观团陆续退出大厅。从他们的面部表情，看得出各人的心中仍装有一份遗憾。

“我冒昧地提出来，能不能让我们摸一下兵马俑？”接待室里，盲人参观团团长为接待人员提出了个难题。

博物馆领导一研究，对这些特殊的外国盲人应特殊接待，尽量满足他们的请求。但一号坑是不能让他们下去的、一旦这20多位盲人进入站立的秦兵马俑军阵，后果可想而知。唯一可行的是到修复室去摸。此时修复室正在修复一匹陶马和一件陶俑。兵马俱有，摸后的感觉应该是和坑中的兵马俑军阵相同。

20多位盲人被搀扶着走进修复室，工作人员先把俑头放在他们手中，让盲人一一抚摸。随后分成两组，一组摸陶马，一组摸武士俑。盲人们颤抖着如枯树枝样的手，在陶俑和陶马的上部小心地摸起来。最后几乎所有的盲人都跪在地上紧紧地抱住陶俑、马的腿。

“看到了，看到了，全看到了……”八旬老盲人搂住一条马腿，呜咽着叫喊起来，浑浊的泪水在沧桑与苦难雕刻的脸上唰唰淌下来。那个额头上凸着紫青色包的老太太，抓住武士俑的一只胳膊，将额头依偎在陶俑的胸膛，眸子里闪烁着激动的泪光，像个饱受委屈的孩子向 2000 年的老人倾吐人生的艰辛。真诚与凄惋之状，令身边的接待人员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特殊的参观结束了。20 多位外国盲人游客不住地躬身，泪水涟涟地向中方工作人员致谢：“我看到了，看到了中国的伟大，看到了中国人民友好善良的心……”

对于盲人的热切话语，工作人员并不怀疑，他们确实看到了，看到了古代中国的杰出艺术，也看到当今中国灿烂的阳光。自然，他们是用心灵来看待这一切的。或许，心灵的观察和感受要比眼睛所看到的更为深刻、真实和接近生活的原貌。因为，当残疾束缚着人的生命时，人的内心世界会发生奇特的变异，残疾的制约使他们在生命的跑道上内心变得更为强悍和机敏，生活中的一切细节都能触动他们敏感的神经和细腻的情感。透过别人的语言和行动，他们会更深刻地感到真实和可信的是潜藏在心灵深处的人的价值、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的完成与实现。

怀抱骨灰盒来秦俑馆的人

1988 年 11 月 15 日下午，秦俑馆的游客正处于高峰期。一个中等身材的青年夹杂在人群中走进一号兵马俑展厅。当要接进俑坑时，他突然从手提兜里掏出一个方型的盒子。这刹那间的非凡举动立即引起了保安人员的注意，并疾步向前将他截留。

“这是什么东西？”保安人员眼里透出警惕的光。

青年人没有吭声，低着头呆呆地望着手中精制的方盒，眼里流出了泪水。

迷惑不解的保卫人员将其领进接待室，交给接待组长吴晓延过问此事。

事情已快明了。

青年人叫傅盛智，是安徽省芜湖市造船厂工程师。手中的方盒不是保卫人员怀疑的爆炸物品，而是盛放着他的爱侣骨灰的骨灰盒。无疑，这当中会有一场奇特的悲剧。

悲剧和秦俑博物馆并没有联系。

1988 年 10 月底，傅盛智的妻子。芜湖市计量局工程师李晓梅，和她的几个同伴踏上了开往古城西安的列车，去参加国家计量局在西安召开的会议。行前，她颇有几分激动地同丈夫商量趁这次机会要去看看兵马俑军阵的风采和华山的奇险。这是她久藏心中的愿望。

会议召开前的 3 天，她和同伴就早早地离开安徽，途中下车登向了华山险峰。领略了华山的陡峭险峻。观看了日出的磅礴美景后，她随两个同伴向山下走去。

华山奇险，一位女伴脚脖扭伤难以行动，多亏女伴的男友就在身旁。在他的搀扶下，三人缓慢前行。

李晓梅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同伴前面。上山与下山的人多得如同搬家的蚂蚁。李晓梅的面前出现了三叉路口，她不加思索地选择了一条看似平坦的石路走去。而后边的两位同伴在混杂的人群中没有发现李晓梅的去向，便沿另一条自认为易行的道路行进。

也许从这时起，悲剧的帷幕拉开了。当两位同伴回到山下他们住宿的旅馆时，却不见李晓梅的身影。他们赶忙向服务员询问，得到的回答是肯定没

见她回来，尽管这时他们有些焦急甚至两人有些担心，但远没有预料到事实比他们想的更为悲惨。两人不顾疲劳和伤痛，沿路返回寻找。直到他们将要到达华山顶峰，仍未见李晓梅的影子。

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他们在极度忧虑中向华山派出所报告。华山派出所立即派出干警四处寻找。

当夕阳的余辉落在整个华山时，李晓梅被找到了，她躺在道边的丛林里静静地闭着眼睛永远告别了人世。

据公安部门侦查鉴定，李晓梅系被活活掐死的。悲剧的起因是罪犯图财害命，还是欲实施强奸则没有一致的结论。

电报拍至安徽芜湖，傅盛智匆匆赶来，经历了一番痛苦的精神折磨后，他强抑哀伤将妻子的遗体就地火化……

现在他抱着爱侣的骨灰盒来到秦俑馆，是为了让妻子完成生前要参观兵马俑军阵的心愿……

接待室内，傅盛智声泪俱下地问：“我能不能带着妻子的骨灰盒进去看一眼？”

“可以，但现在游客太多，你先喝点儿水，在这里等一会儿再去吧。”吴晓延极为同情地当场回答。

游客渐已离去，傅盛智在吴晓延和讲解员陪同下，怀抱骨灰盒来到兵马俑展厅。

讲解员轻抚了下骨灰盒压低声音说：“李晓梅同志，我为您的不幸遭遇而感到痛心。尽管您已去世，但您仍是我们心中最亲爱的观众，愿您的灵魂能看到兵马俑，听见我的讲解。”

讲解员像往常接待贵宾一样，对兵马俑的历史价值、艺术成就、军事意义无一遗漏地作了声情并茂的解说。

傅盛智被深深感动了，热泪刚刚地淌下来，滴落在怀抱的骨灰盒上。他用沙哑的声音轻唤道：“晓梅，你听到了吗？这坑有多大，俑有多威武……”

随着傅盛智一声声呼唤，讲解员渐渐停止了解说，眼睛潮湿了。

“参观”结束了，傅盛智看看手中的骨灰盒，又望望兵马俑军阵，呜咽着说：“能不能让我在这儿照张相？”

讲解员拭去眼角的泪珠说：“按规定兵马俑大厅只有国家元首参观才能拍照。不过你的情况特殊，我请示一下领导再回答你。”

讲解员来到了已成为博物馆馆长的袁仲一的办公室，说明了一切。

“不管怎么说，他爱人是在陕西境内遇难，咱们该满足他的要求，以慰藉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让他照。”袁仲一说着，和讲解员一起来到展厅看望傅盛智。同时派人将博物馆陈列部的摄影师高玉英请来为傅盛智和他的亡妻拍照。

随着闪光灯的闪烁，诞生了一张特殊的照片，也留下了一个让我们难以忘却的故事。

作家三毛观秦俑

1991年1月4日，海内外华人世界享有盛名的台湾女作家三毛，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用丝袜将自己吊死在浴室的挂钩上，结束了她那辉煌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三毛猝世震惊文坛！三毛死因神秘莫测！海内外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探寻这位女作家的死亡之谜。最早风传的是三毛自感身患癌症，而在无奈中自杀，但很快遭到台湾荣民总医院主治医师赵灌的否认。因为二毛患

的不是癌症而是因荷尔蒙分泌紊乱导致的子宫内膜肥厚。这一症状医护人员早已同她讲明，而三毛也并未表示怀疑。事实上，在手术后荷尔蒙分泌已恢复正常，三毛的情绪也随之乐观和兴奋，直到她自杀之前都没有发现有异常的情绪波折。

猜测否定后，又有人认为三毛与西班牙籍丈夫荷西曾有过的一段浪漫而热烈的生活而使他终生难忘，但随着 1978 年荷西在西班牙潜水作业中命归大海，她的心灵受到重创，从此一蹶不振，遂产生自杀念头。而在她的生命之灯忽闪忽灭之时，大学时期一位男友曾想竭力填补她心灵中感情的空白，但终因不能挣脱家庭妻小的羁绊而不得不含恨放弃。从而更增加了三毛自杀的决心。有的报刊则把三毛自杀之因完全归根于她所编剧的《滚滚红尘》在金马角逐中最佳编剧的落选……

三毛自杀莫衷一是，众说纷坛。随着报刊在世间的纓纓飘落，三毛生前的著作和后人她撰写的著作铺天盖地拥向书店、书屋、书摊、书市，一时间到处充斥了《三毛自杀之谜》、《三毛、三毛》、《哭三毛》、《哭泣的骆驼》、《温柔的夜》……有的出版商干脆把钢笔字帖也全部印上三毛爱情小说的精彩片断。三毛的名气达到了她生前远不能及的高度。

可惜，这出版商的本意似乎并不在专为这位女作家的陨落而痛惜、哀思和怀念。这雪片样飞落的报刊、书籍所引起的轰动效应，恐怕也绝非三毛的亡魂所喜爱的和所情愿的。

当我赴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采访之时，听到的除兵马俑的议论之外最热门的话题依然是海湾战火与三毛之死。因为海湾战争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来过秦俑馆，他们的巨幅照片仍完好无损地张贴在馆内的橱窗上，这就不能不让人更加关注海湾战争和战争中主要人物的命运及最后的结局。而三毛本人从离开秦俑馆到自杀身亡，也仅仅才过去了几个月的时间，短暂的历史烟尘并没有完全掩饰她在秦俑馆的足迹。她的音容笑貌、忧郁神态依然在和她所有接触过的秦俑馆工作人员心中清晰可辨。也许了解了这位作家在秦俑阵前的所思所感，她的自杀之谜就更容易解开了。

这是一个无风无雨静静的夜晚，我在秦俑博物馆暂住的房间里，面对一位漂亮而又才华横溢、多愁善感的小姐，静心地听她讲述关于作家三毛与秦俑馆的故事——

去年 4 月 11 日下午，我正在秦俑馆忙着接待游客，无意中见到一个气质非凡光彩夺目的女人，便忍不住多看了她一眼。这时我发现她胸前挂着一个长命锁，立刻意识到她可能是台湾女作家三毛。因为对她的书我非常喜爱，能够找到的几乎都读过，其中在她的一本书上就画有这样一把长命锁。图的下面是三毛的亲笔字“我的宝贝”。她看见我在她面前愣神，立即冲我作了个手势，面带微笑嘘了一声，示意我不要声张。就在这一刹那，我感到她聪明过人，便不由自主地仔细观察她的一切。她的穿戴很普通，黑底暗花的服饰给人一种简明爽快的感觉。她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是因为透过这简单普通的服饰，让人感到她内心所散发出来的一种独特魅力。在众多的游客中，我很少为某个人而留神。哪怕她花枝招展抑或是雍容华贵，都难引起我的特殊关注。但三毛不同，我见到她的第一眼，就被她特殊的气质征服了。这种奇特的感觉或许来自对她作品的爱恋和对她人生命运的同情。

我最终还是忍不住向前问道：“您是不是……”

“就是，就是。”未等我说完，她就抢先作了回答。

“能不能……”

我的话还没完，她又抢先回答：“可以，可以。”

我越加佩服她的机敏与聪明。

“转过身来。”她说，有一种潇洒、爽直的感觉。

她拿出一张精制的硬纸铺在我的肩上，签了她自己的名字微笑着递给我，匆匆向展厅走去。

她的步子非常大，走路非常快。在我所见到的游客中，很少有像她这样潇洒而充满精力和具有自信心的人。她的出现使我想起了《撒哈拉的故事》。我仿佛看见她用自己的健步跨过撒哈拉大沙漠和五大洲千山万水时那矫美的身影。前行道路上一切的阻碍和险恶，都在她的坚强意志和奋力跋涉中变得渺小与平坦。

在大厅里，面对兵马俑军阵，她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惊奇和一味地赞美如何伟大了不起。她很少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讲解员的解说。但看得出她内心的情感波动比其他人更加强烈。她原本就有些憔悴疲倦的面容又增添了一层深沉和凝重。我想这时候她看到和想到的也许不会仅仅是中国的古代文明和世界奇迹，更多的则会是关于人类生死的困惑和爱的痴迷，以及对人生主题意义的思索，同时她也一定会想到作为人类一员的自己所苦苦寻求的生活真谛和最后归宿。秦始皇陵兵马俑给予她的深切感受一定不是生活的永恒而是生命的死亡与再生。

当三毛走出展厅来到篆刻图章的小卖部时，有一个衣着华丽看似气派非凡的妇人也走了进来。三毛低着头默默地观看面前的一切，那位贵妇人横在柜台中央，态度傲慢地对年轻的女服务员嚷道：“师傅，你的图章怎么刻？”服务员礼貌地作了回答。贵妇人递过一张纸条，气势依然咄咄逼人：“就按这个名字这种样式刻，要赶快刻，刻好后送到××宾馆第五层412房间，不要耽误。”

我望望三毛，又望望这位贵妇人。忽然觉得人的差异如此之大。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贵妇人的身材是那样肥胖，服饰和打扮是那样华美，神态又如此旁若无人和沾沾自喜，相对瘦弱和穿着朴素的三毛，她应该更能令人注意。但在注意贵妇人时除了心中的愤慨再也没有什么值得记忆的东西。因为人的伟大在于真善美的集中统一。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越发感到三毛的真正魅力，并对她多了一份心愿，愿她生活得更富有和更美好。

三毛要走了，我觉得应该送送她。当她一旦发现别人非常喜爱她时，她便像孩子一样给人一种更加亲切和善良的馈赠。她突然伸开双臂，紧紧地将我搂在怀中，亲吻着我的头发和面颊。我的身心受到强烈的震颤，我蓦地产生了一种感觉，这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这种感觉催人泪下，像她这样一位善良多情的女人，为什么命运总在捉弄她，使她饱受了人世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她曾因数学成绩平平而遭到同学的讥讽和老师的侮辱，不得不在家独自一人面壁七年。她曾遭到一位不良男子的骗婚而无脸再见亲朋好友，不得不离乡背井、浪迹天涯。她曾与荷西在沙漠里度过了欢快、浪漫的眷属生活。但随着荷西的去世，她又坠入了生活的低谷，命运之神又向她伸出了残忍的手，扼住了她喘息的咽喉，以致使她恶梦连绵，憔悴不堪……我无法抑制情感的闸门，我的泪水潜然而下。

“噢，这是泪水。”三毛动情地望着我的脸颊，掏出手帕拭去我的泪水。她转过身走到将要开动的旅游车上，从自己的包里找出一个黑色的皮夹子走

过来：“我想把这个送给你作为纪念。”她的眼睛有些湿润，她低下头不再看我，以此掩饰她内心情感的波浪而不在这种时刻失态。

她送我的夹子很旧，里面残留着几页她的手迹。这无疑是陪伴她度过千山万水的心爱伙伴。由此我更加对她的真诚和善良多一份敬爱。

我觉得我应该回赠她一点礼物，我从旁边的小卖部里暂借了一本价值 25 元的兵马俑画册送给她。也就在要握手言别的时候，我的一位同事却在不远处高声提醒我：“你怎么把这么贵重的礼物送给她，这不是吃亏了？”

这位同事的话被三毛和车上的台湾人清楚地听到了。我的头顶如轰然响起炸雷，我感到无地自容。我想当场谴责她，但终于没有付诸行动。也许我们太贫穷了，贫穷得在人的交往中为一分钱的得失而费尽心机去盘算，其结局却是人的情感、情谊越发冷漠和淡远。我记得三毛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其实台湾人也不是大陆人所想象的那样富裕。”在这贫穷与苦难的进程中，人应该注重物质但更应注重情谊。物质可以买到，真正的情谊是金钱所难以买到的。

握别的时候，她的眼角挂着泪珠，她告诉我：“也许在几个月之后我还要回来看看你的。”

然而，我等到的不是她的归来而是关于她自杀的噩耗。

我觉得她的死因一定像她说的一样：“我很累、很憔悴、睡不着觉。晚上时常做恶梦，像是生活在梦中。”她感到自己在折磨自己、空耗生命，在漫漫长夜里她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为此她痛不欲生。她确信这一个个恶梦都是上帝为她安排的生活方式，自己只是一种简单的形成。在这个短暂的形成中，她经历了她所能经历的一切，完成了自己所要完成的事情，她感到她已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这生命之灯忽闪忽灭时，她希望获得新生，而这个新生必须通过死亡去获得。台湾人对宿命论和人的生死转换的宗教理论是极为信服的，那么她渴求新生的寄托就是自杀，她把自杀当作寻求新生命的唯一形式，这种形式不是消极的，而是一种毅力与精神的再现。人的一生一世不只是怎样面对生存，且还有如何对待和进入死亡。三毛的溘然长逝，是超脱于尘世的对生活和生命自身更高层次的拥抱。我等待着她的新生，等待着她的到来……

漂亮的小姐说完她要说的这一切，泪水盈满眼眶，我在递给她一条毛巾的同时，竟觉得自己的眼睛也有些发烫。明亮的灯光下我们相对无语，静静地为三毛的去世而祈祷。

送走面前的小姐，已是凌晨三点多钟。夜色依旧黑暗无光，四周出奇地宁静，世界依然安详地沉浸在温馨的梦中。望着长空中一颗飘逝的流星，我在心中轻轻地呼唤着——

归来兮，三毛。

第十章 将军俑头被盗案

这一人类文化唯一的古迹，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感谢中国领导者、人民大众以及专家们为人类挽救了这稀世珍宝。

——欧洲自由民主党联盟主席维利·比克莱克

令人困惑的消息

1987年5月26日，新华社发出了一条电讯：“记者从公安部获悉，今年2月17日，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中一个保存在秦陵考古队仓库的将军俑头不翼而飞，至今下落不明。3月27日西安市公安局抓获了一名以1万8千元价格出售一秦武士俑头的犯罪分子，当向秦陵兵马俑博物馆和考古队询问关于这个犯罪分子出售武士俑头的情况，这两个单位竟谁也不承认是自己丢失的令人困惑的消息起源于考古队和秦俑博物馆的内部变革。

为避免发生像铜车马出土时那样的混乱局势和纠纷，也从更有利于秦始皇陵园的考察、发掘、保护诸方面考虑，1984年陕西省文物局报请当地政府和国务院批准，以920万元的代价将秦始皇陵园及四周的土地全部征用。不久，陕西省文物局撤消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坑考古队，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秦始皇陵园考古队，两个不同的名称意味着考古事业不只局限于兵马俑坑而是走向整个陵园。

根据新的情况和工作的需要，省文物局对秦陵考古队的人员作了如下安排：

队长由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石兴邦兼任。

副队长由原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主任王学理担任，主持考古发掘的一切事务。队员有原秦俑考古队的程学华、屈鸿钧、王玉清和新补充的张占民、张仲立、刘占成等人组成。

原秦俑考古队的其它人员都重新回到原单位工作，不再参与秦陵考古队的一切事务。

为理顺秦俑考古队、秦陵考古队、秦俑博物馆三家的关系，防止发生混乱和出现纠缠不休的问题，1985年11月29日，陕西省文物局专门下发了一个被称为66号的决定性文件：

关于秦陵考古队移交问题的决定

省考古研究所、秦俑博物馆、省博物馆：

为了迅速做好秦陵考古队与秦俑馆、省馆等单位之间的移交问题，我局与上述单位负责人召开了专门会议，现将会议通过的有关决定下发给你们，请你们督促有关人员按此决定加紧完成有关移交手续，以便秦陵考古队早日开始发掘工作。

一、修复二号铜车马购置的设备、工具及剩余材料等全部移交给现铜车马修复小组。二号铜车马本身及全部文字、照片资料交给秦俑馆，其文字、照片资料复制一份给秦陵考古队。此项工作限于十二月五日前完成。

二、一号坑内已展出的五个方内全部出土文物（包括南北展室的全部文物），由原考古队移交给秦俑馆，未修复的秦俑由秦俑馆负责修复、复位及五个方的安全、卫生工作。该项工作由杭德洲牵头交，马秀青接、限年底以前完成。考古队编写发掘报告时所需文物。由秦俑馆负责提供。报告编好后给秦俑馆留一套副本。

三、省博物馆原借秦俑考古队的文物，开出清单交秦俑馆保存，文物归省博物馆所用。此项工作限于十二月五日前完成。

四、原考古队将所有文字、照片资料一式三份，分别移交给秦俑馆，省文管会和现秦陵考古队，该项工作由杭德洲牵头，限年底以前完成。

五、原考古队修建的东台以东房屋交秦俑馆，秦俑馆在考古队西部（三号坑以东）盖给考古队同数量房交考古队使用。原考古队占秦俑馆房屋一律退还。

六、原考古队房屋购置的设备交现秦陵考古队，该项工作限十二月十五日前完成。

七、财务移交按我局发（85） 85号文件规定办理。限于年底前完成。各接交单位务必按上述决定按期完成各项移交工作，逾期不交者要追查责任。

陕西省人民政府文物事业管理局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随着移交工作的进行，将军俑头和武士俑头被盗案的发生，以及后来发生的许多意想不到的故事，这份号称[85] 66号文件也就更为重要和不可缺少。而关于新华社发出的电讯和所引起的困惑，也只有等到将军俑头案破获之后才能解开。

将军俑头不翼而飞

1987年2月18日晨，秦陵考古队学员（从当地农村招来帮助考古人员工作的临时工）赵永峰发现考古队西边的仓库门开着，好奇地向前观看，当他发现门锁脱落后，立即意识到什么，立即向居住在不远处的考古队员刘占成报告。刘占成听后先是一惊，随之跑到仓库门前仔细观察，一切迹象表明房门是被撬开的，房内放置的东西可能被盗。

此时考古队副队长王学理正到北京出差未归，刘占成急忙找到考古队员王玉清、孟占先商量后，决定立即向驻地派出所报案，同时派考古队学员杨团生赶往西安去找考古队员屈鸿钧，因为他拿有库房钥匙并知道房内存放文物的情况。

派出所指导员王登民接到报案，立即赶来察看现场。这是三间一通的简陋库房，内有钢筋、汽油桶、水管、木板等杂物。显眼的是有两匹复制的陶马，而北墙根一块朽木上则放有一个出土的秦俑武士头。

“丢失了什么东西？”王登民问。

“房内的具体情况我们不知道，钥匙由老屈掌管，我们已派学员到西安询问，等回来就知道了。”刘占成回答。

王登民只好派人将现场保护起来，等待西安方面的消息。

这边派出所和考古队的人员心急如火，而派往西安的人却泥牛入海，直到夜幕完全笼罩了大地也没见他回来。

第二天上午，派往西安的杨团生终于回来了，他没有去找考古队员汇报，而是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样走进自己平时工作的修复室和几个人闲聊起来。

刘占成得此消息，立即赶往修复室找到正在拿着一个馒头啃吃的杨团生。

“昨天找到老屈了没有？”刘占成显然是带着怒气询问。

“难找得很。我先去省博物馆他的家，没有任何人，别人说他生病住院了。后来我等他老伴回来，才一起到陆军医院找到了屈老师。”杨团生嚼着馒头，一吞一咽地说。

“你屈老师说啥？”刘占成焦急地问。

“屈老师说那个房子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只是几块木板，有一点钢筋、钢管，他还说有一个俑头。”杨团生依旧不紧不慢地回答。

刘占成仍不放心地问道：“你问他登记清册，他怎么说？”

“清册？”杨团生抬起头稍作思考：“屈老师说清册他记不清了，不知有没有，即使有，在西安房子还是在工地房子也记不清了，再说一时也难以找到。”

刘占成把情况再次向派出所汇报，并一同到仓库复查了现场。既然俑头尚在，其它的破铜烂铁被盗也就无需大惊小怪，于是派出所便以一般盗窃案立案。

刘占成、王玉清派人把房门重新钉好封严，只等队长王学理和屈鸿钧来后再作处理，事情似乎极简单地了结了。

五天之后，刘占成到西安出差，顺便到来医院探望屈鸿钧的病情。

“前几天的事儿好险，仓库被撬，罪犯也没抓到，多亏武士俑头还在，要是把这个俑头丢了，事情可就大了。”刘占成如释重负地随便聊着。

“那个将军俑头呢？”屈鸿钧躺在病床上问。

“啊？！”刘占成一下站起来，惊瞪着眼睛，忘记了是在病房还是在自家的客房，大声呼叫起来：“你老汉可要说清楚，到底是几个头？怎么杨团生回去说就一个头？”

屈鸿钧从刘占成心理的变化中意识到了什么，他挣扎着坐起来打着手势说道：“我跟他说是两个头，一个是将军头，一个是武士头。武士头在房北的木板上，将军头在南边的油漆桶上。”

“完了！”刘占成拍了下大腿，顾不得再说下去，走出医院立即赶往省考古研究所找到已成为副所长的袁仲一报告：“老屈说仓库里两个头，可我们只发现了一个，很可能那个将军头丢了。”

袁仲一听后，大惊。立即找到考古所石兴邦所长汇报。这一天，王学理也从北京赶回西安。

第二天一早，省考古研究所派车将石兴邦、王学理、刘占成拉到秦陵考古工地。刘占成一下车忙找到王玉清打开仓库重新安装的锁。

“赶快查找将军头。”几个人说着争先恐后地拥入库房四处寻觅，然而，除一个武士俑头瞪着眼睛似在讲什么外，没有发现将军俑头的踪影。

“完了，现在看来将军俑头被盗了！”几个人紧张而不安地叹着气走出库房。

秦陵考古队立即把丢失将军俑头一案向临潼县公安局写了报告，并分别抄报当地派出所、省公安厅、省文物局。2月28日，临潼县公安局派出两名刑侦技术人员到现场勘查，省文物局保卫处也迅速派出工作人员到考古队调查。3月5日，省公安厅、西安市公安局、省文物局和考古研究所的领导人一起分析了案情，决定由西安市公安局会同临潼县公安局共同破案，并迅速成立了专案小组以尽快破获此案。

为破案悬赏 150 万

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近八千件陶俑中，将军俑仅为六件，因此它的价值也就越发显得珍贵，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堪称无价之宝。

将军俑头的突然失踪同将军俑的发现一样震惊了世界。

就在公安人员迅速投入破案行动的同时，国内外的文物走私分子也纷纷

行动起来，并企图抢在公安人员破案前将文物偷运国外。据公安部情报部门获悉，有两个国外文物走私集团已潜入中国境内和国内的走私犯罪分子联系，四处寻找将军俑头的踪迹。

面对严峻的形势，公安部在广州召开的反文物走私犯罪活动的座谈会上，命令陕西迅速破案，一位领导甚至说：“谁破获了将军俑头案，就可以奖给他 150 万元。”在座的公安人员都知道，悬赏 150 万似乎不可能，但公安部领导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一场国宝争夺战，在关中大地拉开了帷幕，到底头落谁手？

1987 年 3 月 8 日，西安市公安局终于得到了一条线索，本市黄某有文物走私嫌疑，即对其依法传唤。在审查中，黄某对他的犯罪活动百般抵赖，满不在乎，对公安人员的审问采取了问东答西、避重就轻，或者死不开口的态度。公安人员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位狡猾而富有经验的对手。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这是古人留下的遗训，面对黄某的出色表演，必须改变战略和对策方能取胜。

公安人员在采取了从黄某的只言片语中寻找蛛丝马迹的同时，瞅准了他的心理和生活中的某些弱点展开攻势，终于使他流着热泪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作出了忏悔：“我有罪，我对不起政府，对不起父母双亲、老婆孩子，我的问题这么严重，你们不打不骂，教育我，启发我，从生活上关心我。我再不向政府交待问题，就是罪上加罪……”

看来世上并没有刀枪不入的人，黄某一口气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提供了陕西省金属结构厂职工肖建国有一秦俑头准备倒卖的重要线索。

专案组及时将这一情况向市局和省公安厅领导人作了汇报，并经过研究分析，肖建国要倒卖的秦俑头如果不是复制品，一定是秦陵考古队丢失的那件国宝将军俑头。

根据黄某的犯罪事实和他交待尚好及愿立功赎罪的要求，经市公安局批准，决定将其取保候审并发展为专案特情人员。

3 月 18 日，根据专案组的指示，黄某找到肖建国详细了解了俑头的情况，得知肖正在四处寻找买主，想尽快将俑头脱手。

市公安局领导人和专案组经过研究，提出了一条：引蛇出洞，欲擒故纵的侦破方案。指使黄某不露声色地为肖寻找买主。

经过黄某的数次寻觅、联系、终于找到了一个走私集团愿买俑头，黄某又以中间人的身份和肖建国具体磋商，最后达成了以两万元的价格成交的协议，并定于 3 月 27 日 12 时在西安市西郊公园当场付款交货。

专案组得到黄某的确切情报后，立即作了张网擒敌的布署。27 日上午，数名公安干警身着便衣，按照事先的安排提前进入指定的位置，等待肖的到来。

11 点 30 分，肖建国怀揣一把锋利的剪刀，将陶俑头放入黑提包内，走出家门骑上一辆三轮摩托车向西郊公园赶去。

为避免公安人员发现，肖建国不时地停车到隐蔽的角落更换衣服，向西郊公园急奔。

在通往西郊公园的必经之路长乐坡交通检查站口，一个公安人员化装成交警正在值勤，周围埋伏了数名便衣公安干警，准备在此将肖擒获。

对讲机传来沿途盯■公安人员的报告：“肖犯已到三号方位”，“肖犯已到二号方位”，“肖犯已到一号方位，请注意，车型为半旧的三轮摩托车，

肖犯身穿……”

肖建国已到交通检查站跟前，“交警”根据报告的情况，立即将一辆三轮车截住，令其驶到路的旁侧，肖建国无可奈何地跳下车，怀揣一颗怦然跳动的心惊恐地注视着“交警”。

“伙计，我用一下你的车到前面拉点东西，只需十几分钟，你看怎么样？”扮成交警的公安人员问。

肖建国稍作沉思，牙齿轻轻咬了下嘴唇：“好吧，用完后你把车放在这里就行，我先到前边商店转转。”说完来到车后，从车厢的杂草中拽出一个黑色提包。

“交警”看到肖建国提起那个包时格外小心，似乎里边的东西比较重，立即作出了俑头就在包中的判断，他当即摘下头上的帽子在手里转了一圈。这是行动的信号。

几支乌黑的枪口突然出现在肖建国的眼前，数名公安人员已将他死死困在中央。

“打开你的包。”公安人员命令着。

肖建国没有动作，两只眼睛四处窥探，以寻找突破口企图逃跑。

“打不打。”枪口已抵于前胸。肖建国长嘘一口气，打开了黑提包，俑头显露出来，肖建国当场被捕，而在西郊公园等候的走私集团也相继落网。

经省文物鉴定小组鉴定，肖建国倒卖的俑头确属真品，但不是公安人员苦苦探寻的将军俑头而是一个铠甲武士俑头。

武士俑头的出现和将军俑头的失踪一样，使公安人员陷于困惑。为解这个疑惑，公安人员到秦俑博物馆和秦陵考古队询问，这个俑头是属于谁的，但两方都不承认是属于自己负责的文物。于是，新华社于5月26日发出以上那个令人困惑的消息。

神秘人物和女房客

既然公安人员缴获的武士俑头找不到失主，也就不再顾及秦俑馆与考古队之间的是是非非，还是把主要精力用于追踪将军俑头，以期尽快破获这个举世震惊的要案。

西安市公安局经过苦心孤诣地反复研究后，终于确定从三个方面展开攻势：除对已破获的武士俑头案案犯肖建国等犯罪分子的所作所为深挖细追外，对临潼县及秦俑馆周围的走私、倒卖文物的违法分子进行排队摸底、深入调查，同时指挥秘密力量主动出击，发现并控制西安市常去秦俑馆附近收购文物的不法分子。

一张巨网在看不见的关中大地撒开了，接下来的便是走私与反走私，追踪与反追踪的国宝大角逐。

经过三管齐下，第一方面的力量在对肖建国的攻势中有了明显进展。肖建国除全部交待了作案经过外，同时供出了一个只知姓氏和籍贯的神秘人物。但这个神秘人物是否与将军俑头被盗案有关，肖建国也不曾知道。

看来只有找到这个神秘人物才能水落石出，舍此别无选择。

专案组再次行动，在茫茫人海里寻找神秘人的踪迹。西安古城的大街小巷到处散落着身着便衣的公安人员，利用一切可能采用的侦查手段实施公开与秘密的侦查。西安市监狱、看守所、法院、检察院所有关于走私犯罪分子的档案都被一一翻阅。然而，近两个月过去了，这个神秘人物没有露出一蛛丝马迹，侦查工作陷于困境。天无绝人之路，希望正潜藏于绝望之中。6

月6日，专案组接到了省公安厅转来的福建省晋江县刘某的信，信中揭发西安市某单位经理有经济诈骗和倒卖文物的问题。公安人员按照刘某提供的线索，很快找到了这位经理，经审查得知，这个经理正是公安人员两个月来踏破铁鞋而始终未觅到踪影的神秘人物。遗憾的是这位神秘人物数次倒卖文物及与肖建国来往情况属实，但与将军俑头案无关。从审讯中得知，这两个多月来他也在四处寻觅将军俑头的踪迹，只是未得到一点线索，而和他有走私联系的两个倒卖文物集团，也已在陕西及沿海海岸撒网，四处探寻将军俑头的下落，但同样地没有得到丝毫音信。面对神秘人物的供词，专案组人员的心情更加紧张和不安，万一这时将军俑头已出境怎么办？如果连老祖宗留下的一个泥头都找不到和追不回，堂堂公安局还能干点什么？身穿警服，腰挂手枪、警棍的公安人员还有什么用处？

将军头，你在哪里？

神秘人物的确神秘莫测。在审讯中公安人员发现此人出奇地聪明灵活，胆识兼备，绝不同于一般罪犯所流露出的那种自以为聪明实则愚蠢的小家气度。无怪乎公安人员费尽两个月的心机都没发现他的踪迹。

根据他的出色才能和愿意立功赎罪的要求，专案组对其取保候审，发展为临时情报人员，为专案组侦破将军俑头案服务。

神秘人物施出看家本领四处探寻将军俑头的下落。6月15日，终于得到了一条重要信息：西安市北新旅社女旅客樊春梅为该旅社经理孙振平的朋友寻找买主，要出售一个将军俑头，要价30万元。

专案组得到报告，欣喜若狂。如果这个事实不假，说明将军俑头没有出境仍在国内，但樊春梅所出售的是否为真正的秦俑将军头，只有深入内部才能窥测虚实，辨请真伪，于是专案组指示神秘人物以中间人身份深入北新旅社，要求见货，试探虚实真伪。

当天下午四时，神秘人物向专案组报告，已和樊春梅约好，于6月16日上午12时让他看货，樊为防止意外，没有约定具体看货的地方。

专案组告诉神秘人物，16日上午10时，在北关大街十字路口交通岗楼前，由两名公安人员和他见面，商量具体对策。

第二天上午，两名公安人员身着便服来到约定地点悄悄等候，但直到11点30分，离约定时间已超过了一个半小时，神秘人物还没有赶来，看来事情比预料的还要复杂。两名公安人员走进岗亭，按原规定的联络信号给神秘人物所在的单位办公室挂通了电话，神秘人物没有在办公室，单位的人也没见他的踪影。

“我是黄雁贸易商行的王经理，找他有要事相商，请转告，下午1点30分我在北门里十二路公共汽车站站牌西侧等他。”公安人员向神秘人物的女秘书留下了新的联络信号。

下午1点30分，神秘人物终于出现在约定地点，向公安人员报告了情况：“樊春梅极为狡猾，当我和她再次联络时，她说让提前看货，可我一直等到中午12点，樊又说主人不在，时间改在下午3点，具体地方仍未定。”

“下午见货后一定想法绘张图像……”公安人员叮嘱几句，迅速离开谈话现场。

下午3点，神秘人物在北新旅社一所阴密的房间里，终于等来了该社经理孙振平。孙振平指着身后跟来的一个大汉介绍道：“这个老哥姓唐，俑头是他卖的。”

唐某瞪着锋利的眼睛在神秘人物的全身扫了一遍，没有说话，迅速从床底拖出一个黄色提包。随着拉链的张开，俑头露了出来。

“这是别人从秦陵考古队偷来的，为了慎重，由我帮他处理。”唐某终于说话了。

神秘人物装作毫不在意，以走私老手的神态斜着眼向提包里的俑头瞅瞅又慢慢点了点头，作满意状。随后对唐某说：“干这一行你知道都要慎重，我看你给画一张将军俑头的正面和侧面图，把修补过的地方用箭头指出来，这样我回去好让老板鉴别是真是假，这个要求我想唐兄不会推辞吧。”

唐某沉思片刻，答道：“可以。”

于是，两张将军俑头不同角度的画像很快勾勒出来，唐某为取得神秘人物的信任，同时画出了一张盗窃图交给对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神秘人物将原价侃为25万成交。对方约定于17日上午11时在北新旅社付款取货。在买方老板验货的同时，要先付押金一万元给唐某……

神秘人物结束了旅社的会谈，于当天下午6时向专案组作了汇报。

当天夜里，专案组研究制定了翌日的行动方案。由公安局七处副科长高西元扮成文物走私者，以给住在金花饭店的澳门“表哥”代买将军俑头为名，和案犯直接联系，以便掌握破案的最佳时机，同时挑选18名公安干警在旅社内部和四周布设三道防线：首先由5名便衣警察以旅客的身份进驻北新旅社观察罪犯的动向，控制内部情况，接应打入内部的高西元并及时向外传递信息。第二道防线由8名干警化装成各种身份的人员，控制旅社的前后门，防止案犯逃跑。第三道防线是在北关大街十字路口布置5名干警，配备三辆汽车、两辆摩托车和两辆自行车，防止案犯冲破一、二道防线，实施公开抓捕。各路防线均由市公安局一名处长或副处长指挥。

抓捕方案已定，但对现场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和应急措施，专案组同样进行了细致、周密的研究：如果罪犯改变方案，变换交货地点和方法，公安人员必须随机应变转移阵地，争取当天破案。假设罪犯不让见货或改变交货日期、地点，打入内部的高西元则以对方不讲信用为由，“愤”而离去，由控制外围的干警跟踪唐犯，查实其落脚点，再做进一步侦察。

一切准备就绪，公安干警纷纷行动，一场夺宝擒敌的战斗就要打响了。

双方争抢将军头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西安市公安局以其冒险的行动，希企将罪犯一网打尽。6月17日上午，古城西安雨后初晴，人们为连日阴雨后的第一个晴天而欢喜，纷纷走出家门来到大街，目睹阴雨过后古城的风采。北新旅社门外的马路上，人流如潮，小商小贩的叫喊和各种车辆的轰鸣声汇集在一起，显得拥挤而杂乱。各道防线的干警按既定的方案提前进入阵地。11时，一辆超豪华尼桑出租轿车缓缓驶进北新旅社院中，随着车门轻微的开启，一个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青年人，手提棕色小皮箱走了出来，青年人冲四周看了一眼，掏出香烟引火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随着喷出的浓浓烟雾，大摇大摆地走进旅社，此人就是高西元。

神秘人物和樊春梅在服务台前闲聊着，见高西元进来，轻声打了个招呼：“在老地方。”于是，高西元随神秘人物来到一楼6号房间，向正在等候的旅社经理孙振平介绍道：“这是老板的表弟，他以全权代表的身份来验货付款，你们谈吧！”

神秘人物说完轻轻把门带上，又悄悄地溜出旅社躲了起来。他知道一场

决战就要来临了，到底谁胜谁负，谁死谁活以及头落谁手，他不再顾及了，只要能保住自己的性命也就算是幸事。

“你是哪里人？”孙振平把手中拿着的一张报纸放在床上问道。

“干这行的不要多问，这是规矩，谁是货主，赶快验货。我表哥下午就要乘机飞往澳门。”高西元沉着流利地回答。

“货主还没到，可能马上就来。”孙振平不再追问，眼盯着高西元回答，“你和老王（神秘人物姓氏）是怎么认识的？”高西元为分解孙振平的精力和视线问着。

“是通过一位朋友介绍认识的。”孙很简单地回答，看来对这个话题并不感兴趣。

“这人不错，很可靠，我已跟他作过几次生意，办得都很好，要不，我是不会来这里的。”高西元不顾对方的情绪继续说着。

“要是人不可靠是不敢出手的，这一行风险性太大。”孙振平依然情绪不高，看得出他是在为唐某未及时赶来而着急，或有什么心事。

“老王已把情况都向我讲了，只要是真的，价钱不变。”高西元将话引入正题。

孙振平一听有钱字出现，似乎来了几分精神，他站起身说：“这个没问题，你等一会儿，我去看看。”说完走了出去。

在另一个房间里，孙振平拨通了电话：“喂，是老唐吗？怎么还不来，人家都在这儿等你多时了……什么？没有变化，我盘查过了，没问题，你赶快来……”

极富经验的唐某怕发生不测，迟迟没有赴约，直到孙振平打过电话后，他确信已无意外事情发生，便匆匆赶来见到孙振平又密谋一番后，两人才抬着黄提包走进6号房间。

“这是我们的老板。”孙振平把唐某介绍给高西元。

高西元微微点了点头，掏出一支烟递给唐某：“先抽支烟再谈。”

“抽我的，比你的好。”唐某气势逼人，抽出一支香烟甩给高西元。

“有肉不吃豆腐。”高西元顺势说着，点燃了香烟。

老谋深算的唐某眼睛在高西元的身上转了一圈，突然问道：“你是几处的？”

“七处。”高西元就要出口的两个字瞬间又落入心中，他在大吃一惊的同时，意识到自己确实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我不能回答你的提问，这是规矩，我也不问你，只要货是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高西元不露声色地回答。

“你表哥是哪儿的，现住什么地方？”唐某仍不死心地追问。

“我表哥是澳门的商人，家住澳门提督马路125号A楼C座，现住金花饭店310房间。”高西元回答极为迅速流利，他事先就想到对方可能要追问这位“表哥”的情况，自然也就想好了对策。

“只要货是真的，马上就将钱给你。”高西元说着潇洒地打开棕色小皮箱，亮出一万元人民币：“这是看货的押金。”

唐某一见成捆的钱压在箱中，立刻精神起来，但他毕竟不失走私老手的风度和狡诈，他在房间踱了几步，突然转过身满脸杀气地恐吓道：“今天我带来了8个人，两个在旅社里，6个在外边，身上都有家伙。如果出了事，哼！”唐某停顿了一下：“我就叫你站着进来，躺着出去，像电影里干的一

样。”

高西元的心怦怦地跳荡起来，他知道眼前的唐某绝非等闲之辈，所说的话也不仅仅是恐吓，一旦被他识破，一场血战在所难免。他强按住跳动的心，故作怒气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要是为了抢这一万块钱，我把钱放下就走，连头都不回！”说完作欲走状。

唐某已是黔驴技穷，面对高西元的从容不迫，只好陪起笑脸作着拦截的姿态：“别误会，别误会，你知道干咱这行风险大，我不得不加以小心。”

“货带来了没有？我要马上验货。”高西元仍作怒气未消地提出了要求。

唐某和孙振干将包抬到桌上，拉开锁链，取出俑头。高西元抱起来仔细观察。他发现头的脸上有淡淡的彩粉，眼珠中残存着白色的彩绘，耳朵里有少许的泥土，脖子后边有一条经过修复的裂痕……一切迹象表明，眼前的俑头和被盗的将军俑头完全吻

高西元激动地望着，心中暗说：“将军俑头，你可出现了。你让我们找得好苦呵！”

“是真的，没错儿。”高西元微笑着望了唐某一眼。唐某得意地伸手拍拍高西元的肩膀：“伙计，我出手的东西还有假的？”

“怎么交钱”？高问。

“价格不变，叫我的朋友跟你去取。”唐答。

“不行，我给表哥打个电话，叫他把钱送来。”高提出了不同意见。

唐摇了摇头，“那不行，为怕出事，我们已把旅社的电话线掐断了，还是叫我朋友跟你去取吧。”

高西元想想，一咬牙说道：“也行，这一万元先给你。”随后同孙振平走了出去。当迈出房门时，高西元又回头对唐说：“从现在起你不要离开这个房间，要是我取来款你再换成假的，那就跟你没完。”

“你尽管走，我绝对不会那样干。”唐一挥手，将房门闭死。

“伙计，这事儿你干得漂亮。”高西元长嘘一口气，拍了拍孙振平的肩膀。

“是很漂亮。”孙点头回答着，脸上翻着红润。这时他没有发现高西元已经摘下了眼镜，更不会意识到这个眼镜的摘落意味着一种行动信号的发出。隐蔽在旅社内外的公安人员蜂拥而上，孙振平的头还没有完全抬起来，就被高西元一拳击倒在地。房内的唐某听到动静刚开门窥探，就被赶上来的公安人员三拳两脚打入床底。在服务台望风探信的樊春梅更是未费吹灰之力就将其擒拿。

将军俑头完好无损地落入公安人员手中。

三名罪犯被捕后，公安人员进行了紧张的审问，得知唐某原名唐轲。据他供认，将军俑头是临潼县小张和小王托他出售的，他曾去过小张住的地方。

机不可失，西安市公安局立即派出干警押着唐轲赶往临潼县指认。在临潼县公安局的协助下，当天晚上就将该县第三运输公司单身宿舍中的案犯“小张”抓获，小张原名张传秀，据他交待，那个小王叫王更地，是经过临潼火车站客运员权学力认识的，王更地在哪儿不知道。

公安人员迅速将权学力抓获。据权学力供认：王更地原在临潼火车站派出所当治安员，后被辞退，现不知在何处。公安人员经过调查得知，王更地正在临潼县康桥乡家中收麦子。18日黎明时分，公安人员驱车直奔康桥乡湾

里村，将正在熟睡中的王更地从被窝里提出来，押入警车。

王更地雪夜盗俑头

1986年隆冬。临潼火车站站前的饭店里，王更地和权学力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兄弟般亲热地对饮。窗外大雪正紧，两人越喝越酣，话题由女人终于转向了金钱。

“你说干什么最能赚钱？”权学力涨红着脸问。

“我看现在干个体或者做买卖最赚钱。”王更地未加沉思地回答。

权学力笑了笑：“不对。”

“那是搞长途贩运？”王更地想到权学力的职业，又见他一幅得意的样子，便想到了长途贩运。

权学力摇摇头，仍说道：“不对”。

王更地再也想不出有什么赚大钱的新招，只好求教于对方：“那你说是什

么？”

“现在做什么生意都能赚钱，但最赚钱的是贩古董。我正在渭北搞一座古墓，弄到了一个梅花针，有9斤重，估计能赚几万元。”权学力醉意蒙蒙地说着自己的罪恶行动。

王更地噓了一声。作为农民出身的他连五千元钱放在一起是什么样子他都没见过，何况是几万元。他的心跳动起来，金钱的诱惑使他向权学力讨起具体的方法：“你看我咋样赚钱？”

“坑里有的是，搞一个就是几十万。你要能搞到，我包着给你卖。保证你一夜之间发大财。”权学力在酒力的冲击下，摇晃着上身，半闭着眼给王更地指出了到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盗窃俑头的路子。

“你这话靠得住吗？”王更地还是半信半疑地问。一夜之间就可赚几十万，这对于他来讲太难相信了。

“咱哥们啥时说过谎话，保证不出县城就能脱手。”权学力拍着胸脯作出了豪侠仗义的姿态。

“那我就瞅机会去试一试。”王更地终于下定了决心。二人越说越投机，越喝越迷糊，直到烂醉如泥才被服务员架出饭馆。

饭店聚会之后，王更地念念不忘权学力对他说过的赚钱方法。他自幼生在临潼，熟悉当地的风气，这些年靠吃国家、卖祖宗遗产发财的不少。自己在部队白白尽了4年义务，不但没有发财升官，退伍后托关系找门子才弄了个临时治安员的差使，一月的工资只是吃喝就很紧张，要是再搞个对象，成立个家庭这日子怎么过？他了解秦陵考古队的情况，要偷，定能成功。但他又有些担心，要是在行窃中被抓住咋办？偷回来卖不掉咋办？让公安人员抓进监狱咋办？种种问号使他迟迟未动。

数日后，王更地又与权学力相会于酒馆，当权学力知道王更地因害怕而未动手时，又进行了一番开导鼓励：“常言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冒一次险可保证一辈子的清福……”

王更地终于下定了决心，他要孤注一掷，押上这个生死赌注。

1987年元宵节后的第5天，王更地在临潼县城西边的一个商店里买了一把中号螺丝刀。晚饭后，租一辆三轮车到县旅游局门口下车步行向秦俑馆赶去。

天越来越黑，纷纷扬扬的大雪覆盖了整个大地。王更地顶着风雪，带着辉煌的资金梦，于次日零时左右到达秦俑博物馆墙外。他倚着墙根稍作歇息

后，来到秦俑馆的门前悄悄向里窥探，见无异常动静，便径直朝大门走去。当走到门前时，他又停下脚步，绕到北边的三角拐弯处翻墙而入，进入秦俑馆院内。随后沿展厅的路东侧来到考古队门口，见大门开着，便顺势钻进去，身贴墙根左右拐了几个弯，来到第二排平房的第一间房门处停下，他蹲下身听听四处仍无动静，便掏出携带的螺丝刀撬开门锁溜了进去。屋里漆黑一团，看不清放置的文物，他伸出双手小心而紧张地四处摸着，终于触到一个俑头。他将俑头抱在怀里走出房门，顺原路返回。当来到秦俑馆外墙前时，由于俑头太重，他不得不先将俑头放入墙头之上，等自己翻墙而过后，又将俑头从墙上拿下，迅速溜走。这时天已破晓，大雪早已停歇。王更地怕暴露自己的罪恶，于是来到火车站北部的松树林中将俑头藏于一棵枝叶茂密的松树上，自己空手返回家中，一头扎入被子昏睡起来，直到晚9时他才来到松树林将俑头取走，带到临潼县权学力的宿舍，并将猎获的宝物装入一个纸箱，转移到车站一间平房内隐藏起来。十几天后，又转至临潼县客运公司行政科干部张传秀的住处。从此，三人开始了密谋出售将军俑头的计划，四处寻找买主。

1987年3月，张传秀在西光厂招待所和人交谈包装生意时，结识了西安美丽华大酒店筹建处临时工唐轲，并请他帮助代销将军俑头。

唐轲原为走私文物的老手，为辨别俑头的真伪，他于4月的一天来到临潼张传秀的宿舍，亲自查看了将军俑头，狡猾诡诈的唐轲为得到确实证据，和张传秀一起来到秦俑博物馆，对俑坑的将军俑头作了细致的观察，然后又来到馆外的文物复制品市场，对真假俑头进行了对比后，才确信俑头为真品，要求将货送往西安。

4月29日，王更地、张传秀将俑头送到了唐轲家中，并达成协议：俑头卖价7万元，如唐轲卖到100万元，王、张也只要7万，其余归唐所有。一场交易很快做成。

1987年5月中旬，北新旅社经理孙振平在唐轲家中见到将军俑头，在唐的要求下答应为其销赃，但寻找了近一个月仍没找到买主。这时，孙振平又求助于以北新旅社为落脚点，长期流窜在外搞“金盒子”和股票生意的情妇樊春梅，让其帮助代寻买主，樊春梅当场答应并付诸行动。……

1987年6月22日，新华社向世界播发了电讯：“本社5月26日曾报道了保存在陕西省秦陵考古队仓库中的一个将军俑头不翼而飞，记者近日从公安部获悉，这一案件已被西安公安机关破获。6月17日，案犯唐轲、孙振平、樊春梅在出售这一将军俑头时被公安干警当场抓获……”

随着全国各大报刊、电台的转载和播发，仍在四处探寻将军俑头踪迹的国内外走私倒卖集团，只好仰天长叹，罢阵休兵。

尽管罪犯已被抓获，俑头完好无损，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案子并未到此了结，随之而来的则是和此案有关的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人们仍在热切地注视着将军俑头案的最终结局。

第十一章 枪声喊声板子声

兵马俑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血汗和聪明才智的结晶，后辈一定要珍惜它。

——扎伊尔立法委员会主席卡松戈·穆扎吉

人头落地方猛省

1987年6月19日，陕西省委、省政府分别作出批示，嘉奖在破获将军俑头案中的参战人员。6月24日，公安部向西安市公安局发来了贺信：“将军俑头案破得漂亮，破得及时。此案侦控措施精心设计，行动迅速果断，参战干警机智灵活，为侦破类似案件提供了有益和重要的经验……”

随后，国家文物局、公安部刑侦局、陕西省人民政府在西安联合召开大会，隆重表彰西安市公安局在侦破将军俑头案中有功人员。公安部为“秦陵将军俑头被盗案专案组”记集体一等功，并同陕西省公安厅为侦破人员高西元记个人一等功，为侦破人员安坤生、马军记个人二等功，为侦破指挥员董儒、张斌生、张志明记个人三等功。参与将军俑头案的六名罪犯被抓获后，关入看守所内。1987年6月23日，西安市公安局向西安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将六罪犯逮捕，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在查看了罪犯的案卷后，为慎重起见，携同市公安局委托省文物局文物鉴定小组对将军俑头的真伪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书如下：

参加鉴定人：

李长庆：鉴定组成员、文物鉴定专家

王长后：鉴定组成员、文物鉴定专家

韩保全：鉴定组成员、助理研究员

吴双喜：鉴定组成员、助理馆员

石兴邦：研究员

袁仲一：研究员

名称：秦高级军吏俑头（俗称将军俑头）

时代：秦

质地：陶质

规格：将军头俑从颈底部到发冠顶处通高为38cm，面部长度为27cm，从下颌到上额宽21.5cm，其右耳廓中上部有3cm×2cm不规则残缺一处，左耳廓上部有不规则残缺1.7cm一处，在右冠尾右侧近末端上有宽1.5cm×6.5cm修补痕迹一处，在右冠的右顶部有长4cm×2cm的修补痕迹一处。胡须总长5公分，右下胡须残缺不齐，重量为13公斤，脖颈处环绕一周有高7cm，低为2cm的修补痕迹，冠上残存有褐色彩斑。

鉴定结论：此系秦陵一号兵马俑坑第20方第十过洞出土之将军俑头，出土号为T20G10：1，整编号为

T20G10：97，是八号战车上之将军俑头。目前，俑坑出土此类俑仅有六件，是秦俑艺术中典型的代表作品，为国家一级甲等珍贵文物，属稀世珍宝。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接到文物鉴定结论书，根据犯罪事实，于7月2日将6名罪犯批准逮捕，并于8月16日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经公开审理，于1987年10月7日作出如下判决：

王更地，21岁，以盗窃罪被判处死刑。

权学力， 23 岁，以盗窃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唐轲， 43 岁，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

张传秀， 33 岁，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

孙振平， 29 岁，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樊春梅， 46 岁，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8 年。

一审判决后，王更地以盗窃文物是受他人胁迫，并非本案主犯为由；权学力以来指使王更地盗窃文物，量刑太重为由；张传秀以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个别情节不实，没有从中谋利的目的为由；唐轲、孙振平以在销售将军俑头中只起联系作用，原判定罪不准，量刑太重为由；樊春梅以在联系买主时，不知道是将军俑头，且没有参与倒卖，不应以投机倒把罪论处为由，分别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到上诉后，立即进行了审理，作出了如下结论：

王更地携带工具，只身撬门入室，盗窃国家珍贵文物，并积极联系销赃，显系本案主犯，上诉理由纯属推脱罪责，不能成立。

权学立主动与王更地共同策谋盗窃国家珍贵文物，并向王更地提示盗窃目标，事后又为其寻找买主，在盗窃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张传秀积极联系买主，进行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犯罪事实，不仅有王更地、唐轲的供词可证，且张传秀亦有多次供述在卷，足以定案，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唐轲明知将军俑头系国家珍贵文物，勾结他犯积极进行倒卖活动，显系投机倒把主犯，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孙振平身为北新旅社的经理，为牟取暴利，积极参与倒卖将军俑头的犯罪活动，提供犯罪场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樊春梅明知是将军俑头，为牟取暴利而参与倒卖文物的犯罪活动，有证人证言及同案犯孙振平、唐轲的供词为证，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量刑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1987 年 10 月 15 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核准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王更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就在王更地等罪犯判刑的布告贴出来的同时，另一张布告也醒目地出现在西安市街头：

文物盗窃犯肖建国判处无期徒刑肖建国，男， 33 岁，汉族，安徽省金寨县人，住陕西省金属结构厂家属院 2 区平房 15 号， 1987 年 3 月 27 日因盗窃被收审，已逮捕，现在押。

肖建国于 1987 年 3 月的一天，窜至临潼县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从博物馆北边的地道口进入一号坑展厅西侧，盗走从 T20 方位出土修复的武士俑头一个，于 1987 年 3 月 27 日中午，在西安市长乐坊附近倒卖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并缴获了所盗俑头。

肖建国目无国法，盗窃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已构成盗窃罪，情节严重，审理中认罪态度不好，应依法惩处。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肖建国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7 年 9 月 7 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文物事业管理局作出了《关于考古队将军俑头被盗案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分决定》。全文如下：

1987年2月17日夜，省考古研究所秦陵考古队发生秦俑一号坑 T20 方出土的将军俑头在杂品库被盗。西安市公安局于6月17日破案，追回了将军俑头。这以前，西安市公安局于3月27日曾破获了去年6月和今年3月秦俑一号大厅后部两起武士俑头被盗案。秦陵考古队连续发生文物盗窃案，暴露了该队文物管理混乱和在安全保卫方面存在严重的漏洞。盗窃案虽已破获，但至今还有一个武士俑头没有追回来，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为了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吸取教训，切实加强文物安全工作，局整顿检查组于6月29日进驻秦陵考古队，进行调查和停工整顿。责令副队长王学理、干部刘占成停职检查。经过近两个月认真地调查，查清了将军俑头和武士俑头被盗案发生的原因和责任。现对有关责任人员处理决定如下：

一、秦陵考古队临时工简七一，无组织无纪律，乱拉关系，不经领导批准，私自将外单位人员王更地先后两次领进放有贵重文物的队部秦俑头颜色保护室内。简给王说“秦俑头价值很高，里根总统来了，我国才送了个复制品。”同时取出一张彩色俑头照片请王更地看，并告诉王隔壁一排房子是秦俑修复室等。简七一在客观上为罪犯王更地到考古队踩点和盗窃将军俑头提供了重要情况。简七一对这次被盗案件负有直接责任，其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很大，影响很坏，简已不宜继续留队工作，立即解雇。

二、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主任、秦陵考古队副队长王学理同志，1985年7月主持该队工作以来，做过有益的工作，但忽视文物安全。他主持队务工作时间不长，就将原考古队部院内经常性昼夜值班制度取消，撤销了值班人员；省文物局针对秦陵考古队文物管理混乱、文物安全有漏洞，去年12月22日专门发了陕文物发（86）97号紧急通令，提出加强该队文物安全工作的要求。但该队没有认真落实；文物管理依然混乱，该移交的不移交，将军俑头被盗后，又在绘图室、修复室发现了俑头和箭头；该队内部纪律松弛，无章可循，漏洞很多；对临时工缺乏严格的安全管理教育。临时工简七一向罪犯王更地泄露了内部情况，在客观上为其作案提供了条件，是造成这次将军俑头被盗的重要原因。这次将军俑头被盗时，王学理同志虽不在考古队，但在去北京出差前没有具体明确指定干部暂时负责队里工作。王学理同志工作严重失职，对连续发生的俑头被盗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兹决定撤消其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主任、秦陵考古队副队长职务，取消考古队领队资格两年。同时根据省考古研究所党总支的意见，局直属临时机关党委决定：撤消王学理同志省考古研究所第二党支部委员职务。

三、省考古研究所秦陵考古队干部屈鸿钧同志，身为老文物工作者，去年七月发现队部杂品库内有两个俑头后，本应及时告诉队领导或将俑头存放到正式库房。特别是去年12月向秦俑馆正式移交一号大厅前五方文物时，明知杂品库有两个俑头属于应交之列而未交，同时也没有明确向队领导报告，仍放在杂品库内。对这次将军俑头被盗负有重要责任。鉴于该同志一贯表现较好，且本应退休，因缺乏文物修复骨干，仍留在工作岗位，带病坚持工作。发案时他正在医院动眼疾手术。当向其询问有关情况时，他态度明确，回答肯定，为立案提供了可靠证据。同时对自己的错误认识较好。兹决定给屈鸿钧同志行政记大过处分。

四、省考古研究所秦陵考古队干部刘占成同志，在考古队做过有益的工作。去年11月25日，考古所领导当面指定他负责秦陵考古队保卫工作，他

强调自己是业务干部，不愿兼做保卫工作，但所领导没有同意他的意见。今年2月，在副队长王学理出差不在时，虽未明确他代职，但让他招呼队里的工作（刘占成说：招呼只是大厅的发掘工作），在此期间发生了将军俑头被盗案件。

特别是队上明确他负责一号大厅的安全，但他对大厅值班人员缺乏严格管理，致使大厅发生了武士俑头被盗。

刘占成同志对连续发生文物被盗案负有一定的责任。兹决定给刘占成同志行政记大过处分。

五、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秦陵考古队队长石兴邦同志，对秦陵考古队工作长期让一名副队长主持队务，亲自检查指导少，对反映该队的问题处理不得力，致使发生将军俑头被盗，对此负有领导责任。但该同志系高级知识分子，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在我国考古事业上作出了突出贡献。因年龄较大，兼职过多，工作中有失误，这次整顿中尚能检查认识自己的责任，责成石兴邦同志作出深刻检查。

六、（略）

震惊世界的将军俑头案就此了结。劫后余生的将军头失而复得，又重新被安在了他那硬梆梆、黑乎乎的身子上，重新恢复了他昔日的威严与豪气。抱着这位将军的头，四处兜风，企图发笔横财的王更地，不但好梦难圆，最终把自己的头也弄丢了，那具被血染红的五尺躯体，当然也没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真可谓“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据说，就在王更地被押赴法场，行将枪决之时，他还祈求执法人员留他一条性命。他说自己还年轻，还能为社会做许多有益的事。然而，没有人再去听他的花言巧语了，要做有益的事，来生再做吧。这一生所做的一切应该就此结束。跟他一样做着黄粱梦的男男女女，醒来看到的却是黑洞洞的牢房和一日千年的岁月。世事难测，善恶自有分明时，想来那一帮男女蹲在幽暗的牢房，该对自己的人生好好感叹一番。

当然，感叹的何止他们，即是那些尚且自由的人，也由于这“将军头案”的最后结局而感叹不已。他们的感叹，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又意味着这个案子第二个阶段的开始。

刘占成说：我有功

将军俑头案过去四年之后的一个晚上，在秦俑博物馆院中一间极普通的平房里，我见到了在将军俑头案中受处分的秦陵考古队队员刘占成——一条30多岁的壮汉。也许常年的田野考古生活才使他的脸看上去有些粗糙和黑红，但从那双乌黑明亮的眼睛和魁梧的身材看去，又不失为英俊威武，这是一个典型的关中汉子。

我本打算了解一下整个案子的细节，可他却抱给了我一堆油印和手写的材料，我顺手翻动着。

“这是我这些年上访的材料，你先看看吧，我要告诉你的可能大多是关于我个人的事。”他说。

“你还在上访吗？”我问。

他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吐出浓黑的雾，望着我说：“上访，一直在上访。有些好心的人劝我，事情已经过去了，就算了吧，不要再费脑筋，点灯熬油地写材料了。你再反映也是枉然。但我不相信，光天化日之下，怎会翻白为黑？我就不相信没有个包青天，找不到个说理的地方。我记得

1987年法制报曾登过一篇《法律作后盾，农家胜官家》的文章，说的是淮北市公安局侵犯公民民事权利，受到了法律的处罚。我感到社会主义的法律还是公正的。作为我个人，将接受任何公正的处理，但也决心同任何不公正的处理作斗争。”

“你感到对你的处理在哪些方面不公正？”我问。

“我认为首先是侵犯了我的公民名誉权。1987年6月29日，在未落实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因将军俑头案，省文物局就宣布让我停职检查，这是不合乎情理的。事实是，我作为考古队的一名普通队员，在将军俑头案问题上，不但无任何责任，而且是有功人员。”

这个说法令我在感到新鲜的同时，也吃了一惊，一个有功的人何以又受到处分？吃惊过后，又增强了我要听下去的兴趣。

“之所以我说有功，是在2月18日早案发后，是我首先组织报案，派人保护现场和派人去西安向屈鸿钧了解情况的。2月25日，又是我第一个核实案情，及时向所领导人汇报的，2月26日，还是我对放置杂品的仓库进行认真检查，最后从事实上落实将军俑头确实被盗的。这一切，足以表现一个普通考古队员、业务干部对国家文物的高度责任心。而文物局党组竟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冤枉无辜，打击有功者，宣布让我停职检查。至今我也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一无任职，二无问题，停的什么职？检的什么查？难道积极报案、负责就有罪吗？”

“由于局党组的错误决定，使我不明不白地接受停职检查，遭受冤屈竟长达七十余天。在那段时间里，我背着停职检查的黑锅，精神上受到极大折磨，人不人，鬼不鬼。不能正常工作，无法搞业务研究，同志间的正常接触和交往也受到限制，连家属的思想上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并在相当广的范围内造成极大影响。我总觉得，我党在对人的问题上历来是相当慎重的，我认为局党组宣布让我停职检查的决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有关条文规定，严重侵犯了我的名誉权，侵害了我的人格尊严。”

“文物局所派来的整顿检查工作组，经过大量的调查和落实工作，于8月29日找我谈话，也承认将军俑头案与我没有责任。那么，因将军俑头案宣布让我停职检查，显然是错误的。而文物局不但不纠正错误，反而在无事实责任的前提下，以莫须有的罪名，于9月4日，要求我在处分决定上签字。我在上面所签的字是：处分完全是强加于我头上的。”

“之所以说处分是强加于我头上的，是因为我只兼管了一段一号大厅的值班人员。从工作上说，考古队的发掘和修复是分为两摊的，保卫工作也是一分为二，我本人从来没有负责过修复工作方面的保卫安全，也没有任何人交给我修复上一片纸、一个字的文物册表，更没有交待过一件文物实物。再说，分工兼管和保卫干部有质的区别，分工兼管，那就可以分给你、我、他任何一人。考古队的发掘、修复上曾兼管过与保卫的人员除我外，还有其他四五个人。特别是王学理同志主持队务工作后，对有关保卫工作，不是兼管而是主管，难道把他也叫做队上的保卫干部？”

“事实是，上级组织从来也没有发文或以其他方式任命过某人是队上的专职或兼职保卫干部，只有等案发后，才根据临潼县公安局的整改通知书，派来一名保卫干部。当然，在上级未派保卫干部的情况下，队上的业务干部不管是谁都有责任兼管安全工作，但不能说谁管了一点保卫工作，谁就成了保卫干部。”

“在杭德洲主持工作期间，我管过一段保卫工作，那时院子里安有报警器，具体值班的有3人，后来报警器坏了，各修复室又安排了值班人员，直到王学理到来前，院子里还有5人长期值班，可王学理上任后，就将5名值班人员减为3人，两个值夜班，一人值白班，余下的工人专管打扫院内卫生。

“1985年11月9日，王学理同志在考古队干部、学员大会上，以整顿人员为名，宣布将院子仅有的3名值班人员调到一号大厅，从此彻底撤消了多年来院子的夜间和白天的值班人员，致使库房无人值班，才为将军俑头案酿下了祸根。即使我是保卫干部，这时一个人也没有，我去管谁？

“1985年11月9日，王学理同志开会宣布，撤消大厅后面长期一直坚持值班的人员，从此大厅后面再无人值班。

“1986年12月5日，王学理同志把大厅前五方的文物保卫工作正式全部移交给秦俑馆，值班人员也全部撤回。王学理对我讲：今后大厅后面他准备在外地找一个老汉来值班，在未找来前，叫我先从发掘人员中抽上两个人临时值几天班，于是，我从发掘人员中抽调3人值班，直到1986年12月27日王学理从咸阳叫了一个叫冯孝民的老汉，接替了发掘人员抽调的3名值班人员。从此大厅后面就由冯孝民老汉一个人值班。直到将军俑头案发后的3月5日，我提出大厅后面要再增加人员值班，只一个老汉昼夜值班恐怕要出事。会上，王学理才同意增加一人，后来我又坚持增加了一人，这时大厅后面包括老汉在内共有3人值班。当时值班人员问我，已交给秦俑馆的文物咱管不管，我说都是国家文物，也应该给看管。

“在这期间，王学理多次找我谈话，让我戴上徒有虚名的保卫干部的桂冠，但均遭到了我的拒绝。我知道自己担不起这个担子，也无能力无条件负这么大的责任。因我不接受，还和他吵过几次，我曾经对他说：你不要一口一个保卫、保卫的，具体他说我只是负责兼管大厅的几个值班人员，要搞队上的整个保卫，咱们工地大，文物重要，我是个业务干部，既看两个探方，又分工管理考古发掘现场，抽时间还要搞业务研究，是根本兼管不了整个保卫工作的，你从上面要个专职保卫干部不是更好吗？王学理对我说：我养活不起一个专职保卫干部。他这个话我曾向工地的王玉清、张占民等人讲过，就在将军俑头被盗的前一两个月，王学理个人和我谈不通，又从考古所叫来两位领导跟我谈，当时我仍未接受，并且态度坚决地重申了我的以上理由。那次的谈话考古所领导都有记录，可以证明我没有接受这个要求。既然队上找不到保卫干部，作为常务队长的王学理，就应及时向上级申请要专职保卫干部，落实安全措施，但可惜的是王学理同志没有做这个工作，致使将军俑头被盗。”刘占成说到这里停住，眼睛显着激动的光望着我，似在听我发表自己的见解，然而，我没有吭声，只是将烟蒂轻轻地捏压在烟盘，继续听他按原有的思路讲下去。“处分决定称：今年二月，在副队长王学理不在时，虽未明确让我代职，但让我招呼队里的工作，在此期间发生了将军俑头被盗案。事实是，今年二月，正值工地春节放假，王学理和我是节日值班带班干部，但他却不来工地，后来不知谁批准，有何事，他又突然决定去北京。在王学理去北京前，不是明确让我代职，而是根本就没有让我代职，只是分头安排了一下工作而已。当时他说去四、五天，但却迟迟十几天才归。

“我清楚地记得，王学理走前，交待给我的工作有二：一是招呼好节日值班人员，二是管好开工后的发掘现场工作。对于修复上的工作和放将军俑头的仓库的钥匙，他是通过屈鸿钧另外安排的，与我毫无关系。二月十二日，

我结束了院子管理节日值班人员的任务，十三日正式转向大厅发掘现场的管理，十八日修复上的将军俑头被盗，这能说是我的责任吗？”

刘占成说着，站起身，显然是有些过分激动以致使他焦躁不安，在屋里来回踱步。坐在我们身旁始终未作声的刘占成的妻子望着丈夫越发黑红的脸，小声说道：“算了吧，说这些有啥用？还是喝点水，说些令人痛快的事吧。”

“那武士俑头的丢失是怎么回事？听说公安机关破获此案后，秦俑馆和考古队都不承认自己丢的，那到底是谁丢的？”我想起新华社曾向世界播发的那条令人困惑的电讯问道。

刘占成再次点上一支烟猛吸着，点点头，沉思片刻：“这个问题是较复杂。”他似乎已没有了先前的怒气，嘴角露出了一丝苦笑。

“我这样说吧，在武士俑头丢失时，秦俑坑一号大厅已被分割成前半部、中半部，后半部三个部分，你知道在盖大厅时这些兵马俑已全部用土回填，也就是又全部用土埋了起来。到1980年时，前半部的兵马俑已重新发掘出来，并经过修复，大部分又在原地站了起来，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一部分。

“前半部修复好后，考古队又将后半部的兵马俑发掘出来，并修复了一部分，这时，秦俑博物馆和考古队进行了移交，事情也跟着来了。按规定秦陵考古队要将前半部和后半部全部移交给秦俑馆，属于考古队管理和发掘的只有中间那一块。可王学理同志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在全部移交了这两部分文物后，又在自己起草的关于文物保卫中的协议中糊里糊涂地写道：‘前五方坑中存放的文物由秦俑博物馆承担文物安全及卫生工作’。至于后半部的文物安全保卫工作归谁管协议中却没有提出。如果不出事双方都你好我好相亲相敬，可偏偏事情就出了。1987年3月27日，肖建国混进了展厅后部，趁值班人员不注意，脱下褂子将一个武士俑头包起来悄悄地顺着地道口也就是一号展厅的后门溜了出去，这时博物馆和考古队谁也不知道。

“案子破获后，公安机关来问，说是肖建国盗走的俑头是展厅后部的，而这一部分的文物就是属于秦俑博物馆的，如果没有协议书，责任肯定要秦俑馆承担，可这时秦俑馆将协议书拿出来，祸就落到了考古队的头上。刚才我已经说过，王学理跟人家签的协议书是前五方的文物安全由秦俑馆负责承担，那么中间和后部由谁承担？尽管协议书上没有写明，但当公安机关来人询问时，考古队一方咬定文物是秦俑馆的，应由秦俑馆承担责任，与考古队无关。但秦俑馆一方却在协议书的文字中作文章，尽管文物属于秦俑馆，但安全保卫却归考古队，武士俑头的被盗责任应由考古队来承担。所以就有了新华社发出的令人困惑的消息。可事情推来推去，还是人家秦俑馆占了上峰，这个糊涂协议给考古队带来了本来不应该有的大祸，我自己也在这场大祸中倒了霉。更令人感到气愤的是，王学理同志起草的这个协议书以及和秦俑馆的签字经过，我一点也不知道。所以说文物局把武士俑头丢失的责任推到我的头上是毫无道理可言的，给我的处分是不实事求是和完全错误的。这个错误决定是对一个公民人格的公然践踏。”

“那么您认为将军俑头和武士俑头被盗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我瞥了一眼腕上的手表，已是10点多钟，决定在临走前提出最后一个问题。

“秦陵考古队连续发生俑头被盗的重大责任事件，主要原因固然在主持队务工作的常务副队长王学理身上，但是作为主管部门的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领导人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前几年大兴安岭的火灾事故，林

业部长被撤消了职务，那是因为林业部长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无数事实证明，一些因官僚主义造成的严重后果，其危害及影响远远超过违法乱纪、贪污盗窃等问题的本身。许多重大事故，大多与官僚主义者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有密切的关联。因为一切事情都不会是孤立的。作为文物局、考古所一个下属单位的秦陵考古队，能连续发生秦俑头被盗这样重大的责任事故，主管领导的官僚主义和严重失职也是不容置疑的。他们理所当然地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可奇怪的是，关于将军俑头案重大责任事故的处理，对本来没有责任的普通考古队员强加处分，作了错误处理。而对主管的领导者，却避重就轻、应付过关，对他们应负的责任事故不作任何处理。难道说他们真的没有责任和不该受到处分吗？我认为至少有这几方面的事实足以使他们受到处理。“第一，作为主管部门的文物局、考古所，对秦俑这样大、这样重要的考古发掘工地，一不配备保卫专干，二不拨保卫专款，并对长期文物管理混乱的现状不认真检查，同时不切实落实安全制度和防范措施，以至导致了俑头连续被盗，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第二，秦陵考古队修复上的值班撤消长达一年之久，将军俑头这样贵重的一级甲等文物长期放置在杂品库中，局、所领导竟全然不知，这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严重的失职又是什么？“第三，作为主管安全的局领导×××来工地检查，当要看杂品库时，王学理同志说里边没有啥，他竟轻信了王的话而没有认真履行自己的领导职责，对杂品库未作任何检查，以致酿成了库内将军俑头被盗的重大事故。“第四，1986年11月25日，我当面对来工地的局领导人×××和队长王学理等明确指出：秦俑工地大，文物贵重，需派一名专职保卫干部，但他们却置若罔闻，既不认真落实，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其最后的恶果是将军俑头案发。“记得在影片《汀泗桥之战》中有这样一个令人难忘的镜头：叶挺曾当面严厉批评他的老同学黄琪翔，对汀泗桥战斗失败的责任难道要推到一个下级军官的身上吗？这话寓意深刻，值得每个主管秦陵考古队的领导者深思和反省。将军俑头案处分了考古队的三个人，事情似乎结束了。但事实上是对没有责任的普通业务干部不公正的处分，又制造了一桩新的冤案，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得不发出呼吁，让上级领导人和纪检机关对将军俑头案的处理作进一步彻底的复查，对事故主要责任者应严肃处理，对官僚主义应予以追究，对受错误处理的同志应尽快平反昭雪……”

墙上的时钟敲响了十二声，打断了刘占成满含怨屈悲愤的叙说，也向我提出了应迅速离开的警告。我草草地收起采访本，告别了刘占成和他的妻子，在漆黑的夜色中向我栖身的秦俑馆家属院最后一排单身职工楼摸去。

我躺在床上，脑海中依然显现着刘占成那慷慨激昂的音容声貌。四周极静，只有风声不断传来，我越来越感到刘占成的叙说已远远超出了案情本身而具有了更加深层的意义和内涵。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案子才更加扑朔迷离，像一团迷雾难以令我看到真实面貌和窥视那曾发生和存在过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既然我已踏进了这个神秘的区域，就索性辨清整个事情的真伪，透过弥漫的雾，去寻求一种更合乎情理的真实。

我决定去一趟西安，找当年的秦陵考古队常务副队长王学理，也许在他的心中会装着对事情的另一种全新的见地，我要在他的内心世界里，寻求一种更清新的东西。

王学理说：我无罪

三天后，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家属院的一幢半旧的楼房里，我见到了当

年的秦陵考古队常务副队长王学理。

和刘占成相比，他显得过于消瘦和老气了些，但这位 60 年代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虽近“知天命”之年，但那双明亮的眸子和看似颇有些潇洒的举止，又让人明显地感到这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典型的知识分子。

我说明了来意。

他望了望我，微微地露出一丝笑容，看得出这种微笑的背后带着一种忧郁和苦涩。他说：“现在报刊对这个案子及失盗原因的宣传已经不少了，也有这方面的报告文学出现。但这些文章又大多把我王学理漏掉了。我没有功劳，连苦劳也没有，现在是孤单无援。一些无聊的文人墨客贪财忘义，崇权谄媚，凭借手中的笔杆子树起了一些高大的偶像，并在这些偶像身上附会上一些近似传奇的故事，以歌功颂德，使偶像更加高大壮观。而把我的形象从反面来描绘，甚至写成小丑。让一个小丑来主持考古队的工作，那么丢东西就成了必然结果，文章也就更具有了典型性和轰动效应。”

“请您不要误会，我只想了解一点将军俑头案的真实情况，并不想把谁树成偶像，同时也不愿意把谁写成小丑。何况从美学角度上看，旦角生角与丑角一样地令人可爱。或许丑到极至便是美到极至呢！”我说出了我的本意，同时在走向他的心灵深处。

“你的话倒是满有些戏剧意味。”王学理依旧微笑着，但看得出他的精神渐已爽朗起来。

“生活本身就是一场大戏么！”我答。

他站起身，走到另一间屋里，抱出一捆打印的材料，顺手取了一份递过来。我一看，吃了一惊，足有三万字的材料清楚地印制着一个醒目的标题：将军俑头失盗的责任冤案为何平反不了

——我的第 30 次申诉

王学理

“你也在喊冤叫屈？”我问。

“有冤必喊，有屈必叫，这是我们国家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他答。

我点点头，望着材料暗暗地想，如果这份申诉书从第一稿起，每投寄一次誊抄或修改一遍的话，到现在应该是共有 90 万字经过了笔端，如此浩大的文字工程，即是令专写“三部曲”的作家也不得不为这位申诉者的毅力和精神所折服。由此可以想见，这个案子耗费了他多少精力和心血。如果把这些精力和时间用之于学术研究，那又是怎样的一种景况？

“这 30 次的申诉稿合起来可相当于三部长篇小说的文字数量。”我说着，内心有一种为这无效的劳动的惋惜之情。

他叹了口气，目光暗淡下来，似在为我的惋惜之情作解释：“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正在用自己的知识和才智向国家和人民作奉献的时候，却遭到政治上的打击、人格上的侮辱，学术上的限制，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已申诉二十多次，但却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眼睁睁地看着酿成的这桩历史冤案不能平反，我不能不再次提出申诉，我觉得争回人格和人权比做什么都重要。”

“您觉得文物局对您的处理不恰当？”我小心地问。

“不是不恰当，而是完全错误的。省文物局置自己 1985 年下发的行之有效的 66 号文件于不顾，并置管理混乱，底数不清，按局文件该移交而不交，

致使隐匿的俑头失盗的原秦俑考古队队长×××的直接责任于不顾，滥用权力，借助社会上不明前后两个考古队真相的错觉，巧妙地移花接木，撤销了同此案毫无牵连的我的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取消两年领队资格。这既推卸了自己按文件早应追查的逾期不交的责任，也庇护了关系网上的责任者。”当王学理一口气说完这番话时，脸涨得通红。显然他开始稳不住阵角而内心激动起来了。

“我看过文物局下发的 1985 年第 66 号文件，但对您说的前后两个考古队的真相和巧妙地移花接木等不明白，希望您能对此解释一下。”我说。

王学理从材料堆里找出一份复制的 1985 年第 66 号文件，用红蓝铅笔在上面圈划着：

一号坑内已展出的五个方内全部出土文物（包括南北展室的全部文物），由原考古队移交给秦俑馆，未修复的秦俑由秦俑馆负责修复、复位及五个方的安全、卫生工作。该项工作由杭德洲牵头交、马秀青接，限年底以前完成……原考古队将所有文字照片资料一式三份分别交给秦俑馆、省文管会和现秦陵考古队，该项工作由杭德洲牵头，限年底以前完成……逾期不交者要追查责任。

如果按此种圈划法，把所有带圈的文字排列起来，就成为：

“全部出土文物，原考古队移交，由杭德洲牵头。

原考古队分别交，不交者要追查责任。”

王学理放下铅笔，望着我的脸：“这下你该弄明白了吧，原考古队发掘的这批文物的交接双方是在它同秦俑馆之间进行，可以说是有单位、有人、有时间、有责任。这一切理所当然地同陕西省考古所无关，同秦陵考古队无涉，也自然同我王学理本人毫无牵连，当然我也不负什么责任。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1986 年 7 月 2 日，在省文物局一位领导的办公室里，杭德洲问我：‘省文物局叫把以前的文物交给秦俑馆，你说咋办？’我回答：‘由你交文物是早有规定的，还是按局里的文件办。’杭德洲说他工作忙，要屈鸿钧协助，并令我通知屈，我说我不能通知他，由你同他商量，他如果愿意协助你，只要他给我说一声，就算是把人交给了你。当屈告知我时，我说这不是咱队上的安排，你听老杭的吧。因为他们没有陶俑底数，不是照册清点，而是临时见俑登记，并从登记到同秦俑馆交涉，以至于一件件的点交，都是由杭德洲同屈鸿钧经手的，我并没有参与和闻知，当然不能说我有工作上的责任。何况原秦俑考古队向秦俑馆移交的这批文物没有按时交付，从 1985 年 11 月 29 日文件下达到 1986 年 12 月 2 日，拖期长达一年之久不见移交。在这期间，文物局没有任何文件或是口头通知委托现秦陵考古队代管。别说他们之间一年之久不交，就是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不交接，都与我毫无关系。因此，我没有事实上的责任。至于杂品库内存放的将军俑头，我王学理压根就不知道。一号坑在第一次发掘时，共出土四个将军俑，但原考古队向秦俑馆移交时，却少交一个将军俑头，并将其擅自藏匿于现考古队的杂品库内，因为在 1985 年 11 月 7 日，柴忠言（原考古队修复人员）把钥匙交给屈鸿钧时，其中是放杂物的一间普通房子，里面除两盘钢筋，九根半钢管、十多块杂木板、一个木案子，还有其它一点杂物外，并没有任何文物。有这两人移交签字的清册可证，而掌管钥匙后的屈鸿钧从来没对我说过里面有俑头。既然我不知道，当然也就不负法律的、事实的和工作上的责任。这一切责任应当归于把贵重文物不交，并乱塞于杂品库中的原考古队杭德洲同志，可文物

局不但对此不予追究，反而责诸于人，企图不是昭然若揭吗？将军俑头案发后，有人向公安机关建议将我王学理逮捕，但临潼县公安局却明确表示：只要发案时本人不在，就没有直接责任，因此也就不能逮捕。1987年2月17日，杂品库内的将军俑头被盗时，正值我在北京参加《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写会议，在2月13日去北京前，我曾三次委托主管考古队安全的刘占成负责工作，并向考古所石兴邦所长汇报过，25日晚从北京返回西安后，得知杂品库门被撬，26日赶到工地后摸清了情况并及时向省文物局和临潼县公安局报案，这一切足以说明，我非但没有事故责任，而且是有文物责任感的，作为邻居，我是尽到了道义上的责任的，因为这是邻居家中失盗，并非秦陵考古队失盗，由我主管的秦陵考古队文物库房和发掘现场，文物是清楚的，有安全保障的，并没有发生任何失窃事故。至于发生在1986年7月和1987年3月20日的两次一号大厅后部武士俑头被盗事件，责任者很明确，前者是原考古队在移交过程中丢失的，后者是秦俑馆接收后丢失的，两个俑头各有属主，均未交秦陵考古队代管。而1987年2月17日被盗的将军俑头则是原考古队该交而不交的私藏之物，理应追究其栽赃之过，怎能说是秦陵考古队连续被盗呢？三个俑头的连续被盗，恰恰反映了文物局主管领导的官僚主义和原考古队的管理混乱。舍此，别无他责。

“我王学理主管的经过重新组建的秦始皇陵考古队，辟有专用文物库房，新购有六个铁皮文物柜子，还有一系列安全措施。新发掘的五个探方，对出土的文物及时入库，库有登记，发掘现场又无文物差错。就原考古队掘的前五个探方文物及整个安全问题，我曾多次给省文物局呈送过报告，并进行过不只一次的敦促，可说是尽到了道义上的责任，但可惜没有引起文物局领导人的足够重视。

“早在1985年66号文件下达后，我就给局领导谈过这批文物的安全事宜，当时得到的批示是：马上就移交，你们应做好新的发掘工作。

“1986年6月29日之后，我曾多次报请确定考古队保卫关系，时至俑头被盗三个月后才口头答复，整整拖期一年的时间。

“1986年7月24日，省文物局一位领导人关于未移交陶俑人坑问题来到考古工地，当时我阐明了局文件规定的责任范围，也没有接受放俑的任务。按理说，应引起局领导人关于拖期文物安全的关注和重视。可惜的是，领导者事发前麻痹不仁，事发后凭权推诿。

“1986年11月19日之后，就个人占有文物、拒绝入库问题，我向局报告并多次催促尽快解决，直至将军俑头被盗过后四个月还迟迟未得到落实，从我报告之日起又整整拖了八个月之久！两相对比，谁有功，谁有罪这不是很清楚吗？说穿了，这次将军俑头被盗事件我只不过是当了个替罪羊而已，我相信这个冤案总有一天要平反的……”

“请问您在取消考古队院内经常性的昼夜值班制度、撤消值班人员时是怎样考虑的？”未等王学理把话全部讲完，我又提出了这个关键性的敏感问题。

“我没有取消值班制度，更没有撤消值班人员，您的提问使我感到茫然。”他答。

“那……”我没有说出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信息，但王学理分明已经已窥知了我的心情，他在猛喝了一口茶水之后，再次解释起来：

“1985年我接手工作后，鉴于人浮于事，在7月3日召开的干部会上，

就临时工做了明确的安排，干部也有了具体分工，同时加强了值班制度和人员的管理。在一号大厅内共安排 9 人值班，日值班 5 人，夜班 4 人，每班 2 人，日夜轮流，并由业务干部刘占成负责保卫工作。在生活区安排值班 3 人，另有 2 人作杂工并随时顶替，由业务干部鱼龙负责管理。

“1985 年 11 月 8 日，根据文物局及考古所关于人员整顿，确定放假的指示精神，我在学员大会上明确宣布：大厅留值班人员 8 人，生活区留 2 人值班，由刘占成同志管理安全保卫和统工工作。至 1986 年 2 月 5 日，在安排春节值班期间，确定大厅的 8 人不变，生活区增加到 3 人。3 月下旬，由于考古队即将进行发掘工作，根据新的情况我作了周密的安排。原来考古队的院子是向外开通的，游人可随便穿过，所以派人值班。而自从春节后有武警中队驻进秦俑馆，我亲自跑材料、找人员在营房同考古队间修筑了一道隔墙，并请人焊接了两付铁栅门安上，规定晚上 11 点锁门。从此，考古队有了自 1974 年发掘以来一直未有的独立的大院。这期间，我多次拜访武警中队，加强联系，以取得事实上的支持。

“将军俑头被盗前夕，我在安排春节值班时，明确指出责任范围仍是大厅和生活区，带班干部是家住考古队院内的刘占成同志，在我去北京前夕，就考古队工作先后给刘占成安排过三次，令其负责队里的工作。刘占成满口答应，一再说：你放心地走，队里有我呢！就在我去北京时，将文物库房的钥匙交给了刘占成。这一安排在 2 月 10 日，我曾向考古所石兴邦所长作过汇报。事实上，在我离开工地未赴北京期间，刘占成已开始主持队上的工作了。

“当将军俑头案发后，刘占成竟置事实于不顾，强词夺理说：石所长没叫他负责考古队工作，考古队也没有安排春节后值班，开工后值班制度是自然取消的云云。当我拿出记录后，他又说他只负责大厅的安全保卫工作。而偏偏不久大厅后部又丢失了武士俑头，这时刘占成怕承担责任，便又对前来工地调查的工作组说他只负责大厅前边的发掘，大厅后边是王学理主管，将责任无辜地推到我的头上。更令人奇怪的是，在春节放假期间、干部未归的情况下，作为副队长的我给刘占成交待了工作，文物局调查组则认为不算数，两人为啥不签字。而刘占成在案发后为逃避责任，竟编造出王学理只让他招呼大厅的假话。对这种话，我们的文物局不但予以相信，并且形诸于文件，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领导机关的文件还有什么严肃性可言？

“我认为，连续发生俑头被盗的事件，正像主管陕西省文博考古事业的副省长孙达人在省文物局的报告上所批示的那样：秦将军俑头的丢失，反映了你局、所严重的失职和渎职。除此之外，我还认为俑头被盗事件的发生，也是原秦俑考古队某领导人的过失。客观地实事求是他说，我非但没有直接领导责任，连间接责任也没有。要说有责任的话，也只能是邻居失盗我没有看见和没有听见的责任……”

时间在沉闷、激昂、忧郁、伤感的极为复杂多变的氛围中飞快地流逝，我借王学理先生再度掀动杯盖喝水的空隙提出辞别。当我站起身时，又禁不住看了一眼那堆倾注了申诉者心血和精力的材料，摇摇头，没有说话。王学理先生似乎已明白了我的心理，在送我下楼的同时作着最后的解释：“想我王学理已年届五十，正当拼搏、报效国家而取得成果之时，却遭受如此不白之冤，身心受到严重创伤。我数次不懈地申诉的目的，就是要求我们的党派人作详实的调查，恢复冤屈者的名誉，解我于倒悬。”

屈老汉说：我委屈

在见面之前，我读过他一篇名为《参加秦俑坑发掘的回忆》文章。那清新的笔调、优美的意境，无不令人感到作者心中热血的荡动和青春激情的喷涌——麦苗返青，布谷声声。我和几位多年的老伙伴告别了曾是周、秦、汉、唐等十一个王朝建都的西安，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骊山北麓，在秦始皇陵东侧三里的西杨村卸下了行装，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颇为漫长的秦俑发掘工作。……新的、美好的事物，对一个陌生的人来说总是好奇的、迫切的。如同战士进入战场，一切全都抛于脑后。而投入新工作的急切感，使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有意义的，连露水珠儿都带着泥土的清香。一栋茅屋、一座帐篷、一杯泥腥未退的淡水，勾住了我们的心，成了我们新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的新生活从这里开始了。

当我走进省考古研究所大院屈鸿钧先生的家时，迎接我的是一位白发苍苍、步履艰难的老人。自然规律不可抗拒。那个青春勃发、豪情满怀的时代一去不返，岁月的流逝、生活的磨难已使他垂垂老矣，再也没有昔日的激情与神采了。

望着他因患眼疾而双目近乎失明的病体，我不忍心将那件不快的事情提出来，去唤起他痛苦的记忆，给他多病的身体再加一层冰霜。但当我们的交谈就要结束时，他还是将那件事情毫不掩饰地提了出来。这让我深感不安的同时，也更清晰地感悟到他内心的疾痛与苦衷。

“事实上将军俑头丢失与我有啥关系？这个库房以前是柴忠言拿钥匙，柴调走后交给王玉清，后来王玉清退休又把钥匙转给我。将军俑头案发后，一些无耻的文人秀才们跟着瞎起哄，有家杂志登载的文中说我是保管员。我这个保管员是怎么来的？是会上决定的还是上级任命的？”

“我拿着钥匙，一没给贼娃子提供线索，二没给贼娃子开门。可有人却造谣说我和贼娃子监守并盗，引狼入室，这是哪家的逻辑？我从事考古工作三十余年，在许多遗址、墓葬的发掘清理中，我一个人用筛子筛出金豆、金泡之类的珠宝都如数上交。如果我有盗窃文物之心，就说没筛出来，或者筛出三个金豆我说两个，你又怎么去证实？人怎得凭良心说话和办事。

“有的领导说，给你老汉个处分，没有啥。既然没有啥，怎么不给你自己记一个？有些同志胡研究、胡决定，说钥匙你拿着，记个处分也不为重。我拿着钥匙就有罪？要是你拿着钥匙外出，你家中的钱财被贼娃子破锁而盗，还要给你治罪？”

“现在我已经老了，无力再去为这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四处奔走呼号，争取平反昭雪。你说有罪就有罪，你说没罪就没罪。现在看电视，哪个朝代还没有几个屈死鬼。你再翻腾，是上级大，还是你大？任他们去吧，反正我感到自己的有生之年也不会太长了……”

握别的时候，屈鸿钧先生站在门口，左手扶住门框歉意他说：“我的眼睛看不清路，我不能远送你了。”

我点点头，默默地一个人走了出来。当就要跨出那个狭窄的小院时，猛回头，见他依然立在那里静静地望着我。满首的白发、如柴的身体、迟钝的目光……无不作着风烛残年的警示，我感到在这一切的背后潜藏着一个可怕的征兆。

我再次迈开步子向外走去，一阵凉风吹过，竟有两颗温热的泪珠从脸上滑落下来。

蚂蚁的故事

怀揣一颗沉甸甸的心，我走进陕西省文物局的办公楼，希祈在这里能对积聚在脑海中的诸多问题有个全面的解答和感悟。

在一间挂有“党委”和“纪委”两个牌子的办公室里，我向工作人员出示了介绍信并说明来访之意。

看得出，负责纪检工作的两名工作人员对我的来访很感为难和棘手，以极度的小心，谨慎简单地回答着我的提问。这种小心谨慎以致使他们自始至终都未向我透露自己的姓名。

“我们对这几位同志的处理情况及事实依据都根据省人大、省政府领导的意见重新作了复查，复查后仍然没有发现新的证据和理由推翻原来的决定。”工作人员说着从柜子里拿出一份“陕文物党（88）2号”文件递给我。由于他们事先向我作了只准看，不许记录和复印的规定，我只有凭记忆大体地记下了文件的内容：

一、省文物局正式对省考古研究所批复，将“秦俑考古队”改为“秦陵考古队”。考古队除改换名称和更换领导外，其余工作人员基本未动。将军俑头被盗案发生在王学理任期内和直接管辖的考古辖区内。

二、将军俑头被盗原因是取消值班制度，王学理于1985年11月8日亲自将昼夜值班改为只在重大节假日值班。由于王学理同志的错误安排，致使院内空虚，出现俑头被盗的重大责任事故。

四、……

复查文件交还对方后，工作人员总结性地对我说：“这个问题从最早的处理一直到后来的复查，我们都比较慎重。局长带人做了几个月的调查了解工作，证实了以前的处理是正确的，没有新的理由和新的事实可以推翻原来的处理决定。国家珍贵文物丢失了，内部没有一点责任吗？如果平时安全保卫措施落实得好，文物是不会丢失的。作为考古队的直接领导和管理者受个处分的处理并不过分。在案发后不久，司法部门要追究直接领导和管理者的刑事责任，我们文物局领导出面把责任承担了下来并归到文物局并作内部处理，他们才免于刑事责任。现在领导有些后悔了，要是当初不出面，推给司法部门处理，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麻烦……”

临走的时候，一位工作人员曾反复地亲切叮咛我：“你最好不要卷入这个是非之中来，试想，你否定文物局，说文物局处理得不对不行，要说文物局处理得对，受处理者不对也不行，只要你的态度倾向一方，另一方就可能要和你打官司或到单位去告你，到那时你就会感到进退两难，陷入这个问题的是是非非之中而不能自拔，别想再以清静的心态去搞你的事情了……”

我点头称是，我说我没有对这类问题作出对与错的判别的义务，只有客观描绘生活、再现生活的责任，而文学的迷人正是确有那么一些作家出神入画地描绘了生活，而不是生硬地去干涉生活。作家有对生活参与的权利，但这种权利是受到局限和有尺度的，倘有过分的热情或过火的举动，都可能酿成不堪设想的恶果。前车之鉴，尤在眼前，我自记之慎之。

在返回秦俑馆的路上，我为我的西安之行而暗自叫苦。我知道自己事实上已陷入如同秦俑坑的焚烧一样争论不休、难以决断的泥沼。问题的本身如同我的采访，转了一个大圈后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一时难以找到新的路子去冲破这个圈子从而摆脱困惑。这种企图寻找一种理想答案而面对现实又无可奈何的困惑，一直在我的身心缠绕，直到我返回北京后的若干时日都未能

摆脱。

在极度的困惑与痛苦中，我把将军俑头案发生的经过以及对王学理等人的处理情况向同室一位正在文坛走红的作家李鸣生阖盘讲出，希祈得到他的帮助。

“我想在作品中再现这个案子以及和这个案子有关的所有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只是不知从什么角度写起，如何写起？”

他在屋里走了几个来回，沉思了足有半个小时，突然抬起头说：“我想给你讲个故事。”

“不管讲什么，只要能给我一点启示就算没白费时间。”我点头应允。

“在非洲的原始森林里，生长着一种不大的蚂蚁，这种蚂蚁深感自己弱小的个体无法和其它强壮的动物争食觅先，便组织起来，在森林里排开数十米的阵线向前推进。于是，奇迹出现了，森林中无数巨蟒在他们的攻击中最后只残存一幅骨架，威震山野丛林的虎豹也呈望蚁而逃之势。小小的蚂蚁几乎成为非洲原始森林的主人。一天，当蚂蚁大队人马开到一个高坡时，突然遇到了一股山火，大火在风的席卷中向他们扑来，成千上万的蚂蚁瞬间将有化为灰烬的可能。就在这危急时刻，排开的蚂蚁大军迅速向中间云集，最后抱成一个巨大的圆团向山下滚动。烈焰升腾，烟雾弥漫，滚动的蚁团在大火的烤中发出叭叭的炸裂声，外围的蚂蚁纷纷坠入火中化为灰烬。但蚁团没有散开，仍旧越抱越紧、越滚越快地向坡下冲去……最后，巨大的蚁团终于摆脱了大火的包围，避免了整体的覆灭。这支大军又排开数十米的阵线纵横于丛林之中……”

李鸣生讲完这个故事，静静地望着我，很是自信他说：“将军俑头案的一切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其最深层的原因和悲剧性结局都可从这个故事中得到揭示的钥匙和答案。”

我一时没有完全感悟这个故事与将军俑头案的内在联系，但却隐约地体会出一种味道。这个蚂蚁的故事到底给予这个案子什么样的启示？我在久久地思索着。

第十二章 秦陵地宫之谜

中国古代的杰出文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望以后随着技术的发展，会有更大的考古发现。

——斯里兰卡总检察长西瓦·帕苏帕蒂

史籍觅踪

兵马俑军阵和铜车马的出土，无疑使全人类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人们在为这伟大的历史奇迹惊叹的同时，也把视线投向了这伟大奇迹的母体——秦始皇陵地下宫殿。这是一个更加神秘莫测、令人心驰神往的更加伟大和更难令人置信的奇迹。

关于秦始皇陵地宫的结构和形制，在浩瀚的史籍海洋中，不难窥见对它的记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对秦始皇陵的修建及地宫形状作了这样的披露：

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

继司马迁开记载这段历史和秘密的先河之后，又相继出现了许多关于秦始皇陵修建、焚毁及地宫形状的记述。如《汉书·刘向传》、《水经·渭水注》、《三秦记》、《三辅故事》等。但这些记述均有明显地从司马迁《史记》演化的痕迹。如汉代的史学家班固在他的得意之作《汉书·刘向传》中这样描绘：

秦始皇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三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项羽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棺椁。

而北魏的地理学家酈道元在他所著的《水经·渭水注》中，则描绘得更详尽：

秦始皇大兴厚葬，营造冢圻于骊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藏焉。

斩山凿石，下锢三泉，以铜为椁。旁行周回三十余里，上画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狱九州具地理之势，宫观百室，奇器珍宝，充满其中。坟高五丈，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能灭。除此之外，还有这样一连串的记载：

死葬乎骊山，吏徒数十万人，旷日十年，下彻三泉。合采金石，冶铜锢其内，漆涂其外。被以珠玉，饰以翡翠。中成观游，上成山林。为葬骊之侈至于此……

——《汉书·贾山传》昔始皇为冢，斂天下骊异，生殉工人，倾远方奇宝。于冢中为江海川渎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沉檀为舟楫，金银为凫雁。以琉璃杂宝为龟鱼。又于海中作玉象鲸鱼。街火珠为星，以代膏烛。光出墓中，精灵之伟也。

——王嘉《拾遗记》始皇葬骊山。……下锢三泉，周回七百步，以明月为珠，鱼膏为脂烛，金银为凫雁。金蚕三十箱，四门施微，奢侈太过。

——《太平御览》引《三辅故事》始皇冢中，以夜光珠为日月，殿悬日月珠，

昼夜光明。

——《太平御览》引《三秦记》始皇冢，……燃鲸鱼膏为灯。

——《太平御览》引《三秦记》关东贼发始皇墓，中有水银。

——《太平御览》引《皇览》以上引文尽管给人们提供了很多饶有兴味的材料，

但内容驳杂而多有舛误。

至于这座地下宫殿到底是如何模样，资料却是鲜之又鲜。在种种不同的记载中，唯有东汉的卫宏似乎脱出了司马迁的框子，另避蹊径，对秦始皇陵作了不同侧面的记述。其中《汉旧仪》中一段记载丞相李斯向秦始皇的陈奏，成为历代史学家研究秦陵地宫的重要依据：“……深极不可入，奏之曰：丞相斯昧死言，臣所将隶徒七十二万人治骊山者，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可燃，叩之空空，如下天状。”“凿之不入，烧之不可燃，其旁行三百丈乃至。”

不难看出，继司马迁之后的文献史料，对秦始皇陵及地下宫殿的描述，越来越庞杂繁多，神秘莫测，令人惊骇。秦陵的地下建筑均像咸阳都城的宫殿并有百官位次。深邃而坚固的地宫，不但砌筑上纹石和明珠为日月星辰，下面还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埋藏着无数珍奇动物及物品的地宫中，尚有用人鱼膏（据说是一种生活在海中形似人的四脚鱼）做成的蜡烛永不熄灭地燃烧放光，使地宫常年形同白昼。为防止盗墓贼进入，工匠在地宫门口制作了神奇的机关暗箭。倘盗墓人一旦接近墓门，便暗箭齐发，将其毙命于墓中……

随着时间的流逝，秦始皇陵地宫越发神秘莫测，一些似是而非，真真假假的故事也在正史和野史中不断出现。

据《临潼史话》载：秦始皇驾崩后，胡亥怕“沙丘之谋”泄露，众公子争夺自己的皇位，于是假传始皇遗旨，命众公子殉葬。之后又下令“‘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此旨传出，后宫妃嫔多半无子，顿时号陶大哭之声响彻殿宇。胡亥丝毫不加怜悯，将无子的妃嫔全部带入秦始皇陵园，以武力强行驱入地宫深处，绝望的妃嫔有数人当场撞死在地宫内，有的早吓得昏死过去，尚有大半正慌乱无主之时，胡亥已命工匠把地宫第一层宫门封闭了，妃嫔均死于其内。当工匠把地宫之门封闭到最后一层时，为怕地宫秘密泄露，胡亥心生毒计，下令所有参加修建陵内地宫的工匠、刑徒到墓中看戏领赏，当工匠、刑徒云集地宫之时，军兵侍卫就将最后一道地宫门封闭，工匠、刑徒又成为始皇帝的殉葬品。传说只有一青年工匠逃了出来，原来地宫内通向外面的水道是青年工匠亲手设计而成，被闭于地宫后，他悄悄潜入水道慢慢爬了出来……至于这青年工匠沿着怎样一条水道爬出地宫，出来后又去往何处，则无人知晓了。

项羽入关后在挖掘秦陵时，突然有一群金雁从地宫中飞出弥布天空。三国时吴国宝鼎元年（公元266年），张善在日南（今越南广治省广治河与甘露河合流区域）做太守时，有人把一只金雁献给他。张善根据金雁身上的铭文，推断是秦始皇陵内的陪葬品。据现代考古研究者张文立先生推断，这传说中精巧能飞的金雁出自秦始皇时代是可能的。因为在春秋时，著名工匠鲁班已经造出了在天空中飞翔的木雁并有飞到宋国城墙之上的记载，至几百年后的秦始皇时代，工匠造出会飞的金雁是可信的，但这金雁到底是否出自秦始皇陵地宫之内则无从考证。据民间传说，秦始皇还在陵区设了可让活人同死人做生意的地市，进行经济贸易。至于这个集市的经济贸易如何进行，活人与死人怎样讨价还价，同样没有人说得清楚。不过据传说，秦陵南部上陈

村一个七十余岁的老人在打井时发现了一块光滑的大石板，召集众人掀开后，见是一个极深的地下空间。派两青年人腰捆绳子持火把下去打探，两人上来后说地下空间大得看不到边际，里边有石室，室内倒卧着许多披红挂彩的美女，四周摆着石凳、石椅，还有许多铜质的器物。村人以为遇到了阴间鬼魂，忙撒些硫磺、石灰入洞内，将石板盖平后，又用土复填起来……在秦俑坑发掘之初，考古工作者曾跟那老头去找当年打井的位置，可惜自 1958 年以来当地多次兴修水利和搞农田建设，井的准确位置已无处寻觅。据考古研究者推测，这地下洞穴也许是秦陵地宫中的附属建筑，是供皇帝娱乐或是像传说中的集市一样的贸易场所。

陵墓地宫的真实推断

自秦兵马俑坑发现之后，经过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地质学家等多学科组成的研究者的共同努力，经过十几年的苦苦探寻，关于秦始皇陵地下宫殿的历史真实在逐步探明，而在这一探寻和研究过程中，秦俑考古队常务副队长、著名考古学家王学理以及著名考古学家程学华都作出了非常的里程碑式的杰出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地宫”，绝不是后人想象中有似于地面上的那种宫殿建筑，它实际上不过是人们对埋葬死者及其随葬品的墓穴的一种雅称罢了。

据著名考古学家王学理的研究，秦始皇墓内的地宫，的确具有宏伟壮丽的规模。经现代科学测试手段分析，它也确实突破了人们已知的秦代建筑水平。从总体上讲，它只能是，也必然是一个巨型的石砌周壁的竖穴墓矿，然后再附设一些回环相连的隧道式的别室和墓道耳室。而内部结构则是由石、砖、木料组成多级桁架式建筑拱卫穹窿顶的群体建筑。因此，同人们所见到的古代陵墓一样，秦始皇陵地宫也大致分为墓室、别室（侧室），墓道三个部分。

墓室是始皇陵地宫中放置棺槨的主体墓穴，或称槨室。据测知，秦始皇陵地宫上口起掘的范围很大，南北长 515 米，东西宽 485 米。在这个地宫上口之内，经施工处理，由四面向内收一段距离后，筑“方城”一周。方城四面辟门，其中惟东面有五个门道，为避免陵区雨水径流灌注墓室而造成塌方，除采取导流措施外，还在方城之内收分、斜行地向下挖掘墓扩。而在墓底，再壁直地挖筑槨室。秦始皇陵室这个由巨型的竖井式圹穴构成的三维空间，犹如一个倒置内空的“四棱台体”，也即是考古学家常说的口大底小的“仰斗”状。事实上，自春秋到秦汉间的大型土圹墓，斜壁上都带有多级台阶，像已出土的秦公一号大墓就有三级，而杨家湾汉墓则有五级。那么，秦始皇墓中的周壁根据“数以六为纪”（《史记·秦始皇本纪》）规定，就可能有六层台阶环绕着。如果从透视的角度看，整个墓室就是六个由大到小的倒四棱台叠加而深入地下的大土坑。

《关中记》曾说过汉陵“方上”的面积是一百二十步，而汉陵封土堆基部的底面积大于上口的这种合理结构，显然是承袭秦陵而来。秦始皇陵家经过漫长历史的风风雨雨，终使它由原来周长 2087.6 米缩小到现在的 1390 米，足见它被历史的风雨无情地脱去 70~82.5 米的一层“厚皮”。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在这脱掉“皮层”的地方，即现在陵冢的周围，下深 8 米，即是地宫上部的外围建筑。据考古专业人员测知，墓扩上口有一道高和厚各约 4 米的“方城”，南北长 460 米，东西宽 392 米，其顶部距今地表只有 2.7—4 米。

在这周长 1704 米的四边正中有斜坡门道，其中南、北、西三面各一，东边有五。门道宽达 12 米，已用夯土填实。由探知的墓底强夯区得知，这个范围东西长 160 米，南北宽 120 米，并很可能就是椁室所在。

关于墓室的结构问题，我们不妨援引王学理、程学华等考古学家所总结的考古资料作推导，也许有更多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已经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上自殷周、下迄汉代的大型陵墓，凡是在平川地带营造墓室者，无不穿土为圹，作成朝天的竖穴墓椁墓，椁顶横铺原木，填土夯实，与地平齐。已经发掘的王侯大墓，如殷墟侯家庄西北冈“亚”字形大墓、武官村“中”字形大墓、妇好墓、凤翔的春秋时期秦公一号大墓、咸阳杨家湾汉墓等，都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很好的例证。至于战国晚期，虽然已经开始出现了洞室墓，但这还只局限于小型墓葬。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墓穴固然是大型的洞式墓，也开了“以山为陵”的先声，但这属于凿山为藏的另一种类型。另外，像湖南长沙象皮咀的吴氏长沙王墓和陡墓山曹■（长沙王后）墓，则为我们提供了西汉文、景二帝时期诸侯王墓的典型材料。这两座墓都具有较为复杂的木结构墓室，它包括着前室、后室、两层回廊、甬道等部分，内置“题凑”、两重木椁和三重套棺。其结构特点是摆脱了传统“井椁”的固有形式，在木椁室前端已经设了门，原来的头箱、边箱和脚箱分别演变为前室、回廊和后室，而前室又分外高大、宽绰，处于突出的地位。内置案、盘和果品，象征宴享或祭祀之所；回廊则由若干个小室组成，后室则放置棺。显然，这是模拟地上宫室建筑而来。那么，具有更大规模，而时间早此四、五十年的秦始皇墓室结构，岂能挥邪嗤 β 穉炕厄鸱比皇强隙 i 摹*

秦始皇陵所在的地理形胜固然优美，但它却处在骊山北麓大水沟口的山前洪积冲积扇的前缘地带。这个冲积扇的扇心在陵区陈家窑到杨家村一带，而扇缘部分却很宽大，东西跨越焦家和董沟之间，几近两公里。陵冢南北的坡向呈正方形的阶梯状倾斜，由南往北递减。反过来从地望上看，陵园北部的坡度只有 1° 左右，南部在 2° 上下，再由上陈到杨家就增至 3°。而陵东西两侧呈凹槽状，坡度变化也大。据考古探测，两侧的冲积覆盖层由砾石、砂砾、亚粘土、泥砂和粘泥混合组成，其中心厚度可达 150 米，这样的地形、地质构造，使当时在选择陵墓地宫的具体位置时，就无疑地要面临一对突出的矛盾。即：冲积扇心的地势虽然高亢、富有气势，但地面狭小，砾石很大，而同一高度的杜家村和董家沟之间，固然开阔，但地质结构疏松，稳定性差，其扇缘部的上焦至岳家沟一线以北，砂砾、黄土层尽管深厚，却地势偏低。于是，聪明的陵墓设计者优选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在“营建矿冢”上下功夫。这就是：在地面开阔而地势偏低的黄土地上深掘圹穴，加高封土。这样，就把利用自然形势和人为地改造形胜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从而在“骊戎之山”旁边又矗立起一座人工的“山林”。

在推测秦始皇墓穴深度时，人们怀疑通风问题是秦代施工技术上难于解决的问题。这实际是把墓室误作纵深的洞穴而产生的疑虑。如果确认其是大口朝天的竖穴，也就不会产生难以通风的疑虑了。至于深地取土，则属于高程运输，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是不算复杂的。

当这些问题和矛盾都被消解之后，在深而大的“地宫”里，其顶部的建筑形式同样是一个值得研讨的课题。

作为竖穴石圹的秦始皇墓室，其跨度和进深，肯定也是超巨型的。从已掌握的考古材料看，展示给我们的思路只能是：在桁架结构上考虑墓室顶部

构造。因为秦代的建筑技术还不能解决无柱的大跨度屋架问题，一些地面上的大型建筑物，特别是宫殿，还多沿用殷周以来流行的高台建筑形式。如咸阳原上的秦一号建筑遗址，原是一座平面呈曲尺形的夯土高台，上下有三层。经复原，其顶部正中是高耸雄伟的两层主体居室，南临“露台”，北邻设有平座和栏干的“榭”，东门通“曲阁”上“阁道”。在主室四周有上下不同层次的小间，围绕高台层排列着七个出檐设廊的单室。这一宫阙建筑突出的特点是，把不同用途的房间安排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结构紧凑，排列得体、高下错落而又主次分明。另据《史记》载：阿房宫建筑规模是“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今天人们看到的阿房宫前殿遗址，仍是一个东西长 1300 米、南北宽 500 米、高达 10 米的夯土台基。推想而来，其建筑结构也不外乎围绕土台作多层安排。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都向人们反映出这么一个事实。即秦代的大型建筑靠着都柱及其栌（斗）、栳（拱），承托着■瘤（大梁），再配合以壁柱，组成一套木构架系统，从而解决屋架大跨度问题的。这个事实，就为研讨秦始皇陵地宫顶部的结构问题，提供了有关技术的借鉴。

与此相关的是，作为大型地下建筑的秦兵马俑坑，也为探讨这一课题提供了范例。俑坑下部由一道道东西向的承重墙把大坑隔成一条条室档，下铺条砖，从而形成放置兵马俑的“过洞”。在过洞西侧，有壁柱嵌入承重墙内。柱间下垫木、上架梁，成为纵向的支承骨干，再在梁上横铺密桁。众多的木物件结合部通过榫头卯眼而构成整体结合、稳定性良好的木构架网络系统。这种既有多跨的宽容度、又有延续的进深性作法，对于我们了解地宫的建筑无疑是一种理性并富有现实意义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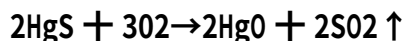
在这些启示下得出推论的秦始皇陵到底是什么样子？据考古学家王学理推断：秦始皇陵墓室底部的平面形状，同墓室上口一样，近于长方形。底面积 19200 平方米，相当于 48 个国际标准篮球场。如果“上具天文”指的是在平板的木椁顶或石顶上画些日、月、星辰之类，哪还有什么“天文之象”的意味？其实当时人的天宇观早已形成，天是苍穹，呈拱形，像个倒扣的蛋壳，地是方的，有如棋盘，天际之处，连接四海。“三光隐映，以为昼夜”，正是此处的形象。可以说，秦始皇陵地宫，在平面布局上是分区的，在立体上环周壁却是分级的。主体建筑作穹庐顶，居于突出地位，其他如百司衙署、离宫别馆，则是许多大小不同、规格各一、自成单元。而这些群体建筑，通过一套柱、梁、枋、檩、檠等木构件和墙、阶、角、隅组成一个桁梧迭、隆顶穹空的巨型砖石和土木混合结构以承托陵冢的荷载。如再加上墓圻周壁上数重台阶的楼、阁、亭、榭，就显得上下错落，变化有致。地宫上部，以宫墙（方城）环绕，阙、楼连属，俯瞰宇内，气象博大，蔚为壮观——这就是秦始皇陵墓地宫的辉煌构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地质学家利用现代地球物理化学探矿方法，对秦始皇陵先后进行了两次测试。他们先在秦始皇陵封土之上钻眼取土作为地质样品，经过精密的室内化验，惊奇地发现土壤中的汞的含量为 70—140ppb，从最深处取出的土质含汞量可达到 280ppb，测试结果表明秦始皇陵地下埋有大量的水银。为排除秦始皇陵封土本身就带有大量水银的可能性，地质工作者详细地查找了史料中关于秦陵封土来源的记载，其中酈道元的《水经·渭水注》记载较为详细：“鱼池水出骊山东，本导源东流。后始皇葬山北，水过而曲行，东注北转。始皇造陵取土，其地淤深，水积成池，渭之鱼池也。”

这段记载告知后人，骊山的泉水本来是向北流动的，因秦始皇建陵筑起长堤，泉水才折北向东。至今在陵南约 3 公里处还有一段长约 1500 米，高近 10 米的长堤残迹。同时记载还说明秦陵用土取之鱼池。至今在始皇陵以北约 1.5 公里的鱼池村南尚有一大坑，其容积超过秦陵封土的体积。

1982 年 5 月，地质工作者再次来到秦始皇陵，并特意从鱼池村坑中取土化验，其结果表明鱼池坑中的土壤含汞量仅为平均 35ppb，比秦陵封土的含汞量平均值约低 8 倍。如果酈道元的记载无误，这说明鱼池村坑中的土壤原来含汞量微乎其微，运到秦陵之后才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表明是来自秦陵地宫内水银挥发所致。以此类推，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的秦始皇陵地宫“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是可信的。

既然司马迁的历史记载是可信的，那么，从已测知秦始皇陵的强汞范围是 12000 平方米来看，如果按有的学者根据有关资料把储汞的厚度暂以 10 厘米来计算的话，则墓穴内水银藏量的体积应为 12 亿立方厘米。据现代科学提供的依据，汞在 20℃时的密度是 13.546 克/立方厘米。那么，始皇陵内原来藏有水银的理论数字应为 16255.2 吨。因为陵内是“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要流动起来当然就不是平铺地倾入墓底。如按已掌握的汞藏量和现代汞的生产能力，估计陵墓内储有水银应是 100 吨左右，如果这个数字能够成立，再由丹砂炼汞的比率（86.26%）推算，始皇陵内的巨量水银需由约 115.928 吨丹砂提炼而成。聪明的中国古代炼丹家，很早就发明了用石榴罐加热使硫化汞分解而得到水银的方法。这个生产过程用现代的化学分子式列出便是：



秦始皇陵地宫内储有 100 吨水银，这在今天的人类看来，似乎是个难以置信的数字。假设这个事实成立，用什么方法或证据来加以证实呢？或许，只有从有关的文献记载和始皇陵区附近的汞矿等方面来考察更合乎逻辑。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说过：“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擅其利数世，家颇不赀。”从此记载的补充“徐广曰：涪陵出丹”来看，这里应指今天的四川彭水县。《新唐书·地理志》载：“溱州土贡丹砂。”溱州便是今天的四川綦江县。另据地理资料知，酉阳县也有产汞的历史。由此可见，在今天的四川东南彭水、綦江和酉阳地区构成了一个产丹砂的三角带，而在这个三角带中，又以彭水产丹的历史为最早，时间也最长。实际上，与之毗邻的贵州省的汞的储量、产量目前居全国之首，其中与四川彭水三角区不远的铜仁、德江、思南、桐梓等县也早有盛产朱砂、水银的记载，而这些地方发现和开采的历史不晚于川东南三角带，或者更早些。

另据《宋史·食货志》载：“水银产秦、阶、商、凤四州，有四场。”又“朱砂产商、宜二州，富顺监有三场。”今天的山阳县，自唐以后属商州，在县西南金钱河上游的西坡岭、丁家山、石家山有汞锑矿，至今仍在开采。而《元和郡县志》曾说：“兴州（今略阳县）开元贡朱砂”、“长举县（今略阳县西北）接溪山在县西北五十三里，出朱砂，百姓采之”，历代不绝。

再据《明一统志》载：洵阳县“水银山在县东北二百四十里。山出水银朱砂，有洞”。经现代地质部门勘探，在公馆和竹筒两乡相接的大小青铜沟一带，竟是一处长达百余里的特大汞锑矿床，定名“公馆汞矿”，其藏量居西北地区之首，列全国第三位。据古矿洞中采集到的遗物判断，其开采的历

史可远溯到汉代之前。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巴蜀寡妇清之所以载之于《史记》，正是她家数世开办汞矿致富而又适应了秦始皇对汞的需要，至于洵阳、山阳、略阳等县采汞的上限年代虽不能确证始于秦代，但通过政权力量和专制手段迫使全国交献的事实未必都详录在案。所以，就不能排除地处秦地、采运均称便宜的这些地方采汞的可能性。因为由公馆到两河关（乾河同旬河交汇处），可溯旬河水运到宁陕，后沿子午道抵达长安，再转秦陵，全程不足 300 公里。由山阳到商州，本来有一条古道相通，再走武关道，直驱秦陵，也不过 230 余公里。至于远在巴蜀的丹砂和水银，当是跨长江、溯嘉陵江而上，沿米仓道或金牛道越过巴山，经汉水，再通过褒斜道、傥骆道或子午道这些“千里栈道”，源源不断地运到关中的。

从汞的产地和运输航线看，始皇陵内有 100 吨水银似是可能。但既然“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就必有川、河、海的流动，至少当初的设计者是这样构想的。那么，这些水银形成的江河湖海又是如何流动的呢？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史记》中“机相灌输”和《汉书》中“机械之变”的记载，对这千古之谜似应有所悟。在古代“机”的含义只能指机械，而同近现代以热能和电能为动力的机械、机器却毫不相干。“灌输”当是流灌输送的意思。而“相”字在这句话里却至关重要，它把“机”同“输”两者联系了起来，由机械推动水银流动，再用“灌输”的力量反过来又推动机械运动。如此往复不已，以期达到水银流动不辍。然而，这种构想应该算是设计者或建造者的一厢情愿，因为根据能量守恒和转化的科学原理，任何不消耗能量以求作功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事实证明，这种努力也只能是无法实现的徒劳。由此推知，始皇陵内的“水银河”是无法也不可能长期流动的，它只能在机械的推动下缓缓地“流动”一段时间，然后进入枯竭状态。遗憾的是，今天的人类尚不能确切地详知创造以水银为江河大海流动的壮举，使用的是怎样一种神奇的机械。

当然，秦始皇地宫内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神奇造诣，其真实用意恐怕还不是主要象征气势恢宏的大自然景观。如同吴王阖闾、田齐桓公古墓中以“水银为池”一样，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防盗。历史的经验提醒人们：“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掘之墓也”（《安死》）。由于水银的熔点是 -38.87°C ，即是在常温下的液态也极易挥发，而汞本身是剧毒类药物，人一旦吸入浓度汞气，即可导致精神失常、肌肉震颤而瘫痪，以至死亡。墓中“以水银为池”，便可扩大汞的蒸气挥发层面，使毒气发挥更大的作用。秦始皇墓内用“机相灌输”的方法来搅动水银，不但使摹拟的江河“奔腾”起来，而且弥漫在墓内的高浓度汞蒸汽，可使入葬的尸体和随葬的物品长久保持不腐，更重要的是还可毒死胆敢进入地宫的盗墓者。

始皇陵地宫的形状已经推断而出，那么这位千古一帝的棺槨又是个什么样子？

自兵马俑被当地农民发现之后，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对于兵马俑和秦始皇陵的研究者越来越多。七十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版的《国家地理》杂志上，插图作者杨先民先生在图中曾根据科学推测，把秦陵地宫中装载棺槨的龙舟放置在以水银聚成的河流中间。对于这幅插图，有研究者认为，水银河穿梭于摹拟宫殿的槨室及山岳之间是有根据的，这从测得的汞异常区正当陵

冢中心部位即可印证。但这幅插图也自有它的不足和失误，其重要的一点便是把史书上记载的“游馆”当成了“游移之棺”，而这个失误所依据的历史记载就是《汉书》上的“石椁为游馆”的说法。在《史记》中，司马迁在谈到秦始皇陵地宫时，只是谨慎他说过“下铜而致椁”，并且是放在“穿三泉”之后叙述的。由此可见这是施工程序中两个先后相接的步骤。这里的下应是投入、投放的意思；致，应作达到来讲。当中国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艺技术的进步，棺椁之制作则趋华丽奢靡。从已出土的曾侯乙墓的椁室来看，其室是用380立方米的木材垒成，其主棺为两层的套棺制，并制作得十分考究。“外棺”的四周和上下两面用22根重达3200公斤的铜材构成框架，再嵌以木板，拼成完整的棺身、底和盖。如果按曾侯乙墓的规模推测，秦始皇陵地宫中的椁也应是采取了同曾侯乙墓中外棺相似的作法，不同的是椁比棺的规模更大、装饰更为华丽罢了。历史兼地理学家酈道元把这种做法称作“以铜为椁”，似能说过得去。

在此之前的《史记》和《水经注》都称作“下铜致椁”或“以铜为椁”，而《汉书》却偏称“石椁为游馆”，这岂不是一对大的矛盾？

如果班固的《汉书》有些道理，我们只能这样认为，前者说的是主椁，后者指的是椁室。从已出土的曾侯乙墓看，椁室的内部隔成北、中、东、西，各作长方形的四室。东室是放置墓主人之棺的主椁，即“正藏椁”，其它各室均属“外藏椁”，中椁放礼乐器，西椁殉人，北椁置车马器和兵器。以此推测下来，秦始皇陵地宫的“正藏椁”很可能就是所谓“以铜为椁”，而“外藏椁”的各室彼此相连又同各侧室相通，如果这个格局能够成立，便构成了回环往来的趋势，从而也就自然地构成了优游之棺。也正因为椁室用石砌筑周壁，同挖墓室时“塞以文石”的做法一致，所以，这种椁室就被班固在《汉书》中演义成“石椁为游馆”。

关于古代的陵墓，大多有脂烛长明，弩戎不虞的传说，这些传说为本来就阴森神秘的陵墓又增添了一份恐怖。至于气魄恢宏、历史悠久的秦始皇陵地宫，人们对这种传说更是深信不疑。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有始皇陵中有“人鱼膏为烛”的记载。所谓“人鱼”应指今天人们常说的“娃娃鱼”或“山椒鱼”。这种鱼在今天中国的许多地方仍有分布，但数量却不是很多，因而已列入珍奇动物的保护范围。

“人鱼膏”在很多典籍中都写作“人膏”、“鱼膏”，这很可能是流传中的笔误。在古籍上常有用鮟鱼、人鱼、孩儿鱼、鲛讷来代表“娃娃鱼”的，其学名叫“大鲵”。据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王学理先生的研究，鲵的另一种解释便是“雌性的鲸鱼”。他在研究中指出，由于鲸鱼属于大型水栖类哺乳动物，体长、肉美、脂肪多，用其脂膏点灯便有了经济的意义。当年秦始皇在东海令人以连弩射杀过的大鱼便是鲸。有的科学家曾作过这样有趣的推算：用鲸脑油制成的蜡烛，一支的燃烧值是7.78克/时，一立方米的鲸油可以燃烧五千天，秦代人之所以用“人鱼膏”作烛，大概是利用了耗油少、燃点低、不易灭的这一特性，用作照明相对可以保持持久。但从已出土的北京十三陵明定陵地宫中的“长明灯”来看，在陵墓中要做到“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隔绝了空气，燃烧也就成为泡影。想来秦始皇地宫中的“长明灯”，也早已熄灭若干个世纪了。

如果打开秦陵地宫，其间安装的弩弓是否还能发生作用，这同样是研究者和好奇者感兴趣的课题。秦始皇陵内安装的弩弓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现在尚无确切的定论。但就秦俑坑出土的弩弓来看，其弓干和弩臂均较长，材质可能是南山之“柘”（山桑），当是性能良好的劲弩。据考古学家王学理先生估计，这种弩弓的射程当大于六百步（合今 831.6 米），张力也当超过十二石（合今 738 斤）。这样远射程、大张力的劲弩，单靠人的臂力拉开恐怕是困难的，只有采用“蹶张”才能奏效。如果把装有箭矢的弩一个个连接起来，通过机发使之丛射或是连发，就可达到无人操作、自行警戒的目的。这种“机弩矢”实际上就是“暗弩”。因为秦始皇陵内藏有大量珍奇异宝，为了防盗，就在墓门内、通道口等处安置上这种触发性的武器，一旦有盗墓者进入墓穴，就会碰上连接弩弓扳机的绊索，遭到猛烈的射击。这一做法，被以后汉唐陵墓所继承，有些史书也详尽地记载了这一事实。据《录异记》载：唐僖宗末年，一个盗墓贼被凤翔府官差抓获，当府曹李道审问时，盗墓贼说他“为盗三十年，咸阳之北，岐山之东，陵城之外，古冢皆发”。但有一次，在掘一古冢时，“石门刚启，箭出如雨，射杀数人。……投石其中，每投，箭辄出。投十余石，箭不复发，因列炬而入。至开第二重门，有木人数十，张目运剑，又伤数人。复进，南壁有大漆棺，悬以铁索，其下金玉珠玕堆积，众惧，未即掠之，棺两角忽飒飒风起，有沙迸扑人面，须臾风甚，沙出如注，遂没至膝，众惊恐走。比出，门已塞矣。后人复为沙埋死。”

由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个盗墓贼可谓是死里逃生，无怪乎他对府曹李道说：此次不被捉捕，也打算今生“誓不发冢”了。

拨开历史的迷雾

关于秦始皇陵墓的规模、规格及地宫的形制，已经推测出来，人们在惊叹这座恢宏庞大的陵墓之时，也不免对地宫内奇珍异宝的存与毁多了几分担心和猜测。千百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一直流传着始皇陵被几番盗掘的不详之语，更有牧羊儿火烧地宫棺槨的说法。现在，流传中的盗墓者和那个牧羊的小孩已不能寻觅，只有关于这些故事的历史记载还残存人间。透过这些略带霉味的文字，我们似乎能看到如果按史书记载看，秦始皇陵显然是遭到了大规模的盗掘和破坏，而盗掘和破坏者竟是在中国历史上三个鼎鼎大名的人物，这便是西楚霸王项羽、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国君石季龙（石虎）及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若再加上西汉末年农民军在盗掘中“销椁取铜”和牧羊的小儿进入盗洞求羊而失火烧棺，算起来先后经历了五次大洗劫。从这五次大洗劫的记载来看，陵墓内的奇珍异宝早已荡然无存了。那么，这些史料记载和民间流传的故事，是否都是可信的？秦陵地宫真的被盗一空了吗？知名考古学家王学理在研究后指出：

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越是随着记载时间的推延，叙说破坏的内容就不断增加，而且所叙各事又多有牴牾之处。最早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只说了“掘始皇冢，私收其财物”的话，况且还是引用的刘邦和项羽在阵前对骂中的语句。不想过了一百八十多年之后，在班固的《汉书》中，却出现了“羊入其囿”、“火烧其藏椁”又“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其掘”的语句。又经四百多年，地理学家酈道元在班固的基础上大加发挥演义，直至出现了项羽对始皇陵大加盗掘焚烧和牧羊童火烧地宫的具体细节。至于以后的史书作者，对始皇陵的毁与盗的问题上，更是百般演义，直至把石虎、黄巢等人加了进去方才罢休。而袁枚在《始皇陵咏》一诗中，对史书中提到的几个人物不但未作半点怀疑，反而指名道姓，言之凿凿，并对始皇陵的遭遇作出了“骊山之徒一火焚，犁耙牴杆来纷纷。珠襦玉匣取已尽，至今空卧牛羊群。”的

结论。由于班固、酈道元、袁枚等人的历史影响和在文史领域里的地位，千百年来，人们对这些记载深信不疑，只是到了今天，在掌握了大量的考古资料之后，人们才对这些历史加以怀疑并深究起来。

前面已经提过，司马迁在《史记》记载的关于项羽盗掘始皇陵的史实，只是引用刘邦在两军阵前责骂项羽的话，没有直接去写项羽云云。如果刘邦指责项羽盗掘陵墓一事属于事实，那么这应该算作一桩重大的历史事件。但这样的历史事件却没有分别载入《秦始皇本纪》和《项羽本纪》之中。即便是《秦始皇本纪》不载而在《项羽本纪》里是非记载不可的，但遗憾的是在其中却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这是司马迁的遗漏？还是有不便称说之处？两种疑问似乎都难以成立。因为司马迁是一个被公认的秉笔直书的史学家，极少奉迎趋势之作，只要看一下他对始皇陵地宫的结构及其陈设清楚的记述，就不难发现其材料来源定有所本，绝非随意杜撰。假如司马迁所处的西汉皇宫档案库中有这方面的史料，或是民间有类似的传闻异故，他必定要加以证实而后采录。既然他在《项羽本纪》中曾对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妇女宝货而东”的行为记述得如此明确而肯定，还有什么要对掘始皇陵墓这一事件加以掩饰呢？不可否认，率军进入关中的项羽其“掘冢”的动机是绝对存在的，但是否已经掘开了始皇陵并盗走宝藏，却是互有关系而结果未必一致的两码事。恃功好气的项羽自幼出生在“世世为楚将”的项氏之家，其祖父项燕便是被秦国所杀的楚国名将。秦的统一，楚的破灭，在使项氏家道中落的同时，也在项羽幼小的心灵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即使他自小便形成了“取秦而代之”的思想。正是这种国破家亡的仇恨和自小形成的性格，使他得势后做出了一次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的非常举动。当他统率大军入关中并杀掉秦降王子婴后，又怎能不想掘开始皇陵，以雪当年秦国大将白起“拔郢郢、烧夷陵”之国耻和秦将王翦诛祖杀父之仇？但是，面对秦始皇陵这样一座庞然大物，其陵墓地宫之深邃、构筑之坚固、警戒之严密，令处于乱世之中的项羽，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发兵卒盗掘开来，因为当时尚有比盗掘始皇陵更大更紧迫的事等待他和他的将士们来做。对于这位项羽大将军来说，能够顺手牵羊以泄仇恨的，莫过于把秦始皇陵园地面建筑纵火尽情地焚烧，对于包括兵马俑坑在内的浅层地下“宝藏”，能挖的挖，能拿的拿，能毁的毁，能烧的烧。由于出现了这一连串的非常行动，人们误认为项羽盗掘了始皇陵地宫是极有可能的，而刘邦所言“掘始皇冢”的证据也许正在如此。

既然事实如此，那么后来的班固、酈道元又何以编造故事，栽赃陷害已作古的项羽？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难解的悬案。尽管对班固等人当初的心理无法琢磨，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这就是关于汉武帝中期以前的史实，基本是从《史记》中抄袭过来的，而身为兰台令史的班固也不可能比早他四百多年、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获得更多的档案材料。在这种情况下，班固竟写出了一连串的谬误之作，其原因只能是随着民间流传而添枝加叶、铺张渲染、以讹传讹，人为地夸大化、完整化，以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正是他的沽名钓誉，才给后人留下了一团扑朔迷离的历史迷雾。

如果按照班固的记述，可以设想，项羽要凭借为数几十万人的挖掘能力，不管他采取大揭顶还是多道并进的办，都将是愚蠢至极的。若在短期内，集中一处深掘，不但难于下手，而且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来说，也是难于奏效的。即使是地宫被打开，那陵墓内的珍宝再多也有个定数，以三十万的人

力，何以“三十日运物不能穷”？若从盗掘的面积上来看，对于一个深在地下七八十米的陵墓，开凿的面积过大，短期内挖不到底，更谈不上取物。“凿”小了，下部缺氧，人不能入。由此可知“羊入其凿”说法是不可靠的，在地层深处“火烧藏椁”并“火延九十日不能灭”的事，也无法发生。历史上对于掘墓中出现的“怪异”现象多有录载，如《汉书·外戚传》载王莽发傅太后冢，墓室崩塌，压杀数百人，开启棺木，臭气熏人，远及数里，开丁姬冢，椁内喷火四、五丈，烧了器物衣服，仅得玉匣、印绶而已。《括地志》载西晋永嘉末，挖齐桓公墓，水银散发出的气体人不敢近，久之，才牵犬进入墓内。如按班固、酈道元、袁枚等人的记载，无论是项羽、石虎或黄巢率部确实掘开了始皇陵，势必会受到原设的暗弩的射杀，即使有幸进入墓室，也将会受到水银毒气的伤害。而关于这些更能引人入胜的事件，书中岂能无载？退一步说，如果始皇陵内已被洗劫一空，历代朝廷又何需下令派人保护呢？当刘邦平定天下后，即派二十户为始皇守冢，这本身就说明这位新登龙位的皇帝知道并没有人毁坏寝宫。否则，还有什么守冢的必要？至于继刘邦之后，历代王朝对始皇陵都倍加守护，起码也是对班固、酈道元、袁枚之流讹传的否定。

从本世纪五十年代起，陕西的文物工作者就开始对秦始皇陵进行地面勘察，七十年代末期以后，考古人员便围绕陵冢、陵园进行大规模的钻探，并留下了近十万个钻孔。

据长年负责秦始皇陵园钻探的考古工作者程学华透露：钻探资料表明秦始皇陵地宫上的封土没有发现局部下沉的迹象，夯土层也没有较大的变动。目前在整个封土上仅发现两个直径不足1米、深不过9米的小盗洞，况且这两个盗洞又远离地宫。如果当年的项羽以三十万人对始皇陵地宫进行发掘和火烧，怎会是今天这般模样？

“班固近似道听途说，酈道元则是信口开河，致使我们的考古研究误入迷途。”程学华在对历史史料的记载者加以批评的同时，并对其记载也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和否定。

素有严谨、精确的治学之道的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并没有项羽焚烧地宫的记载，只是在刘邦和项羽两军对垒时的相互对骂之词中，借用刘邦的口提到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而未提及项羽焚烧、盗掘始皇陵地宫的只言片语。相反，在晚于《史记》的《汉书》和《水经注》中，则把项羽对始皇陵的盗掘与焚烧说得活灵活现，形同亲眼目睹。这就不能不令人对项羽的盗烧问题加以怀疑和重新思考。

现秦陵考古队副队长张占民先生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也得出了和程学华先生一致的结论，认为班固和酈道元的记载是相互矛盾和难圆其说的：既然项羽烧地宫在先，那么地宫内的建筑，包括棺椁在内绝对不会幸免，怎么没有对秦始皇尸骨作何处理的半句记载？是一同烧毁了还是搞碎了？以项羽的性格和复仇心理，若见到秦始皇尸骨绝对不会放一把火了之的。而且假设项羽在匆忙中反常地一把火烧毁了包括秦始皇棺椁、尸骨在内的地宫，怎么会在后来又冒出个牧童失火烧毁了棺椁的说法？而假设项羽当时没烧始皇帝的棺椁和地宫，牧羊人单凭一根火把照明就敢独自钻入地宫烧掉了埋藏在地下数十米的棺椁？何况地宫之内严重缺氧，水银弥漫，不等牧童接近棺椁也许就一命呜呼了。由此可见，《汉书》的记载是难以成为事实的。

从现已发掘、钻探的地宫周围的一些随葬品看，西墓道耳室仍保存着完

整的铜车马队，而装置铜车马的木椁也没有遭到火烧，属于自然腐朽。北墓的耳室也同样地保存着一些重要的随葬品。试想如果秦陵地宫真的被项羽 30 万大军所盗，在墓两旁的随葬品却怎么能完好无损？既然这些随葬品能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深藏在地宫内的随葬品应该也不会被洗劫一空，甚至同样完整地保存下来。假如项羽当年真的一把火焚烧了地宫，那么地宫内的水银也早已挥发四散，而不再会有我们今天在陵的封土中发现和验证的水银存在。一切迹象和实物资料表明：秦陵地下宫殿不但未遭大规模的洗劫，也同样没有被焚烧的可能。

按照酈道元在《水经注》中对秦始皇为什么把陵址选在远离执政都城的骊山解释为：“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扩于骊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美玉，始皇贪其美名，固而葬焉。”

试想，自小在宫廷中长大的秦始皇在选陵时刚满 13 岁，他怎么能知道这骊山之阿多黄金和多美玉？况且，经过近几年的地质工作者对始皇陵以北广大地区进行勘探，未发现大量的黄金散落于泥河之中，其含金的比例则是微乎其微，那么这“其阴多金”就不能不令人产生困惑并怀疑酈道元记载的失误。酈道元的《水经注》关于秦陵选在骊山的理论在被后人深信不疑了一千多年之后，渐为当代的史学研究者张文立、张占民等推翻，而形成了新的更切合历史实际的观点。秦始皇陵之所以选在骊山之阿，其中一个原因不能排除，这就是随着秦国国都由西向东迁徙，政治、文化中心东移，秦皇陵墓区也相应地由西向东转移。中国古代对族人的葬地十分重视，一般都要安置在国都附近。秦在雍城建都时，秦公的墓葬都在雍城附近。1986 年考古学者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便足以证实了那段葬制历史。而秦的国都由雍东迁之后，秦王及族人的墓地也相应地东移开来，其跨度从咸阳一直延伸到临潼县韩峪乡附近。近年来经过考古调查，在这一带发现了几座大型秦墓便可为证。秦始皇帝正是在这条由西向东的延伸线上为自己筑造陵墓的。经过考古勘探，在他陵墓以西 20 里左右，便是其父秦庄襄王的陵墓。

1978 年，美国射电天文学家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在架设卫星通讯天线时，意外地发现天线收到了额外增加的温度。在长达一年的反复试验中，无论是天线伸向天顶还是东西南北，不管是春夏秋冬的艳阳丽日，还是风霜雪雨的阴晦天气，其测定数值总是恒定不变。两位科学家经过苦心孤诣地研究后，终于发现这种能量并非来自地球和太阳系，它弥漫于整个宇宙天体之中，是由微波辐射和微粒子组成的“背景辐射”。因而两位科学家很快发表了根据测验结果和研究后形成的《在 4080 兆赫上额外的天线温度》一篇短文，并一举荣获诺贝尔奖金。瑞典科学院在颁奖决定中指出他们的发现“是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发现，它使我们终于获得了很久以来，在宇宙创生期所发现的宇宙过程的信息。”

彭齐亚斯和威尔逊的这一重大发现，被后来的中国学者张海云、孙铁山誉为正是中国历代先哲所称的“元”、“玄”、“■”等神秘莫测的一种风水之气，并继之推测出：“宇宙之■到了地球，就受到风力、水力的调节和制压。被强化者，风水学中称为吉，被削弱者，则定为凶，所有的近似迷信的吉与凶几乎都能用现代科学作出解释。中国历代流传的山环水抱必有大发者，已被无数古都和历史名人的故居所证实，原因却都是因此山环水抱收拢了宇宙场而使人得以生存繁衍并强盛起来。所以历代帝王选国都以及建陵墓，都按此原则观风相水，慎重斟酌。”秦始皇陵之所以选在骊山，其风

水观念的影响则是形成陵墓位置的主要方面。秦陵右靠青翠瑰美的骊山，左傍浩森如链的渭水，面对广袤的原野，形成了独特俊美的天赐风水宝地。秦始皇陵园的位置在礼制上符合祖陵不断向东延伸，而晚辈居东的思想，在传统上体现了依山造陵，看风相水的观念。正是置于“山环水抱必有大发者”的思想观念支配，秦始皇陵才坐落在骊山之阿，而并非像酈道元所云始皇贪其多金多玉的美名，才把陵墓安置在此处的。既然班固、酈道元、袁枚等人的历史错误已被指出，秦陵地宫未被盗掘的事实基本得到证实，那么项羽等人究竟在陵园破坏了什么？其破坏程度达到了怎样的境地？《吕氏春秋·安死》曾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相（掘）之墓也。”并且举例说：“宋未亡而东冢相，齐未亡而庄公冢相。”由此可看出，关于盗墓掘冢之风确实由来已久，并演化成一种职业，有些人专门就从事这种挖坑掘洞、截路盗墓的勾当。他们“憚耕稼采薪之劳，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乐，智巧穷屈，无以为之。于是宁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广泽林藪，扑击遏夺，又视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相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与分之。”此风在经历了两千年后，不但未有收敛，反而越演越烈。清代毕沅曾说：“有人自关中来，为言奸人掘墓，率于古贵人冢旁相距数百步外为屋以居，人即于屋中穿地道以达于葬所。故从其外观之，未见有发掘之形也。而葬已空矣。噫！熟知今人之巧，古已先有为之者。小人之求利，无所不至，初无古今之异也。”

秦始皇陵是否遭受过民间那些不事耕稼、专干掘冢嗜利之徒的盗掘呢？陵内的珍藏既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就不能没有蠢动，陵冢封土基部逐见内缩，不能说与此无关。但始皇陵墓坚固与艰巨的程度，早使凭借集团力量的项羽、石虎等无所使其计，而细民靠分散力量的“微扣”又奈若何？

虽然陵墓地宫得以保全，但整个陵园却在项羽开其端的兵燹中遭到了彻底的毁灭。这次大毁灭最首要的便是烧毁了地面建筑。

也许用不着想象就可知道，秦始皇陵园的地面建筑目标最为显著，因为它的显著，便首先成为项羽大军洗劫和破坏的对象，那博大恢宏的寝殿、食官、门阙、角楼和园寺吏舍在兵燹中都无一幸免。几千年之后，当人们站在这片遗址上，仍能看到红烧土和木炭混杂、残砖碎瓦与草屑相伴的凄凉残景。若仔细辨认，那遗址的铺地石中箝制的木构早已化为炭迹，其西段有大型板瓦和筒瓦俯压地下，显系整块屋面坍塌所致。从这些残景中，不难想象出项羽大军焚烧之猛烈。而鱼池的官邸建筑留下的同样是经过火焚后的一片废墟，辉煌的丽邑城也是经过大火烈焰的吞噬之后壮烈地湮没于古草黄土之中的。当然，埋藏于地下的兵马俑也在这次洗劫中深受其害，那残头断臂的秦俑大军在重新走出那阴暗的世界之后，总在以无声的噪音，向人们发出愤怒、抗争的呐喊。

在考古钻探中，经过部分清理的陵园建筑遗址，很少有金钱或青铜器物的发现。在发现的“乐府”铜编钟、两诏铜钺，“骊山园”铜锤及戈、矛等铜兵器，都散见于陵园的堆积土中。秦俑坑内的青铜兵器，按理应当与兵俑的数量相等，有近万件之多。这个数量无异于一个大型的兵器库，一旦得到这些兵器，便可立即装备军队，投入战斗，但现在看来，俑坑中的兵器所剩无几，若结合兵马俑被破坏的情形来看，坑中的兵器显然是被掳去了。当年刘邦指责项羽“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无疑是指他捣毁从葬设施，并掠走陵园财物的暴戾行径。

中外学者的探寻

1966年，在爱尔兰的伯温河畔，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隐没于密林深处的高大壮观的坟墓。经反复验证，考古学家惊奇地发现这座坟墓建于公元前3250年，比著名的埃及金字塔建造年代还要早500多年。为迄今世界上最古老的陵墓建筑，并由此引起世界许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探寻的兴趣。

著名考古学家麦克尔·奥列卡经过对此墓作了精密的研究后意外地发现坟墓大门上方，一块石头掩饰着一个长方形的窗口，窗口半开半掩，而石头也可移动。于是，奥列卡对这个奇特的窗口产生了兴趣，经过一番苦心孤诣地琢磨后，终于得出了这个窗口与某种天文现象有关的结论。如果把这个门上之窗当作一个观察孔，那么，也许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可以观察到某种独特的天文现象。为了证实这种推断的可能性，他开始进行了天文演算，终于确定了这是古代人类用来观测冬至阳光的独特设施。

为做到对这一独特设施更进一步的了解和探究，1967年12月冬至的那天清晨，奥列卡只身一人来到古墓进行观测。他惊异地发现当太阳跃出地平线的刹那间，一缕灿烂的阳光就从窗口射进了古墓。随着太阳的不断升高，射入古墓的光辉也开始四散，并形成很强的光，将墓中的一切照得分明通亮。奥列卡在强烈的光照中看了看手表，这正是冬至到来的准确时刻。几分钟后，随着太阳的继续升高，阳光从窗口移开，坟墓重新陷于神秘恐怖的黑暗之中。

奥列卡的发现，同古墓的发现一样轰动了西方史学界、考古界和天文学界。他第一次以活生生的事实揭示了五千多年以前的古代人类就已经开始观测和准确判定冬至时间的伟大创造力和非凡的智慧，这无疑是对古代人类文明的又一个新的探知。

当然，这座古墓和窗口的发现，只是探知了人与天体相关的一部分，而另几座陵墓的发现，则向人们揭示出整个天体宇宙与古代人类的密切关联。这就是中国自60年代初相继发现的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西安交大西汉壁画墓28星宿图和湖北随县战国初年曾侯乙墓中的漆箱拱形盖上的星象图。

洛阳与西安交大的西汉墓，主室的顶部和四壁均绘满了色彩斑斓的壁画。其内容明显地分为两个部分，上部代表天空，下部代表山川。代表天空的除日、月、流云和飞翔在天空之中的形态不同的仙鹤外，最令人惊叹的便是以青、白、黑三色勾绘的两个较大的同心圆圈，在这两个圆圈之间绘有各种星辰80余颗。经考古学家和天文学家断定，这就是中国古代天文中的28星宿图。

显然，从战国初年曾侯乙墓在漆箱拱形盖上绘制星象图到西汉墓在壁画中星象图的出现这段历史沿革的岁月里，必有其它陵墓在其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那么这座陵墓起源于何时，其主人又是谁？

早在1965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就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古代墓壁中配置天文图像，似起源于秦代，《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墓中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当时在墓室顶部绘画或线刻日月星辰象图，可能仍保存今日临潼始皇陵中。”

当代考古学家、原秦俑博物馆馆长刘云辉在肯定了夏鼐这一论断的同时，也提出了司马迁的《史记》对秦始皇陵地宫的记载完全值得相信的观点，因为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和治学态度均不同于后来的班固、酈道元以及其他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一切，被后来大量的出土实物和资料所

证实。在甲骨文未被发现时，有人曾怀疑《史记》中商王世系的可靠性。而随着殷墟甲骨的发现，甲骨上商王世系的记载与《史记》所记完全相同。这并非偶然巧合的记载，使后人对《史记》更加深信不疑。而从司马迁的身世也可以看出，他所记载的历史史实是可靠的。他的祖先曾有多人在秦国做过臣僚，而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为汉王朝宫廷中的太史令。秦始皇地宫的构造虽属绝密，但秦皇宫廷中必有档案记录。因为《汉旧仪》指出秦陵地宫是按“章程”进行修建的，在后人看来，这个章程无疑就是施工图纸，这类的图纸在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已有出土，想来秦时的图纸也应同此类似。当年刘邦大军刚攻入秦国首都咸阳，刘邦就命萧何收“秦丞相御史令图书藏之”，因此汉王朝对秦始皇陵地宫的构造应有些掌握。而当时的司马谈也完全有资格接触这些属于机密的史料。司马迁是继承父亲的遗志而作《史记》的，对这些机密史料同样可以比较详尽地了解。因此，《史记》中对秦始皇陵地宫的记载应当说是可信无疑的。

然而，尽管司马迁的《史记》具有相当的可靠性，但是很难令后人准确地了解秦始皇陵地宫的真实情况，而不得不根据《史记》的字意和考古资料进行分析和推断。据长期进行钻探工作的程学华先生所掌握的资料，可证实秦陵封土下的地宫东西宽 485 米，南北长 515 米，总面积达 249, 775 平方米，如此规模庞大的地下陵墓宫殿，是世界上任何一座陵墓也无法与之相匹敌的。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局限，对秦陵地宫的深度无法准确地测出。目前秦陵地宫已用洛阳铲钻入 26 米的深度，但经过分析验证仍是人工夯筑的夯土层，就现在掌握的情况而言，秦陵地宫至少有 26 米以上的深度。而根据司马迁《史记》中“穿三泉”的记载，应看作是穿过了三层地下水。秦陵附近的水文资料表明第一层地下水距离地表为 16 米，第二层和第三层地下水距地表到底有多大距离还尚无测定。即是测定，2000 年前的地下水位和今天的地下水位显然有较大的差异，因而不能以水位的高低来确定地宫的深度。尽管如此，考古学家还是根据有关资料对秦陵地宫深度作了比较切近实际的种种推测。在众多的结论中，以袁仲一先生的为最低，他推测的结果是地宫深度不会少于 24 米，而刘云辉先生的推断结果是地宫最少在 50 米以上，这是目前考古界对秦陵地宫所作出的大体结论。

既然秦陵地宫已穿越了“三泉”，那么，地宫内部采用了什么方法堵塞或排除地下水？有研究者根据《史记》中“下铜而致椁”和《汉旧仪》中“铜水泉绝之，塞以文石，致以丹漆。”的记载，推断秦陵地宫的地下水是先用冶铜锢其内，再塞以纹石，其次涂漆，最后涂丹，从而堵塞了地下水，不致于渗入地宫之内。

这种推断固然有其道理，但仅凭这样的办法能否彻底堵绝地宫内的渗水则引起不少研究者的怀疑。那个当地宫封闭后，从地下水道里偷偷爬出来的青年工匠的民间故事，也在令研究者对秦陵地宫之间有没有排水道的问题进行不断地探寻和思考。

八十年代末，陕西省地矿局工程师孙嘉春对始皇陵以北 3 里的秦代鱼池遗址进行了考察后，大胆地否定了酈道元在《水经注》中所记载的单纯地从此处取土而成池的说法，提出了秦人筑鱼池的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掩护地宫排水管道出水口的论点。这一令人震惊的理论一经提出，使科学界为之哗然，并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为判明这一理论的真伪，随后不久，水文地质研究

者邵友程又来到鱼池遗址进行新的勘察。古鱼池水面虽不存在，但他仍然看到了原鱼池底部连片的荷塘和丛生的芦苇。令他惊叹的是公路两侧与沙河东北侧三角地带的芦苇丛中，竟流出一渠和混浊的沙河水完全不同的清澈的碧水蓝波。当他登渠问一位正在洗衣服的女人这渠水的来源时，女人告诉他：芦苇丛里有一处昌水泉，常年涌流不息，从不见枯竭。当他走下水渠询问一位当地农民这里的水源情况时，农民指着鱼池遗址告诉他说：“只一锹就见水。”

邵友程根据推算，得出了“由于有着一条排水管道的制约，秦始皇陵地宫底部的标高，绝不能低于鱼池中心标高 430 米，应在地面以下 40—50 米之间，最深不超过 55 米”。而至于那个“昌水泉”是否就是地宫管道的排水口，在他后来发表的文章只是以“确也是个有趣的问题”含混过去而未作明确论证。自然，在秦始皇入葬时那个被封闭在墓中的青年工匠是否就是沿着这条排水管道从“昌水泉”爬出来的问题，更没有人去作是与非的结论了。

秦始皇陵在中国，但关于它的研究者却遍布世界各地。相对而言，中国学者在对待秦陵地宫的研究问题上，未免有些拘谨和过于实际。而国外学者对秦陵地宫的研究思想，则要大胆和开放得多，其丰富的想象，大胆的构思，灵活多变的论证，实在令中国人为之瞠目。即是那些对秦陵历史的爱好者所做的举动，也令人大感惊讶和意外。

早在 1978 年，当中国考古学家正处在发掘秦始皇陵兵马俑坑高潮时，4 月份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就率先登出了驻美学者杨先民先生绘制的秦始皇陵地宫结构的想象图。

而位于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三名科学家，在 1984 年 10 月 3 日出版的第九号《谈论》杂志上，发表了一封建议信，对秦陵地宫的发掘提出了全新的见地：

我们建议成立一个多学科的工作队，不用物理发掘的方式，而是使用现代的非破坏性技术，勘探和探查位于中国西安骊山的秦始皇陵，具体地说，我们想要置一个大型感应线圈和一个电动发电机组，钻探一些干“油”井，在这些“油”井里和骊山上安置磁场仪和其它电子装置。

建议使用此方法的优点是：

——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发掘。我们将只钻探直径为八英寸，与塑料管相连接，通过粘土的浅“油”井，因而不会造成破坏。

——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探明真正的秦始皇陵的立体位置。它也许就在骊山下面。

——我们的方法提供了一个机会，通过这个机会我们可以了解陵墓的深度、体积与规模。

这项计划如果能实现，预定目标如果能够达到，将会向学者和科学史研究工作者提供难以估价的信息。探测方法总的来说是有益的和实用的。探测自然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实行。……

陈明

戴维·勒基

罗纳德·罗这封建议信的刊出，尽管出乎人们的意料，但却未能引起轰动和大幅度的震撼。于是三位科学家在 1985 年 1 月 25 日出版的第六号《谈论》杂志上，再度抛出了《应用于考古学的非破坏性探测和层析 X 线摄影学》足以令科学界为之震惊的长篇论文：

自古以来，人们就产生了不掘开地面便可探知地下埋藏宝物的梦想。这个梦想在今天已成为现实。英国物理学家将电学与磁学相结合，向我们提供了透视地球、金属和人体的手段。此后，科学家们又利用更先进的方法找矿、探场和诊断病症——这就是层析 X 线摄影术。其应用范围极为广博，如果用之于考古，则可在不提取文物标本的前提下，向考古工作者提供古代遗迹和埋藏事物的准确位置和详细的资料。

秦始皇陵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之一。虽然历史文献对其未作详细记载，但根据仅存的史籍和考古发掘也可作出基本推测。因此，可以相信，陵墓内有大量的青铜构件，如环绕墓室的青铜墙壁，青铜及拱顶。根据史料推测，陵墓中有 4 个青铜铸成的环状物，其中 3 个用来封闭地下河，一个构成墓室本身。这些青铜的重量可达万吨。

对于秦始皇陵巨大的地宫和丰富的文物，我们可以采用标准的现代化非破坏性探测方法感应到涡旋电流，测定出其衰减的磁场，这就是时域电磁探测。

为完成秦始皇陵的非破坏性探测，我们建议分两个阶段进行：一、为获得陵墓地宫三维结构的资料，可在骊山附近打一些直径为 8 英寸的干油井，井中置磁场仪，进行探测，并根据探测提供的数据编制陵墓地宫结构的数学模型。二、用层析 X 线摄影技术，探测地宫内的埋藏物。通过以上非破坏性探测，为将要发掘陵墓的考古学家提供重要的帮助和指南。

我们在丁肇中教授的指导下，正在进行高能物理实验，将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地球物理学装置。我们相信，通过高能物理学的方法，将秦始皇陵作为实例。上述理论定能得到验证……秦始皇陵地面上的陵墓物理形状使我们得出结论：陵墓主体修建的非常深，可能位于地下 500 至 1500 米。

……我们估计地宫内的青铜环状物的直径为 25 米，陵墓主体的直径则大约为 50 米。而这些青铜环状物中的每一个都会形成一个在它们下面的陵墓的电磁保护屏障，使埋藏在内的物体几乎无法被探测到。

……我们相信，通过测试而发现的地宫，实际上要比杨先民在《全国地理》杂志上绘制的宇宙观念图形大得多，支撑天空的神圣大山是由青铜铸造的，外部的青铜墙又形成一个环状物，我们在这个环状物上可以发现涡旋电流。

……在这样的探测中，我们是很有兴趣的高能物理学家。因此，我们鼓励同中国的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和其它愿意被邀请的人一起讨论我们的想法。

我们相信，如果获准利用遗址现场，工作队可以使用感应和声波设备发现大量的有关陵墓的资料，而避免采取物理进入的方式，在探测结束后，我们将把遗址现场恢复到原来的状况。

组成一个多学科的工作队，使用现代的非破坏性技术，探测秦始皇陵，这项计划的实施，从技术和历史的角度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因此，我们希望得到中国科学院的批准。

我们希望同中国的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地理学家

一道，就此设想进行座谈讨论。

我们希望进入现场，采用感应和声波设备对秦始皇陵进行探测。工作结束后，回填干“油井”，将现场复原。

如上述构想得以获准，我们将写出具体的技术建议。

对于陈明等科学家的建议，鉴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科学院暂时没有批准，其非破坏性探测和层析 X 线摄影学自然也未能实际应用。但我们相信，秦始皇陵地宫的真正奥秘，总有一天要彻底揭开。到那时，一切关于被盗还是未曾被盗的争论也自然休止了。

第十三章 秦俑人的忧思

我在观赏这一非同寻常的兵马俑奇观后，离开博物馆。这一奇观是迷人的，也是巨大的，我对发掘、维护这人类宝藏的考古学家和管理工作者表示敬意。

——法国陆军参谋长、上将 施密特

面对宝藏的困惑

文物，作为人类自然和社会活动的实物遗存，无论它最初是精神还是物质，先进的还是落后的，乃至当时它是服务于人民群众的还是反动帝王贵族的，都从不同的侧面和领域揭示了中华民族亘古以来绵延不绝的生存、繁衍、斗争、发展的历史，以及历代先驱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因而，它的价值和对人类的启迪作用是永恒的。人们可以对历史长河中的某一段途程和某些人物作出不同的评价。但是，反映这段历史的文物的价值并不受人们对历史评价的影响和限制，都是全民族乃至全人类保护、研究和利用的珍贵历史宝藏。

由于战乱、兵燹等原因，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曾出现的短暂的大秦帝国，留给后人的文字史籍和实物资料极为匮乏，这段历史越来越被淹没在风烟尘土之中。秦始皇陵兵马俑、铜车马、马厰坑、珍禽异兽坑的发现和发掘，以及秦陵地宫奥秘的探索，无疑填补了这段历史研究的空白，并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采。那朴素生动的陶文化，刚健恢宏的铜文化，盖世无双的冶金技艺，非凡卓绝的战阵布局……组成了一部浩瀚的秦代历史经典。每一件出土的文物都是古代先民们伟大智慧与非凡创造力的血汗结晶，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和永恒的历史丰碑，是融多个民族、多种文化而成一统的第一个封建大帝国的立体而完整的象征。直到今天，这些埋藏了 2000 多年的出土文物，在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中仍蕴含着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发挥着其它精神和物质无法代替的纽带作用。同时，秦陵出土文物那丰富多彩的内涵和神秘莫测的玄机妙法，已成为其它民族和国家借鉴和观赏的文化财富。

回首 17 年对秦始皇陵文物的发掘与保护，考古工作者与管理工作者为此付出的努力并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只要随意翻动一下秦俑博物馆厚厚的游客留言簿，就会清楚地看到远道而来的中外游客是怎样一种心灵的震颤，无论是国家元首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平民百姓，无不为本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掘留下钦佩敬慕之情。

然而，明珠的闪亮并不能全部掩饰落在它身上的尘埃，秦陵文物在发掘和管理中的缺憾与不足，同样应该引起我们的共同关注，诸多已成为过去和将要发生的悲剧不应再无休止地困惑着考古学家、管理人员和一切瞩目关心秦陵文物的人们。

中国的田野考古事业比之世界田野考古学的兴起要晚了许多岁月，因而它的缺憾也无可避免地暴露出来。

早在兵马俑发掘之初，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大师就曾对发掘中的过失作过尖刻的批评：“兵马俑的考古发掘怎么能像农民挖土豆一样胡刨乱挖？而修复却又用筛子筛、刷子刷、清水冲……这完全违背了考古学的方法和意义。”

尽管夏鼐大师这时尚未亲临现场，他所听到的关于秦俑发掘与修复的消

息，难免有些夸大了事实。但并不是毫无根据，事实上也确有一个阶段我们的部分考古工作者是这样发掘和修复的。

1978 年底，秦俑工地出现了边发掘、边修复、边建馆、边准备对外开放的“大兵团作战”的方法。除考古队人员外，工地上还出现了大批的当地驻军、社员和前来实习的学生。有的农村社员上午放下手中的锄头，下午便走进俑坑挥动了掏铲、铁锹。在对考古知识及文物价值毫无基础的情形下，陶俑自然被视为常年挖刨的土豆。其结果是，许多陶俑在他们挥动双臂极为卖力的挖刨下，被砍掉了头颅、削掉了鼻子，铲掉了臂膀……由于陶俑的大面积揭开，对大雨的肆虐毫无办法加以对付。许多木车遗迹以及陶俑陶马身上的艳丽彩绘，都在雨水的侵蚀浸泡中荡然无存。

1979 年春，夏鼐大师率专家、学者百余人，前来秦俑工地考察和研究后，指出了一系列秦俑考古发掘中存在的缺点和失误。由此，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掘工作不得不暂时停止。随后，国务院、国家文物局、社科院考古所及陕西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派出专家，亲赴秦俑发掘工地进行调查研究，并和实际考古发掘人员一道总结了发掘中的失误，共同制定了新的科学的考古发掘方法，兵马俑坑才又得到了重新发掘。但由于种种原因，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掘又几度陷于了“发掘——停止、停止——发掘”的状态之中。至今，除三号俑坑全部发掘、修复完毕外，一号俑坑大部和二号俑坑在试掘后回填。一号俑坑发掘和修复了的陶俑陶马仅占整个俑坑的 1/3，而二号俑坑尚未进行正式发掘。因而，秦俑博物馆所展示给今天游客的也只有三号俑坑和一号俑坑的极为少量的兵马俑的雄姿，二号俑坑仍未向今天的世人开放，8000 兵马俑仍有大部分在短暂的面世后又重新被埋入黄土之下。那气势磅礴、恢宏雄壮的军阵，那奥妙无穷、深不可测的军事战略战术，那精美绝伦、盖世无双的整体雕塑艺术群，便无法让今天的游客亲眼目睹并彻底地感受和领悟，无法让研究者作更加深入的了解和全面的探究。这种种原因和目前的现状，给这里的考古人员和管理工作者带来的遗憾完全与前来观光的游客及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是相同的。

尽管我们面对的是诸多遗憾，但这种种遗憾对深藏在地下的文物未必不是一件幸事。从我国近几十年考古发掘的诸多遗迹和陵墓可以看出，文物的损失与破坏令人震惊和悲叹。1958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计划地主动以考古手段发掘的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出土的几百匹足以代表中华民族古代纺织与刺绣艺术顶峰地位的织锦布料，几乎全部损坏、变质。而定陵地下玄宫出土的万历皇帝及两位皇后的三具尸骨，也在“文革”的狂潮中随着腾天的烈焰化为灰烬，消失在苍茫的宇宙，给人类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巨大的悲愤和遗憾。六十年代初，当周恩来总理赴陕西视察时，陕西省政府曾提出了发掘唐代乾陵和其它帝王陵墓的设想，但未能得到获准。周恩来总理引用定陵织锦损坏变质的教训，解释了不予批准的理由后，郑重而风趣地指出：“目前我国还没有足以使文物不受损失的科学保护方法，祖宗留下的遗产还是让土地神多替我们保护几年吧。”

然而，秦始皇陵兵马俑脱离了土地神的庇护，已经在走向人类的怀抱。我们在满怀热情迎接这支秦代大军的同时，也对它们提出的苛刻要求感到棘手甚至不知所措，由此而来的失误与缺憾、忧思与困惑，已是无法避免了。

当我采访了周铁、张志军两位文物保护专家后，方知秦兵马俑同样受到了较为严重的损坏，并出现了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而这种结局的原因自然

是多方面的，有的属于不可抗拒和难以改变的自然因素所成，有的则是人类本身制造的失误。

一号坑兵马俑军阵气势雄伟，辉煌壮观，而人类为此构筑的以保护为目的的拱形大厅，也不失恢宏壮阔的气度与风范，如此大跨度的拱形建筑，其设计者的苦心和施工者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它在中国遗址性博物馆建筑史上的地位也是没有可与之匹敌的。但由于设计的匆忙，资金的缺乏，材料筹备与运输的困难等诸多人为的和自然的原因，大厅留给人们的遗憾也是显而易见且难以弥补的。

当观光者走进一号坑大厅，首先见到的是一个四边直上直下的长方形俑坑，而当年俑坑中那精心设计的长长的门道却压在了大厅墙基的身下而无法恢复，给人们造成一种非历史真实的误解，削弱了兵马俑军阵布局 and 战略战术思想的艺术性与震撼力。同时，根据专家张志军先生对大厅监测结果得知：下雨或下雪的异常天气，都会使坑内湿度相对上升 10% 以上，而在正常天气中，阳光的照射可导致坑内温度在短短的 2 个小时之内上升 7℃ 以上，湿度却又相对地下降 13% 以上。这种温湿度的巨大反差和迅速变化，对坑中的秦俑表面彩绘特别是在修复中粘接陶片的环氧树脂化学胶，都会造成极大的损伤并缩短了本身的有效寿命和应起的关键作用。这种大厅的建筑结构使深入地下 4.5 米但体积较小的三号俑坑，温湿度的反差更为明显，损害力也将更为严重和突出。

经过修复的兵马俑重新下坑复位后，曾几次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倒塌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是没有对陶俑采取任何预防倒塌的措施所造成的，其倒塌的结局是再度使完整的陶俑变成碎片。从断裂的陶片可以看出，大量的断茬面仍是经过人工修复所涂化学胶的部位，而这些部位所涂胶的痕迹只占原断裂茬面的一半左右，且在茬缝处又很少发现本应使用的金属勾接加固部件和其它有效的修复物质。因而一旦修复起的陶俑倒塌，再度破损成零乱的陶片已是必然。

秦俑坑土质的黄沙积成，经保护专家周铁测试，黄沙土质失水后体积收缩约 30% 左右。由于日光的曝晒，俑坑中的土隔梁渐已收缩裂变，而骊山脚下农民采石炸山所发起的隆隆炮火，给近在咫尺的秦俑坑带来了相当于人们已有轻微感觉的三级地震，从而使俑坑土隔梁的裂缝越发增大并延伸，并有顷刻塌陷覆没陶俑的危险。在一号坑中部有一条横贯整个坑中的巨大裂缝，这条裂缝已穿透大厅墙基并延伸到大厅外部，已对这座高大恢宏的拱形建筑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尽管以吴永琪为首的修复专家，已用了钢架将土隔梁拦起来作了“无害性有损”的探索性修复，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这种方法对土隔梁的现状能维持多久，也是一个未知的课题。

当然，令人困扰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兵马俑的颜色保护问题，空气、温度对俑的腐蚀问题，地震对兵马俑乃至整个博物馆的威胁问题，……无不在困扰着秦俑人的心。硬度相当于水泥凝固后的陶俑，历 2000 多年水淹土埋而未变其质，但出土仅十余年，有的周身已生出绿毛。而出土的金属兵器，也不同程度地染上了绿锈。青铜一旦被氧化即成为氧化铜，原有的特质将不再存在……

秦俑的保护已刻不容缓，秦俑人面对大自然和现代人类本身给其造成的损害，他们在苦苦探寻足以解除一切问题的可能药方。但这个药方却又迟迟未能寻到。

秦俑馆前的特大爆炸案

1991年3月20日，临潼县公安局迅速向省市公安机关和附属单位发出了一份通报。

秦俑馆前发生特大爆炸案的情况通报

3月19日下午1时10分左右，秦俑馆附近约300米处的华岳照相部秦代服装照相点，发生特大爆炸案。

炸死3人（董××，男，19岁，邢××，女，19岁，二人均为照相点工作人员），另一名王建荣，男，26岁、白水县尧禾镇北草村6组农民。炸伤3人。

临潼县公安局局长王风学，副局长郝金岗、张发战，副政委张忠全接到报案后赶赴现场。

王建荣自幼丧失父母，婚姻问题迟迟不得解决，生活失去信心，加之对现实政策不满，3月1日就写好了长篇遗书，要一死惊人。

3月19日上午，他提上装有炸药、雷管的皮箱，当天11时左右赶到秦俑馆附近，在仿造的铜车马上照相时引爆自杀。

同时还在其家中搜出了存放的雷管等罪证。

事隔一天之后的3月21日，《陕西日报》在头版公开报道了这则令人震惊的消息：

临潼县公安机关查清一起爆炸案

本报讯本月19日中午，临潼县境内秦俑馆以东300米处发生一起爆炸案，炸死3人，轻伤3人。省市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迅速赶赴现场，指导当地公安机关开展破案，抢救受伤群众，在白水县公安机关的配合下，8小时查清全部案情。

罪犯王建荣，现年26岁，白水县农民，因婚姻问题产生悲观轻生思想，留下遗书，携带爆炸装置，于3月19日中午1时许来到秦俑馆附近的华岳摄影部秦代服装照相点。当工作人员为其拍照时，引发爆炸。除王犯当场炸死外，另2名照相点工作人员也被炸成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省公宣）

不难看出，《陕西日报》的这则报道，实则是临潼县公安局所发通报的改写，其内容基本是重复的。但只要仔细对照两篇报道，又不难发现，《陕西日报》在报道中将“在仿造的铜车马上照相”悄悄地隐去了。这绝不是作者的疏忽和遗漏，而恰恰是破费了一番苦心才作出了这样的抉择。其目的是为防止读者将仿造的铜车马误为真正的铜车马，而引起不良的社会效果。

但是，作者的这番苦心最终还是没有达到目的。就在爆炸案发生的不几日，当地农民以及西安市众多的市民、游客，还是把假的当作真的流传开来。直到十几天之后，笔者踏上了西安开往北京的列车时，仍有不少乘客在议论“秦俑馆铜车马被炸”的消息，其活灵活现、令人大惊失色的描绘与叙述，仿佛让听众觉得他们似乎亲眼目睹了秦俑馆铜车马被炸的惨象，以致整个车厢四座皆惊，为之哗然和感叹不已。然而，可以断言的是，所有的演讲和宣传者都不过是以讹传讹而已。只有一个仰躺在中铺上默不作声的人亲眼目睹了这一爆炸案的整个过程并了解了大部分事实真相——那就是笔者。

3月19日上午11时40分，我结束了对秦俑馆一位工作人员的采访，像往常一样手提采访包，来到馆外当地群众开办的饭摊前津津有味地吃着兰州拉面和夹馅烧饼。12时半又来到了一个茶摊前品尝关中的大碗茶到底是何种

滋味，同时，我也想借此和主人闲聊，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和当地习俗。我在秦俑馆采访的几乎每一天中午，都是如此安排。而此时我断然不会意识到也不可能意识到，20米开外的不远处，将在40分钟后发生特大爆炸案。

但事实毕竟发生了。

当我捧起大碗茶，准备一饮而尽并向主人告别时，身旁突然响起了一声惊天动地的炸雷，我的身心在雷声的震撼中蓦地颤抖了一下，不等在懵懂中醒过神儿，手捧的大茶碗里已不偏不斜地飞入了半块手指，淋漓的鲜血将大碗茶染成殷红的浆汁。

我抬起头，向爆炸声的中心部位寻声望去只见刚才还完好无损、专供照相使用的“铜车马”随着腾起的硝烟和尘土顷刻化为无数块碎片在天空中飘荡、翻滚。透过浓浓的烟尘，依稀可以看到两条大腿和一个人头从树梢和房顶上慢慢滑下，几条身影如同在电影中播放的特技镜头，先是蹦跳起来，再是张扬着双臂缓缓倒下去……

硝烟散尽，人群从四处涌来。“铜车”已荡然无存，“铜马”伤痕累累。令人惨不忍睹而又胆颤心惊的是，那从树梢上落下的人头和半块臂膀仍在微微颤动，四周仰躺着十几个被炸伤和惊昏的男女。黄色的土地上涌起黑红的血水。

惊骇、迷惑、恐怖……现场一片混乱。

有清醒者拨开骚动不安、惊恐不已的人群到附近的派出所挂通了医院和公安机关的电话。几十分钟后，医院的救护车和临潼县公安局的警车相继开来，并迅速地投入了营救和侦破工作。

我在帮助医护人员将受伤者抬上救护车后，留在原地跟踪公安刑侦人员的侦查足迹，并打开采访本记下了侦破此案的详细经过。

有目击者向刑侦人员反应：下午1时左右，有个长发高个身披大衣的青年人，手提一个不大的棕色皮箱来到“铜车马”照相服务人员面前问道：“秦俑馆的铜车马在哪里？”两名专管招揽生意的年轻服务员立即答道：“这就是秦俑馆的铜车马，快照个相吧。”

提皮箱的青年人望望面前的“铜车马”，没有吭声和动作，冰冷的面部表情给人一种淡漠和犹豫的感觉。

“快照吧，机会难得，你看这铜车马多好。”服务员以惯有的招揽顾客之道，自以为已准确地猜中了青年人踌躇不前、犹豫不决的表情是吝惜钱财的心理反应，于是又以极大的热情和多年总结出的劝说，终于使年轻人来到了开票处，拿起笔写下了“白水县尧禾镇北草村王建荣”的地址和姓名。身边的服务员露出了淡淡的微笑，似乎在暗自庆贺又一次胜利。

可惜，常识只能是常识。此时服务员的洞察术和惯用的伎俩已经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向悲剧的深渊滑去。当青年人放下手中的笔以和服务员同样的笑容大踏步踏上“铜车马”之时，死神悄悄地降临了。

青年人刚刚坐稳，摄影师便举起早已准备就绪的相机。一声“咔嚓”的轻微响动还没有落下，便是一声惊天动地的雷吼。青年人的碎尸乱骨飞向天空的同时，“铜车马”的木片和铁筋毫不留情地楔入两个服务员的乳部和小腹下方的致命部位。其实，当救护车匆匆赶来时，医护人员和目击者心中都一样地明白，这两个均为19岁的青年男女，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个繁华的大千世界再也不属于他们了。

值得庆幸的是，为青年人照相的摄影师尽管在爆炸的轰响中倒入了尘埃

之中，但死神没有收留他，依然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暂时留存下来。因而，他怀中相机里那个摄有青年人面貌的底片也由此成为刑侦人员迅速、准确查清罪犯的重要依据。

当然，这只是部分目击者向刑侦人员提供的不可能与事实完全相吻合的一些情况。而另一种说法却让人更感到惊恐：当罪犯王建荣乘车来到秦俑馆前时，他将装有烈性炸药的小型手提箱隐藏在身披的大衣内，走进秦俑馆并越过两道警卫防线进入一号坑展厅，当他发现展厅中只是站立着一片泥塑的“瓦爷”时，便不感兴趣地走了出来，寻找他要找的爆炸目标——铜车马。但当他踏上铜车马展厅门口的台阶时，他的手提箱由于身体的抖动从大衣内暴露出来并被守卫人员及时发现。因秦俑馆早已制定了不许游客提包进入铜车马展厅的规矩，故此他的爆炸阴谋没有得逞而转向馆外的假铜车马。

从实际勘查和大量的走访调查推断，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不是这样的程序，那么，罪犯从上午 11 时进入秦俑馆车场到下午 1 时实施爆炸，在这长长的两个小时内他会干些什么？

在遍地血污、碎尸、残片的爆炸现场，几乎所有身穿警服和便衣的公安人员都在忙碌着勘查、测绘、照相、化验……只有一个人没有动。他站在现场一侧静静地观察着面前的一切，面部表情沉重而严肃，忧虑而焦躁不安。我知道，在这极为复杂的情愫中，最能使他感悟的是什么。

我轻轻来到他的面前交谈起来，我和他早已认识并打过数次交道。他是秦俑博物馆公安科科长冯得全。

“又给你敲了一次警钟。”我说。

他“嗨”了一声：“何止是一次警钟，简直是在我心里捅了一刀子。前几年在上海湛江饭店发生过一起爆炸案，凶手是个女犯，炸死了两个人。后来公安机关审问罪犯时，她说最初是想来秦俑馆引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来成，结果在上海实施了犯罪行动。早在那个消息传来时，警钟就在我心里敲响了。”

“如果这个罪犯真的将出上的铜车马炸毁，我看对你这个公安科长的处理绝不会轻。”

他苦笑着轻轻摇摇头：“对我怎么处理倒不重要，也无所谓，只是遭受的损失和影响恐怕不是能想象的了。”

“我们应该在兵马俑坑和铜车马展厅安装像机场检查站那样的检测器，这样或许就能避免恶性事故发生。”我望着他阴沉的脸，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长叹了一口气，又摇摇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不用说安装检测器的投资问题，即使安上，这么多的游客又以怎样的方式和程序进行检测？秦俑馆毕竟不是机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警卫人员的素质和辨别能力，加强责任心与使命感，别无他法。”

我点点头，心想他说的也许符合秦俑馆的实情，在这块满是血污的土地上，他惊恐而又威严地站着，他在为整个秦俑馆的安全而陷于深深的不安与沉恩之中。

秦俑馆前的爆炸案，在给秦俑馆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又一次敲响了警钟的同时，也在他们心中蒙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增添了一份沉重的忧虑。就在爆炸案发生的当天晚上，正在西安办理公务的袁仲一馆长，立即返回秦俑馆，召开了全馆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在强调了全体人员要提高警惕的同时，又对公安科和警卫中队格外叮咛一番。

会停了，人散了，袁仲一的心情依然无法平静。他曾几次从宿舍里走出来，头顶时隐时现的星斗，独自一人在漆黑的夜幕中徘徊。他深知，只要秦俑馆存在，罪恶还将会在这里产生，如果哪一天秦俑博物馆的文物遇到不幸，他这个一馆之长该如何向中国乃至世界人类交待？

武士俑头再次被盗

就在这次爆炸案发生 2 年之后的一个冬天，冯得全和袁仲一所担心的事情，再一次降临到秦俑馆。

1993 年 7 月 13 日，青海省大通县后子河乡东村农民韩光云，踏上了开往古城西安的列车。随着列车不住地颠簸荡动，这位 21 岁的男性公民的思绪也在剧烈地翻腾。

在此之前，他并没有要走出那个偏僻贫困的乡村，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的打算。只是一个偶然或者说是必然的事件，让他不得不作出了这个抉择。尽管这个抉择很令他感到为难和苦涩，但也有一线甜蜜的曙光似明似暗地映照着他——这是关于一个女人的事件。

在他的眼里，那个女人是世界上最为美丽也是最为可爱的，他无法详细地回忆起，自己是从什么时候爱上她的，或许是在小学，也许是在上初中的时候，跟他同村又是同学的姑娘，就经常地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有事无事地经常来到姑娘的身边，说一些朦朦胧胧的生硬但肯定渗杂着爱情味道的闲话。当他们双双辍学回到乡村后，他便经常帮助姑娘一家不计报酬地干些杂活。他是一位身体强壮，头脑灵活的西北汉子，他知道该以什么样的优势来征服她。

当他感到时机成熟或者说水到渠成之时，便悄悄地托了个媒婆去摘心中向往已久的鲜果。尽管老媒婆伶牙俐齿，经验丰富，处事干练老道，素有宿将之称，无耐两家相处太近，谁的家中有几只老鼠都十分清楚，加之姑娘年轻貌美，姑娘的父母断言拒绝了老媒婆的代理任务。

男性公民韩光云见自己颇为尊重的情场老手败下阵来，心中大为惊骇的同时，又猛生疑窦，认为这老姬是故意跟自己兜圈子，耍布袋戏，实属贪恋钱财之徒。为使好梦成真，他便心生一计，速到本村小卖部购了几个罐头和几斤鱼干给老媒婆送上，嘱其再次从中周旋。

老姬见小伙子聪明真诚，又有礼品送上，不好推辞，只好于第二天那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再次硬着头皮潜入姑娘家中。

在来姑娘家中之前，老媒婆便仔细地总结了上次失败的教训，然后脑海里像演电影一样把自己在姑娘家的场面以及言谈举止，又细细地过了一遍。凭着多年的媒婆经验，她从回忆的众多镜头中，终于捕捉到了对方显露破绽的画面，针对几处破绽，她详细地制定了攻防计划，准备一举将对方降服于膝下。

决定一个女人命运的酣战重新拉开了帷幕，老姬尽管年届七旬，但不愧是方圆数十里的媒介名将，依然有宝刀不老之势。在那个寂静清冷的黑夜，面对孤灯，她舌战群儒，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向前逼进，对方则步步后退，大有一触即溃之势。

大约五更时分，对方终于招架不住，被迫有条件投降。这个条件就是只要韩家能拿出 3 千元，姑娘便由他领走。

这个条件对于韩光云来说也颇苛刻，他一家六口，只住着两间土屋，一年到头温饱都成问题，怎么能拿得出这 3 千元钱。但不管怎么说，曙光终于

出现了，只要想些办法，也许会有希望的。

从此，韩光云日夜思念起发财之道。当他偶尔听一个亲戚家的表哥说西安打工可以赚钱后，便怀着万分惊喜踏上了去往古城的列车。

当韩光云随着人流走出西安站步入广场时，他差点晕倒了。这个突变的心理感应，不是由于他得了心脏病或脑溢血之类的急症，而是眼前的景象使他感到头晕目眩了。宽大的广场上聚集着数不清的人群，车辆来往穿梭，高耸入云的楼群几乎挡住了太阳的光线，使他辨不清东西南北。眼前的一切使他惊奇、羡慕、迷惑，最后达到了晕眩。当他稍稍回过神来后，便突然觉得自己生活了 20 多年的那个偏远闭塞的乡村是多么落后和寒酸，这 20 多年的人生简直是白白度过了。在懊悔与亢奋中，他投奔一个在西安打工的同乡住下来，不再顾及挣钱发财的事，第二天就登上了西安东线一日游的大轿车，决定先游览一番，以弥补这 20 多年来人生的遗憾。

大轿车在举世闻名的兵马俑博物馆停了下来，韩光云随着乘客进了展厅。当他看到面前只是一排排的泥人人时，觉得实在有些无聊，甚至觉得花的那 8 元钱的门票是多么冤枉。

正当他垂头丧气、后悔不迭之时，只见一个浓装艳抹但仍周身透着土气和俗气的野导游（野导游又称“刀子”，是近几年在中国旅游区崛起的新的气象，关于“刀子”的故事后文详述）说：“兵马俑的价值随便拿出一个就能换回一个香港，有十个就能换一个美国。”女野导游说着，自鸣得意地看了看惊骇不已的众人，更加狂放他说：“前年一个叫王更地的青年，来这里偷了一个俑头，一下子就卖了几百万元……”野导游不再讲下去，她感到刚才的话足以把兵马俑的价值生动又形象地表达了出来，她感到她已尽了自己作为“刀子”的义务和责任。而听众也由于她的一番高谈阔论激动万分，狂骇不止。

此时的韩光云收紧了怦怦跳动的心，眼睛死死盯着“刀子”，他不是为她那张涂抹得近似妖怪一样的脸蛋，而是为她的话，为她话中那几百万元的诱惑。

这个诱惑太强大了，强大的不敢让他相信，一个泥人头就值几百万元，这不是瞎话也是神话，想一想自家那两间泥屋才值多少钱？

正当他困惑不解，信其有又信其无的时刻，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察走了过来，他们以威严的面容注视着大厅的各个角落，令人感到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文物重地。

韩光云似有所悟，他的聪明很快使他把这里的一切和自己那个乡村作了对比，并很快得出结论：如果这些泥人人不重要、不值钱，怎么戒备如此森严，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特别是一些黄头发、长鼻子的外国人专程来看，自己的那个乡村怎么就没有人愿意光临，……想到这里，他在这个结论的背后又下了最后的结论，那位野导游小姐的话是真实的，兵马俑了不起。

将要走出博物馆的时候，他突然觉得有些恋恋不舍，到底舍不得什么，他自己也一时搞不明白，当他最后瞥了一眼四周那高大森严的围墙时，心中翻起一股莫名的沉郁和狂跳。

由于韩光云此次西安之行没带足够的经费使他足以稳住阵脚，十几天之后，他便在无奈中快快返回青海家中。

外面的世界已经走入他的心灵，就不可能再让其收拢回缩，那个偏僻贫困的乡村已不可能再让他留恋了，唯一留恋的是那个将要嫁给她为婆娘的女

人。或许，正是为了逃避乡村的庇护，得到女人的温暖，他才痛下决心，重返西安。

1993年12月25日，他凑了80元钱的经费又踏上了去往西安的途程。当他站在西安站广场的时候，由于车票花掉了29元钱，身上只剩下51元钱。因为没有身份证，一时难以找到打工的活计，几天之后便身无分文了。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韩光云躺在黑乎乎、脏兮兮的屋子里，开始了是走还是留的严峻抉择。继续留下来，已十分困难，如果就此回去，何以向父老乡亲交待？何以去面见那位将要投入自己怀抱中的朝思暮想的姑娘。

想到那位姑娘，他的心中越发恐慌不安，要是再不拿点钱给她家，看来她的父母是不会答应，而她自己也不见得就非要等下去，从前一段的接触后，姑娘好象对自己并不感兴趣，只是迫于老媒婆和父母的压力，加之自己又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人，才勉强答应下来。就以她的聪明和心比天高的性格看，答应这门亲事，也许是她的缓兵之计，一旦找到上等的男人，她是注定要飞走的……想到这里，他的额头已沁出了汗渍，他感到心中焦躁不安，痛苦难耐。

当最后一个烟头扔到地下并被狠狠地踩灭之后，韩光云脸前灵光一闪，一条奇招迅疾划过脑际，这个奇招如黑夜中一道闪电，在迅速划过的同时，又急速隐于暗夜不再复现。

韩光云抬手抹了把脸，脸上散发着火辣辣、热乎乎的气息，待这气息稍稍散开，那闪电般的奇招又涌向心头，并使他在极度的恐惧之中感到了一片欣喜。

他想起了几个月前，在兵马俑博物馆大厅参观时，那位女“刀子”的讲解，想起了那遍地站立或躺着的泥人人，想起了那值几百万元的泥人头。假如这千万个泥人头有一个是属于自己的，那会是一幅什么模样？不但家乡那位姑娘束手就擒，即是古城西安那些整天涂脂抹粉、鼻孔朝天，见了自己就吐唾沫的俏小姐，也会手到擒来，跪于自己的膝下。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发歪财不富，这是家乡流传了几辈子的醒世警言。如今自己已是穷途末路，何不去偷一个泥人头发上一笔？

决心一下，他便借着暗夜的寂静，构思行窃的计划。

1994年1月5日下午5时许，韩光云拿着从同乡那里借来的十几元钱，乘车来到秦俑馆。借着夕阳的余辉，他在馆外各处详细侦察了一番，便悄悄来到秦俑馆南边王地村麦场上一堆玉米秆中躺了下来，尽管时值冬日的严寒季节，黄土高原上冷风凄厉，尘土飞滚，但他却感到周身阵阵躁热，身上的血液在汩汩流淌，他完全沉浸在一个伟大时刻来临之前的紧张与狂喜中。

天渐渐暗了下来，夜幕笼罩了突兀的骊山，四周也已处于平静。一阵紧张与狂喜过后，面对无尽的黑夜，韩光云感到在极度的疲乏之中又有几分孤独和恐惧。夜风卷了过来，周围的玉米秆叶子哗哗啦啦地响着，像一群游兵散将穿越丛林的脚步，越发让他感到凄凉和不安。韩光云将玉米秆的缝隙又拓宽了些，整个身子被埋在里边。他闭上眼，仰躺着，索性要好好地静一静神。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当韩光云醒来时，已是子夜时分。他钻出玉米秆，不禁打了个寒战。风仍在无尽的夜里往返窜动，阴沉的天空像锅底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潮润，像要下雨，又似在降雪，或许要落一种更加庞大和沉重的不祥的东西。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天地在混沌中裹夹着世间的芸芸

众生苦度沧桑。

韩光云将头摇晃了一下，使劲睁了睁眼睛，以辨别他所在的位置和他要去的地方。片刻，他提起那个黑乎乎的手提包，借着夜色向秦俑馆摸去。

秦俑馆渐渐近了，院内几盏路灯在夜幕的包围中，疲惫地燃烧着，残淡的光映照着点点树影和高大的围墙。

韩光云摸到一个偏僻的角落翻墙进院，躲在漆黑的地方向周围窥探。这时，只见一个身背长家伙的武警走了过来。他惊出一身冷汗，怦怦跳动的的心脏几乎要蹦出口中。他按捺着又准备着。他悄悄地从身旁摸起一大块砖头，作好了攻击准备，他想，如果自己被警察发现，他要一个箭步窜上去，先发制人，照准警察的脑袋就狠狠地来一下子。但是，警察没有发现他，而是从他身旁慢慢走了过去。他看到那冰冷的枪刺离自己越来越远，便轻轻嘘了口气，将砖头放回原处。

他不敢向存放兵马俑的大厅走去，他要摸清值班警察的规律，否则，不但是徒劳，反而是引火烧身。

终于，他摸清了。巡逻警察转一个来回要数十分钟。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他只是摸到了值班人员的规律。

事实上，秦俑馆内几个大厅相隔不远而又各自独立。仅一号坑大厅就长达 230 米，宽 72 米，绕一周便是 604 米，更何况围三个大厅绕一周的时间？

规律已经摸清，他开始壮着胆子，趁着值班人员的空隙，向一号大厅飞速而去。当他停下来时，顾不得喘口气，便伸手去拉大厅那带转轴的大窗。这个大窗他白天就悄悄地试过，他觉得整个大厅就是这个大窗可以拉动并有可能钻进去。他在白天悄悄拉动大窗时就犯起疑惑，为什么整个大厅偏偏这里可以拉动？是馆内人员的疏忽，还是故意设下的陷阱？或许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但不管怎么样，这里是唯一可通往大厅的道路，只有进了大厅，才能得到自己要得到的东西。

别无选择，于下去。

大窗转动了，发出轻微的不情愿的吱吱声，可惜这种声音极其弱小，刚一发出就被原野的风吞噬了。

韩光云干脆麻利地翻身进入大厅，尔后像个行盗的老手，匍匐前进到大厅西区兵马俑修复现场。这里排放着一些尚未修好的陶俑。此时，他的两眼放射着异样的光，极为兴奋地向一个陶俑

扑去。

面前的秦俑又高又大，重在 150 公斤以上，要盗走整个一件谈何容易？于是，最具艺术和文化价值的秦俑部件——俑头，自然成了他猎获的对象，他在飞速地像农民拔萝卜一样地拔着俑头。遗憾的是，俑头像是长在陶俑的身上，怎么也拔不下来。情急之中，他的头上冒出了汗珠。

当他一个个不住地摇着俑头时，脚下被绊了一下，险些将他绊倒。他无意识地往脚下一看，原来地上正躺着一个只有上身而无下身的陶俑，这显然是出土后未来得及修复的残俑。令他兴奋不已的是，居然俑头完好无损。他立即弯下腰，两手抱住俑头左右扭动了几下，很快就拔了出来。

当他抱着俑头顺原路返回到窗下时，他的心中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惬意和激动。他仿佛觉得怀中抱着的不是一个铠甲武士俑头，不是一个冰冷的泥人人头，而是一个鲜活水灵并散发着香水气息的女人的头，他仿佛嗅到了这个女人吹到自己脸上的热烈而甘美的气息，以及醉人的那略带泥土味的馨

香。

一个难题摆在了他面前。

由于窗子太高，他无法怀抱俑头爬上去。怎么办？他环视四周，发现坑内散落着一根根的草绳。他不知当初考古人员为什么要在坑内放这么多草绳；也不知这些草绳的真正用途。他只是觉得这是苍天在暗中帮助着他，让这里有这么多草绳。他不敢耽搁，跑上前去拽了几根草绳，胡乱将俑头捆绑起来。他要用农家打水的办法，待自己爬上窗子后，将俑头吊出来。好一条奇妙的计策。

当他庆幸着老天保佑并觉得心中那个女人已被自己牢牢绑住，并将任意为自己宰割时，不幸的事发生了。大祸来临了。

他做梦也没想到，今日的秦俑馆已不同于三年前的防卫技术，这里已经配备了世界上一流的监测防控仪器。当他翻窗跳进大厅的一刹那，已经落入一张天罗地网之中。

1月6日凌晨2时55分，秦俑馆安全技术总控室监测荧屏显示一号大厅04号报警区域报警。04监测探头是复合双技术先进报警探头，具备微波扫描和红外线控温两种科学手段，能迅速智能分析侦察异常情况。总台值班人员听到报警，马上通知大厅内民警：“04号地区情况异常，立即进行现场搜索！”并向公安科长、队长报告。一把利剑迅速出鞘。

公安科长冯得全和民警队毕队长在3分钟内就将全体民警召集起来，果断命令兵分三路：包围大厅外围，封锁馆内所有通道，部分警为去馆围墙外设伏堵截。与此同时，公安干部小兰、民警詹向东同民警梁金刚、杨安吉，在馆内大厅兵分两路向西区搜索前进。大厅内虽有照明设备，但在这阴沉的冬夜似乎显得特别幽暗。要在总面积14260平方米内的大厅，寻找一个暗藏的盗窃分子并非易事。约3时10分许，当搜索人员合拢包围到大厅西南角运土木桥时，发现一个黑影紧贴在桥下立柱上。他，就是韩光云。

训练有素的民警飞速上前将其擒获。现场缴获了罪犯用草绳捆扎好的俑头，在墙外缴获一个手提包，这是用来装俑头用的。

韩光云被送入大牢，所获赃物经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结论如下：

被盗俑头系秦俑馆一号坑西区T20-8G-81号铠甲武士俑头，属秦代。俑头造型准确生动，塑作精致，神韵形象生动，属国家一级文物。

1994年9月1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韩光云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至此，韩光云的女人梦和发财梦全部落空了，他将在高墙和铁网中度过他的人生。没有人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能活多少岁月，但他的归宿现在就可以说得清，这就是——死于女人和贪婪。

关于自身的忧思

一百年前，留美归来的广东人容闳想招收一批幼童赴美留学。但他费尽心机，苦等数日还是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最后不得不改道香港招收了数名学生，才算补足了这小小的数字。

一百年后的今天，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凡有西方驻中国领事馆的门前，总是云集着一群群焦虑不安而又不得不耐着性子等待的中国人，尽管他们的身份、背景、地位、追求各不相同，但总的目的却是一致的，这就是要设法取得一张去西方国家的签证。

就在英国的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并给人类带来第一次技术革命的一个世纪

之后，西方的洋人们在中国的土地上铺设了华夏第一条铁路。其结果却被当时的中国政府和炎黄子孙以极大的恐惧与愤怒之情将铁路拆毁。直到历史的年轮滚动到 20 世纪 80 年代并卡压得中国子民几乎无喘息之力时，才有人站起来大声惊呼：“中国发展的要害部位在于交通。”

由于长期的封闭与保守，直到本世纪 70 年代我们还仍在自我感觉良好地声称：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口众多……而一旦当国门打开，我们的目光注视着整个世界格局和发展图景时，才蓦然醒悟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危机：人口、资源、粮食、环境无不困扰着生存在这块黄土地上的炎黄子孙。

于是，我们的生活观念开始转变，我们的价值取向开始转移，我们的目光和奋斗目标在投向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人类的同时，也在热切地投向自身，我们在关心整个民族发展的同时，也在感悟注重作为个体的人的本身价值。

当我们蓦然回首，竟发现昨天与今天有那么多的不同之处，昨天虽然没有古老，但却毕竟成为过去，过去的时光不会再来。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叠厚厚的纸张，散发出淡淡的霉味。在这些回忆文章和日记中间，我有机会再度窥视到已逝去的那段时光中这里的建设者那潜藏于身心之中的思想脉络和生命轨迹——

从筹建博物馆的人来说，只有从外县调回下放的 3 个干部，加上自愿回本地工作的 2 人，其余 19 人都是从省文化局所属单位借调的。博物馆地处农村，距西安市 70 里，到临县办事还要步行 7 公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我一想到革命的前辈，在开创根据地时披荆斩棘，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心里就忐忑不安，惭愧不已。今天有党和人民的支持，只要自己努力工作，一定会完成任务。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建好秦俑馆。一股暖流涌向心头，人说千条万条抓根本，千军万马抓班子，根本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思想。（我）随即提出了一个动员口号：建好秦俑馆，为国争光，为中国人民争气……不知不觉地合衣而睡了。

——摘自秦俑馆第一任馆长

杨正卿手稿

然而，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除了“四人帮”的疯狂捣乱和破坏外，唐山、松潘又遭严重地震。接着国家几位主要领导人周总理、朱德委员长、毛主席又相继去世。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心情相当不安，处于一片悲痛、哀伤之中。尤其是“四人帮”，为了反对周总理和迫害邓副主席，捣乱破坏的步伐节节升级，从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潮起，到阴险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天安门流血事件，残酷地镇压了革命人民，妄图窃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祖国的上空确实密布了阴云。但是，战斗在秦俑工地的干部职工，背负着这沉重的压力，大家默默地扎实地干着自己的事业，压力成了动力。大家在参加了毛主席的追悼大会第二天，就化悲痛为力量，动上开挖了秦俑一号坑大厅 36 个基础坑的第一个。筹建处党支部、施工现场指挥部领导，为了鼓舞士气，提出了建好秦俑馆为国争光，为毛主席争气的战斗口号。所以我们一不怕地震的威胁，二不怕“四人帮”批“唯生产力论”。领导群众，大家都是吃在工地，住在防震棚，白天热火朝天地干活，晚上棚内讨论工程和国家大事。基础土方工程进展很快。

——摘自王志龙回忆文章面对这显然镌刻着时代烙印并具有浓烈政治色彩的日记与手稿，我不怀疑撰写者当初的真诚，相信他们度过了一段艰难的

人生历程，并在这段历程中始终洋溢着革命激情。这其实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华民族整体精神与生活风貌的概括与写照。同样，面对今天的他们，以及他们同伴的精神变化与对人生新的认识和思考，我依然感到真实可信。在秦俑博物馆副馆长吴永琪的办公室里，这位当年随着上山下乡的热潮来到延安地区插队，后调到秦俑馆工作的北京知青，向我介绍了大量工作人员的艰苦生活与奉献精神后，又特地叮嘱：“在你的文章里不仅要有秦俑人的乐观和自豪，还要有他们的忧思和对前景的真实心理感受，这样才能较准确地反映出秦俑人的内心世界和现实生活。”

我在点头称是的同时，心中暗想，秦俑人经过了十几年生活磨炼和情感积淀后，终于摆脱了特定时代所赋予的盲目乐观与自豪，而实实在在地开始注重自身的生活与事业、甘苦与忧虑了。

那么，我们现在该关照些什么？

秦俑人的忧虑是多方面的，但生活的困境则是构成忧虑的重要因素。尽管秦始皇陵园和秦俑博物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尽管这块在地图上无法找到的弹丸之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尽管早在十年前就正式对外开放，但秦俑博物馆仍然未能摆脱这独特的地理环境对它的限制和束缚，它依旧并注定要永远坐落在这偏僻闭塞的山野荒滩之中。

当年来这里工作的人们，也许并未意识到他们的青春和生命会这样长久地和山野荒滩作伴，更未令他们预料到的当自己的青春及生命将要被岁月无情地耗掉时，仍将和这大山与荒滩相伴的竟是自己的儿女们。现实已经证明和仍在继续证明着这个事实，最早来这里工作的马青云、王志龙、张文立、杨异同等人的儿女，已经在这里沿着父辈的足迹踏上了自己生活的途程，他们将别无选择地要同自己的父辈一样，把青春与赤诚全部注入这块黄土，他们注定要经受生活赋予自己的缺憾与磨砺。

我在秦俑馆采访的日子，感觉最深的是环境的苍凉与寂寞，文化生活的贫乏与物质生活的不便。只有当游客到来的时候才显得热闹，有了生机，当游客一旦全部离去，又分外让人感到孤寂与空荡，甚至伴有淡淡的伤感。尽管这里的泉水拥有让一个幼童洁白的牙齿渐渐变为黄色并足以使少男少女因牙齿的缺憾而哀叹不尽的奇效，但秦俑馆的日用水源却仍不能满足工作人员的需求。我在秦俑馆的日子，就时常饱受找不到一点水洗去脸上污垢的痛苦。当我针对水源问题询问副馆长吴永琪时，他的回答令我遗憾又无可奈何，“这里每打一眼井都要经过上级批示，我们好不容易得到批示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出了水，但这里水位却极深且出水量极少，积攒一天一夜的水几乎难以满足洗菜做饭的需求，所以秦俑馆至今未能建一个澡堂，职工们洗澡只好跑到3里外的缝纫机厂去沾人家的光。其实不仅是水源短缺的问题，这里的职工买一把菜、看一场电影都要跑到十几里外的临潼县城。而生活上的困难倒还可以容忍和逐步解决，目前最困难和令人头痛的是子女教育问题。秦俑馆这么多干部职工子女，很少有人考上大学，考不上大学，就要在这里干下去。如此教育不足的恶性循环，对国家和对个人都没有利益。我们这一代人倒是没有什么额外的需求和欲望了，但眼睁睁地看着下一代孩子高考落榜后那痛苦的表情，心中总是感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难以言状的内疚……”

环境、水源、文化、教育、交通……困扰着秦俑人，使他们越来越感到创业的艰难与跋涉的痛苦。但面对眼前的现实，又似乎没有什么招数可以摆脱这种困境。这帮已有妻小、人到中年或近老年的秦俑人，只好在无情的现

实面前低下头颅，默默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他们认了，他们豁出去了，他们有了和兵马俑博物馆共存亡的悲壮精神与刚烈意志。

但这种精神和意志并不是所有秦俑人都具有的。在采访的日子里，我有意识地接触了几位刚踏进秦俑馆的工作不久的年轻大学生。让我感到惊讶和新鲜的是，他们具有的却是另一种悲壮的精神和刚烈的意志。他们不再安于现状，他们要和命运作顽强的抗争，他们的目标是走出秦俑馆，寻找更广阔的天地。

那是一个既停水又停电的夜晚，我闷在黑洞洞的屋子里，因为不能整理采访笔记而感到烦躁不安，便索性来到已燃起蜡烛的另一个房间，和两位刚分进秦俑馆不足半年的大学生进行了交谈。

“你看这日子还怎么让人活下去！”跳动的烛光映照着一张算不上漂亮但朴实、可爱的少女的脸。她在无意识地向我和她的伙伴发着牢骚。

对她的具体情况我了解得不多，但早就相识。记得我刚驻进秦俑馆的头几天，多亏了她和她那位同伴的帮助，才喝上了几杯热水。她的朴实与真诚恐怕要令我终生难忘。

我知道她和她的同伴在大学都不是攻读考古专业，却不知道像这种完全可以留在大城市某个企业或机关更能发挥专业特长的大学生，为何要分到这偏僻的秦俑馆来。

我知道她对自己的分配和现状并不满意，便即兴问道：“当初分配时为什么不找找关系留在西安？”

“我是个女孩子，老爹又没本事，向哪里去找关系？”她说完，拿起身边的毛线织起了毛衣。

“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一下班就织毛衣，未免有点像家庭主妇了吧？”我为她的这种生活方式感到惋惜，因为在和她们相识的日子里，我看到她大部分业余时间都在无休止地织着一件或几件毛衣。

“不织毛衣，你又让我干些什么？”她抬起头望着我，稍黑而又红润的脸上露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

我无言以对。

“你是否终身会在这里工作？”沉默了一阵后，我问。

“那不可能。”她没有抬头，和我说话的同时，仍在忙碌着查找那散乱的线头。

“那你今后怎么打算？”我问。

“当然是回西安市，我的全家都在那里。”她的言语透视着坚定不移的心理。

“你能调回去吗？”我问。

“走着看吧，一年不成两年，两年不成三年，我想上帝总有发慈悲的时候。”她放下毛衣，两只乌黑的眸子静静地望着我，表情充满了激奋与自信。

我无语，似理解又不理解地点了点头，当我要跨出门口起身告辞时，我心里涌起了一阵莫名的惆怅。

这次闲聊之后的第二天晚上，我特意邀请了一位在大学攻读考古专业同样是刚分到秦俑馆不久的大学生，我觉得应该更广泛地了解他们这代人的生活观念和心理走向。

这位大学生深刻而富有诗意的讲述，竟使我大吃一惊。

“人生的路有时竟由不得你个人选择。我不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糊里糊

涂地学了考古专业，毕业后又是不容你个人选择地分到了秦俑馆。作为考古专业的大学生分到这里，按说是幸运的，如果立志于这项工作和考古研究，或许在这里可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就会比在别处还强。但当我到来时，心中就蒙上了一层忧虑和阴影，难道我的一生就永远在这块天地里生活下去吗？我认为一个人对前景不应该看得太清、太透，如果看得太清、太透就变得毫无意思甚至比较可怕了。我现在才 20 多岁，如果不作别的选择，注定要在这里熬到两鬓斑白直至退休。这种生活和前景太令人不可想象了。何况秦俑这块骨头已有无数人在啃吃，只要秦陵不揭开，要再想以啃秦俑这块骨头成名成家是极其困难的。即使秦陵揭开也不见得就能成就自己的事业，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世界知名的，尤其是同行，大多都成为相互残杀、相互排挤、相互打击、相互诽谤的冤家对头。这种现象其实在秦俑这十几年的发掘中就已明显暴露出来了，如果不是相互排挤和残杀，许多事情不至于搞成两败俱伤的结局。对这些现象我是极为讨厌的，我将尽量避免和别人发生冲突。其实想透了，这些作法也是极为无聊和没有意思的，即使争得了秦俑研究第一把交椅的地位又怎样？秦俑再伟大再辉煌也毕竟是世界考古史上的一个小小部分。要想成为真真的考古大家，取得考古界的重要地位，仅研究一个秦俑是不够的。必须把目光放开、放远，面向整个古代人类文明遗迹，去做更广泛的探索、发掘和研究，同时作为考古学家个人要有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机敏与聪慧。中国考古学巨匠夏鼐就是极好的例子。他不但参加了中国文化遗迹的发掘，而且在长达 5 年的英国留学生涯中，参加了许多国家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因为有这段不同寻常的国外经历，才产生造就了伟大的夏鼐。正如日本考古学家通口隆康先生所言：‘夏鼐之所以能保持了中国考古学界顶峰的地位，是由于他高尚的人品以及专心一致力求学问的精进。他不仅对于国内考古学，而且对于国际上考古学方面的知识之渊博，涉猎范围之广泛，作为一个考古学者来讲，是无人与之匹敌的。’

“所以我想放弃秦俑这块骨头到国外去，并且放弃考古学改为专攻人类学。我认为人类学是一门更具有发展前途的学科，有着极为广阔的领域，它既和考古学相联，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假如有一天我的出国梦能够实现，我想是会做出比秦俑馆更大的成绩来的。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可能永远无法实现的辉煌梦想，因此我目前的心理极为复杂，工作热情也自然不是很高。我所喜爱的不是兵马俑，也不是铜车马，而是馆外的田野和田野中生长着的早木。每当麦苗返青，杏花开放的季节，我几乎每天早晨和黄昏都要到野外散步，用手轻轻拨弄麦苗上的晶莹、荡动的露珠，用唇亲吻杏树林中迷人的鲜花。我感受到的是青春的气息和大自然生生不灭的力量。那麦苗的兴旺，那鲜花的芳香以及远处的山野丛林和天空中飞翔的小鸟，无不引起我身心的骚动和情感的奔涌。我越来越感到，美丽的大自然在不断地召示我走出秦俑馆来，驰骋于更加广阔和多彩的世界中……所以我要尽一切努力，摆脱目前的困扰，踏入一个前景并不明朗但却注定更有人生意味的理想之国。”

这位年轻的大学生在向我倾吐了这近似狂妄的心音后，又反复叮咛：“你不要和别人说我的想法，最好也不要写入文章，即使写也绝不能暴露我的姓名，甚至连我是男是女也不要点明，以免引起不良的后果。因为现在我毕竟还在这里工作，这苦衷你能理解。”

我点点头，真诚他说：“我不但能理解，而且祝愿你早日实现那个辉煌

的梦想，成为世界著名的人类学家。当然，如果你获得了诺贝尔奖金最好别忘记我。”

我们笑着相互分手作别。

在那间暂住的屋子里，我在默默地剖析着秦俑人的忧思：政治上的磨难、发掘中的阻力、技术保护方面的无能为力、环境的闭塞、交通的不便、生活的窘境、水源的缺乏、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争斗与磨擦，以及文物的安全保卫问题，孩子的教育问题，年长的与年少的在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上的不同认识问题……这一切如同股股小溪汇成的江河，强烈冲击着时代和现实生活，许多古老、陈腐的观念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摆脱了盲目的乐观与政治的需要，重新注视社会与家庭、人生与事业的关系以及其中的得失，随之而来的便是关于人生本身命题的新的感悟与思索，以及在感悟与探索中形成的不同价值观念与心理走向……这是一种时代必然的产物，这是一种摆脱愚昧走向新生的忧患与反思，这是人类在生命和现实中的更高层次的拥抱。

毋庸置疑的是，秦俑的发掘与秦俑馆的建设已经走到了不得不驻足重新选择方向与行走方式的十字路口。否则，它将越来越感到举步维艰，力不从心，直至陷于难以自拔的泥沼。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的故弄玄虚。因为事实已经在向瞩目它的人类作出回答。

第十四章 偏离航道的滑行

参观兵马俑这一伟大的发现，对我来说是一次不平凡的经历。这里不仅展现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最重要的是中国给予这个 2000 多年前真正统一中国的伟大人物以极高的评价。如果没有他的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今天我们将不可能到这儿来参观。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

穆罕默德·齐亚·哈克

悲壮的衰落

秦俑的发现和发掘，无疑向今天的人类打开了一扇早已沉没于历史烟尘中的大秦帝国的窗口，开启了一扇使我们重新走向远古和远古人类心灵的门扉。驻足于这帝国的窗口，走进这远古的门扉，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感知了秦帝国昔日的风采，感知了远古人类非凡的创造力与刚毅不拔的奋发图强的精神。那扣之有声、威武雄壮的陶俑，那寒光闪耀、锐气逼人的青铜宝剑，那雍容华贵、神采飞扬的铜车铜马，那变化多端、神秘莫测、奥妙无穷的军阵布局，那烧陶的技艺，那青铜的铸造，那冶金的水平……这一切，组成了一部浩瀚博大的百科全书，字里行间无不展示和激荡着秦帝国的盖世雄风，镌刻着它的创造者和组织者不朽的声名。这个消声匿迹的帝国，正以另一种形式穿越空间与时间的隔膜再度神奇的复活。

由此，今天的我们在置身于这辉煌灿烂的古老帝国之中的同时，也更能拨去历史的烽烟迷雾，对这位帝国大业的缔造者和中国绵延不断的文化进行更清醒地认识和反省。

关于这位亲手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的秦始皇那叱咤风云、刚烈悲壮的一生，2000 多年的历史舆论对他有褒有贬，有誉有毁，有高亢激昂的颂歌，有沉郁凄惋的唾骂。但作为一个奠定了“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的封建制度基础，并具有独特性格的历史人物，赞誉难掩他的错误和过失，诋毁也不能抹煞他的丰功伟绩。只是面对着这个复活的帝国和今日的生活现实，我们不能不将关于秦始皇的毁誉交融中最为敏感和明显的争论——焚书坑儒事件，再一次郑重提出并加以探讨，以明历史的真实和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对社会推动的得失。

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尽管各种史料记载有不同之处，但其总体却是一致的。当年所焚书籍有二类：一是《秦记》以外的周室六国史书。二是民间所藏的《诗》、《书》、百家语等诸子书。除焚书之外，又以“诽谤”、“或为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坑杀诸生 460 余人。

千百年来，人们把焚书坑儒事件作为秦始皇残忍、暴虐和毁灭中国文化的一大罪状加以唾骂和贬低，使这位千古一帝的伟大形象由此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不再具有昔日的辉煌和完美。

但是，人们在极度的愤慨、唾骂和诋毁时，却很少对一个在这次事件中极为关键的人物进行批驳，更很少有人对这个人物本身以及他所代表的阶层予以深入地解剖和探究。这个人物就是当时的丞相李斯。

所以说李斯是事件的关键性人物，是因为大量书籍的焚毁实则是他一手促成的结果。如果没有他那夸大其词、耸人听闻的煽风点火，事情的结局完全有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李斯当时尽管已身居要职，但仍未摆脱为君主驾车牵马的士大夫阶层和

“伴君如伴虎”的险境。不同的是，他比一般的士大夫更多一些实际权力而已。

令人不可思议和痛心的是，这个具有非凡才华和智慧的阶层，正如黑格尔所言：“自信生来就是为皇帝拉车的。”因而不择手段、费尽心机依附权力，攀高结贵，以选择为皇帝和政权驾车的最佳位置。同时，在选择的方式和驾车远行的漫漫征途上，又开始了内部的自残和激烈的角逐。其凄苦残忍之度，绝不比古罗马斗兽场奴隶之间的拼杀格斗逊色。随意掀动中国历史的每一页，都不难发现这个阶层内部的悲壮的自残事例。战国时期的孙臆，先是被同窗庞涓削去双足，受到酷刑，后来又是他在马陵道设下伏兵，以劲弩将庞涓射死于荒山野岭。两个杰出的军事家就这样完成了悲壮的人生旅程。而秦代的李斯，则先是以其超人的计谋，将和自己处于同等地位的同学韩非用毒药致死后，再以舌卷风雷之势，借秦始皇之手将比自己地位低下的诸生坑杀于荒郊野外，但自己也在和同僚的角逐中马失前蹄，被处死于咸阳街头。这种士大夫阶层的自残，随着历史的进展，越演越酷烈凄惋。其事例之多不可胜数，许多悲剧并不是由坐车的君主造成，而是拉车的士大夫自残的结果。之所以历史上许多君主被冠以暴戾、无道、残忍的罪名，只是他本身被当作士大夫阶层自相残杀的锐器而已。

令人大惑不解和扼腕叹息的是，这个出现了许多具有宏韬大略盖世英才的社会阶层，千百年来只知一味地依仗权势，为君主驾车开道，却从未构筑起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和生命体系，在纷繁的大千世界中，他们始终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与君主、权势作抗衡以争雄，并取得自身和这个整体阶层的胜利，这不能不算作是最大的悲剧。这悲剧的深层底蕴所揭示的则是自誉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之圣杰，远没有小小的蝼蚁聪明和清醒的哲理。

因为，那小小的蝼蚁深知自己个体的力量无法和山野丛林中的君主——猛虎、巨蟒之辈争雄。在面对如何生存的严峻问题上，它们所作出的选择不是为猛虎开道，亦不为巨蟒驾车，而是精诚团结，构筑了自己独特的生存体系，并以个体的智慧和整体的力量在山野丛林的生存环境中，和猛虎巨蟒分庭抗礼，顽强生息繁衍。

人类中的士大夫可以伴君，但这小小的蝼蚁却不伴虎。它们以整体的力量和独特的生存结构出没于山野丛林，使整个动物世界中的君主、枭雄也不得不敬而远之，莫敢轻举妄动。假如人类能领悟了其中的奥秘，假如秦时的儒生包括李斯本人不是纷纷跑到咸阳，依附权贵，给君主拉车开道，以图个人眼前之小利，而是建立和构筑另一种生存体系，或许，他们的命运结局没有如此悲惨。或许，整个世界人类的生活又是另一个样子。或许，在秦帝国陨落的千百年后，那种知识分子自残的凄苦情景也不会在这块黄色土地上出现。遗憾的是，这一点，至今人类没有做到。所以悲剧也就不会休止。

诸多史评家把秦始皇焚书坑儒说成是毁灭中国文化，这显然有些夸大其词和加重其罪之嫌。确切地说，应是以法家为代表的秦文化毁灭以儒家为代表的关东文化。而事实上，由于关东复辟势力的顽强抵制，对抗诏令私藏禁书者并不少见，致使儒家学说再度死灰复燃，并见越烧越盛，直至出现了后来大火蔓延华夏的冲天之势。与此同时，“秦虽无道，诸之尺书，文篇俱在”。至汉兴起时，民间所藏诸子百家之书陆续而出，可谓洋洋大观。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余风也骤然升起，阴阳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等诸子之学与儒学并存。各有各的信徒和市场，渐已形成燎原之势。只是自汉武帝行使“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各家学说才又陆续退出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中心。

这样的事实，已清楚地向我们表明：秦始皇的“焚书”政策和文化征服所收到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它在客观上没有造成中华文化的断裂和灭绝性的浩劫。相反的是以项羽为代表的关东复辟势力的兵燹行动，却给先秦文化和科技造成了灭绝性的毁坏，致使辉煌的雕塑、书法、绘画、文学、音乐等艺术和杰出的烧制、铸造、冶炼以及防化等科技精髓几乎绝迹于世，出现了金光闪烁的中华文明链条中再也无法衔接的断裂层面。秦兵马俑和铜车马的出土，以鲜活的实物和无可置疑的事实证明了这一论点。否则，兵马俑写实风格的雕塑艺术、烧制工艺、铜车马的冶金铸造和青铜剑铬盐氧化处理的先进科技可能就不会失传，甚至直到今天都仍然是难以解开的科技工艺之谜。

项羽发动的兵燹，仅仅是使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文明发生了断裂和遭受了重创，而汉武帝所采取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则是最终导致中国文明衰落直至彻底沉沦的祸端。

汉初复兴的儒家学说，当时仍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在它的面前仍然是诸家学说林立，如老子、庄子、墨子阴阳家等诸家学说在朝廷和民间的影响，大可以和儒学分庭抗礼。只是汉武帝下令“独尊儒术”后，诸家学说才日渐萧条冷落。而这时的儒术由于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也便失去了原有的披荆斩棘、在竞争中不断发展、改进和完善自身的创造力和应变力，原有的单纯、朴素、贴近人生和现实的精华也日渐受到侵蚀。这时的儒学便开始趋向呆板、陈腐和僵化，它作为一家独立的思想学说受到时代的严峻挑战，并将沉沦于历史的泥潭之中。

导致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汉武帝的大一统思想。如果这种大一统思想只是在语言、度量衡、历法、礼乐等社会生活的形式方面的统一，则是符合民族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国家民众的需要，对社会具有推动作用。可惜的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根本目的在于完善政治一统下的思想一统，或者说是思想一统下的政治一统，而这种一统思想或一统政治又都是君主个人意志与见解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而使中国的集权化、君主专制政治又更加集中和“一统”，使人们的精神意志和生活方式完全臣服于君主的权力和意志之下，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思想怪圈。

但随着这种怪圈的形成和加固，儒学本身却衰落和日渐走向破灭。在这关键时刻，由于董仲舒的出现，才力挽狂澜，将衰竭的儒学再度复苏。

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理论，以自然法则作为人的行为规范，以自然秩序比附社会伦理，以天象变异比附人的喜怒哀乐，从而成功地把各种文化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都放置于天命的支配之下，形成了新的以儒、道、阴阳、刑名、天、人、自然合而为一的汉代儒学。这种“天人感应”的新儒学理论，为“君权神授”制造了迷惑民众的依据。从而使封建君主的大一统思想和一统下的政权顺利地沿着这一理论体系跨过了近千年的岁月。这种新儒学的理论不仅巩固了大一统思想和封建君主政权，同时也在迷惑民众的过程中使中国的古代教育丧失了独立性，滑向了腐蚀消磨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歧途。所培养出来的大多是奴性十足的官僚和满口“仁义道德”的愚腐学子。而这种奴性教育的最终结果是使官僚和学子的一切行为更屈从于政权并按照时政的意志和需要去行为。秦始皇的“坑儒”事件，在西汉前期尚未见载诸典籍，只是一些儒家学派的信徒口传而已。汉武帝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后，有个叫卫宏的人为迎合君主以及儒家学派的欢心，在一篇《诏定古文官书序》中，将秦始皇坑儒的传言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并编撰了秦始皇在骊山温谷种瓜，瓜熟后令儒生们下谷观看，正当儒生们面对面前的奇异现象各持己见、争执不休时，秦始皇下令填土，700余名儒生被全部活埋坑杀。而后来的史学家王充出于和卫宏同样的目的，竟不顾历史事实，在《论衡》的《语增篇》中信口开河地加以证实道：“传语曰：秦始皇焚烧诗书，坑杀儒士……言烧焚诗书，坑杀儒士，实也。”

王充的结论，终于使秦始皇背上了“坑儒”的骂名。而事实上，当年的秦始皇并未“坑儒”，只是杀了一些靠招摇撞骗、欺君蒙世的“方士”而已。当然，秦始皇坑杀方士的做法也未免过于残暴，若在2000年后的今日，按照法律以诈骗罪将这些方士判几年刑也许较为恰当。

当董仲舒提出创立的新儒学流行了近千年之后，由于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在中国的兴起，这种以阴阳五行为主体的新儒学又日渐陈腐并受到严峻挑战。尽管正统的儒家学派大力排斥诋毁佛道二教文化，但最终还是在这两种文化的渗透冲击中，不得不吸取佛道哲学中的思想精华，对汉代儒学进行第二次改造和完善。于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创立的“三教合一”的理学又顺时诞生，从而，这被再一次改造了的儒学又在中国延续了近千年。

孔子创立的儒学，经过历代王朝的一路滚动，其中“三纲五常”、“忠君守节”、“仁义道德”之类的思想系统愈渐强化，越来越加重了民众在政治上的被压迫和思想上的被桎梏，扼杀了进步求新的思想和精神。中华民族杰出的智慧、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也在《四书》、《五经》的熏染中愈渐变得愚昧并陷于僵化。延至明、清时期，随着科举的发达、八股的盛行，专业教育受到严重的压制和摧残，史学、艺术受到儒家保守思想的制约，科学技术则被视为“雕虫小技”而大加诋毁蔑视，致使中华民族处于危机四伏、濒临绝境的险要关头。

当西方文化随着传教士来到中国，当欧洲的科学家、革命家用血与火的代价冲破了持续一千多年黑暗的中世纪，并把古代科技向现代科技转变的时候，我们的帝国仍在儒家的传统思想怀抱里徜徉，并陶醉于中央大国的迷梦之中。屈原、岳飞、海瑞式的忠臣不断出现，但张衡、祖冲之、沈括式的科学家却日渐减少。

直到西方人用洋枪洋炮轰击中国封闭的大门时，传统的士大夫们还在儒家文化的祖传宝库中寻找抵制西方文明的精神武器。据说古代曾有读《论语》退敌兵的战例，只要是“仁义之师”，定能所向无敌。但面对这些完全来自另一个文化世界，只知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全副武装的洋鬼子，再也无法用读《论语》的方式和“仁义道德”的说教来阻止他们的进攻，即使那些不大拘泥于“唯经唯圣”思维模式的清军将领，面对以自己祖宗发明的火药武装的洋枪洋炮也懵了，他们在一番苦心孤诣的冥想后，终于从佛道二教文化中得到启示，断定这是洋人施展的妖术。于是迅速组成了防御战术，大量的兵卒用手中的刀矛剑戈刺向肥猪、羊群，将一盆盆鲜活的热血泼洒到城墙上，以道战妖、然而热血未干，国门却在炮击中摇摆得越发厉害，大有倾刻即溃之势。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清帝国的将领和满口“子曰诗云”的学子们，除再次命人将粪便和污物涂于城墙城门之上以破妖术外，再也没有什么招数与敌一搏了。这个以儒家传统文化构筑的大一统的古老帝国，终于在新的文明撞击中走向沉沦当中华民族饱受了外敌的铁蹄蹂躏和血

腥屠杀之后，蓦然回首，才发现这体现儒家文化精神的“道德仁义、非礼不往”云云，原来竟是吃人和被人吃的礼教。若这礼教专吃外敌，倒还是件幸事，遗憾和具有悲剧意味的是偏偏去吃孕育呵护了它几千年的中华子民。所以，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时候，以易白沙、吴虞、鲁迅、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在响亮地提出了“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去，烧去！”的口号的同时，也以“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付诸了行动……

中华民族终于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步履艰难地走到今天。当我们面对兵马俑这扇 2000 多年前的秦帝国向后人开启的窗口，难免要作这样的遐想：假如当时的秦文化能够征服关东文化，假如秦始皇燃起的那把大火使儒家学说全部更新，中华民族的进程和历史命运会是何等模样？

难以愈合的裂痕

1988 年 12 月 22 日，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在参观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后，满怀激情在留言簿上写道：“来到了伟大的历史文明地，我完全被感动了。在此地——西安，开始了中国和印度的友好交往。向你们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致敬！”

拉吉夫·甘地总理的留言，使人们想起了唐朝高僧玄奘去印度取经的故事，同时也想起了比这更早的年代——汉朝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与那条辉煌耀目的丝绸之路。这是一条同样是以今天的西安为起点，向西方延伸一直通到地中海东岸的东西方贸易交往之路。在这条全长达 7000 公里的古道上，中国人将自己制造的“美丽得像野地上盛开的花朵，纤细得可和蛛网比美”的珍贵的彩色丝绸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罗马帝国，在“罗马城内中国丝绸昂贵得可和黄金等重同值”的物品，曾令罗马贵族不惜血本争相竞购。以致使近代西方历史学家发出了“罗马帝国的灭亡实是由于贪购中国丝绸以致金银大量外流所致”的感叹。而那时的中国得到的则不只是罗马的金银财宝，还有大宛的葡萄、苜蓿，安息石榴，以及其它各国的胡豆、胡瓜、核桃、芝麻、大葱等农作物品种，也相继从西方传了进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当然，后来的佛教和佛教艺术也是沿着这条路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

不论古罗马帝国的灭亡与贪购中国丝绸有无关系，但他们的竞购却是自愿和自觉的。号称“仁义道德”的中国从未对它们是否购买进行强迫和威胁，况且丝绸的本身并不存在有害于人的成分。

可是，当历史进展到十八世纪末叶，中国人又不惜以每年一千多万两白银作代价，去购买西方输入的殷红色罂粟花。

当中国人逐渐意识到，这种罂粟花竟是足以使一个民族毁灭的毒素，并不愿再作这桩残酷的交易时，以“弱肉强食”的理论行事的西方列强，便使用大炮轰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于是，他们以暴力得到了比做鸦片交易更为昂贵的金银财宝，中华民族遭到了比购买吞吸鸦片更加迅速的灭亡之灾……

然而长夜迷蒙，恶梦乍醒。残痛的历史渐已生锈。血泪却难消失。当中华民族从苦难中站起，当那些灾难的制造者洗掉脸上的血污，重新打好领结，以友好的姿态踏入中国时，却发现面前竟横隔着一条条难以愈合的裂痕——故事之一：

1988 年秋，西方某国一个旅游访问团来到秦俑馆参观。当这个团的成员走进秦俑一号大厅时，顿时被面前的兵马俑军阵惊得目瞪口呆，大有刘姥姥

进大观园之势。唯有一个看上去精明机灵的青年却与众不同地没有惊觉之意。当旅游团成员在导游娓娓动听的讲解中缓缓前行时，那机灵的青年用眼睛向四周扫了一圈，悄悄挤出人群，在确定没有危险后，迅速举起手中的相机，对准了俑坑中站立的兵马俑。就在闪光灯射出一道白光的同时，他又旋即躲进人群之中，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听起导游的讲解。

但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走过来，将青年人的相机按住，打开盒盖，将胶片抽了出来。整个过程短暂迅速、干脆利落，大出包括照相者在内的所有人的预料。

年青人见整个胶片已曝光，立即捶胸顿足，呜哩哇啦地叫唤起来，其悲痛之状如丧考妣。那博物馆工作人员并未理会青年人的叫唤，抬手指指竖在坑壁旁“严禁拍照”的白色木牌，潇洒地走向别处……

当我在采访中听到这看起来并没多大意思的故事之后，还是找到了那位工作人员进行了一番采访。

“那个故事是真的？”我在复述了别人讲给我的故事之后，为防止讹传，我特意说出此言以证真伪。

“是真的。”他答。

“从这个故事中，我感到您带有一种奇特的心理去做了这件事。”我按自己的思维逻辑作出推断。

他笑了笑：“没有什么奇特的心理，本来大厅中明明白白竖着‘严禁拍照’的牌子，他却视而不见，非要和我们较劲儿，那我们按规矩就要给他一点惩罚。”

“我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也许我的推想错了。”

“不是错了，你说得也有一些道理。一般的外国游客，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游客，如果在大厅里拍了照，我发现后大多是先解释或提出警告就算拉倒了，用不着什么惩罚。而对有些国家的游客却不能含糊，非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要不他还以为你软弱可欺，以为这里是100年前的敦煌莫高窟或圆明园，要是给他一点惩罚和颜色，他就会清醒地认识这兵马俑坑再也不是100年前的敦煌莫高窟，可以任他们盗窃、残踏，也不是圆明园，可以任他们抢劫和焚烧。那个年代毕竟已经成为历史，今天的中国毕竟不是昨天的中国了……也许这样做显得有些过分或不太友好，但要友好就要相互尊重。你若不尊重我，我也很难尊重你，尤其是那些曾经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现在还道貌岸然、趾高气扬的国家中的人……”工作人员说完这番话后，望着我反问道：“你认为我想的和我做的是错还是对？”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提问。理解就是最好的回答，我想。故事之二：

在秦俑博物馆大门口的治安办公室里，我和干警聊着近几年的治安情况。

“还有没有人敢来盗窃将军俑头一类的文物？”我问。

“自从秦俑馆建馆以来，从没有发生文物失窃事故，至于以前将军俑头、武士俑头还有其它什么头被盗，与秦俑馆毫无关系。”身边的高副科长说着，似在证明着什么。

我怕重新落入将军俑头案之争的怪圈，干脆说道：“那扒窃游客财物的小偷，这些年应该有并且也应该会出现在秦俑馆吧。”

“这倒是事实，我们这个办公室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专门对付这些不法

分子的。”他说着，瞥了一眼墙上悬挂的一长排耀眼的锦旗没有再作声。我知道那便是他们业绩的标志和人生的荣耀。

关于抓扒手的话题，在场的所有人都颇感兴趣，因为他们在这方面都建立过功绩和付出过代价。

“前几年这里的小偷比较多，大多从西安市过来的。其特点是脚穿平板鞋或球鞋，这些鞋子基本都是新的，他们几乎三五天就要扔掉一双，重新换一双式样不同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公安人员从留下的脚印中辨别出他们的踪迹。但他们衣着打扮却比较普通，褂子上的扣子大多没有齐全的，因为他们经常在人群拥挤的公共汽车或商场行窃，扣子有不少被挤掉。我们掌握了这些扒窃分子的特点后，比较容易地抓获了一大批。后来是，西安的扒手来一个栽一个，最后一个也不来了，都到其他地方开辟阵地去了……”公安干警兰革利向我生动地描述了抓扒手的经过。

另一名尚不知姓名的干警接着讲道：“1990年11月那次就大不相同了。”

“怎么个与众不同？”我问。

“那个时候北京正在开亚运会，外国游客来的特别多。一连几天就有外国游人跑到治安办公室，报告说自己丢了相机、钱和其它贵重东西。我们感到很奇怪，怎么在短短的几天内就发生了数次外宾钱财被盗的事件？难道是西安和当地的扒窃集团又在反攻，打进秦俑馆？经过几天的观察，我们终于找到了这帮扒窃分子的踪影。

“这是一帮完全不同于西安和当地扒窃分子的盗窃团伙，每个人都是西装革履，打扮整齐，看上去很有些商界人物的味道。我们在暗中观察时发现，这个扒窃团伙共有9人，所采取的扒窃步骤和方式是3人为一组，共分3组。每组又分前、中、后三点一线，最前方的是跟踪外国人，第2个紧随背后掩护，而第3个则拉开一定的距离，手端照相机悄悄观察周围的情况。我们一看这阵势就知道遇上了高手。根据不同的敌情，我们也改变了往常单个跟踪的战术，也分为3人一组，将计就计，给他们造成了掩护和观察上的困难。这样在一天之中就将两组6人全部在作案的瞬间当场抓获。共缴获照相机3台和约合13400多元人民币的外汇。经过公安机关的审查我们才进一步得知，这是一帮从桂林赶来的扒窃分子。这个团伙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受到公安机关的通缉的在逃犯罪分子，号称‘西南虎’。奇怪的是他们行窃的对象全是外国人，并对西方那些黄头发、蓝眼睛、长鼻子的洋人特别感兴趣。我们在初审中间罪犯朱国林和李建国，为什么不扒窃中国人的财物而专盯洋人，他们的回答是：‘中国人太穷，一是没有多少钱财，再说中国人偷中国人的东西也不仁义，算不上是站着尿的男子汉。洋人们钱多物重，得手后感到过瘾和解气，因为他们在旧社会来中国耀武扬威并且还明抢明夺。眼下的政策不容许咱明抢明夺，暗地里摸他们点钱财也不算什么太大的罪过……’

听完这位干警的叙说，我心里隐隐作痛。

图腾的幻象

当我们穿越历史的腥风血雨，冲破几经飘荡弥漫的政治迷雾眺望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已接近世纪的边沿，当世界张开双臂迎接中国的时候，我们发现一种巨大的落差明白无误地横在面前。

“亚洲四小龙”似乎在一夜之间崛起，而劫后余生，在衰变中长存的东方巨龙仍没有腾飞长空，做视苍穹。

于是，炎黄子孙再度展示出中华民族坚韧、执著的性格，以悲壮的进击

姿态试图在瞬间创造出惊天动地的奇迹，以展视昔日那个辉煌帝国的盖世雄风。

我们欲以慷慨悲歌之气，在古老得生锈的轨道上作腾飞前的滑行——

自 80 年代起，香港、澳门、巴黎、伦敦、纽约等世界大都市的文物交易市场，一度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许多稀世之宝琳琅满目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廉价拍卖，任人购买，出售价格日渐下跌，大有江河日下之势。

这种奇异的文物繁荣和价格直线坠落的现象，立即引起了西方各国文物商店、文物收藏家和国家博物馆的惊恐。世界经济情报组织和各国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立即派人探寻这奇异现象的渊源，终于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世界文物市场的剧烈冲击波来自东方的中国。德国的一家杂志明确地指出：“现在到达西方国家的中国文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甚至连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也大量涌入市场，这种现象引起了全世界文物收藏家的惊恐和不安。而这些廉价拍卖的稀世文物，几乎全部是通过非官方贸易渠道，以走私的形式流入国际市场的……”

西方记者的报道并未夸大其辞，据国家文物局统计，自 1984 年以来，中国各地的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先后发生被盗案件 300 余起，有数万件珍贵文物被盗走。陕西省境内，仅 1987 年和 1988 年两年时间，就发生足以让国内外震惊的文物盗窃案 11 起。

秦陵发掘工地曾发生罪犯王更地从该处仓库盗走秦将军俑头的重大案件。就在此案发生的第七天，也就是 1987 年 3 月 4 日，

西安市省建三公司一处一队停薪留职工人张善贵，又携带断线钳、尿素袋及黄挎包等作案工具，以西安专程来到眉县文化馆，按照事先踩探到的路线，悄悄溜入文化馆第三层楼，用断线钳将文物陈列室两道门的四把铁锁剪断，入室后又剪断拴有 13 个青铜编钟的铁丝，并用秤钩撬开放有复制品的纹方尊的展柜，将馆内珍藏的国家一级文物西周牴臣铜编钟一件、西周饕餮纹铜编钟二件和同一纹形的方樽一件盗走，当夜返回西安，后被公安机关抓获，法院依法判处其死刑。

同年秋，河南省灵宝县予灵乡农民刘春利，携带作案工具来到陕西省境内的乾陵，企图盗挖乾陵 2 号陪葬墓，因无机可乘，只好改为盗窃乾陵博物馆内珍藏的文物。当他详细探明了乾陵旅游部工作人员对游客参观进出不检查，墓室石棺可藏人，墓道便门门锁可更换等情况后，返回原籍，待机行窃。

1988 年 3 月，刘春利伙同柳映申从原籍来到乾陵博物馆。

经过一番密谋，柳映申住进乾陵旅社，准备第二天随同游客进入陵墓接应作案的刘春利。

当天下午，刘春利携带提前准备的手电、钢锯条、中洲牌铁锁，提包等作案工具，随游客混入永泰公主墓，并乘无人留神之际潜入石棺至深夜溜出，用钢锯条锯坏墓道东二便房门上的华山牌铁锁，打开便房门取出彩绘女骑马俑两件，然后换用中洲牌铁锁将房门锁好，又潜入石棺内。

第二天上午，柳映申按事先预谋随游人进入墓道，将刘春利及所盗文物接应出来。两人返回原籍后，将盗窃的两件国家二级文物以一千二百元的廉价出售给走私者。

1988 年 6 月 4 日，刘春利又伙同另外两人来到乾陵博物馆。采用上次行窃的手段潜入章怀太子墓内，盗走黄色三彩女俑 6 件、绿色三彩女俑一件。3 人在返回原籍销售盗窃的文物时被抓获，珍贵文物才幸免外流。

当人们发现盗窃博物馆内珍藏的文物风险性大且行动和盗窃数量均受到局限时，便把视线转入密布于荒山野地的古墓群，或以镐头、铁锹的原始工具，或以雷管炸药等摧毁性手段，将墓葬掘开、炸翻，窃取文物，以获暴利。这种盗掘古墓的狂潮越演越烈，古墓葬甚至文化遗址的破坏数量也越来越多，景况越来越惨不忍睹。全国每年被盗的古墓可达数万座，流失文物以及文物的价值无法估量。在众多的盗墓大军中，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有专业考古队员和文物管理人员。盗墓之风的盛行几乎使每个人都知道“要致富，去盗墓，一夜一个万元户”的口号。有的为获取暴利，不惜将自己祖宗的坟墓掘开，以达目的。

随着盗墓之风的盛行，盗墓者的设备也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1990年7月，古城长安的灋高遗址大量的陶器被盗。而盗窃者有相当一部分曾在考古队工作过，具有一定的探墓经验和发掘水平。从现场发现的214个探眼看，其技术之精，速度之快，设备之良，即使是声名赫赫的秦陵钻探小分队的专业考古人员也叹为观止。

盗窃、走私文物的狂潮蔓延了整个中华大地，古老的文明在愚昧和野蛮的践踏蹂躏中已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

但是，它毕竟是华夏民族几千年历史的沉淀，是炎黄子孙非凡的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是列祖列宗昭示后人远航的明灯。无论今天变成怎样的残暴，也难以阻隔人类对它的膜拜和敬爱。

1995年7月20日，临潼县人民法院受理了秦俑馆张彦贪污及胡庚、王金安、费筱金、单子琪伪造有价票证案件，并对五被告分别判处7~2年的有期徒刑。

临潼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彦（陕西省临潼县人，系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票务科售票员），于1994年元月底，伙同本单位职工单新琪等人，伪造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门票一万三千余张（每张面额十五元），后张彦委托秦始皇生平腊像馆张良政代为出售假门票五百余张，得赃款六千九百元，其余一万二千五百余张面值十八万七千五百余元因案发未得出售，贪污未遂。

案发后，张彦供认：1994年元月，秦俑馆职工单新琪找自己商量要伪造秦俑馆门票，自己先是感到吃惊、害怕，后表示同意，并愿意为其阴谋计划出资垫支。张彦先后给单新琪人民币八千元，委托西安市某印刷厂印制。当一万三千张印完后，两人赶到西安将假门票提回，并藏匿在张彦的住处。张彦怕假票质量差，未敢在秦俑馆票口出售，便委托秦始皇生平腊像馆工作人员张良政代为出售。张良政出售假票五百余张，付给张彦赃款六千九百元。后来张彦又从住处拿出五本假门票，因案发未得出售。

当我第二次来到秦俑馆，找到公安科长冯得全了解情况时，他说，现在许多人被金钱迷住了眼睛，分不清善恶美丑，而有些人为了追逐金钱，不择手段，铤而走险，其结果往往是既坑了国家，又害了个人。像秦俑馆印制假票出售一事，过去就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现在又一次发生了，这是个悲剧，是一个被金钱驱使的头脑发昏的悲剧。当然，这个事情的发生也绝非偶然，这些年，秦俑馆在门票的管理问题上是不尽人意的，是有许多值得重视和整顿的东西的，如果不重视和整顿，可以断言，这类的事件还将继续发生，而且永远发生下去。

听着冯科长的介绍，想想以前这里发生的一曲曲哀婉的故事，我的心情

又多了一分沉重。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民族在苦难中崛起的最有力的奇招吗？这就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原动力吗？如果这些都不是，那又是什么？

也许，我早就应该对我忠诚的读者和中国的有关部门谈一谈“刀子”问题，因为这支年轻的“刀子”队伍，很早就露出了问题的端倪，这个问题像梅毒一样在这支队伍身上散发开来，成为不可收拾的晚期状。

早些时候，我在北京明十三陵的定陵博物馆采访并准备写一本关于那个地下玄宫发掘的书时，就在那陵园外的滚水桥边，偶见一位约二十七、八岁的中国女导游（因无法分辨她是小姐还是太太，故称女导游），领着一群中外游客在讲解。我走到她身边时，这位女导游正在滔滔不绝地指点着面前那块巨大的无字碑说：“无字碑为什么没有字，是因为从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就不写碑文……”以后她所讲的我没有听下去，我感到已无需再听下去了。

也许这个滔滔不绝且有些自命不凡的女人，压根就不知道在中国的安徽凤阳西南大明皇陵前的神道口，有一块篆刻的“大明皇陵之碑”，其碑文恰为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撰写，这篇长达 1105 言的碑文，情真意切，气魄非凡。现代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郑振铎先生在谈到此文时曾说：“《皇陵碑文》确是篇皇皇太著，其气魄直足翻倒了一切夸诞的碑文。它以不文不白、似通非通的韵语，记载着他自己的故事，颇具有浩浩荡荡的威势。”

至于后来的明代诸陵没有碑文，是因为长、献、景、裕、茂、泰、康七陵门前，并未设碑亭和碑，到嘉靖一朝才逐一建成。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曾请世宗撰写七碑之文，但正迷恋酒色、沉浸于成仙之道的嘉靖皇帝，却无心思想和才华撰写。自此，十三陵前的碑文便空了下来。

假如那位女导游不知这段历史，理应翻一翻这方面的书籍，若懒得翻书查史，便作不知也罢，何以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不惜编造谎言以致误人子弟？

知之为知之，不知之为不知。这句中国的古话曾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和处事准则滋润了多少代人，并由此塑造了这些人的人文精神和文化良知。可在这支新崛起的“刀子”队伍中，为什么就偏偏失去了效应？

就在这次之后，我特地邀请了中国文学出版社英文部的编辑章思英小姐一同来到定陵。在此之前，她已经对我和一位朋友合写的关于定陵地宫发掘详情的拙作，完成了英文翻译方面的工作，她对定陵的整体概况和具体事件已相当熟悉。由此，我故意让她跟着专门为外国人服务的“刀子”们，看他们是如何推销这古老文明的，几个来回下来，她不愿意再跟下去，她先跟我说：“不可思议”，后又说：“简直是在杀人。”我从她痛苦的面部表情中猜出，这些专门服务于外国人的“刀子”们，对这古老文明是作着怎样的一种解释？而那一帮又一帮的国外游客，又是怎样被天真地稀里糊涂地阉割着渴求文化与仰慕文明的良知。

当然，仅凭以上证据，还不足以产生“刀子”的名称，也不能形成梅毒式的病变。名称的产生及病变的大爆发还要在几年以后。

当我再次来到秦俑馆的时候，病变已经爆发了。

那天早晨、当我和同道来的记者许志龙先生、从居住的秦俑博物馆外一个小招待所走出来时，迎面走来几位农村打扮的姑娘将我们围了起来。“需要导游吧先生，我们给您做导游，既便宜又随便，保您满意。”姑娘们争先恐后地说。

我望了望他们那被寒风吹得微红又有些皱裂的脸，惊恐之中又多了几分好奇，想不到这些农村姑娘还没放下锄头就做起了导游，这个世界变化得快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我们当然没能让她们做导游，冲出重围向前走去，走不多远，又被一群农村姑娘打扮的导游小姐围住，我们再度冲出重围，向秦俑馆走去。

我们之所以这样义无反顾地杀奔出来，一是不需要导游，二是对她们心中没底，不知道这群女人会给你讲出些什么来。

我们在兵马俑一号大厅里转着，眼睛盯着几千年前的祖先，心中不觉又产生了一种震撼和敬慕——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强大无比、战无不胜的中国。

这样想着，身后有人群拥挤而来，嘈杂的争论声中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最为响亮。我回过头，看到了一个我刚才似曾见过的女导游。

女导游正在给人群讲解。

“中国第一个皇帝叫秦始皇，他娶了一个婆娘是武则天，后来他的婆娘把秦始皇害死了，她自己成了皇帝……这些兵马俑是秦始皇在临死前偷偷布置的军队，他想在阴曹地府指挥这些军队杀武则天，为自己报仇……”嘈杂声淹没了女导游的讲解，也淹没了我在心中涌起的对中国古老文明的仰慕之情。我有些模糊的视线已看不清女导游的那张得意得有些涨红的脸，我只看到一个妖怪在挥舞着魔爪，无所顾忌地撕咬着中华文明，这文明的鲜血已将她张大的嘴染得透紫花红。

我终于知道，这些女导游们来自附近的农村，她们原本并不识几个汉字，只是她们向当地县市的某部门交纳几百元钱，由这些部门集中起来学习几天，这些农村娃便可取得一个导游证，她们即可在古城西安的旅游点堂而皇之地为游客讲解。已成为导游的农村娃们，她们讲解的凭据大多靠平时看的电视剧来作为准则，一旦她们脑海中的电视剧模糊不清，那么，她们讲的故事也就自然地将牛唇强安到马嘴上。这一点，我在一个饭馆吃饭并向一个同时在饭馆喝水的女导游询问时，得到了确切的证实。

在秦俑馆和几个人的交谈中，我得知了一些更多的情况，也第一次听说对于导游们那“刀子”的称呼，同时得知“刀子”已散布于全国各地了。

既然是“刀子”，其用途自然就跟宰字有关，而他们宰的人无非就是游客。据悉，全国各地旅游景点的售货亭、售货厅包括饭店、旅馆等服务网点，几乎全部被“刀子”控制，这些服务网点要想让货销得好、销得快，就必须跟“刀子”取得联系，依靠他们的帮助。而“刀子”们一旦得到好处或承诺，就源源不断地把游客带来，并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动游客购买货物。由于游客不熟悉本地情况，多半都被说动，或多或少都要买上一些。尤其是外国游客，对中国的一切知之甚少，那么，也就只好大瞪着眼睛听凭“刀子”的摆布了。当货主卖掉货后，其获利要跟“刀子”们对半平分，有时“刀子”们得到的要比货主还要多。当然，这只是“刀子”们的一个部分，有些散落、普通、偏远的旅游景点，平时没有人光顾，这些地方的老板们便设法同“刀子”取得联系，以求他们将游客或哄、或骗或采取先斩后奏等多种方法搞进门内，然后下手开刀。所获利润的一大部分便由“刀子”们所有。如此做法，尽管有时也被游客所识破，但毕竟木已成舟，悔之晚矣。倘有不理睬“刀子”们的露头青，自然要吃亏在眼前。再好的景点、再好的货物，再实惠便宜的饭店、旅馆，只要“刀子”们说一声“不好”，或“不可买”，使无人问津。

我曾采访到这样一件事，因为有一个“刀子”太黑，秦俑博物馆各厅联合起来抵制，坚决不给她半点好处。结果，由本“刀子”率领的外国旅游团，从不踏进这几个大厅半步，只在院中转一圈便匆忙赶往别处。由于“刀子”自身的利益，可苦了那些外国佬，他们不远万里来中国想看看这世界八大奇迹，结果最多只看到几个复制的兵马俑，更可悲的是他们一定还蒙在鼓里。至于“刀子”糊弄他们的招数，也自然让他们看不出半点破绽。

几年之中，“刀子”队伍异军突起，“洋刀队”、“土刀队”山头林立，磨刀霍霍，各旅游景点便成了他们角逐的焦点，牟取暴利的屠宰场。据悉，西安有一个率外国团的“刀子”，在一天之中就获暴利9000多元。至于那些外国佬又有多少损失，则无人打听了，也无人感兴趣了。

也正因为有了这种牟取暴利的思想作先导，也就没有人再去对那古老的文明本身感兴趣，而出现种种谬误甚至怪诞的讲解似乎也成了自然之中的事了。

早在1948年，当中国人民正光脚赤背，吱扭扭地推着木轮小车，在枪林弹雨中越过黄河，突破乌江天堑，迅速荡涤着历史留下的污泥浊水之时，一代巨人毛泽东就曾庄严地向世界宣告：“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

中华民族以悲剧的心境和虽九死而不悔的浓烈的格斗精神，用一场革命推翻了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但在四十多年的成长历程中，却未剪断几千年封建思想的脐带。愚昧、无知、野蛮、落后的锁链仍在紧紧地捆绑着我们的身心，我们的手脚，枯槁着我们的精血，摧残着我们意在构筑的文明大厦。使东方这条巨龙虽已唤醒并有圈腾之志，但始终未能呼啸长空，傲视苍宇。

我们在困惑中驻足，我们回首沉思，我们蓦然发现造成当今困境的不再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是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努力去认识，看我们所接受的传统中，那些是损害我们命运和尊严的，从而相应地塑造我们的生活。”重温科学巨人爱因斯坦的忠告，对于我们今天的炎黄子孙似乎尤为重要。二十世纪已经敲响了晚钟，历史将要开始人类新的纪元。雄踞在东方的巨龙能否伴着新世纪的太阳，依然在于我们自己。

重新认识历史，反省自身吧。只有当我们清醒地认识了历史和自身，勇敢地拿起匕首，以完全不同于荆轲刺秦王式的慷慨悲歌之气，理智地刺破自己的肌肤，排除血液中一切野蛮和愚昧的毒汁，义无反顾地斩断缠绕于我们身心的脐带，中华巨龙才能得以真正的腾飞。

第十五章 为了忘却的纪念

这一伟大的奇迹，证明了中国的文明、文化以及中国人的信仰和他们对脚下土地与传统的热爱，深深感谢这里的工作人员。

——约旦外交大臣塔希尔·马斯里

“四人帮爪牙”袁仲一

当1995年就要在那个无雪的冬季结束时，我完成了对陕西扶风法门寺长老的采访，又转道来到了秦俑博物馆。

我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情结让我一定要来到这里，我恍惚觉得有什么珍贵的东西遗落在这个我曾经爱恋的博物馆，并有一种急欲寻回的念头。

屈指算来，秦始皇陵兵马俑从1974年被当地农民发现，迄今已逾21个年头，而秦俑博物馆的对外开放也已度过了16个春秋，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世界遗产保护清单的1987年，也已相隔了8载岁月。就秦俑馆本身而言，这段或长或短的时光，比之存在了2200多年的兵马俑，无疑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小小的浪花，这朵浪花没能像大秦帝国那样给世人留下吞吐风云、融汇百川的庞大气势。但它又确是留下了，给这个喧嚣与寂寞的世界留下了一丝散发着欢乐、凝结着悲愁的声息。

寻着这淡淡的声息，我在打捞那即将沉于河底，却又时常萦绕我记忆深处的那片刻的历史真实。

我蓦然发现，当年为秦始皇陵兵马俑最初的发掘作出过努力与贡献的考古人员，竟像秋后的树叶一样哗哗啦啦地飘然而去，只是把丰硕的果实留在了枝头。杭德洲、屈鸿钧、崔汉林、王玉清、赵康民、程学华、王学理、杜葆仁等等，这一串与兵马俑紧密相连的闪光的名字，已与考古现场渐渐远去。他们或安度晚年，或躺在病床上呻吟，或在家中孤影自怜，或由于生活中的某种委屈而四处奔波、卷入官司的漩涡而彻夜难眠，哀苦不已……留在这里的只有袁仲一先生一人，而这个坚守阵地的强者，也已进入了人生的暮年。尽管夕阳无限好，但总也不免有些只是近黄昏的悲凉。历史就是这样造就着一切，又磨蚀、毁灭着一切。

他们确是离去了，同时又留下了。离去的只是个体的自身，留下的却是群体的雕像。无论他们的个体有着怎样的不尽人意的缺憾，但作为这个群体的雕像却是丰满并极富生命色彩的，他们的名字将同八千兵马俑紧紧联在一起，让后世人类铭记的同时也充满深深的敬意。

面对这物欲横流的生存环境和社会时尚，面对人类越来越急促的沉重的脚步，我不能再错过探寻他们这代人心音的机会，我要把他们生活的碎片尽可能地组接起来，以还原历史本身，也为了忘却的纪念。

当我打算和秦俑博物馆馆长，也是老一代考古队员中唯独还留在这里工作的袁仲一先生交谈时，他正准备去西安开会。由此，我和袁先生的这次接触，匆匆十几分钟就告结束，关于他的故事，大多则是靠他人提供。

一位自小在秦俑馆长大的服务员，偶尔谈到袁仲一先生时，她的眼里闪着兴奋的光，又表现出几年前我初见她时的真诚与热情。她声音不大却极富感情地讲着：“我小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在俑坑边玩耍，因为小，只贪玩，没有更多地去注意考古人员的生活，但有些事还是清楚地记着的。考古人员先是在坑边搭起帐篷，后来天气冷了，帐篷没法住了，他们又跑到西杨村农

民家中住。吃的是和农民一样的粗茶淡饭，睡的是农民几代留下的黑土屋，生活的艰苦是现在无法想象的。那时袁先生还算年轻，不是今天你见到的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不只一次地发现，他和其它队员在发掘休息时，身子一倒，卧在坑边说些闲话，然后慢慢就睡着了，我和几个小伙伴在他们身边窜来跑去，有时还大声吵闹，也很难把他们惊醒，看得出他们睡得跟在自己家中一样香甜。兵马俑坑的发掘以及铜车马的发掘，袁先生是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的。在铜车马刚发现时，四方百姓都来观看，一到星期天，西安的职工也拖家带口地一群群地前来参观，这中间什么样的人都有，好人坏人准也分辨不清。加上当时临潼县的百姓和领导部门与博物馆的意见不一致，就使铜车马的命运难以预料。在这种情况下，袁先生和程学华先生两人在坑边搭个草棚，日夜看守，硬是在寒冷的早春度过了一个多月，这罪也只有他们能受，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全部明白，他们那代人为什么对事业的赤诚几乎都超过了生命本身……”是的，两代人的感情和心理当然很难勾通，但这两代人却又分明是凭着良心去做事、去评说的。就在这期间，另一位退休的考古队员也跟我谈到了袁仲一先生，他说：

“1978年春天，省文化局突然派来工作组，调查老袁的问题，说袁仲一是“四人帮”的爪牙，并令我写揭发材料。我对工作组说：你们委屈老袁了，“四人帮”也没来过发掘工地，老袁在这里默默无闻地搞发掘，怎么会成为“四人帮”的爪牙？这“四人帮”的爪和牙再长也伸不到这个穷山沟里来。我因写不出材料，也揭发不出什么问题，也受到了工作组的打击。你想我们整年住在这山沟里，一猫劲地搞发掘，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同甘共苦，一块馒头掰两半，一碗水分十口，相敬相爱地生活、工作，还有什么问题值得揭发批判？人生也真是难以捉摸，说不准什么时候灾难就降临到头上……”

“事实上，经1978年那一折腾，袁仲一在考古队就多年没有抬起头来。上边对他不但不信任还故意找茬整批，这个考古队长还怎么干？工作怎么开展？这时的老袁急流勇退，闷下身子像一头黄牛一样只拉犁不说话，只搞发掘和研究不过问其它的权利名誉之事。多少年后，他终于成了国际都知名的秦俑考古研究专家，今年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现在许多国外大学都邀请他去讲学，而他也已经去过了好几个国家讲秦俑考古学了。那次打击对袁仲一来说也许是件好事，要不还很难取得今天这样国际瞩目的考古研究成果。但话又说回来，前些年老袁受的委屈和心中的痛苦，也只有他自己能体味出来……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好人终归是好人，袁仲一自1988年当了秦俑博物馆馆长并兼秦陵考古队队长，到现在我所听到的大多还是拥护与称赞的声音。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凭良心做事，靠真本事才能吃饭，单靠整治他人，玩弄权谋是不会长久的……”从这几段零碎的谈话中，我似乎感到了隐藏在袁先生心中丰富的生活矿藏和奇特的人生经历。在这个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先生的血液里流淌的绝不只是鲜花与喜悦酿成的殷红，更多的则是人生的苍桑苦难与不屈的精神意志所融汇而成的汁液。或许正因为渗进了这异样的物质，他的骨骼才越发坚韧刚硬，他的人生途程才更具悲壮和潇洒意味。

“反革命分子”程学华

其实，来秦俑馆的路上我就想到了这位老人，这位老人性格中的执著与厚道以及传奇式的人生，曾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也难过了好一阵子。我想这次一定要再见见他。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他已退休回到西安的家中了。让我更加难过和吃惊的是，听说他已经衰老得很不像样子了，且还得了一种类似精神分裂的疾病，生活很是落魄，也很是痛苦无奈。对于他的病，跟我交谈的人都说是因为他的家庭原因，或者是夫妻感情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我则不太同意这种观点，家庭、婚姻对于他来说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是他的全部。只要回过头来看看他大半生的足迹以及感情的历程，就足以看到政治上的磨难和打击，对于他是多么重要，可以说，这种磨难和打击严重摧残了他的心灵，他后来的疾病在这个时候就已埋下了伏笔，只等日后总体的爆发。

这是一个不幸的天才。

记得四年前，我在秦俑馆采访的日子，对人们传颂的几位“元老”，和我真正作过长谈的只有程学华先生一人。我和他最初相识是在秦俑馆一个僻静角落里一间低矮、灰暗、潮湿三者具备的平房里。这是他的宿舍。

面对这位过早地戴着花镜，并没有多少风度而纯似一个农民打扮的干练精瘦的老头，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在五十年代曾经使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术的创造发明者蔡伦的地位发生撼动，八十年代以铜车马的发现、发掘而使考古界为之刮目相看的大名鼎鼎的考古学家程学华先生。更令我难以置信的是，这位纯朴、憨厚的老头曾经是一位“现行反革命分子”。悲壮与传奇、泪水与欢歌构成了他六十载风雨征程的主体色调。时间回到1957年5月17日，中国《工商经济报》发表了一则令世界为之震惊的消息：

东汉蔡伦造纸的记载发生动摇

——坝桥砖瓦厂掘出的古墓中发现西汉时代的用纸。同时出土的还有石刻、铜镜、宝剑、陶器等。

本报讯陕西省博物馆，5月8日接到坝桥砖瓦厂发现两口铜宝剑的电话后，次日即派员前往现场调查。这两口铜宝剑的出土地点在该厂第二生产队工作区——八角琉璃井之南。这是一座西汉时期较大的墓葬，出土铜器有：铜镜三面、铜剑两柄、铜洗两个和许多半两钱。石刻有：卧形盘颈石虎四个，天然白石加紫花带足方盘一个和前石质相同的石案一个。陶器大多破损，完整的有彩绘陶甗三个，带彩陶俑三个，陶鼎一个，大小陶罐八个，残铁灯一件。更重要的是铜镜下面垫有麻布和类似纤维制成的纸。我国是世界上使用纸张最早的国家。据历史记载：纸是东汉和帝时期（公元89~105年）中常侍蔡伦所造。这个墓葬发现的纸叠，由它同坑的其他器物证明，是西汉遗物无疑。因而这几叠纸不仅推翻了蔡伦造纸的记载，并把纸的制造和使用推前了二百余年，从这叠纸的质地细薄匀称来看，制作技巧已相当成熟。以此推断纸的发明年代似应远在东汉以前。另外，这个墓葬内出土的麻布、石虎等也是珍贵的文物。该馆正积极设法整理，准备展出，供广大人民群众参观。

观。

（田野）

《工商经济报》刊发不久，具有权威的《文物参考资料》又以“陕西省坝桥发现西汉的纸”为题，对发现与鉴定的经过作了更加详尽的长篇报道：“……这次出土的纸，虽然是长宽不足十公分的残片，但能看出它的颜色泛黄，质地细薄匀称，并含有丝质的纤维，其制作技术相当成熟。因此可以说明纸的发明应远在东汉以前，过去历史记载纸是东汉和帝（公元89~105年）中常侍蔡伦所造，显然和事实不符。”

坝桥纸的发现和鉴定者，正是三十年前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的年仅24

岁的程学华。

尽管这时的程学华已引起考古界的瞩目，但他并没有把精力全部放在考古研究上，考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暂时的职业，因为他原本是西安市戏曲研究室的戏剧创作员，只是为体验生活才来到省博物馆工作的，在他心中占有主要位置的仍是戏剧创作，那才是他从小就立志追求的生活方式，那是他眼中最辉煌的事业。

1958年，他就在坝桥纸发现后的第二年，春风得意的程学华写出了多幕话剧《受骗》，并由长安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受骗》的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起轰动，陕西省和西安市几家艺术团体，争相筹排这部大型话剧。程学华在考古界出尽了风头之后，想不到又在文艺界崭露头角。生活向他绽开了笑脸，鲜花的芳香迎面扑来。这一切，对于一个25岁的热血青年来说无疑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辉煌境地。

然而，就在这辉煌境地的前方，却横亘着一条足以致人于死命的悬崖。但程学华没有看见，他也不可能看见，因为此时的共和国已步入多雾的秋天，严寒的冬季即将来临。

1959年，程学华的好运终于休止，灾难向他走来了。他的《受骗》先是被审查，接下来他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博物馆接受群众的监督劳教。从此，属于他的只有“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争取重新做人”的生活方式，他彻底跌入了人生的低谷。

三十年后，当我重新翻阅差点致程学华于死命的《受骗》剧本时，也大有受骗的感觉，剧中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说的是一个三辈扛大活的老贫农，在入合作社问题上受到一个顽固富农的欺骗。这个富农向他说合作社如何如何坏，结果这个老贫农迟迟不肯入社。最后经过大队支部书记的一番政治思想工作，老贫农幡然醒悟，揭露了顽固富农的卑鄙丑行，毅然决然地加入了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走向了康庄大道……这个今天看来具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的“左”得幼稚的剧本，之所以在当时被看作是“反革命”的毒草，是因为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把剧中顽固富农攻击合作社的话，当作程学华的话来论罪的缘故。正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一历史冤案直到1973年春才得以平反昭雪。

1974年，程学华随秦俑考古队来到兵马俑坑现场进行发掘，这时他的好运依然没有到来，尽管“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已经在形式上摘除，但实际上仍处于部分人的监控之中，给予他的生活准则依然是“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只是没有“重新做人”的条文。因为他原本就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什么牛鬼蛇神之类的动物和妖怪。

1978年，袁仲一被当作“四人帮”的“爪牙”受到审查，程学华被要求揭发袁的问题，他怎么苦思冥想也找不出“爪牙”的问题，而被前来审查的工作组同袁仲一一样划为革命群众的对立面进行监控。与此同时，他那段“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老帐又重新摆到了桌面，他的生活又回到了那段凄苦的政治岁月，他又成了人民的敌人。

于是，该提升的工资级别没有提，该属于他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几乎全部取消。孤立无援的他只有同袁仲一先生一样，低下那颗高贵的头颅，握紧钻杆，默默无语，忍泪吞声地在秦始皇陵园和两千前的地下始祖交流着内心的积郁与奔涌的情感。

铜车马的发现与发掘震撼了世界，无数的人们又幸运地目睹了两千多年

前秦帝国鸾驾的风采雄姿与卓越的冶金制造工艺。但很少有人看到几年前在铜车马坑边搭起的那个在风雪中荡动的草棚和漫漫长夜里草棚中两个蜷曲依偎着的身影，更没有人去探知这两个身影的内心深处翻动着的是一种怎样凄苦、悲壮的情感波澜。日本访华团团长井上裕雄在 1984 年 8 月来到秦俑馆后，把兵马俑和铜车马喻作“一棵古树上盛开的两朵鲜花”。他和他的同伴所欣赏和羡慕的只是这两朵花现时的明艳，其不知“当初的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在秦俑博物馆那间僻静昏暗的屋子里，望着程学华那佝偻着驼背的消瘦的身影，我的心里翻起一阵酸楚。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历尽磨难艰辛而对事业却如此地执著和痴情，对生活依然充满了自信与挚爱的情怀。当我静心地倾听了他的肺腑之言后，我才豁然开朗。

“俺对秦陵的感情与考古事业的追求，不是在兵马俑发现之后才形成的，早在我踏进考古界大门的时候就开始了。”

“临潼是我的家乡，这块黄土生我、养我，使我长大成人。开始我想以文学的形式表达我对这块土地和这片山水的爱恋，但当《受骗》事件之后，我知道我将告别文坛而终生和考古事业作伴了。因为我成了现行反革命，西安戏剧研究室不能再收留我，我也失去了发表言论的权利，只有在省博物馆默然无声地做点细小的工作。1961 年，秦始皇陵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的心中就有一种想法，如果能把秦始皇陵的事情搞清楚，家乡的主要历史情景也就基本揭示出来了。1962 年 2 月，陕西省文管会对临潼县秦始皇陵进行调查，当时我就提出来能否让我也参加，结果没有得到批准，其原因是和我当时的政治处境相关的。后来在给秦始皇陵立碑时我来了，大概领导看我比较朴实、憨厚，不像他们想象中的反革命分子那样凶残可怕，就让我参加一些田野考古方面的劳动。若仔细把秦始皇陵前的碑文和保护标志的志文对比，就会发现，国务院所镌刻的志文是：‘秦始皇陵’等字样，而碑文则刻了‘秦始皇帝陵’等字样，这有‘帝’字和无‘帝’字其实是不尽相同的，只有细心琢磨才能体会出个中的味道。”

“当时秦始皇帝陵光秃秃的，封土上连棵象样的草也没有，一遇到雨季，封土流失严重，我们感到心痛，就向省文化局汇报要绿化陵园，文化局调拨了五千元钱给当时主管陵园的渭南地区，从此秦始皇陵园内就有了些稀稀啦啦的洋槐树。但这些树刚刚发芽长叶，就被人折断做了架芸豆、黄瓜之类的篱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向省文化局要了五千元钱，给渭南地区，让他们分给陵园附近村社的社员买石榴苗子在秦始皇帝陵园内种植，谁种谁收。这样陵园内大部分地方都植上了石榴树，而临潼的石榴也是全国有名的鲜果，常以皮薄、颗粒大、汁液多、味道纯正著称。当地农民对栽植这种果树很感兴趣。”

“由于政治上的厄运，我将近 30 岁才结婚成家。当我的女儿长到要上学的时候，秦始皇陵园的石榴树已经开花结果，每到夏季，整个陵园的石榴花一片火红，鲜艳夺目，光彩照人。为了寄托我对这片土地的爱恋和纪念那段植树的历史，我给女儿起了程蕊红的学名，意思是陵园的石榴树已经坐蕊开花，就要结出丰硕的果实了。1973 年我又有了一个儿子，便给他起了个程林红的名字，因为这时我看到陵园里的石榴树已经长大成林了。”

“兵马俑发现之后，我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发掘，随后主要从事秦始皇陵园的考古钻探，现已钻孔五万多个，发现了陵园内外近五百个陪葬坑，估计

整个陵园内外、包括已发现的兵马俑坑军阵，共有陶俑一万余件，而秦陵地宫的秘密也在钻探中逐渐揭开。同时，临潼县境内的战国、秦 6 个帝王陵墓的内在情况也基本在钻探中搞清楚。前些日子有个记者在报上发文章，说我钻探的地下孔道的深度加起来可以穿透地球，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但要把这些年钻孔的深度加起来，其数字确也是惊人的。自从 1974 年我来到这里后，一直都是发掘和钻探，共请过两次事假。第一次是 1980 年春节母亲去世了，我回家奔丧，正月初 3 回家，初 6 返回工地。第 2 次是 1982 年，我的爱人去世了，我又回家住了几天……”

程学华没有再说下去，我也没有继续追问。当我结束采访走出那间低矮的小屋时，又忍不住回过头望了一眼那瘦削的身影。就在这蓦然回首的一刹那，我看到他那紫深色老花镜的背后滑下两道潮润晶莹的光。这是他最后向我发出的无声的肺腑之音：“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无名罪犯”郑安庆

我在秦俑馆奔波，曾数次穿行于兵马俑坑和铜车马展室，每一次都有一种异样的心灵的震颤和曾未有过的收获，我越来越感觉到我所踏入的是伟大的古代文明与精湛的现代艺术所融汇而成的神圣殿堂。

如果说兵马俑与铜车马的制造工艺和冶金技术体现了古代人民非凡的创造力与杰出智慧，那么，兵马俑与铜车马的修复以及气魄恢宏，宽阔雄伟的展厅，则完全展示出中国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建筑艺术水平。我在为这辉煌神圣的殿堂惊诧之余，以同样的敬慕之情静心观赏镌刻在殿堂之上的书法艺术。从墨迹的风格和气韵中不难看出：

“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几个雄壮的大字为大名鼎鼎的叶剑英元帅所提。

“铜车马展厅”五个柔中有刚的字迹则出自久负盛名的大书法家舒同先生之手。

而唯独“第一号兵马俑大厅”几个稳重秀美的篆书难以辨别是出自哪位大家的墨迹。

于是，有人告诉我，这是秦俑博物馆陈列部美工郑安庆的杰作。

一个博物馆的美工能写出如此令人叹惊的字体，并且高悬大厅门口上方，毫不掩饰地接受海内外游客的欣赏与品评，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一大幸事。我决定亲眼见一见这位幸运的美工，我打算分享他的幸福与欢乐。

然而，当我走进陈列部见到这位四十多岁的汉子时，竟出乎意料地发现他没有我想象的那样聪明伶俐，健谈豪爽。他给予我的感觉是口齿愚钝、目光呆滞、行动笨拙，只有那份热情与真诚尚存在他的身心之中。在我以极度惊讶和迷惑的神情得知了关于他的一段苦难岁月之后，才恍然醒悟昨日这个才华横溢、稳健刚强的血性男儿为何变成今天这种模样的。

1982 年 9 月 26 日，《陕西日报》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

走私犯郑安庆被依法逮捕

本报讯秦俑馆美工郑安庆未向公安机关申请备

案，又未经工商部门批准，私自开设刻字行业。从 1980 年 7 月至 1982 年 4 月，他先后向外国商人走私印章，印料二百五十余枚，用小包裹五十四件邮往国外，从中牟取暴利一万二千八百八十五元七角。并收受外商彩色电视机、收录机各一部和兑换券七百三十八元。临潼县公安局根据《刑法》第

一百一十六条和《海关法》一百零七条、一百五十条、一百八十四条及对外贸易的有关规定，认为已构成走私罪，经县检察院批准，将郑安庆依法逮捕。

(唐世兴)

消息已明确警示世人，郑安庆的灾难是因为他私刻印章和外国人做生意。想不到他不但有一手潇洒俊秀的书法，而且还有刻制印章和外国人做生意的本事。

其实，早在郑安庆上小学时，就迷恋于书法、绘画和金石刻字的艺术，并经过十几年的奋力苦搏，他的艺术创作成果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书画界的赞赏。自 1962 年起，仅他的篆刻印章就先后在《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新体育》、《陕西日报》、《西安晚报》、《延安画刊》、《延河》等二十余家报刊发表近百方，并出版了《毛主席在陕北》的印谱单行本。

1978 年，郑安庆从一家工厂的子弟小学调到秦俑馆做照相与绘图工作。1979 年秦俑馆开放之后，郑安庆见外宾纷至沓来，便向馆领导人提出了“愿在工作之余用我的刻印小技为外国游客治印，以为博物馆挣外汇”的建议。他的建议没有被馆内领导者采纳，但却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1980 年 4 月，郑安庆再次向馆领导人提出了他先前的建议：“现在工作有了秩序，馆内也设了小卖部等设施，我可以在工作之余刻些印章为馆里挣点外汇。”

他的建议得到了领导人的许可：“你先刻刻看吧。”

郑安庆颇为激动，一种复杂的心理情感驱使着他当天夜里就用自己原有的水墨石刻出了三方印章。他确是出手不凡，三方刻石刀法娴熟、字迹刚劲有力，除正面的刻字外，又颇费心机地在印侧四边刻下了秦俑图像和俑坑简介，以及“××先生×年×月×日赴中国西安参观秦兵马俑坑刻石纪念”的文字。

第二天，郑安庆将三枚刻章及印模拓片拿到博物馆外宾小卖部对外销售。不出三日全部售完，秦俑博物馆由此获得了 190 元外汇，从此，郑安庆越发积极地镌刻，外宾小卖部源源不断地销售。至 1980 年年底，仅为期半年的时间，秦俑博物馆共获外汇七千余元。

也就在这一年的 8 月，日本书法代表团前来秦俑馆参观。当团中的原野茂先生走进外宾小卖部，见到郑安庆篆刻的印模及边款拓片后，大为惊讶称绝，当场买下六枚印料要求篆刻，可郑安庆此时已回老家探亲，原野茂并未失去信心和放弃得到这绝美的篆刻艺术的机会，他给馆内小卖部预付了印款和邮资，提出等郑安庆回馆后为他刻好寄去，秦俑馆服务人员当场答应下来。这笔交易到此似乎已进入尾声。

然而就在这时，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悲剧拉开了帷幕。

郑安庆探亲归馆后，按日本原野茂先生的要求刻好印章并亲自给他寄去。事隔不久，原野茂从日本给郑安庆寄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对郑的篆刻技艺表示极大的敬佩和兴趣。同时原野茂对自己的经历和爱好作了详尽的介绍：“我已 50 多岁，现在日本××中学担任书法课程教师，已从事中国书法研究 30 余年，有两个孩子……希望能得到您的指导与帮助……”其感激之情、虔诚之意溢于言表，令人为之感动。

此时郑安庆已自学日语近两年，很希望有一位日本朋友给予自己学习上的帮助和指导。于是，很快给原野茂回信并赠送了自己篆刻的部分拓片。从此，郑安庆与原野茂不断书信往来，成为互教互学的书道之友。

1981年元月，郑安庆为其家属调动工作，请了几天事假，按照秦俑博物馆的日常规定，这月他因耽误工作而没有得到工资之外的奖金。

郑安庆心中有些不快，想起自己半年多来为秦俑馆挣了钱，出了力，不但未得到经济上的半点报酬，就是连一句领导对自己的鼓励、表扬之类的精神安慰也未曾得到。一番感慨悲伤之后，他决定找馆领导人谈出自己的想法：“据了解，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友谊商店、书画店、展览馆等经销的书画、篆刻、工艺品，对作者都是按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五十提成作报酬或奖励。西安友谊商店也设有治印业务，对刻者按50%提成，如遇应急买主，100%归刻者。我给外国人治印，工具、印泥全是我私人的，开始卖掉的三方印石，连石料也是我自己出钱买的。我不要求给我本人多少报酬，只想馆里是不是适当地给点奖金，我也好买几本书和几块石料……”

未等郑安庆的话讲完，领导的脸色已起了明显的变化，心中也添了大大的不快。“从这件事情一开始我就知道会有今天。”领导说完这句令郑安庆困惑不解的话便匆匆离去了。

第二天，秦俑博物馆召开支部委员会，特邀非党员的郑安庆列席。开会之前，馆领导人明确回答了昨天郑安庆的提议：“经过初步研究，馆内对你不予进行什么奖励，你昨天的要求是无理和私心太重的表现，你的手伸的过于长了，这是资产阶级的金钱观念……”

郑安庆闻听恍然大悟，这哪里是列席什么党支部会议，分明是在接受警告，他觉得这是一种羞辱，他感到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受到了伤害，血气方刚的郑安庆无法容忍和按捺心中的愤慨，他据理力争：“我不能接受您的批评，我说的提成是有政策依据的，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而不是资本主义原则……领导人更不示弱，同样慷慨陈词：“多劳多得是主要对农村社员和城市待业青年等集体所有制企业而言的，你是国家干部，工资就是国家给你的报酬，不存在多劳多得的问题。这个政策对你是不适应的。”“陕西省博物馆业务干部曲儒同志的象牙微雕在本馆对外部出售，怎么实行30%的资金收入提成？”郑安庆以眼前的实际事例颇不服气地反驳。“曲儒是曲儒，你是你。陕西省博物馆的曲儒不归我管，秦俑博物馆的你归我领导。”领导人也寸步不让，提出了比郑安庆所引用的事例更实际的问题。“中国是几个共产党领导？”郑安庆以他的聪明与才智把这场辩论像艺术创作一样推向极至，而使一切对手都无法超越并望而却步。领导人挥挥手，示意郑安庆：“这次你的列席会议已毕，请回吧。”

郑安庆愤然走出，大呼不平。领导者悄然落坐，怒不作声。这次会议的结果是，今后博物馆小卖部将不再收留郑安庆的篆刻印章和拓片，并命令郑安庆停止篆刻活动。

冲突既起，就无平静收场的可能，悲剧的帷幕已经拉开，也只有就此演下去，否则便不再是悲剧。

郑安庆与日本教师原野茂的书信往来仍在进行。郑安庆为他代买中国的文房四宝及字帖、印谱、篆字字典等印刷书籍，原野茂向郑安庆回赠日本出版的书法、印章等书籍，同时提出：“我的日本学生很喜欢您的印章和拓片，希望今后多给提供些您本人的艺术作品。”

其后，原野茂的朋友白霞洋（原日本书法家访华团秘书长）给郑安庆来信，提出了和原野茂相同的希望。郑安庆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先后篆刻了近二百枚姓名印章，通过邮局寄给原野茂、白霞洋和他们的学生。

1981年7月，原野茂、白霞洋等再次访华，并带来14寸彩电一台，收录机一架赠予郑安庆作为酬谢。

原野茂、白霞洋回国后，又先后三次通过日本和中国银行给郑安庆汇款约七千余人民币，其中原野茂的五千元汇款理由是“友人赠与”（日本银行汇款凭据）。

原野茂与白霞洋给郑安庆的汇款引起了陕西中国人民银行的注意，他们把款转至临潼中国人民分行的同时，要求该行到秦俑馆了解具体情况，秦俑博物馆领导人借机将汇款单扣留在馆内，未通知郑安庆。

当日本方面的汇款人在信中得知郑安庆没有收到汇款后，立即寄来汇款凭据，郑安庆持凭据赶赴陕西中国人民银行查询，当他得知此款已转至临潼中国人民分行后，又赴临潼询问。

“是你们馆里的领导暂时不让发给你本人。”临潼分行方面回答并当即表示：“我们再到馆里催问一下，是公款由他们领，是你个人的就马上给你。”

郑安庆的汇款被扣压三个月后，终于从银行领取出来。

“是不是你把文物弄出去了？”秦俑博物馆领导人向郑安庆询问，神情充满惊讶与怀疑。

“日本人喜欢我的章子，我给他们刻了章子，这是他们对我的劳动报酬和答谢。”郑安庆坦诚地回答。

“以后不要再搞了。”领导人强硬地作着命令。

“给日本人刻书画印是不是犯法？郑安庆毫不服软地反问。

“不是犯法。”领导人回答。

“既然不是犯法，那我还要刻。”郑安庆倔犟地申明了自己的态度。

“那你就刻吧。”领导人嘴角微微翘起，涨红的脸上透出一股阴冷的寒意：“走着瞧！”

郑安庆的厄运不久便降临了。

1982年5月1日，美国著名美术收藏家哈默五百年藏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揭开帷幕，秦俑博物馆一美工当时正在北京出差，在荣幸地目睹了画展之后，回到馆内以激动、敬慕之情向同行宣称：“是百年难逢的罕事，很值一看。”酷爱绘画艺术的郑安庆闻听此言，难以抑制心中的亢奋之情，立即找到馆领导人提出：“我以5月1日、2日的值班换成休假，补加一个星期天共三日时间自费到北京去看一下哈默的画展，看成不成？”

“噢？！”领导人先是吃了一惊，以警惕的目光审视着郑安庆，沉思片刻说道：“这个问题我不能作主，你到省文物局去请假吧。”

“我一个普通的人物，请三天假怎么还要省上批示？”郑安庆显然有些不快，这时的他竟幼稚地认为只是领导对自己的故意刁难而已，尚未意识到一张巨网已向自己撒来。

“你现在已不普通了，不但不普通，还是极为重要的人物，我实在不敢斗胆批你的假。”领导的话狡黠而虔诚，令郑安庆大惑不解。

“我不认识文物局领导，要去你去，反正这个画展我是看定了。”郑安庆态度明显强硬起来。

博物馆领导人大瞪着眼睛久久地盯着郑安庆的已有些涨红的脸，似乎预感到什么，即刻态度温和热情地表示：“你先在家稍等，我向省文物局给你请假。”

5月6日，博物馆领导赴西安请示没有回来。5月7日上午，仍不见踪影。

据悉，北京的画展将于5月10日结束，时间异常紧迫。

心急如焚的郑安庆见馆领导迟迟未归，于5月7日下午写了“我已去北京看画展”的条子，放到馆领导家中，匆匆赶往临潼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

傍晚，馆领导从西安返回家中，见到郑安庆的条子和确知郑已赴北京的消息后大为震惊，立即电话告知临潼县公安局和省公安厅：“具有重大经济走私问题的郑安庆已潜逃……”同时连夜组织郑安庆有关“走私”问题的材料送往临潼县公安局。

临潼县公安局接到秦俑博物馆的报案和有关材料，立即开动迅速旋转的机器向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发出了传真电报并挂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电话。5月8日上午，临潼县骊山公安分局一名干警和秦俑博物馆保卫科一名保卫干部，携带手铐、枪支驱车火速赶往西安机场，登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

5月9日上午，郑安庆看完画展来到北京王府井大街一家书店购买字帖。此时一个便衣青年突然出现在面前：“你叫什么名字？”

“俺叫郑安庆。”

“就是你。”随着青年人的话音，一幅锃亮的手铐“嚓”地钳住了郑安庆的手腕。

“走！”便衣青年声音不大却咬钢嚼铁般生硬。

郑安庆未全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梦游样被带到不远处的东风市场派出所。

“你先等一会儿，”便衣青年说着，将郑安庆顺势按在一把椅子上，又和身边的几个人嘀咕了几句。

十几分钟后，临潼县骊山分局的干警和秦俑馆保卫干事两人走了进来，郑安庆如从梦游的云海里跌到地面，他恍然醒悟了。

“签字吧。”骊山分局警察把一张拘传证摊到郑安庆面前的桌上，如释重负又洋洋自得地说。

“怎么回事？！”郑安庆自被擒获后第一次质问。

“你回去就清楚了。”对方说着，打开铐子把郑安庆手腕上的表槽下；衣兜里的钱搜出，重新钳上自己从临潼带来的手铐，之后收起郑安庆签字的拘传证，押往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关了起来。

5月10日，郑安庆被带上北京开往西安的列车，押往临潼。为渲泄心中的愤懑与不平，在列车上，郑安庆将公安人员罩住手铐的衣服用嘴挪开，将手铐高高地举了起来，乘客见状，无不哗然，纷纷拥上前来观摩这一奇景。

“谁叫你把衣服扔掉的？”身旁的公安人员大怒，立即喝斥，并将衣服再度盖住郑安庆手腕。

“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随便无故地抓人？”郑安庆颇有些电影上英雄人物的慷慨悲壮之举。

“你犯的什么法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回去后你就清楚了。”公安人员并不想和他说明或解释什么，事实上这些问题也不由他来回答，只要是郑安庆抓获并安全地押回临潼，作为他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至于荣立二等功还是三等功就看上级的批示了，也不由自己作主、说明或解释。

5月11日，郑安庆被押回临潼并由临潼县公安局派人突审。

“你怎么和日本人认识的？给他刻了多少印章？写了多少封信？你所刻的石头是从哪里弄来的？……”提审员一一追问，郑安庆如实回答。

时间已近黄昏，问答双方都疲惫不堪，一天的提审即将结束。

“你们弄了这一天，我到底犯了啥罪？触犯了《刑法》哪一条哪一款？”郑安庆强打精神问。

提审人员收拾着讯问笔录：“你的问题暂时在《刑法》上还找不出来，但我们怀疑你犯了法！”

“要是别人怀疑你犯了法，是不是也把你关进监狱里？”郑安庆显然抓住了提审人并没有慎重考虑的语言，予以反击。

提审人并未发火和显出异样的难堪表情，他仍旧收拾着桌上的东西，顺势抓起即将要装入纸袋的拘传证冲郑安庆亮亮：“拘留你是经过公安局长批准并办过合法手续的，拘得对不对，你现在问还有点为时过早。我们只是奉命执行公务，退一步说，即使抓错了，也会有人给你负责。”

“你们这是违法行为！”郑安庆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高声叫喊，大有和提审员作一番殊死搏斗的势头。

提审员本来已经迈动的脚步又停下来，以惊异的目光打量着郑安庆，刚才的温和气度一扫全无，极为愤怒地说道：“郑安庆，你不要太猖狂了，你有无问题我们正在审查，像你这样的人，即使最后审查没事，也要给你找个事。”提审人说完扬长而去，身边的人员将郑安庆押进看守所。

7月5日，郑安庆在看守所向临潼县检察院发出了呼吁：

我的申诉与控告

临潼县检察院检察长：

我叫郑安庆，男，现年40岁，是秦俑馆陈列部美工。今年5月被骊山分局拘留于县看守所。在已监禁的两个月内，由×××和我馆的×××提审过5次。时间是5月11日、14日、15日、27日及6月23日。

……我曾多次向监所提出要给您写信，但遭拒绝。在6月23日的提审时，我向×××又提这个要求，回答是，“不管，你向监所提。”为什么《刑事诉讼法》第十条规定的被告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在这里就得不到保障？我不明其因，在终于得到获准后，我向您的申诉和控告兹述如下：

一、案情简述（略——作者）

二、拘留是×××馆长对我由眼红、嫉妒而产生的迫害（略——作者）

三、是功还是罪：我跟原野茂和白霞洋的交往是在我国法律及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增进中日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而建立起的同行朋友。我指导他学刻印，他指导我学日语，并交流各自的书法篆刻作品，有益于提高学识水平。他二人的学生中有好多人喜欢我的篆刻，国外有我的知音，作为一个从事艺术的人来说，自然感到欣慰。我给他们刻的印章，都刻有较长边款，介绍西安的名胜古迹。“金石不朽”，它将成为宣传中国灿烂文化的历史见证。这是益事而不是坏事。

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和受教育的权利，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化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篆刻是艺术的一种，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我从事篆刻并给日本人治几方印，不能是犯法作为。他们给我汇的款中，除了印料、邮费和代买“文房四宝”的钱外，自然还有我的艺术创造劳动价值。且他们的汇款是外汇，我能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国家的外汇收入增砖添瓦，同样是益事而不是坏事。而国家给我兑换的人民币我几乎全部存入银行，正是“踊跃参加爱国储蓄、积极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这又是益事而不是坏事。

我虽然有了这些收入，但我全家人的生活是清苦简朴的，家里没有时髦

的现代式家具，甚至连一般家庭中都已有的缝纫机、自行车、电风扇等都没有，更无其它高档家俱。日本人赠我的电视机，我考虑到当时全馆没有一户有黑白电视机，我用上彩电，会脱离群众，于是便原价加关税低于国家同等产品 160 多元处理了，并把钱存入银行，从没有胡花乱用，肆意挥霍。我爱国有何罪？劳动换来报酬又何罪之有？

四、我的控告与要求：1. 骊山分局对我的拘留不合《刑事诉讼法》41 条及列举的七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因而是违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第 12 条，被告要求追究责任。2. 老×和老×在几次提审中都问及我在哪些银行存有钱？存折用了哪些名字？此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3. 老×（对提审人尊称——作者）未持任何手续闯入我家，拿走了我的笔记本、抄走了我的存折号码（这是我根据提审时所听所见判断的）。4. 我已被关押达两个月，人身权利遭到侵犯，并且还在继续遭受侵犯。骊山分局没有按照《刑事诉讼法》第 48 条办理。我要求对我立即释放，并要求追究诬告人的责任。

郑安庆

1982 年 7 月 5 日

8 月 20 日，郑安庆被从看守所监狱带到公安局预审室。他在心中暗想，也许是自己的申诉书起了作用，三个多月的监禁生活就要结束了。然而，令他再度震惊的是一张逮捕证摆到自己的面前。

“今天我正式宣布，你被逮捕了。”提审员声调缓慢地说。

郑安庆懵了。他大瞪着眼睛，脸上无任何表情，呆坐着没有动，似是什么也没有听见。

“请签字吧。”提审员望着显然有些痴呆的郑安庆予以提醒。

郑安庆轻轻地“呵”了一声，看着眼前的逮捕证和提审员，才恍若梦醒地回到了严酷的现实之中。

逮捕证醒目地填着郑安庆的姓名、籍贯等文字，而唯独“因什么罪”一栏没有填写，尚为空缺。

郑安庆停住了握笔的手，抬头问道：“我坐了 3 个月的监，到底是犯了啥罪你们又要逮捕人？”

“犯什么罪不是我们回答的问题。我们只是根据事实把材料和证据移交有关法律部门，他们看给你戴什么样的帽子合适，就给你戴什么帽子。”提审员依旧心平气和地回答，像在和老朋友拉家常一样地坦荡自然。

“我不能签。”郑安庆放下笔，呆板的脸充满了血色与怒气。

“你要不签，将来开庭审判时这关押期间的认罪悔改态度是要考虑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党的一贯政策你是知道的。”提审员柔中带刚地进行劝导。

但是，任凭提审员以何种方法相劝，郑安庆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没有罪，我不签。”

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郑安庆被送进监狱，带上背铐，套上脚镣，以促使其悔过反省。

郑安庆自感出狱无望，不再喊冤叫屈。让探监的家属将日语自学课本悄悄带进监室，头枕墙壁，脚踩镣铐，像电影上被捕入狱的地下革命者一样，偷偷学起了日语。

纸里毕竟包不住火。三个月后，在看守所所长亲自带人查监时，郑安庆

的四册日语课本从被子里翻出。

“你还学日语，你吃的就是学日语的亏。”看守所所长没有过多地责难和予以严惩，只是略带叹息地将书拿回办公室。所幸的是，这时的郑安庆已基本将四册日语课本全部学完。

1982年古历腊月二十八日，临潼县检察院派人来到看守所将郑安庆叫到看守所办公室。

“春节就要到了，关押了你这么多日子，使你的精神、肉体都受了不少罪，经研究决定，先对你取保候审，”来人说着，又怕郑安庆听不明白，补充道：“就是说从今天开始起，你可以回家和老婆孩子过春节了，如果经调查你确实有罪再进来蹲着郑安庆先是点点头，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然后轻轻摇摇头，声调低沉缓慢：“感谢你们的关怀，还想着让我回家过个春节。但我也作好了打算，如果问题没弄清楚，我是不会出去的，这个团圆节我不过了，仍然在这里头蹲着。”

“这可是依照法律的决定，”来人好言相劝。

“顾不得依照什么决定了，反正问题不彻底弄个水落石出、一清二白，我是死也不会走出监狱的。”郑安庆叫劲地作出了强硬的回答。

来人无可奈何地长叹着离去。郑安庆平生第一次在监狱里度过了令他终身难忘的春节。

1983年古历正月十四日，临潼县检察院再次派人来到看守所找到郑安庆：“明天就是正月十五了，快回家过个团圆节吧，不要再叫劲了。”

郑安庆本想再坚决予以拒绝，这时他蓦然发现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出现在面前（检察院事先作的安排），郑安庆顿觉头轰然炸开，整个大地都在下沉。他感到羞辱，他觉得愤懑，他感到无颜见妻子儿女，他深知在自己入狱后，给妻子带来怎样沉重的精神打击，在儿女的幼小心灵上造成多么巨大的难以愈合的创伤。这位手铐、脚镣都没有使他屈服的硬汉子，面对妻子儿女那熟悉而陌生的面孔，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郑安庆回到家中，和妻子儿女在百感交集的氛围中度过了元宵节后，开始了临潼——西安——北京三点一线的上访生涯。

1983年3月26日，《陕西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样的消息：

秦俑馆美工郑安庆错案被纠正

本报讯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美工郑安庆，特长金石篆刻。一九七八年调到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陈列室工作。秦俑馆发挥他的专长，开展了治印业务，近年来为博物馆收入外汇六千多元。郑安庆曾提出就篆刻收入外汇应给他本人提成，但未被领导采纳。以后，来参观的几位日本旅游者要买他的篆刻，他从一九八零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二年四月，通过邮局寄售自己业余刻的印章二百余枚给日本旅游者，日本客人给他寄来了九千五百多元（人民币）作为对他的报酬。他收到这些钱后认为是自己业余劳动所得，没有交公。

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临潼县公安局于去年五月九日以郑安庆“非法刻制印章”、“逃避海关监管、构成走私罪”为名，将郑安庆收容审查。该县检察院又于同年八月二十日批准将郑逮捕。

郑安庆不服，不断申诉。渭南地区检察分院得知后，经过调查认为，郑安庆的行为构不成走私罪，并就郑案报告了省检察院。省检察院又进行了详细调查，走访了海关部门，确认郑安庆出售业余自刻的艺术印章构不成走私罪，指示临潼县检察院不能起诉，要求释放郑安庆，并立即送回原单位恢复

工作。

省检察院还要求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至于郑安庆出卖物品所得，应向他说明，要按说法规定纳税。

（本报记者田长山张子民）

与此同时，《陕西日报》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

执行政策是很严肃的事

对经济犯罪分子一定要坚决打击，但对不是经济犯罪的人，就绝对不能打击。

由于有的同志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对现在搞活经济、对外开放不甚了解，把一些正当的事当成不正当的事，把不是犯法的事当成了犯法的事。例如，当前在城乡都有一些人认为搞副业、做生意是胡日鬼哩，是不务正业。如果谁挣了钱，就马上眼红，说他是搞个人发财，是搞资本主义。临潼县有关人员看见郑安庆不但业余搞收入，而且还从外国人那里赚了钱，这还了得，不是“走私犯”是什么？马上就有人逮了起来，一押就是半年多。你看，思想不对头，就这样把事情办坏了。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就有不少教训，现在不应该再犯了。

人常说：“逮人容易放人难。”意思是说，办错了人，就是纠正了，后遗症很多。所以，当前我们还必须

继续肃清“左”的思想影响，一定要严肃执行政策，特别是法律问题，更要泾渭分明，不可有一点马虎。

几乎与此同时，临潼县人民检察院的一纸公函也到达秦俑博物馆：

郑安庆我院已作了不起诉的决定，现按照有关规定和上级指示，对郑安庆不起诉后的有关问题提出如下建议，请予妥处。作好善后工作。

1. 郑安庆自一九八二年五月九日收审，到不起诉决定宣布，这期间的工资和其他应享受的待遇由单位按规定全部补发。。

2. 郑安庆在押审查期间，单位如进行调资工作，应按有关文件中关于审查期间的调资规定对待。

3. 郑安庆回原单位工作，根据其实际情况予以妥善安排，要遵守单位的各项制度，并享受同其他工作人员同等的待遇。

郑安庆半年多非人非鬼的凄苦悲怆生活从此结束，又重新返回了工作岗位。但他心中的痛苦、委屈与愤慨之情依然未能消除。这恍若梦境的人生经历使他对生活本身更加迷惑，经济上的损失已经补偿，但肉体与精神的创伤如何愈合与补偿？半年多的大悲大痛难道就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飘然荡去，不留下任何一点标带着诸多疑问与困惑，他来到西安一位著名法学教授的家中。这位教授在听他讲述了自己的悲怆经历与困惑后，苦笑着摇摇头说：“您的不幸经历只能使我同情，但却没法具体地解释和回答您的问题。因为无论是中国的《宪法》，还是《刑法》，都没有对办错案和制造冤案的规定与处置方法，这就是说我们的法律不允许有冤假错案的出现。至于说出现了怎么办，我想就目前而言，除了善良的人们对你的不幸洒下几滴同情的泪水外，还没有别的方法来弥补你肉体与精神的创伤。也许你的疑问未来的中国能解答。”

郑安庆回到家中反复揣摩教授的话，并产生了新的疑问：未来的中国能解答吗？这个未来到底有多远的途程？

最后陈述

显然，袁仲一、程学华、郑安庆等人，不能也无法代表整个秦俑馆，他们的命运也不能代替其他人的命运，换句话说，他们就是他们，就是袁、程、郑三人。

但是，我还是用了以上不算太少的文字把他们的人生沉浮粗略地描述了下来——尽管这个描述不及他们整个人生途程的十分之一，尽管他们的命运与其他诸君的命运不同或相去甚远。有一点却是明确的，那就是，他们人生的链条与一个时代紧紧相连，他们的命运就是时代的命运，任何人的个体都无法超越时代，就如同人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

如果把秦俑馆的诸君放在一个时代，也就是刚过去不久的那个时代的背景下去审视，就会发现，他们整体的命运不是透明和鲜亮的，相反则是灰暗和愁怆的、无耐和苦涩的——这就是他们的整体色彩。

老一代考古队员不必赘述，就稍年轻一些的而言，如秦俑馆现任美工李鼎弦先生，在他就读陕西艺术学院行将毕业的六十年代，原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表现甚优的大学生，只是由于他给某部门写了一封大意是：“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不是坏人而是好人，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革命者的信，便被拿入大牢，一关十年。他那最富激情、最富才华、最富创造性的黄金时期，就这样在四壁漆黑的监狱中，在孤独、愤懑、疑惑、痛苦甚至绝望中度过了。尽管他若干年后辗转来到秦俑馆，并在美工的工作岗位上重新扬起了生活的风帆，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那个时代留给他心灵的创伤却是极难消融的，他的心情依然是沉重和忧伤的。当我几次坐在他的对面，并和他探讨二千年前那个放羊的小孩，是怎样拿着火把寻找丢失的羊群，并把兵马俑坑焚烧殆尽之时，他那有些灰黄的脸上始终透出一种压抑的气息。

当我第一次来到秦俑馆和副馆长吴永琪交谈时，得知他原来是一个北京知青，初中毕业或者还没完全毕业，就离开首都北京那平坦的街道，来到陕西的黄土高坡接受教育了。这个时代具体算起来，应该是比李鼎弦先生走进监狱时晚几个年头，但作为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是相同的，人生的命运也是接近的。稍有不同的是，李鼎弦实实在在地下了大狱。吴永琪则是从北京的四合院走进祖国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山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当然，和吴永琪同时代或稍晚些时候来到这里的，还有一批数量相当可观的知青，只是吴永琪更能让人瞩目一些，这不仅因为他后来有幸读了大学，又当上了秦俑博物馆的副馆长，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他早年曾主持过秦陵铜车马的修复工作，由于他凭着自己的才华和毅力出色地主持完成了这项工作，所以他自然地就要引起世人的瞩目，那么，他的名字也将有可能和铜车马并存。

直到今天，秦俑博物馆真正事业有成的人员为数不多，而为数不多的人员中竟有那么多不同的悲怆故事，也着实让人感到有些震惊了。如果回过头来看看那个时代，看看那个“文革”的大框架中包含着的一个个事件性的小时代，竟觉得有些闹剧的味道，荒诞的模样，当这一切经过了之后，当今天的国门已经打开之后，谁都会这样冷静地想到：试想以上诸君的政治命运中假如没有那段痛苦的岁月，他们将为这个民族多做多少善事？

光阴荏苒，人生苦短。才眨眼的功夫，秦俑考古队和秦俑博物馆的第一代人，几乎都不在岗位了。记得我第一次来秦俑馆时，宣教部主任马青云女士跟我谈起她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里根夫妇的故事，谈笑风生间，显得那么年轻而富有生气，那么潇洒活泼，那么让人激动和感奋。当我第二次来的

时候，她已经退居二线，尽管她的谈话依然幽默风趣，她对我的帮助依然热情坦诚，但我还是感到她和几年前的那个她已有了不少的差异，望着她两鬓斑白和显然是走向衰老的面容，我的心中翻起了一股莫名的无法言状的悲伤情绪。也难怪，她的女儿，当年在我面前活蹦乱跳的小女孩，也将要做母亲了。而我这部作品中，提到的诸如杨异同、王志龙等等，也已成为第三代人的长辈了。每个人在时间老人面前都是永远的输家。

令人欣慰的是，继我 1991 年来秦俑博物馆的那个早春之后，这里的工作人员又走过了四年不同寻常的历程，同时也实现了多波次推进后的一次大的综合性开拓。

秦俑二号坑的发掘，已经全面拉开了帷幕。考古队的工作人员，无论是从事紧张的清理工作还是协助工作，都不会忘记对周围环境的搜索，以希冀会出现“乐府钟”这样的宝物或是其它考古线索。因而在秦俑继七十年代之后的二期扩建工程各施工工地开挖地基的地方，随时会看到考古队员的身影。他们不仅对俑坑周围的地层情况作了全面了解，并且在离俑坑较远的一个枯井旁，发现了一座早期居住遗址，其时代约在春秋时代或者更早的时期，遗址中的火膛遗存和一些时代明显偏早的陶片，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考古信息，它将以另一种完全不同于秦兵马俑的景观展示于世。

更令人欣慰的是，继第一代秦俑考古工作者之后，第二代已经迅速崛起，这支队伍的主将就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张仲立、刘占成、张占民等人，而考古队员也大多是来自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这支新崛起的“学院派”或“西大派”队伍，同第一代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开拓性。作为新生代的他们，除了具有年轻强壮的身体条件，还具有第一代无可比拟的考古专业知识和新的考古学思维。他们不但能参加实际发掘，更重要的和更难得的是，他们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和文化素养，能将发掘出来的实物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内涵研究辨别出来，从而形成新的秦俑考古景观。可以预见的是，在以后的十年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主宰秦俑考古发掘和领秦俑甚至秦陵研究风骚的必然是这支以张仲立、刘占成、张占民为主帅的新近崛起的队伍。

又说到考古，我很同意秦俑考古队张仲立、张占民先生的看法。现代考古与那些挖宝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本身首先是一门科学研究，其目的在于科学地揭示古代历史的文化和准确恢复历史文化景观，它借助现代科学手段来发掘古代遗存，破译古代信息，进而从中抽译出历史演进的规律和能够对现代人类产生鼓舞和激励的优秀的古代精神。这一切又正在等待着新一代考古学家去探索、去完成。

秦俑考古工作者的敬业精神以及对秦文化或者相关的文化的研究，所付出的努力和热情以及取得的成果，是我所了解的中国不同的考古队中最为出色的，也是最为优秀的。也许是关中优厚的文化积淀和文化遗风，滋养了他们秉承文化遗产和破解文化遗存的性格，只要走进秦俑馆，就不难发现，这里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有各自的研究成果刊诸于世，就连一般的工作人员，那怕是一个在一般工作岗位上的小姑娘，也有几篇见诸报刊的文章让你大开眼界，诧异之余，让人多了几分敬佩。写到这里，顺便再提一提那位在秦将军俑头案中倒了霉的王学理先生，他参加秦俑的发掘研究历经 18 年的时光，正如他所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我在先前发表的和现在修订的这篇关于秦俑发掘的拙作中，还是没有更多地去描写他，去提及他那工作中很有些不凡

的那一部分。令我惭愧和不安的是，却用了过多的篇幅去描述了他倒霉的那段恩怨。平心而论，这对王学理先生来说是不公平的，但我自然也有苦处，且这种苦处很难宣示于众，这些，我在给王学理先生的信中已经作了说明。

现在我再要补充的是，王学理先生在被撤职查办之后离开了秦俑发掘工地，回到了西安他的家中闲居。他一面写申诉材料为自己申冤，一面做秦俑的研究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凭着多年的发掘积累，硬是写出了《秦俑专题研究》和《秦物质文化史》两本像砖头一样厚的专著，这两本专著出版后，得到了行家们的一致好评。其锋利的笔触，独特而又切中历史真实要害的剖析以及流畅的文字，标志着这两部专著的特点和文化风格，就目前中国考古界整个关于秦俑研究的文章和著作而言，是出类拔萃的。对一个研究者来说，这也许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吧。

后来的王学理先生终于又有了一个主持西安西部汉阳陵兵马俑考古发掘工作的机会，并很快打开了局面，国内外颇有些声响，只是好景不长，当我第二次去西安时，他已被宣布退休，离开阳陵发掘工地，此时的王学理颇不服气，于是又引爆了一场官司。王学理当然是这场官司中的主角。

同上一次基本相同的是，他一边打着官司，又一边做着汉阳陵的专题研究，也许不远的将来，这项研究成果又将公布于世，不知这次是福是祸。

王学理先生在将军俑头案和他在退休问题上的是是非非，我无力去作过多和准确的评价，或许这些恩怨对他对我都不重要，引起我心灵震撼的倒是英雄末路，尚有如此雄心壮志，在令人扼腕叹息的同时，又觉得确不失为一条真正的汉子。

末章 狐愤

1995 年的最后一天，我完成了这中断了 3 年的采访，就要告别秦俑博物馆。

丝丝细雨在冷风的吹拂中飘洒荡动、婉转缠绕。驻足于秦俑馆广场，回望细雨白雾中的兵马俑展厅，心中蓦然涌起一股怅惘情怀和离别凄楚。而对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我感到离别的脚步是那样的沉重、我已深深地爱上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将手中的行李暂寄于广场旁的服务部，我以复杂的感怀心境，再次步入大秦帝国的窗口，向曾给予我无数次激动和伤感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作最后的辞别——你们穿透 2000 多年的黑暗岁月，伴着二十世纪的曙光幸运地回到了人类文明的怀抱。你们这历经劫难而不朽的身躯，在新世纪的光照里注入了鲜活的血液再度获得新生。你们原本就不曾死去，只是以睡眠的姿态，在漫漫长夜里孤独寂寞地存活。你们卧薪尝胆，渴望面世。今天，终于破土而出，尽管身心的伤痕累累，仍不失百里秦川壮士的英雄风采。

你们在那个需要英雄和武力的特定历史时期从母腹里呱呱坠地，你们在激烈动荡烽火连绵的岁月中成长。你们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奔涌飞腾，你们在呼唤英雄的战鼓擂动中，毅然拿起刀矛剑戟，跨马挺枪冲入战场。

你们在历史使命的感召下，责无旁贷地选择了军人这个最能显示人生命力和价值的职业，你们脱胎于战争的岁月，又在战火中煅烧，你们为此付出了生命，付出了爱也付出了恨，你们用青春热血染红了深厚广袤的黄土地，染红了大秦帝国日渐高升的太阳。你们用青春和生命书写着大多数人所不会具有的英雄的壮歌与史诗，你们的太阳曜曜辉煌。

当你们从沉睡中醒来，四顾青山绿水、乡村田陌，都市风流，却见不到你们用青春和生命构筑的那个辉煌夺目的大秦帝国，大秦帝国早已香消玉殒成为历史的片刻烽烟与尘埃。历史老人就是这样造就着一切又毁灭着一切。

直面历史，瞻望未来，你们会觉得分外凄苦与悲怆。战争与和平、和平与战争，只不过是历史巨掌随意翻卷的一种游戏或顺通血液、增强肌肤的健美操。某个历史时期的战争只不过是随意翻卷的瞬间颤动，战争中的具体人在这颤动的瞬间更无足轻重，历史老人在匆匆的进程中，只关心自己的脚步，对推动着的人的生命个体从不承担道德责任和政治义务。

你们悟通了这一点后，才会真正明白：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只有大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个历史启示是永恒而不变的。由此，你们将更会大彻大悟，从而抛弃一时的悲哀与委屈，在新世纪的霞光里，和今天的人们共同将生命的新太阳高高举起。

作别你们的心情是复杂的。

在这个浓缩着大秦帝国政治、经济、文化诸多盖世风情的一隅之地，你们仍然扼守着军人的天职和责任，作出了生命不死的勇猛姿容，以惊世骇俗的尚武精神对面前的一切生命都构成身心的震撼和情感的颤栗。其实，你们只是华夏民族普普通通的孩子，脉管里跃荡着同你们的父辈和子孙一样的鲜血，心中也同样蕴藏着儿女情长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要脱下沉重的戎装，你们就不再以军人的名义命名和生活，而成为普通大众的一员。但当历史和民族一旦需要通过战争创造和平时，你们便义无反顾地踏上征战厮杀的途程。许多战士倒在血泊中至今仍未站起，历史虽经过了千年岁月的淘洗，但

你们抛洒的热血尚能清晰可辨，一个个相互拥抱着、搀扶着、亲吻着的残碎的躯体和不屈的灵魂，使我看到战争酷烈的同时，也看到一个民族令人生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血肉之躯正是支撑帝国大厦的基石与脊梁。因此，秦帝国大厦可以倾塌，但基石与风骨却永存。秦始皇可以死，但兵马俑不死。历史苍茫，尘烟漫漫。秦帝国走向鼎盛的艰难和为此付出的艰辛与悲苦已难为后人知晓。唯兵马俑的铮铮铁骨已作为一个民族坚毅的性格与永恒的图腾。我流泪了。我获得了真诚与充实。短暂的交往已使我们心心相印、彼此相属、相生，你们是我们的过去，我们是你们的今天与明天。古人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外有敌国，则其计先自强。自强者，人畏我，我不畏人。”这不是口号，而是强音。面对翻云覆雨的世界和激烈的竞争，我们要在全球竞争的舞台上站稳脚跟并取得胜利，就必须以空前的使命感与勇往无前的献身精神，清醒地认识世界，理智地认识自身并塑造自身，从而构成重建中华文明大厦的牢固基石，凝聚起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舍此，别无选择……就要走出大秦帝国的窗口，就要和你们作最后的握别。心头涌噎着许多情愫尚无法尽情吐出。“今天的参观使我对中国的两支不同的军队有了不同的了解，一支是现代的军队，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可以立即开赴边境。另一支是默默无闻的军队，就是这支‘秦军’。他们现在虽然不能打仗，但仍在起作用。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来的人们。”这是卢森堡体育、卫生大臣克利普斯对你们的崇高评价。也是我的肺腑之音。

秦始皇陵兵马俑，我以全人类的名义向你们致敬！

